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2024/6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四年第六期（总第四十八期第八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xj](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开放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6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委：王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俊
李捷 杨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俭 张建 张献生
陈纪 陈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长：夏晓华

主编：王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6期（总第48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8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研究

- 01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缘由、定性和功能 / 陈喜庆
- 1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
/ 杨志平 刘金华
- 23 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样态构成、作用机制与行动
路向 / 李昱丰
- 34 团结与改革的交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机制与动力保障 / 王艺腾
- 44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历史、经验与路径
/ 杨玉文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研究

- 56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 高永久 冯 辉
- 70 “合一共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 牛汝极
- 82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 欧阳彬 魏 莹
- 94 流动与融居：交往现代化推进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路径考察
/ 程中兴
- 103 舌尖上的家国：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价值、逻辑与路径 / 李 波 宋 聪
- 114 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传播的实践探索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 / 许丹荔 王炳涵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专题

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研究

- 124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续建与完善
/ 王英津 于 顺
- 138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
/ 韩碧舟
- 152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建构、成效与完善
——基于《香港国安法》的分析 / 徐天骄
- 167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 / 曹宇轩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全球超级选举年与世界政党政治新动向研究

- 182 2024年总统大选与美式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 / 张春满

研究现状与动态

- 194 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图谱：维度、特征与展望
——基于2020年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分析 / 龚静阳
- 211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年总目次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4 No.6(Sum No.48) Vol.8

- 01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s a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 : Reason, Qualities and Function
Chen Xiqing
- 10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Political Advantages
Yang Zhiping&Liu Jinhua
- 23 The Pattern Composition, Mechanism and Action Direction of the CPC's Political Advan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ed Front
Li Yufeng
- 34 Symphony of Unity and Reform: Dual Mechanism and Dynamic Guarante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ang Yiteng
- 44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History, Experience and Path
Yang Yuwen
- 56 The Common Meaning and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Gao Yongjiu&Feng Hui
- 70 Unity and Common Destiny: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Niu Ruji
- 82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Daily Life: Logical Path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Ou Yangbin&Wei Ying
- 94 Mobility and Integration: Exploring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order Ethnic Interembedded
Communities through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Cheng Zhongxing
- 103 Family and Country on the Tip of the Tongue: The Value, Logic and Path of Using Food as a Symbol of Culture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bo&Song Cong
- 114 Exploration into the Practice of Using Games as a Medium to Empower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aking "Black Myth: Wukong" as an Example
Xu Danli&Wang Binghan
- 124 Contin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ang Yingjin&Yu Shun
- 138 The Extraterritori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System in the Gover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y
Han Bizhou
- 152 The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of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Xu Tianjiao
- 167 The Process, Breakthroughs and Prospec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Cao Yuxuan
- 182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Election Political Exception Theory
Zhang Chunman
- 194 The Construction Map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United Front: Dimens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Analysis of Reprinting Papers from People's Congress Reprint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ince
2020
Gong Jingyang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缘由、定性和功能

陈喜庆

（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 100800）

摘要：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是人民政协的基本性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重大定位，需要回答“统一战线为什么一般都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为什么人民政协一直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在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中具有哪些功能”等三个主要问题。从缘由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涉及党的坚强领导、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政治基础、一定的组织形式等关键因素，其中一定的组织形式起着重要作用。从定性看，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集中体现。从功能看，人民政协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渠道，是统一战线成员学习提高、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重要组织，是统一战线联谊交友、加强团结的重要场所，是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稳定和谐的重要机构，是统一战线成员团结合作、服务大局的重要平台。

关键词：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性质定位；团结；民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001-09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是人民政协的基本性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有利于最大限度把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1]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6.001

作者简介：陈喜庆，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

引用格式：陈喜庆.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缘由、定性和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9.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2]这其中也包含着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功能的要求。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长期实践表明，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作用的要求，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统一战线一般都要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基本缘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无论是推动建立、还是巩固发展，都同以下几个关键因素密切相关，而一定的组织形式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党的坚强领导。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就是领而导之，其中“领”即统领，“导”即引导。统一战线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团结合作，而要保持这种团结协作，就必须要有领导。有领导，才能使统一战线保持正确的共同前进方向，才能实现有效协同配合，才能最终取得胜利。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有一个乐队指挥。”^[3]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实践揭示了成为领导者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即特质、实力和贡献。所谓“特质”，就是领导者具有的特殊品质；所谓“实力”，就是具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所谓“贡献”，就是在统一战线中责任重、出力多、贡献大。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中成为领导者，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三个基本条件。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地位，首先是由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组成的，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的，是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是以先进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和组织起来的。其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决定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拥有 500 多万基层党组织和近 1 亿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具有 75 年的全国执政经验，并领导着全国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从而能够将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团结在自己周围。再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卓越贡献决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和强盛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昂首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和国家之林。

第二，共同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4]统一战线是不同的政治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盟。可以说，共同目标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共同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巩固发展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共同奋斗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共同奋斗目标是在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第三，共同的政治基础。共同的政治基础即围绕实现共同奋斗目标而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

策。这些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是参加统一战线的各方面都要共同遵守的, 因而这对于各方面也是一种约束。任何一个方面如不遵守这些政治原则和方针政策, 也就破坏了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 进而会危害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1937年9月20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9月29日, 毛泽东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 指出: “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 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 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人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5]。毛泽东的这段话深刻阐明了共同纲领即共同政治基础对于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作用。正因为如此,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统一战线实践中, 十分重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的工作。比如,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通过了《共同纲领》;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明确了统一战线必须遵守的若干政治准则, 核心内容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巩固共同政治基础, 有力地保障了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

第四, 一定的组织形式。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这决定了统一战线内部, 有许多事情要协商一致, 有许多工作要协作开展, 有许多关系要协调和谐, 特别是有许多利益矛盾要协议化解, 因而一般就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 作为将各方面联系起来的桥梁纽带, 作为协调处理各种问题的平台。1938年4月5日,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就第二次国共合作讲演时, 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他特别指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 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 甚至设想可以“另外组织一个党, 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 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5] 64}。这充分表明了一定的组织形式, 对于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十分重视通过建立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比如, 大革命时期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采取了党内合作的形式, 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组织实际上就成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强统一战线组织建设的历史过程, 李维汉在1949年3月1日《关于统战问题的报告》中曾有具体论述。他说, “大革命时期也有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今后相当时期内, 只要中国还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 这一个组织形式就一定要保存”。

二、人民政协一直是统一战线重要组织形式的科学定性

人民政协成立75年来, 尽管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性质始终没有变。其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政协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本质和主题。统一战线的本质和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 而人民政协的显著特征就是汇聚了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 是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 同时参加人民政协的都是各方面代表性人物, 可以通过他们去团结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使命, 进而最大限度地为完成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关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问题, 涉及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 是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6]从人民政协的发展史看，在这个问题上曾存在模糊认识：或认为只是统一战线组织，或认为仅是协商机构，甚至曾有人认为应当成为权力机关。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贯的、明确的，即人民政协除新中国成立初期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而短暂具有权力机关性质外，一直以来都既是统一战线组织，同时又是协商机构。这也是人民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基本依据。通过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对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把握得更准确。

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首次明确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形式。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哈尔滨征求党外人士关于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意见时，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建议：“将来新政协应有一执行机构，保证共同纲领之执行，即类似外国民主阵线形式。”谭平山的意见受到中共中央重视。李维汉在 1949 年 3 月 1 日《关于统战问题的报告》中说，“新政协是具体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式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代表作报告时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8]中共中央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赞同，一致同意写进《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正式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但是，由于人民政协是个新事物，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特别是地方上的同志，对政协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性质认识不清，存在不少模糊看法。比如，有的认为政协是一种政权性质的机关，是行政和立法的机关，并对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是领导关系；有的认为政协是政府机关的下属单位，同时也搞不明白与党委统战工作部门的关系；有的甚至看不起政协，认为它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组织。针对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召开全国省市政协秘书长会议进行了研究，并于 1951 年 7 月印发了《关于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进一步明确：“协商委员会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去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9]，“协商委员会不是政权机关，也不是政府的隶属机关，而是协商、建议机关，它对政府的关系是协商、建议和协助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工作的关系”^{[9] 142}，“在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关系上，协商委员会不是它们的领导机关，而是它们的协商和团结合作的机关”^{[9] 142}，“协商委员会与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之间，也是协商和团结合作的关系”^{[9] 142}。

第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再次明确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没有变。在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过程中，有些人鉴于人民政协将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在政协性质等问题上再度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比较典型的有两种：一种主张人民政协应是权力机关或半权力机关，一种主张政协可以不要了。195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

议, 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的统一战线组织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具体意见: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在此以后它应作为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而继续存在, 并须在一切必要的地方设立地方组织, 其名称可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1954年12月19日, 毛泽东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 又对政协性质问题作了集中阐发, 指出: “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等于国家机关, 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 那就会一国二公, 是不行的。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 是党派性的。”^[11] 周恩来在随后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还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两种模糊认识作了分析, 指出: “这两种想法出于同一来源, 就是不懂得政协本身是统一战线的组织, 也就是党派性的联合组织。”^[12] 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协章程再次郑重明确, 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 仍然需要存在”。

第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 党中央在完善人民政协性质表述过程中反复重申人民政协仍然是统一战线组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各领域工作都在拨乱反正。围绕修改政协章程, 有关人士对政协性质、职能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讨论, 其中有一种意见, 主张给政协“扩权”。针对这种情况, 邓小平在1980年9月27日对修改政协章程的报告作出批示: “修改章程中, 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 可以提出批评建议, 但无权对政府提出质询, 它不同于人大, 此点请注意。”^[13]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 1982年12月通过的人民政协新章程中, 完善了政协的性质职能, 增加了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的内容, 但首要强调的仍然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特别是同年12月通过的“八二宪法”, 首次将人民政协的这一性质写入了序言, 郑重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此后, 199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又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的内容写入政协性质, 从而形成了政协性质三句话的表述, 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定性始终居于首要位置。

第四, 党的十八大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强调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后, 党内党外尤其是政协内部开展了热烈讨论, 有人提出要使政协的监督有“约束力”, 这实际上涉及的还是政协的性质定位问题。2014年9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 必须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 并强调“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 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 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14]。2019年9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完善了政协性质表述, 增加了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15]的内容, 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的定性继续排在首要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科学分析, 对推进人民政协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人民政协在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中的独特功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强调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并且要求人民政协发挥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这就决定了人民政协在开展各项工作中，都要赋予其统一战线意义，都要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最大限度地为完成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凝心聚力。为此，认真研究人民政协在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无疑是其有效体现功能的重要基础。从长期以来人民政协的工作实践看，人民政协在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中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功能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而这些方面也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努力方向。

第一，人民政协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渠道。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如何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呢？李维汉在新政协成立前后，对这个问题有过多论述。他在 1953 年 4 月说：“我们党既通过他们（指党外人士）的已有组织，又通过统一战线组织（指人民政协）去领导他们”，从而“实现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具有不同于其他方面的显著特征，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统战工作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必须明确，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16]

如何通过人民政协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呢？其主要方式就是寓领导于协商之中。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担负的基本职能。政治协商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广泛听取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意见建议，为党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另一方面，党在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成员协商的过程，同样是使他们了解和接受党的主张的过程，因而也是实现对其政治领导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人民政协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就要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第二，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成员学习提高、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重要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总是建立在一定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而不同时期形势任务不同，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也会发生变化，这决定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始终是统一战线和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的紧要任务。人民政协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学习型组织。一届全国政协就通过了《学习座谈会暂行办法》，成立了专门的学习委员会。二届全国政协更把加强学习作为人民政协的五大任务之一，并创办了由中央统战部指导、由全国政协常委会直接领导、由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社会主义学院。长期以来，人民政协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创造了多种学习方式。一是开展集中学习，如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组织学习，举办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讲座、政协委员学习研讨班、依托各专门委员会组织学习报告会等。二是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巩固学习成果。特别是抓住一些重大历史节点、重大事件等契机，组织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与其

中, 既发挥作用, 又受到教育; 将学习教育寓于各种履职工作中, 不论是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活动, 还是开展提案工作、视察工作、专题调研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祖国统一和海外联谊会工作、对外交往工作, 乃至文史资料工作, 都渗透进学习教育的内容, 从而使人民政协在巩固统一战线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人民政协历来十分强调自我教育, 这是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和统一战线特点的。任何教育如果不能转化为自我教育, 任何“他觉”如果不能转化为“自觉”, 就不能达到学习教育目的。尤其是人民政协中集中了统一战线各领域的代表人物, 许多都是教育别人的人, 只有注重自我教育, 才能使学习教育成为一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 也才能收到提高认识、增进共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效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成员的重要学习组织,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始终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 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

第三,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联谊交友、加强团结的重要场所。统一战线成员数以亿计, 并且还在不断增多过程之中, 如何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实现广泛团结呢? 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做好各方面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 进而通过他们去做所联系成员和群众的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说, 党外代表人士具有双重属性: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 他们是统一战线工作对象; 对其所联系成员和群众而言, 他们又是统一战线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重要方法是联谊交友。搞好联谊交友, 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广交与深交的关系。广交就是朋友要多, 深交就是朋友要真, 成为挚友、诤友, 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铁杆朋友”。二是入情与入理的关系。中国有个词叫“入情入理”, 将“入情”放在了“入理”前面,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感情融洽了, 有助于接受道理, 所以在联谊交友过程中, 既要重视讲理, 也要重视讲情。三是私谊与公谊的关系。统一战线中的联谊交友, 是为党和国家交朋友。因此, 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过程中会有私谊, 但不能置于公谊之上。四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联谊交友是个长期的过程, 特别是要成为“铁杆朋友”, 更不可能短期就能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这个问题时, 曾用福建的两道名菜作说明。有一道菜叫“开水氽海蚌”, 要快, 几十秒即可; 另一道菜叫“佛跳墙”, 要慢, 需要十几个小时。与党外人士交“铁杆朋友”, 就像做“佛跳墙”, 是个慢功夫, 要持之以恒。

人民政协人才荟萃, 汇聚了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士。这既是人民政协的显著特点, 也是其开展联谊交友、加强团结工作的独特优势。长期以来, 人民政协通过专委会、界别、政协机关等渠道, 运用恳谈交流、走访看望等方式, 密切了与政协组织中党外代表人士的联系, 为党结交了大批朋友。特别是每年的政协全体会、常委会和主席会及各种考察活动, 既是重要的议政建言活动, 也是重要的联谊交友机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联谊交友、加强团结的重要场所, 要进一步深化联谊交友工作, 建立健全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 特别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更加注重通过人民政协广交深交党外朋友, 从而画出最大同心圆,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第四, 人民政协是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稳定和谐的重要机构。马克思说: “人们奋斗

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 同样，统一战线作为不同社会力量结成的联盟，也同利益密切相关。何谓“利益”？利益是在需要基础上产生的，凡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利益。也就是说，无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属于利益范畴的内容。按照不同的标准，利益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按实现范围不同，可以划分为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按实现时间不同，可以划分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按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这里的个体利益是不同个体所特有的利益，也就是特殊利益；群体利益是多个个体利益重合的部分，也就是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汇聚了各方面成员，而每一方面的成员既在根本利益、共同利益上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又在特殊利益、具体利益上有所区别，同时统一战线成员彼此之间也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分歧，因而协调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保持统一战线稳定和谐，始终是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

人民政协作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包括了各政党、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和港澳台侨同胞，在协调统一战线关系中担负着重要职责。早在人民政协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明确政治协商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一方面是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中的重大问题。1954 年 12 月，毛泽东把协调关系作为人民政协五大任务之一。2006 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协调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五大关系作为统一战线重要任务提出后，人民政协也把协调这些关系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调整和处理统一战线各方面关系”，同时对如何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作出了具体规定。长期以来，人民政协积极协调关系、反映意见、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为促进统一战线稳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政协作为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稳定和谐的重要机构，要全面参与协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工作，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友党关系；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促进形成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相互关爱、和谐共处的局面；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巩固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第五，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成员团结合作、服务大局的重要平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自身价值的重要体现。人民政协具有统一战线组织与专门协商机构有机结合的显著优势，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搭建了团结合作、服务大局的重要平台，成为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重要实现形式。在人民政协这个平台上，统一战线成员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的基本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凝聚”。一是凝聚共识，即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目标任务的变化，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做到心往一处想。二是凝聚智慧，即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意见建议，始终做到智往一处谋。三是凝聚力量，即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为完成党和国家提出的目标任务，团结一心、形成合力、共同奋斗，始终做到劲往一处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成员团结合作、服务大局的重要平台，要

陈喜庆.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 缘由、定性和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9.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要求, 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深入推进协商议政。优化重点协商方案生成机制, 通过深入调研真切感知经济社会实际运行状况、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和问题, 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发挥协商监督优势, 增进民主监督实效, 助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0 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67.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554.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中卷 [M]. 修订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7.
-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N]. 人民日报, 2023-03-19 (3).
- [7] 沙健孙. 中国共产党史稿 (1921—1949): 第 5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551.
- [8]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36.
- [9]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2: 14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4 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436.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 2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325.
- [12] 秦立海.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 1949—1954 年的中国政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07.
- [1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 与人大代表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13.
- [1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 21 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2 (2).
- [15]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0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1 (2).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30.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8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 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

杨志平 刘金华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优势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优势的规律性认识。从生成理路来看，这一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提炼与总结、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从理论意涵来看，这一重要论述围绕领导优势论、理论优势论、精神优势论、宣传优势论、组织优势论、群众优势论、统战优势论、制度优势论、执行优势论、道义优势论等十个方面展开，推动了党对于自身政治优势的认识更加深入。从实践要求来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制度自信，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010-13

DOI：10.13946/j.cnki.jcqis.2024.06.002

作者简介：杨志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金华，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9LLKDA015）

引用格式：杨志平，刘金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10-22．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优势通常指的是在政治领域或政治活动中, 某一政治实体(如国家、政党、政治集团等)相对于其他政治实体所表现出的某种突出的、有利的条件或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政治优势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形成的有利政治条件和突出政治表现^[1], 包括领导优势、群众优势、理论优势等。“这种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力量, 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法宝”^[2],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优势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 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简称“这一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什么要巩固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巩固和增强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怎样巩固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为深入理解党的自身优势、增强政党自信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重要论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提炼与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 推进与加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吸收与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刻围绕领导优势论、理论优势论、精神优势论、宣传优势论、组织优势论、群众优势论、统战优势论、制度优势论、执行优势论、道义优势论等十个方面展开, 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科学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 不断巩固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对于以强大政治优势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政治优势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聚焦政治优势的具体概念研究。有的学者提出, 所谓政治优势, 其含义接近或等同于政治层面的优越性、先进性, 是对党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成功经验等的概括升华和高度凝结, 是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的综合反映^[3]。也有的学者提出, 人民认可是特定政治势力取得管理地位的必要条件、获得政治优势的基本前提^[4]。二是聚焦政治优势的内容体系研究。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与制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卓越组织领导力、广泛动员力、超强执行力和改革创新力^[5]。三是聚焦政治优势的具体方面研究。有的学者认为, 初心使命突出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6]。有的学者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发展历程出发, 深刻阐述了讲政治对中国共产党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独特优势的重要意义^[7]。四是聚焦政治优势的价值意义研究。有学者指出, 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在推进国家治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8]。

综上所述, 政治优势在党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学界对于政治优势的研究较多, 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在研究的整体性与时代性上需要加强, 特别是要突出新时代政治优势的新特点、新内容与新形式, 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学理性阐释与实践性解读。本文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 重点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生成理路、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 以更好阐释党的政治优势从何而来、由何构成、如何发展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好、

发展好党的政治优势，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生成理路

理论是对时代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现实依据与文化基因。这一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提炼与总结、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一）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理论基础，“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9]。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做了初步探索，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原则，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形成，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0]。一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9] 173}无产阶级只有建立完全独立的、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组织，并在这个组织中取得领导地位，才能统一整个无产阶级的行动，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占据主动，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与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1]其历史使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12]。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建立起来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13]。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发扬民主，又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确保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二）历史渊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提炼与总结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不断丰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政治优势，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提炼与总结，深刻证明了党的政治优势的优越性，具有坚实历史根基。

重视政治优势的培育和发展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总结。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就深刻认识到政治优势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领导优势与群众优势方面。毛泽东提出：“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14]建设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党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集中全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效果显著。改革时期，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充分注意到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领导优势、理论优势等, 并注重发挥政治优势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强调: “有了共同的理想, 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5] 江泽民认为: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16] 胡锦涛提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显著政治优势, 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永远坚持。”^[17] 总的来说, 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过程中, 党不断根据历史经验与时代条件丰富和发展党的政治优势, 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三）现实依据：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与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 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18],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 有着坚实的实践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是全党的共同责任, 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18] 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来看, 首先, 我们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定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与政治原则, 统一了全党意志和行动, 彰显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其次, 我们着力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 从而在思想上坚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组织上增强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作风上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纪律上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制度上强化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18], 使党的理论优势、组织优势与制度优势等得到充分彰显与提升。最后, 我们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 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 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保障了人民权益,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厚植了党的群众优势, 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四）文化基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深刻的政治思想与治国理政智慧, 是中国政治理念不断发展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充分吸收与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智慧,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19]。一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构建理想社会是中国古代先贤们所普遍追求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建立在“公天下”的基础之上, 强调社会治理要公平、公正, 坚持公共利益至上, 并倡导建构万类共存、协和万邦的世界图景^[20]。二是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突出强调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德治思想是古代中国的基本治国思想之一, 包含行德政、施德教、修德行三方面的基本内容^[21]。三是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四是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这一政治理念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为一体^[22], 突出“家国同构”的重要政治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文化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形

成提供了重要文化滋养，成为构建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重要文明底色^[23]。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是由领导优势论、理论优势论、精神优势论、宣传优势论、组织优势论、群众优势论、统战优势论、制度优势论、执行优势论、道义优势论等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对于指导党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领导优势论：党的全面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组织起来的政党，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2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指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必须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将改革向纵深推进，取得更大改革发展成就。首先，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的全面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各项改革，将党的领导贯穿到改革各项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确保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其次，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不仅体现在党的政治领导上，还体现在党的思想引领上。作为一个拥有超过 14 亿人口的大国，要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难以想象的^[25]。因此，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增强和扩大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一方面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等的领导，一方面将党的领导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进重大工作，更好维护国家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理论优势论：科学理论指导的强大政治优势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政治优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自身，使党始终具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强大政治优势，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26] 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强大政治优势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反复比较中、实践发展中得出的，具有强大的历史根基与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7] 一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为人类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特别是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二是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理论,要充分发挥党的理论优势,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理论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引领和理论支撑。

（三）精神优势论：勇于自我革命的显著政治优势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自我革命优势的历史发展与重大意义,彰显了自我革命的显著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18]从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来历史来看,党不仅成功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更找到了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28]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优势与政治品格是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原因,党始终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及时地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了党的生机与活力,使党始终具有坚强的领导力、执行力、号召力,推进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当前,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29]。因此,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宣传优势论：善于思想宣传的鲜明政治优势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对于发挥党的宣传优势作出了重要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30]一是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坚定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提升了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在各个时期,党始终注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厚植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党校体系,专门教育培训干部,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31]二是通过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争取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充分发挥我们党善于宣传和组织群众的政治优势,加强宣传教育,开展群众工作,有的放矢地向群众讲清基本道理,以更好地求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32]。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及时了解群众利益诉求,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思想认识问题和现实利益问题,从思想上凝聚了共识、统一了力量。三是通过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塑造了中国良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3]在全球

化时代，党必须发挥思想宣传的政治优势，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文化的故事，让世界更加了解客观、真实、全面的中国，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

（五）组织优势论：严明组织纪律的突出政治优势

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深刻突出了党严明组织纪律的政治优势，这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29] 9}首先，严明组织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29] 7}组织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鲜明底色。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4]其次，严明组织纪律是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与执行力的必然要求。党的组织纪律严明，才能够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章程与决议，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增强党在思想上、意识上与行动上的统一，保持党强大的战斗力与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29] 4}最后，严明组织纪律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根本要求。我们党之所以能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九千九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是根本保障。因此，必须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坚持自我革命，坚决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从而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使党始终能够紧跟时代步伐、肩负时代重任。

（六）群众优势论：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政治优势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5]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根本政治优势，如果失去了这个优势，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3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逻辑，对于党的群众优势论进行了重要解答，深刻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7]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政治优势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增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其次，历史反复证明，“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38]。百余年来，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充分说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7] 21}为了发挥好党的群众优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急难盼愁的问题，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进一步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七) 统战优势论: 广泛协商合作的重要政治优势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实践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优势。”^[39]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 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凝聚共识。”^[40]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其本质就在于大团结大联合, 以协商合作的重要政治优势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团结统一, 致力于实现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与发展目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运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 其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4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 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27] 351}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团结和联合, 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与诉求, 必须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优势, 加强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 以协商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 不断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扩大团结面, 最大限度把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磅礴伟力。

(八) 制度优势论: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政治优势

凡将立国, 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28] 2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是“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 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政治优势。这一优势在于党和国家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整合社会资源, 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应急救灾或者重点任务攻坚, 从而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有效调配, 汇聚了强大的发展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42]。新中国成立以来,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全面深化改革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 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发展动力, 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28] 206}。在脱贫攻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28] 439}。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下, 党可以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着眼国家长远利益和长远发展, 针对国家重点发展任务进行统筹谋划和整体布局, 并借助完备的组织体系进行政治动员, 集中各方面力量和资源来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提高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使得我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 也为我们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九) 执行优势论: 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大政治优势

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大政治优势, 深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实践中, 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中, 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28] 391}旗帜鲜明讲政治，关键在执行。从根本上说是要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政治理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百余年历史来看，全党讲政治，对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例如，“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28] 425-426}。这就深刻证明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29] 23}。旗帜鲜明讲政治，促进了全党在思想意志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深刻领悟讲政治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方针、政治路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十）道义优势论：坚持胸怀天下的独特政治优势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为全人类求解放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彰显了中国共产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使命责任^[4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44]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历史，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以来，始终把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其政治优势所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讲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 411}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与使命，不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而且勇于承担大党大国的历史责任，始终将自身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坚持为人类谋和平、谋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促进世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45]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到“三大全球倡议”，无不证明了中国共产始终具有胸怀天下的政治优势，坚持站在全人类发展的整体性高度，促进全球发展繁荣、世界和平稳定与人类文明进步，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制度自信, 坚持好、发展好党的政治优势,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政治保障。

(一)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8] 183} 作为一个拥有九千九百多万名党员、五百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要团结带领 14 亿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保证全党令行禁止, 这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在, 是党和国家的命运所系。首先, 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发挥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要政治优势,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其次, 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将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 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 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最后, 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这是发挥党的领导优势的根本所在。当前,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党员干部必须加快适应发展新形势, 加强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 及时克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 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二) 坚持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 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46] 近代以来, 饱受磨难与挫折的中华民族迫切希望寻找到新的理论, 走向新的道路, 实现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 在各种方案中, 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成功选择。毛泽东强调: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 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7] 百余年来, 党之所以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完成各种艰巨任务, 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使党的发展始终具有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指南, 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46] 30} 新时代新征程, 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生命力, 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根本理论指引。

(三) 坚持人民至上,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不断厚植党的群众优势, 增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实践成就, 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人民理论, 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 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48]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经验, 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同时, 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坚持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加快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福祉。

（四）坚持制度自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4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50]。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既源于其自身的特质和优点，也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支撑和保障^[51]。一是坚持制度自信，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释放制度潜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二是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强化制度监管，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28] 28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取得的，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 [1] 柴宝勇，黎田.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内涵、来源与巩固路径 [J]. 国家治理，2023（17）：8-12.
- [2] 习近平. 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 [J]. 求是，2012（15）：3-7.
- [3] 于安龙. 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多维向度与辩证逻辑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8-50.
- [4] 周叶中，闫纪钢. 论依规治党的政治优势 [J]. 求是学刊，2023（1）：1-12.
- [5] 张瑞敏，龙梅. 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中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独特法宝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23-127.
- [6] 赵笑蕾. 党的初心使命论的理论逻辑和政治优势 [J]. 兰州学刊，2022（1）：5-14.
- [7] 段妍. 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论析 [J]. 新疆社会科学，2022（1）：8-14+146.
- [8] 林尚立. 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J]. 求是，2014（6）：14-16.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1.
- [10] 张荣臣. 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当代价值 [J]. 重庆社会科学，2018（5）：6-12+2.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 [12] 刘宁宁.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1）：38-46+159.
- [13] 刘泽兰，彭正德.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及启示 [J]. 湖湘论坛，2021（5）：26-36.
-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6.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4.
- [16] 江泽民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3.
- [17] 胡锦涛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0.
- [1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

杨志平, 刘金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0-22.

深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06-16 (1).

- [1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37.
- [20] 曹润青.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N]. 学习时报, 2023-09-04 (3).
- [21] 郭璐璐. 成果、经验与展望——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性转化之路 [J]. 宁夏社会科学, 2019 (3): 18-25.
- [22] 郝良华, 曲晓萌.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N]. 学习时报, 2023-11-27 (3).
- [23] 张铮. “第二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 (5): 35-44.
- [24] 习近平.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4年9月16日) [J]. 求是, 2024 (18): 4-11.
- [25] 熊光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J]. 红旗文稿, 2016 (14): 10-11.
- [2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2-07-28 (1).
- [2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
-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88.
- [2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61.
- [3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19-04-20 (1).
- [31]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44.
- [32]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544.
- [33]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3-08-21 (1).
-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13.
- [35]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136.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70-171.
- [37]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63.
- [38] 冯俊. 东风化雨——冯俊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55.
- [39]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0.
- [40]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王沪宁介绍有关情况 汪洋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9-11-02 (1).
- [41]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

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 [4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18.
- [43] 吴志成, 刘培东. 中国共产党坚持天下胸怀的理论与实践 [J]. 政治学研究, 2022 (3): 23-36.
- [44]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17 年 12 月 1 日, 北京) [N]. 人民日报, 2017-12-02 (2).
- [4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4.
- [4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9.
- [47]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 [4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N]. 人民日报, 2024-08-16 (1).
- [4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1.
- [50]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51] 于安龙. 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基本维度、内在构成与壮大路向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3): 27-40.

责任编辑: 王京菁



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 样态构成、作用机制与行动路向

李昱丰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统一战线与党的政治优势之间存在共生互促的逻辑关系，有必要运用统一战线视域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以党的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为依据，可以从制度、组织、理论和文化四个维度来理解党的政治优势。从政治优势赋能统一战线的作用机制看，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提升统战效能，以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优势释放统战动能，以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理论优势挖掘统战潜能，以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优势凝聚统战势能，以此发挥合力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从统一战线巩固政治优势的行动路向看，要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全面把握党的政治优势，以统一战线的制度创新不断夯实政治优势的持久根基，以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政治优势的方向牵引，以统战文化建设强化政治优势的精神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党的全面领导；统一战线；大统战工作格局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4）06-0023-11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6.03

作者简介： 李昱丰，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话语创新研究”（2022EDS003）；武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课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监督理论的学理阐释及实践证成”（whtz202404）；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预研究项目“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研究”（2024ECNU-YYJ061）

引用格式： 李昱丰. 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样态构成、作用机制与行动路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6): 23-33.

一、问题的提出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根据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赋予团结与联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下，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成为当前统战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关注的重大课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政治保障^[2]。在党领导推进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党的政治优势赋予了统一战线蓬勃的生命力、强大的组织力、高效的执行力和真切的感召力，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又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政治优势。

既有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以统一战线本体论为视角研究其基本理论问题。有学者立足于大统战的宏阔视野，探讨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耦合共生的同构逻辑^[3]；有学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表现形式^[4]；有学者以统一战线的话语叙事体系为研究路径探讨了其历史演进与建构逻辑^[5]。第二，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结构与价值。有学者立足整体性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构成及其实践路径^[6]；有学者则就党政治优势的某一重点维度展开探讨，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7]，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战胜风险挑战的政治优势^[8]，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9]。第三，将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联系起来，考察其相互作用机制。有学者以统一战线在国家制度中的嵌入与演变为视角，探讨了统一战线制度体系与政治优势之间的结构关联^[10]。有学者论证了统一战线在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显著优势^[11]。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一战线发挥的独特政治优势、价值优势和发展优势^[12]。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虽然已经回答了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但尚不足以反映统一战线与党的政治优势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逻辑张力。

统一战线与党的政治优势之间存在共生互促的逻辑关系，有必要运用统一战线视域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第一，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这些政治优势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第二，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政治优势在其运作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第三，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统一战线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政治优势。基于上述理论观照，本文在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构成样态的基础上，阐明统一战线与党的政治优势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做好统战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样态构成

政治优势是对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成功经验等方面特质的凝练与升华，是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宝贵政治财富与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

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 14}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党的政治优势提供了理论支撑。以这“四力”为视角解析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政治优势, 可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制度、组织、理论和文化四个维度。

（一）政治领导力：政治优势的制度之维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指其作为政治领导力量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 具体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对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认同, 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作用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结果, 体现了独特的制度优势。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解析其制度优势需从党内与党外两大维度展开。

其一,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制度优势。2021年7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明确了“1+4”的党内法规体系架构, 包括党章和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五个板块^[13]。这为学术界阐明党的制度体系框架提供了基本遵循。以此为依据, 党的制度体系可以用“1+4”的组织架构来概括: “1”是具有根本大法性质的党章, 其在党的制度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 “4”是指党的领导制度、党的组织制度、党的自身建设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制度。这四项制度从执行层面确保了党章中的各项制度规定能得到切实履行。这一制度框架既有总体制度安排, 又有具体执行制度, 是一个具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多重制度要素综合体^[14], 显示出体系化、规范化的独特优势。

其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 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1] 28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 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顶层谋划、举旗定向和集中领航的关键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保障了中国共产党所锚定的目标能够通过一系列奋斗最终胜利实现。因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确保制度改革不改向不变色的政治定力优势^[15], 其他各项制度则在执行层面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转化为治理效能。总之, 党内制度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制度之维, 是党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治领导力的制度支撑。

（二）群众组织力：政治优势的组织之维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现代政党。能够将分散的个体以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是其具有强大群众组织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组织优势, 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其一, 高度明确的组织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已经明确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过程中, 这种明确的组织使命感、责任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展现了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其二, 高度有效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是激发党的创造活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16]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 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的有机结合, 能够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

共同意志，保障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作出科学决策、凝聚前进力量。其三，高度严密的组织体系。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17]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18]。这一组织体系赋予了其强大的组织优势。其四，高度严明的组织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19]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组织原则、建立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等方式，为严明党的纪律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三）思想引领力：政治优势的理论之维

当今世界政党众多，其多数都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或思想理论。然而，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孕育出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基因和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优势。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0]以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著称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历史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中证明了其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禀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理论优势的前提基础。不过，理论优势并非一经确立就恒久不变。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必须适应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都必须在不断的理论探索中实现突破。如果只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而不对其进行符合时代条件、符合现实需要的理论创新，就会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充分总结百年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坚持理论创新上升为百年奋斗的基本历史经验，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要求^[21]。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理论创新的历史视野，从方法论层面进一步巩固了党的理论优势。总之，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优势是与生俱来的，这源自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继承与坚守^[22]。与此同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观照和人民群众实际需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并将其用于指导实践，既坚持理论指引、又坚持问题导向，既善于发现社会规律、又勤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在长期的理论探索中形成了强大的思想引领力。

（四）社会号召力：政治优势的文化之维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指其通过政治领导和思想宣传等方式引导社会成员对其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最终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发挥政治优势、形成社会号召力的过程中，文化具有凝聚人心、统一共识的重要作用。近代以降，中华文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风雨飘摇，救亡图存、重拾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然而，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还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实现凝聚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共识、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建文化自信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其原因有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鲜明文化属性。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0]¹⁷⁸恩格斯也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3]两位革命导师都高度重视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并创造性地将其与人的自由和解放联系起来,赋予了文化新的理论内核。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信。第二,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积淀赋予的文化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4]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精神、“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精神、“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创新精神和“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25],塑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精神家园。可见,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优势的历史底蕴。第三,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中形成的文化创新方法优势。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创新方法三个层面的理论思考。一是以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标识性概念激发文化创新自觉;二是以“第二个结合”挖掘中华文化创新的文明底蕴,推进文化理论结构性创新;三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方法,进一步延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路径,推动文化理论的反思性创新^[26]。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赋能统一战线的作用机制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政治优势赋能统一战线的根本前提。党的政治优势赋能统一战线的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提升统战效能,以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优势释放统战动能,以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优势挖掘统战潜能,以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优势凝聚统战势能。

(一) 向上生长: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提升统战效能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27]《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28]。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党的领导居于核心位置,是统战工作必须贯彻落实的最高原则,是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独特优势的制度之基。百余年来,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良好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这一制度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统一战线的视域下,把党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是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贯彻到统战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具体而言,一是在统战工作的顶层设计中贯彻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通过“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28]⁶提高统战工作效能。二是建立健全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执行体系,在统战机构的设置与运作、统战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学习、统战干部队伍的选拔与建设等具体环节中贯彻党的全面领导原则,提高了统战工作质量。三是在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实践中贯彻了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原则,

在发扬民主、尊重差异的同时坚决反对错误的政治主张，提升了统战工作凝聚力。综上所述，在统战领域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就是在一切统战工作中贯彻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一系列能够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作用的制度执行体系，为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进一步提升统战效能提供向上生长的新空间。

（二）向下扎根：以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优势释放统战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29]这一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的精准概括。在统一战线的视域下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及其作用机制，需要阐明党的组织优势如何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统战动能，推进新时代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30]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巩固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始终秉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这是党拥有强大组织动员力的思想根基。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同统一战线中用以凝聚共识的政治基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新时代以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下不懈奋斗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识。共识的凝聚就根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民族复兴强烈的使命自觉。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凝聚共识的前提基础，而严密的组织体系与高效的组织原则是保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现代化组织体系，在其组织体系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31]。这一组织优势作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路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战部、人民政协等统战机构、组织，确保事关统一战线的各项决策和议题能够自上而下地有效传达。其二，各级统战组织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程度地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由此，各级统战部门能够很好地形成合力，在不同层面有效地解决好人心和力量的问题，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

（三）向内延伸：以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理论优势挖掘统战潜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 483}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独特理论优势。这一理论优势作用于统一战线领域，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百余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32]，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品格，这是党能够不断推动统战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从客体层面看，在统一战线领域发挥党的理论优势就是勇于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守正创新，以科学的理论武器为指导，挖掘统一战线更深层次的力量。统一战线的立论基础源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具体认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准确地判断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统一战线策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统一战

线经历了从阶级联盟到政治联盟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正是党运用科学理论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果。在党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具体过程中, 党的统战机构设置不断完善、统战工作范围不断扩大、统战工作对象不断丰富、统战工作方式不断优化, 统一战线合众力、集众智、调动社会力量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些潜能的挖掘是党充分发挥理论优势、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 419} 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 党对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不断推进, 内在潜能得到充分挖掘。

（四）向外拓展：以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优势凝聚统战势能

文化具有凝心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3] 这一论述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两个方面的文化基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以来, 党正是基于这两种文化基因, 通过“两个结合”的文化创新方法, 在统一战线工作领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统战文化。在统一战线中充分发挥我们党独特的文化优势, 是新时代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强大统战势能的精神保障。

党的政治优势赋能统一战线的文化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的党内政治文化优势, 以崇高的党内信仰文化、团结的党内组织文化、务实的党内行为文化和严密的党内制度文化^[34] 为新时代党的统战文化锚定方向。第二, 以“两个结合”的文化创新方法优势赋能统一战线, 为建设新时代统战文化提供方法论支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统一战线的性质宗旨、中心任务、组织形式等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在推进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中, 党通过“两个结合”的文化创新方法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经纬中汲取养分, 缔造了一系列统一战线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战文化。第三, 发挥统战文化以文化人的显著优势, 不断凝聚不同社会力量的思想共识。统战文化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增强了人们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和认同, 并进一步提供了将这一认同转化为行动的拓展空间。综上所述, 党在统一战线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 通过形成独特的统战文化达到了凝聚统战势能的目标。

四、以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行动路向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践过程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大政治优势。以统一战线巩固党的政治优势, 必须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全面把握政治优势, 以统战制度创新夯实政治优势, 以统战理论探索明确政治优势, 以统战文化建设强化政治优势。

（一）前提基础：在统战工作实践中把握政治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35] 在此背景下, 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必须以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前提, 以全方位贯彻党的政治优势为主要抓手, 以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价值旨归。

在统一战线中把握党的政治优势, 就是要在统战工作实践中明确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民主

集中制组织原则优势、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优势和统战文化的包容团结优势，这是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其一，明确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之基。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根本原因在于彻底贯彻了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优势保障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能够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二，明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推进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组织保障。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因为党通过一系列机构改革重塑了统一战线的组织架构，并在其中彻底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机构改革为抓手、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力量能够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其三，明确党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理论优势是推进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向牵引。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每一次历史性变革，都是党立足中国社会具体实际推进的理论创新。党的理论优势赋予了统一战线鲜明的理论底色，统战理论创新的成功实践又反过来印证了党独特的理论优势。其四，明确党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优势是建设独特统战文化的底蕴支撑。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辩证实践中汲取文化基因，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统战文化。统战文化作为统战实践所孕育的独特文化形式，又进一步为增强人民群众的统战意识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持久根基：在统战制度创新中夯实政治优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了系统部署^[36]。统一战线蕴含着团结与民主的辩证逻辑，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将统一战线明确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体现了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

统一战线与党追求人民民主的历史相伴相随，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37]。从统一战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逻辑看，统一战线从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三个层面夯实了党的制度优势。其一，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统一战线以追求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为了落实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内部明确核心领导力量。在统战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可以为统一战线提供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通过明确前进方向、优化组织运行方式有效提高统战效率，为统一战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坚强保障。其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孕育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推进人民民主的历史过程中。这一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各民主党派发挥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是通力合作、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友党关系，从而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彼此攻讦的弊端，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将多党合作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制度性安排，激发了不同政治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的内在活力，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意蕴。其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团结、民主是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一致的追求。团结是实现民主的基础，民主是达成团结的方式，二者的辩证实践构成了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健全的底层逻辑。只有充分认识到团结和民主的耦合共生关系，以团结达成民主、以民主巩固团结^[3]，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凝聚起人心和力量。“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38]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广泛、制度、多层次发展,是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

（三）方向牵引：在统战理论探索中明确政治优势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38],是党的理论优势作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党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识,这一理论认识又反过来巩固了党的理论优势。从逻辑关系上看,二者的共生互促关系表现为两点。其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从内容上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理论体系,赋予了其全新内涵、拓展了其理论外延。其二,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所使用的创新方法及其创新成果又反过来确证了党的理论优势。

首先,从理论关系上看,统一战线理论是党的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对于什么是统一战线、为什么要重视统一战线、如何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认识。统一战线理论认识的每一次历史性变革都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蕴藏着理论创新的思想伟力。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从内容上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理论体系,赋予了其新的理论内涵。其次,党在理论创新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铸就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这一成功实践进一步确证了党的理论创新方法优势。百余年来,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最大程度地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科学地将“两个结合”等理论创新方法运用于统一战线理论之中。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统一战线理论,从性质与原则、结构与功能、目标与方法等不同维度回答了一系列实践性问题,有效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精神支撑：在统战文化建设中强化政治优势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39]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40]。在党领导和推进统一战线过程中所凝结出的人文内核、精神特质、价值理念、优良传统和行为规范,构成了独特的统战文化,赋予了统一战线全新的文化力量。从功能价值上看,统战文化具有凝聚认同的重要作用,是以统一战线强化党的政治优势的精神支撑。

从统战文化的呈现形式看,可以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统战物质文化包括遗址故居、纪念场馆等具有统战历史与现实价值的建筑场所和图书、报刊等。统战精神文化包括党在统一战线中所秉持的思想理念、行为准则和党领导推进统一战线历程中所涌现出的英雄故事等精神层面的文化。统战制度文化则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中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和,其主要以法规、决议、条例等形式存在。其中,统战物质文化是最直观的统战文化形式,是统战精神文化和统战制度文化的有形载体,是具象的统战文化形态;统战精神文化和统战制度文化是对承载着统一战线意蕴的物质资源的提炼升华,是抽象的统战文化形态。统战文化强化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有两条作用路径。一是不断挖掘具有统战历史价值与统战实践价值的物质留存,不断拓宽寻找统战物质文化的路径与方法,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拓展统战物质文化的存在空间,从而提升统战文化可感知性。二是将统战精神文化和统战制度文化融入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中,使“大团结大联合”“画出最大同心圆”等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统战话语。因此,在统战文化建设中强化党的政治优势,可从统战物质文化、统战精神文化和统战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拓展新时代

统战文化的建设空间，使统战文化成为强化政治优势的精神支撑。

五、结语

面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经由“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全面嵌入现代化强国整体架构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形态、中国人民的组织形态、现代国家治理的运转形态、中华民族的联结形态、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实践形态的多维团结结构^[41]。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叠加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时与势发生了新变化，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作用更加重要。新征程上，须在全面贯彻党的领导基础上充分发挥党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做好统战工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7.
- [2] 尤权. 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J]. 求是，2022（17）：29-34.
- [3] 汪仕凯. 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14.
- [4] 陈明明，杨东光.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4）：1-12.
- [5] 林华山，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6）：126-144.
- [6] 于安龙. 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多维向度与辩证逻辑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8-50.
- [7] 黄蓉生.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88-93+202.
- [8] 任学丽. 深刻理解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8）：58-63.
- [9] 张晓辉.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 [J]. 党建研究，2021（4）：36-38.
- [10] 束赟. 制度体系与政治优势：统一战线与国家制度关系的演变与张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4）：67-73.
- [11] 李俊. 统一战线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及其优势 [J]. 社会主义研究，2021（5）：118-124.
- [12] 王汉保. 论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优势、作用及路径 [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6）：65-71.
- [13]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4.
- [14] 陈朋.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转化——基于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的分析 [J]. 宁夏社会科学，2022（6）：67-75.
- [15] 黄建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五重意蕴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9）：130-139.
-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65.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 [G]. 北京：中央文

李昱丰. 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样态构成、作用机制与行动路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23-33.

- 献出版社, 2011: 162.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86.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764.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
- [2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6-67.
- [22] 王玉良.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优势及其实践意义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 16-21.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92.
-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15.
- [25] 孙武安, 杨帅杰.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升华 [J]. 学习与探索, 2022 (10): 46-53+2.
- [26] 陈红娟.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J]. 浙江学刊, 2024 (2): 14-23.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453.
- [2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4.
-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N]. 人民日报, 2024-06-29 (1).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28.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55.
- [3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424.
- [3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4.
- [34] 郭建明. 党内政治文化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政治优势 [J]. 红旗文稿, 2019 (18): 41.
- [35]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王沪宁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3-12-30 (2).
- [36]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7.
- [37] 樊士博, 徐敏.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78-85.
- [3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0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 [39]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
- [40] 蒋英州.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性学理性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 11-25.
- [41] 林华山, 龚静阳, 刘伊菡. 多维团结: 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2-25.

责任编辑: 卢媛



团结与改革的交响： 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机制与动力保障

王艺腾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底层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正确认识并处理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团结与改革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寓改革于团结，可筑牢团结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最大限度凝心聚力；也可通过改革为团结扫清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制度层面供给团结的上层建筑因素，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创造良好秩序。另一方面，以团结促改革，可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创造更公正的发展环境、更完备的治理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党的生机活力、人民创造活力、市场主体活力、体制机制活力、文明发展活力。团结为改革提供人心和力量支撑，也在改革的深化中不断增强和巩固。团结与改革的同构与互嵌，内蕴了维护秩序与激发活力的旨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应继续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至上结合起来，把激发创新活力同凝聚奋进力量结合起来，把推进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结合起来，在团结与改革共奏的交响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保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团结；改革；活力；秩序；双重机制；动力保障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034-10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4.06.004

作者简介：王艺腾，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观研究”（2024110625）

引用格式：王艺腾. 团结与改革的交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机制与动力保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34-4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总结和运用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1]。2024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回顾历史,一手抓团结稳定,一手抓改革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两大基本方式,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对处于后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为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防止出现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陷入政治纷争、社会冲突、族群撕裂的弊端,同时全面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建立新秩序,必须保持团结奋进、和谐稳定的社会大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2]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3]。党中央稳妥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方面改革,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解决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矛盾,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增进团结与深化改革在国家建设与治理中密切关联、彼此同构。就关联性来说,改革需要团结稳定的社会条件支持,也为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通过壮大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亦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就同构性来说,改革本身也代表了团结,发挥凝心聚力、统一思想和共识的作用;而增进大团结大联合的上层建筑也是改革的一部分,需要改革为其扫清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缺少团结,改革无法进行,已取得的改革成果也会失去;而没有改革,团结也无法从旧的基础跃升为新的基础上的更大范围的团结。团结与改革的同向发力与高效配合,使得党能够实现政治有力整合、经济有效增长、社会有序治理、共识充分凝聚,进而创造了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凝练,团结与改革集中体现了党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政治智慧,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学界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问题,有两类代表性观点。一是从宏观—多维的角度,认为多种动力要素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其所是”。这些动力如改革源动力、政党领导力、人民推动力、目标导向力、制度执行力、实践创新力^[4];党的主导性动力、人民的主体性动力、两者互动配合的协同性动力^[5];政治牵引机制、人口支撑机制、市场激励机制、文化导向机制、制度保障机制^[6];“自由自觉”的历史主体能动性、“多元协同”的经济基础运行机制和“守正创新”的上层建筑促进机制^[7],以及领导主体的动力产生与增强机制、建设主体的动力激活与凝聚机制和外部力量的辅助性动力调动与协调机制^[8]等。二是从微观—单维的角度,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于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作用^[9],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作用^[10],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11]、全面深化改革^[12]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用,创新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机制作用^[13]等。亦有学者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人民力量、汇聚人民智慧、推动全面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路^[14]。还有不少研究从统战视角剖析了团结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意义^[15],指出大团结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

了秩序基础^[16]，并从人民本位上的团结奋斗视角考察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实践形态和动力格局^[17]。

综而论之，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必然，提供了有益思考，但未能充分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18]。本文以中观—双维的视角，聚焦团结与改革的互动机理与辩证关系，建构新的分析思路和框架范式，以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优势的内在逻辑和动力密码。

二、寓改革于团结：为中国式现代化营建良好秩序

秩序蕴含社会稳定、团结、有序之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寓改革于团结，一方面强调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推进改革，依托共识凝聚形成推动改革的合力；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各方面体制机制革新，扫清阻碍团结的落后生产关系，使团结在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巩固、发展、壮大，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秩序。

（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安定的政治秩序

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保证，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起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19]。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才有出路，否则就会“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19] 162}。坚定维护安定团结、同心同向的政治局面，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调节国家政治关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以及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等至关重要。须指出，理想的政治秩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动态调整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度的关系，否则就无法保持政治稳定^[20]。要持续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保障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就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秩序更加充满韧性、弹性和适应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的新期待。新时代，党中央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1]在实践中，党中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政策举措，采取巩固政治一致性与维护社会多样性统一的机制^[22]，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对抗博弈的现象，力促“五大关系”和谐。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中央还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力量协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了磅礴伟力。

（二）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健康的经济秩序

健康的经济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可为后者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此外，健康的经济秩序和市场秩序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打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联结和凝聚力，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2] 181}。江泽民曾指出：“如果不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实行改革开放，

没有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巩固的团结和稳定。”^[23]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健康经济秩序的形成要求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关系。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2]¹⁶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围绕这一部署,为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党中央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24]。另一方面,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避免以恶性竞争、垄断行为谋取经济利益,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企业创新活力。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84亿户,同比增长8.9%。这些经营主体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消费产品、模式和体验,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整个社会的交往融合。

（三）整合多元价值观念，培育包容的文化秩序

包容的文化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其主要表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保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一种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格局,进而构建一个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气派的现代文化秩序。这一现代文化秩序集中体现在全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这些观念和标准影响每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价值归属感,指导人们的行为和决策,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人们同心同德、守望相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在中华大地交流交融交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致力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在全社会增进文化认同,倡导文化自信,坚守精神上的独立性,不断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机制,并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党中央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25],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巩固文化主体性”等原创性概念的深入人心,更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6]。

（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塑造和谐的社会秩序

“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7]塑造和谐的社会秩序,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这自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涵盖方方面面,如共同发展、共同建设、共同繁荣等,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并决定社会团结目标旨趣的达成^[2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29]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是团结的基石。共同富裕能否达成,关乎人心的凝聚,影响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为解决这一问题,党中央带领人民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底,我们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30]。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配；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1]¹⁴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聚焦“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围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1]进行系统性规划，必将大力推动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31]。

（五）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建立良好的生态秩序

生态环境关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文明传承创新。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而良好的生态秩序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亮点。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的高度，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充分体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32]近年来，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断取得新成效。一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显著，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数据表明，浓烟雾霾得到有效抑制，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34.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87.5%。二是城乡人居环境更加宜居，城乡脏乱差局面得到扭转。截至2023年11月，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超过73%，近5年来累计改造农村户厕5000多万户。三是环境治理和执法力度大大加强，生态环境安全防线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与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共有31部，其中大多数法律法规是在2012年之后制定的，已经超过我国294部现行有效法律的十分之一。

三、以团结促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活力

“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2] 181}改革虽为社会带来活力，但往往涉及利益重新分配和体制机制调整，也会引发社会阵痛。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方团结，为改革提供“压舱石”，才能保持社会动态平衡，使改革稳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党的生机活力、人民创造活力、市场主体活力、体制机制活力、文明发展活力。

（一）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一是要冲破旧有观念束缚，保持思想精神活力。自我

革命首先要从思想上自我革命。改革开放正是以思想解放为突破口，拉开了新时期的发展大幕，激活了全民族的创造力。面对新的使命任务，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引领社会革命^{[2] 52}；推动观念更新、价值革新、理论创新，使之成为社会活力之源，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2] 180}。二是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保持干部队伍活力。“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2] 57}要继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抓住“关键少数”，发挥他们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先锋、骨干作用。三是要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特别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四是要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凸显群团组织团结工人、青年、妇女等亿万群众的优势，并把群团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使之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33]。

（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创造活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1] 2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为此，要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在重大改革决策出台前后，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确保方案科学性和民主性。在具体实践中，实行民主与实现团结同向同行，民主是达成团结的重要机制^[34]，统一战线与民主存在耦合共生关系。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特别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35]，以发挥其多维互嵌的价值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秩序和治理效率^[36]。统一战线不仅起到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还发挥了增强社会活力的作用。比如，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至92.3%、达530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由4000余万户增加至1.24亿户。进一步健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机制，为他们营造良好环境，有利于调动这部分群体的积极性。

（三）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保护市场主体活力

市场主体活力的激发和提升，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与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法治建设和产业生态培育等多方面工作相互促进。“到二〇一九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一亿二千三百万户，其中企业三千八百五十八万户，个体工商户八千二百六十一万户。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7]保护市场主体的活力，能够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实质上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1]。为此，一是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内需潜力，逐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二是要“健全宏观经济治

理体系，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3]。在此过程中，应加快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水平，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三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增长”^[38]。应继续通过减税降费、简化行政审批流程、融资支持、市场准入平等化等措施，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藩篱，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四）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增强体制机制活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核心地位。“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不断获得发展进步的生机活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38] 813}在某种意义上，良好创新生态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各方面“卡脖子”问题意义重大。一方面，要增强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活力。近年来，我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运行机制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让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32] 468}。此外，党中央还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构建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机制等，持续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另一方面，要依托创新和革新，增强各类体制机制的活力。创新不仅是知识、技术、产品或产业的创新，更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制度创新本质上是改革和完善现有法律、政策、条例、规章等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部分，以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制度强则国家强，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打基础、管长远的。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其科技水平，更取决于其体制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激励和保障创新活动高效进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将制度创新作为重要发力点，突出显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战略思路^[39]，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五）推动文化繁荣兴盛，重焕文明发展活力

文明发展活力是文明绵延不绝的持久动力，是社会整体活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明活力的焕发和增强“对其他社会活力能够产生深刻影响，提升这一活力对于巩固和发挥社会经济活力、社会制度活力具有重要意义”^[40]。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沛的文明发展活力旨在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是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价值内涵，增进民族认同，“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 480}。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是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思想大敌和精神痼疾，也是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错误思潮，必须时刻警惕防范。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24] 314}。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特别要注重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33] 534}。三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文明的活力在于不同文明间的交融会通。进一步提升和增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活力，仅仅依靠自身内部的传承是不够的。只有积极地与其他文明展开交流互动，

虚心向其他文明学习，同时弘扬自身的特性、优势，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完善发展自身。

四、团结与改革协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保障

在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要用好辩证法，既重视社会团结稳定，也重视改革发展进步；既重视激发社会活力，也重视巩固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的良好势头，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至上结合起来，把激发创新活力同凝聚奋进力量结合起来，把推进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结合起来，在团结与改革共奏的交响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保障。

（一）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至上结合起来

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至上结合起来，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19] 342}党的领导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社会大局平稳运行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0] 171}。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有助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国家发展方向和政策的正确性；也有助于党紧紧围绕人民的利益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形成造福人民的良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确保党的各项决策和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上述两大原则彼此配合，既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优势所在，也是中国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把激发创新活力同凝聚奋进力量结合起来

在当代中国，“改革”已然成为一个团结亿万民众的符号，“团结”也已成为人们心中助推改革的武器，两者相互呼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41]。一方面，改革本身就具有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改革也激发了社会创新活力。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抑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无不强调要汇集众智众力，不断巩固和扩大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基础。从深层上来说，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本就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这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细的政策设计，更要将每一项改革置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新征程上，要把激发创新活力同凝聚奋进力量结合起来，就要继续依靠改革开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2] 175}，继续强化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各方面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三）把推进改革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结合起来

当前，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前进道路上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各种难以预料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推进改革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相结合，是针对纷繁复杂的形势而采取的审慎而全面的发展策略。这要求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和有效管理，确保改革进

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方面，要深入研判改革的形势和任务，科学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时机、方式、节奏。比如，可在推进改革措施前，识别可能的风险点，评估风险的影响程度和可能性，以制定应对策略；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路径，避免一次性改革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确保改革措施能够平稳过渡和实施。为此，还要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和应急机制，包括风险监测、预警、应对和恢复等环节，确保在风险发生时能迅速有效响应。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前瞻性和系统性，确保各项改革政策之间相互协调，避免政策冲突导致的风险。此外，还应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善于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冲击^[42]；通过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鼓励公众为改革建言献策，增强改革的民意基础，减少改革的社会阻力。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没有改革，国家不可能繁荣发展；没有团结，国家不可能长治久安。增进团结是深化改革的基础；深化改革是增进团结的呈现，也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的实现。只有最大限度增进团结，把更多人的思想意志统一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来，改革才有持久动力，中国的事情才好办。也只有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不同群体增进团结的思想价值共识，破除利益固化藩篱，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使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才能促进社会有机团结，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总之，团结稳定始终是改革得以前进的保障，而改革也在持续发挥政治整合和社会团结功能。团结与改革的协同运转，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机制与动力保障。这一成功经验不仅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还将为处在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其他国家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方案和镜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56.
- [3]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12月26日，上午）[N]. 人民日报，2023-12-27（2）.
- [4] 邓海龙，牛宝琨. 六维驱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与作用机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04-114.
- [5] 胡洪彬.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生发逻辑、内在机理与成功密码[J]. 学术界，2021（10）：94-104.
- [6] 方兰欣，戚长春.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机制[J]. 科学社会主义，2024（1）：110-119.
- [7] 卢崎，刘晓彤.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机制研究[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4）：26-32.
- [8] 韩喜平，刘一帆.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理与激发机制[J]. 河南社会科学，2024（1）：11-17.
- [9] 田旭明.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J]. 理论视野，2024（6）：45-50.
- [10] 刘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内涵与动力源泉[J]. 人民论坛，2021（28）：89-93.
- [11] 张林.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J]. 经济学家，2024（3）：15-24.
- [12] 包心鉴.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和根本动力[J]. 山东社会科学，2024（7）：5-16.

- 王艺腾. 团结与改革的交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机制与动力保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 34-43.
- [13] 蔡莉, 张玉利, 陈劲, 等.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笔谈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3 (1) : 3-22.
- [14] 王炳权.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J]. 理论探讨, 2024 (4) : 63-69.
- [15] 徐理响, 胡文婷.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 1-11.
- [16] 林华山, 龚静阳. 从大团结走向强国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战线机理、逻辑与路径 [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4) : 5-13.
- [17] 张艳娥.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 1-13.
- [18] 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J]. 求是, 2023 (19) : 4-8.
-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52.
- [20]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73.
- [2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30.
- [22] 林华山, 罗振建. 新型国家：“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基础与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6) : 18-30.
- [23] 江泽民文选：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23-224.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241.
- [25]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7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2).
- [26] 康秀云, 梁志勇. 团结与凝聚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 26-37.
- [27] 胡锦涛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425.
- [28] 王道勇. 从社会团结看共同富裕社会建设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 : 46-55.
- [29] 习近平.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35.
-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 125.
- [31] 刘同舫.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 (8) : 4-12.
- [3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391.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307.
- [34] 汪仕凯. 团结和民主的同构：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4) : 80-88.
- [3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9月20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 [36] 林华山. 多维互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6) : 32-41.
- [37]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7月21日）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 2.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831.
- [39] 王浦劬.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J]. 政治学研究, 2024 (4) : 3-16.
- [40] 刘田. 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活力的提升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8) : 11-19.
- [41]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42] 姚亮.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系统论述 [J]. 理论视野, 2024 (4) : 32-38.

责任编辑：王京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 历史、经验与路径

杨玉文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明确要求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伴随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也经历了实践策略渐进式演变：从改革开放初期更加注重发展，到全面深化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注重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最后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改革开放 40 多年历史沉淀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经验，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兼顾，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系统观念为思维方法，坚持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坚持以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为重要路径，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具体策略。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安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044-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6.005

作者简介：杨玉文，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22ZDA022）

引用格式：杨玉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历史、经验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 44-55.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明确要求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1]。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内容摆布上的特点之一^[2]。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需要坚持的重大要求,更是贯穿于改革开放40多年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实践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议题与改革议题紧密相关,应当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置于改革进程中加以探究。一般而言,改革意味着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面临一些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对安全造成挑战。如何在改革中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论述较多,但甚少文献将其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探讨。现有文献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演进逻辑、科学内涵、现实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在演进逻辑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经验^[3];时代主题变化推动发展和安全关系从生存型发展向发展型安全再向发展和安全并重转变^[4];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阶段,发展和安全关系经历了从“更加注重安全”到“更加注重发展”再到“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演变过程^[5]。在科学内涵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6],体现出人民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等马克思主义意蕴^[7]。在现实路径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3],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发展政策与安全政策共进的相关机制^[8],要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9],要求内外兼修以防范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10]。然而,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察并不多见,目前仅见屈指可数的文献从机构改革^[11]、数字化改革^[12]两个维度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进行阐述。

立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所面临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亟需系统梳理40多年改革开放史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脉络,全面总结相关实践经验,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处理好发展和安全关系提供现实启示。

二、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进程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认识论上既要重视发展,又要重视安全,认识到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操作中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调整二者的比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的实质,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界定发展和安全两者各自的地位,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地进行资源配置。”^[4]伴随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发展,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发展和安全并重”“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四个阶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生动实践图谱。

(一) 改革开放初期: 更加重视经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政治版图深刻调整,美苏关系趋于缓和,全球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

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基于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即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重大决策标志着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启。

改革开放初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操作方面，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3]。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突出强调了农业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13] 16-17}同时，《公报》还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13] 15-16}这说明，在认知层面，要重视安全对发展的保障作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的环境。197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4]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将“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其中，经济建设是这三大任务中的核心，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3] 260}。党的十二大报告更是明确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作为首要任务，强调“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只要农业上去了，其他事情就比较办好”^{[13] 267}。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二大期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劳动热情高涨，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二）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改革领域逐渐从经济领域发展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全领域，改革程度也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并将坚持全面改革确立为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之一，改革的范围拓展到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等社会各领域^[15]。党的十三大以后，“全面改革”与“深化改革”成为党的工作重心。

在全面、深化推进改革进程的同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家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操作方面，逐步从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过渡到注重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一方面，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具备较好的国内外条件。一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我国成功构建了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不仅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充分激发了市场活力，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二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缓和，国家间由军事对峙转为注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与竞争^[7]。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顺应时代潮流，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面临安全挑战。其一，各领域体制改革所遇到的系统性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其二，为更好推进全面改革与

深化改革, 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 在把握经济发展时代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着来自国外的一系列风险挑战。如何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 是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对国内政治不稳定因素, 邓小平明确提出: “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 什么都搞不成, 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6]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 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 推崇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致力于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国际间的分歧, 确保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顺利进行。对内强调稳定, 对外呼吁和平, 推动建构安全型发展格局, 是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所采取的重要策略, 是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的重要法宝。

(三)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发展和安全并重

20 多年的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巨大成绩, 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期, 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 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

改革历程由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 已进入深水区, 可以说,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7], 而“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18]。面对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和挑战,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总体规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1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改革进程由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 正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两个大局”相互交织, 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在实践策略上, 要将发展和安全并重。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 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其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 是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于“两个大局”,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的论断, 强调: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20], “从认识论出发,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的关系, 表现在二者谋划部署上的平衡性、时空领域上的动态性以及内外互动上的发展具有基础性、根本性, 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和保障”^[21]。发展和安全并重, 并非是对二者进行“五五分”, 而是要求辩证看待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既重视发展问题, 又重视安全问题, 既意识到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和前提, 又意识到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和保障, 同步推进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坚持将发展和安全并重, 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原则的实践转化, 旨在促进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决定》, 部署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标志着改革历程正式进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 “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家安全是中国式

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决定》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出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提出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围绕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出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2]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是基于外部环境新变化对发展和安全关系所作出的新判断。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个别大国大搞强权霸凌、肆意围堵打压新兴力量，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求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时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并非意味着不重视发展，而是强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注重国家安全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协同性，坚持做到一起谋划、一起部署，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各方面各环节。《决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1]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认识论层面要看到发展和安全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实践操作层面要依据外部形势的严峻性和国家安全工作的紧迫性，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围绕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三、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沉淀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经验。依据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可以从思想方法、指导原则、实践遵循、工作方法这四个维度着手，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经验进行系统梳理。

（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是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方法。一方面，解放思想是突破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传统认知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22]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通过改革实现发展新的飞跃和质的突破，必然要求破除固化思维、陈旧观念和僵化思想，依据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是在改革中制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践策略的根本指导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

杨玉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 历史、经验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44-55.

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7]²⁰⁹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为思想方法, 准确研判改革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合理把握改革进程中发展和安全工作的重点、难点, 有利于推动改革全面展开, 向纵深发展。

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作为思想方法, 是党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经验总结。“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22]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 依据变化了的实际, 党和国家不断调整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 并相应革新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践策略。改革开放初期,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 破除以往历史中关于社会变革中发展和安全之间会产生矛盾关系的认识, 提出社会政治安定对于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强调在改革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 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 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各领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多种不安全因素叠加。为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确保已有改革成果不会失去,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策略从更加重视经济发展, 调整为注重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立足于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现状, 结合国际形势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时期的事实, 在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时, 不断提高安全比重, 将安全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深入研究和精准研判, 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策略作出新的调整, 强调要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并对国家安全工作作出详细的战略部署。40 多年改革进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深刻诠释了“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方法, 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经验启发意义。

(二)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

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是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导原则。统筹涉及总体性顶层设计方法。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对改革布局进行顶层设计, 是保持改革政策连续性与可持续性、规范发展正确航向的根本保障;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在改革过程中加强基层探索, 为发展凝聚共识, 通过统一战线形成合力, 是刺激发展活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要素。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 既需要党和国家根据现代化推进的实际状况强化调整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又需要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在实践探索中增强获得感和安全感, 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联动机制, 同时保障发展和安全。在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为统筹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的领导作用, 以及人民进行基层探索的创新优势,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项农村土地改革举措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得到全国农民的广泛支持, 在改革的同时维护了社会稳定, 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加强党的领导, 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 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 完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两大重要任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 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23]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党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

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更好地完成了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2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完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改革政策有效落地、稳步推行，继续书写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动新篇章。

（三）坚持“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兼顾

“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兼顾，是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遵循。“胆子要大”突出强调在改革中要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步子要稳”着重说明改革不可盲目冒进，犯颠覆性错误。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之举，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因而要敢于尝试。“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5] 257}同时，要掌握好改革节奏，把控好改革风险，稳步有序推进改革。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同时兼顾“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胆子不大，无法应对改革中出现的“硬骨头”与“险滩”，则各领域体制改革难以进行，发展就会受限；步子不稳，为追求发展速度而蛮干，则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人心不稳的局面，甚至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因此，要稳步推进改革，对发展过程中出现阶段性问题及时改正，为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并逐步在农村展开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土地制度改革，先后在沿海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市试办经济特区，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以及平衡和审慎的决策智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16] 130}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坚持将“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结合。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十分复杂。目前，社会上对改革既存在畏难情绪，也存在浮躁心态。我们一定要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24]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不断打破原有体制机制和工作格局，在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努力做到事前论证评估、事后总结反馈，敢闯敢干、稳扎稳打，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锐意进取、勇涉险滩，稳步推进一项项改革措施，积小胜为大胜，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蓄力量。

（四）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协调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协调，是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工作推进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24] 44}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方面，要求以整体性眼光、系统性思维看待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力求做到发展和安全之间、发展和安全的各方面各环节与各层次之间协调一致、整体推进；另一方面，要根据改革过程中发展和安全工作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点，明晰工作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紧迫任务，集中力量进行重点突破。“统筹既要求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将各项工作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也强调要以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25]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更具紧迫性;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策略方面,更加重视经济发展,重点突破经济发展的卡点、难点,同时以解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问题更好促进社会稳定,彰显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协调的决策智慧。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奠定的经济发展成绩基础上,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时期逐渐将体制机制改革拓展至政治、文化等领域,以经济发展整体推进社会其他领域发展,并逐步提高对改革过程中潜在风险的重视,日益深化对国家总体安全的认识,不断加强抗风险能力,做到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威胁国内外安全的潜在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基于此,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我们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发展和安全工作部署协同推进。在经济发展领域,我们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有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完善、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风险意识和预防机制,统筹兼顾好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和作为“头等大事”的安全,并构建起完善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互动机制。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明晰发展和安全工作整体性部署的最终目标、主要任务与根本要求,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继续以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协调作为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工作推进方法。

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路径

以史为鉴,鉴往知来。当前我国改革步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发展和安全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亟需在进一步提炼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路径。经过梳理分析,我们可从思维方法、基本原则、根本立场、重要路径和具体策略五个方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路径进行总结归纳。

(一) 思维方法: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方法。《决定》将坚持系统观念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并把坚持系统观念与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关联起来:“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各项经验,无不以坚持系统观念为统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26]系统观念是党中央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发展和安全工作的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以系统思维构建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坚持系统观念,不仅要关注发展和安全工作的局部改进和优化,更要从整体上把握和推动,实现各方面工作的协调统一。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注重发展和安全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动态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系统观念有助于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时,更加灵活地调整策略,确保改革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前瞻性,进而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在前进路上继续

保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相统一。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一个“以自身为核心和中轴的国家政权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执政党全面进入国家系统，占据了核心位置，履行着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功能”^[27]。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领导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置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的系列原则之首加以强调，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28]。《决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1] 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从实际出发系统性分析发展和安全现状、整体性审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策略、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治理诉求。因此，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顶层设计、优化布局、整合资源。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点和着力点，党领导制定发展和安全工作的战略，灵活应对发展难点、防范安全风险，保证改革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根本保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不断创新党引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策略，使党的领导贯穿发展和安全工作始终。

（三）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本立场。在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准确回答发展和安全依靠谁、为了谁这一前提性立场问题。《决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1] 其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人民，且人民还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一方面，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文明的任何进步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贡献。“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29] 实践证明，改革征程上所取得的每一个历史性成就，所实现的每一次发展质的飞跃，都离不开人民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只有广泛凝聚人心，才能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政治局面，在改革中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要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大统战’与‘大安全’的关联逻辑……大统战维护大安全，大安全离不开大统战。”^[30] 其二，要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为人民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安全环境。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创新改革举措时，始终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始终贴合人民需要。《决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并进一步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作出战略部署^[1]。另一方面，“人民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宗旨。无论是维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还是生态安全，其核心都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完善人民参与机制，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使发展和安全各项政策和主张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形成应对前进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强大向心力。

(四) 重要路径: 坚持以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

坚持以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国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在认知层面要统筹兼顾发展这一“第一要务”和安全这一“头等大事”, 在实际部署工作层面要突出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严守各领域安全底线。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31]。具体而言,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前,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我们面临着境外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因素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 台湾民进党等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企图解构中华民族和建构所谓独立的“台湾民族”叙事体系^[32]等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互联一体化时代背景下, 国家安全问题具有内外联动性、跨域传导性、极易突变放大性等特点。要注重发挥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 构建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防线。统一战线通过联系和团结各方面的力量, 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增进理解, 加强共识,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是维护国家安全、保证社会稳定的关键秘诀。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 还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集中力量推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高水平安全 and 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社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3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 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高质量发展的任务更为繁重, 统一战线责任更加重大。

(五) 具体策略: 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坚持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具体策略。《决定》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部分, 再次强调要坚持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1]。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对发展和安全辩证关系的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模式从以往注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高水平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突出强调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安全的促进作用以及高水平安全对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一方面, 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高质量发展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创新驱动、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强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等。此种发展模式必定能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技术支持, 从而极大增强国家在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时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没有安全, 发展就不能实现。发展过程中任何领域存在安全隐患, 都可能破坏经济正常运行。高水平安全意味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形成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策略制定上, 要进一步优化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 更好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五、结语

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优化调整统筹发展和安全策略，对于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与维持社会长期稳定而言，意义重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注重发展，到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发展和安全并重，再到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将维护国家安全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见证了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寻求发展与安全之间平衡的智慧与勇气。正是这份智慧与勇气，浇筑出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伟大成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以推动统筹发展和安全策略与时俱进，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以确保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及维持社会稳定，坚持“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兼顾以在大胆创新的同时保持改革的稳健步伐，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协调以合理布局发展和安全战略，是在改革中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工作的重要准则与关键密码。面向未来，要继续坚持系统观念，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通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稳步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3] 张新宁，陈悦. 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逻辑与路径[J]. 上海经济研究，2023（6）：5-14.
- [4] 钟开斌. 统筹发展和安全：概念演化与理论转化[J]. 政治学研究，2022（3）：74-87+162.
- [5] 黄大慧. 思想、制度、战略：从三个维度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性[J]. 教学与研究，2024（7）：6-18.
- [6] 陈健，郭冠清.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经济学解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23（9）：17-27.
- [7] 岳静，陈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演进逻辑与时代意涵[J]. 学术探索，2023（2）：39-45.
- [8] 胡登良. 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研究[J]. 理论视野，2023（9）：52-57.
- [9] 刘蔚. 新安全格局的基本意涵、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2024（1）：148-155.
- [10] 唐琦，张辉，王桂军.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的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4）：21-43.
- [11] 钟开斌. 统筹发展和安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J]. 学海，2023（3）：24-32.
- [12] 程乐.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推进数字化改革[J]. 国家治理，2024（8）：16-20.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3.
- [14]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4.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22：167.
- [1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

杨玉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 历史、经验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44-55.

-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21.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69.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3-48.
- [2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3-12-13 (1).
- [21] 黄大慧. 思想、制度、战略: 从三个维度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性 [J]. 教学与研究, 2024 (7): 6-18.
- [22] 习近平.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8 月 22 日) [N]. 人民日报, 2024-08-23 (2).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907.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45.
- [25] 丑则静. 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与经验的世界价值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 (4): 49-60.
- [2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0.
- [27] 景跃进, 陈明明, 肖滨, 等.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5-8.
- [2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4-06-28 (1).
- [2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44.
- [30]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31] 刘跃进.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演进及融发展和安全为一体的国家大战略 [J]. 学术论坛, 2022 (2): 81-92.
- [32] 朱松岭.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36-46.
- [33]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 “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高永久 冯辉

（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天津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天津 300350）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性意味着中华各民族所共创共有共享并且持续认同的带有中华民族特征的共同要素，以及表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整体规范，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现实建设的核心关切。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表现为“关系基础—实践过程—现实表征—未来走向”的逻辑链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讲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建设要求，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其中，“五个‘相’”的共生关联、“五个共同”的共创实践和“四个共有”的共同归属等论断，是全面描绘中华民族共同性在联系、实践、归属、命运等方面的整体性表达，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协同推进的现实逻辑，形成增进、强化、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现实要求。为此，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新的历史背景下强化各民族的共生关联、共在实践、共有归属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6.006

作者简介：高永久，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天津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冯辉，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天津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助理，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研究”（23JZD03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问题研究”（63242321）

引用格式：高永久，冯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6): 56-69.

高永久, 冯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56-69.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性; 中国式现代化; 团结统一; 五个共同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6-0056-14

经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长周期的自然凝聚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诸要素的政治形塑, 中华民族逐渐凝结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形态。“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 不是同义反复, 而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1] 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社会话语的交织中, 无论是剖析中华民族的内涵外延还是基于共同体理论的学理探讨, 均将“共同性”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特质和联结纽带。谷苞先生从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民族关系出发, 较早关注并集中阐释中华各民族长期互动形成的共有特点^[2], 将之归纳为“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形成并非来源于对西方共同体理论的学术借鉴,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进程中关键特征的自主归纳凝练。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背景下, 从“增进共同性”^[3] 到“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4] 的话语创新, 更加凸显中华民族共同性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价值。因此,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应当进一步阐发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涵外延与实践要求。

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 中华民族共同性意味着中华各民族所共创共有共享并且持续认同的带有中华民族特征的共同要素, 以及表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整体规范, 是中华民族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综合表达, 集中反映出中华各民族之间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紧密关联。中华民族共同性代表着对“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科学表述的总括性认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现实建设的“共同”要素则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具体意涵提供注解。2024年9月2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5] 从“两个结合”的理论高度, 系统回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的结构内涵、“从哪来”的历史脉络、“为什么”的形成逻辑、“怎么样”的科学评价、“往哪去”的未来走向、“怎么办”的建设路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既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魂脉, 也全面凝练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 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共同性意涵, 为学术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点深入思考、理解、阐释中华民族共同性提供科学引领。以中华民族共同性为切入点, 亦有助于深刻把握这份纲领性文献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在回顾中华民族共同性已有论点的基础上, 尝试提炼讲话精神蕴含的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性视角,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两个结合”的理论指导, 从共生关联、共创实践、共有归属、共享命运等环节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对于增进、强化、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实践要求, 进而延展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探讨。

一、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性视角

自谷苞先生将中华民族共同性提炼为一种学术观点并得到高度认可以来, 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为重要动力，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探讨再度成为学术热点。综合看来，已有关注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外延与生成机理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三个视角。“结构论”将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解为纵横交织的结构存在。有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一个由本底性共同性和具体性共同性共同组成的层级结构，后者是前者底层逻辑的延展^[6]。一些学者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的核心动力解读为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统一^[7]，通过与各民族差异性的关系结构认识中华民族共同性。“维度论”把中华民族共同性判定为内容丰富的多维度存在。许倬云认为：“‘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8]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四个维度的具体表征，则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文化共同性和社会共同性^{[1] 25-29}。有观点主张从意识与实践两个维度把握共同性的精髓，将认同和团结视为共同性与共同体的联结通路^[9]。此外，亦有学者着眼于决定共同体形成的共同性核心要件，分别形成“疆域、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情感”六种要素^[10]和“情感归属、精神认同、利益追求”三项需求^[11]与“族际利益互补性、记忆情感共同性、民族文化聚合性”三个特征^[12]等多维理解。“时空论”则关注中华民族共同性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连续性存在。有观点从纵向上将其划分为继承的共同性和凝聚的共同性^[13]，从历史、现实与发展三个时空维度透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转化与发展^[14]，认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源于各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共同性增长^[15]。结构论、维度论与时空论三个视角分别观察到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某个侧面，共同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华民族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共有要素，规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形态，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第二，中华民族共同性是多元辩证的结构体系，这种共同性的具体内容可以从多个维度、不同方面来认识。第三，中华民族共同性在互动延展中不断增长发展，既是各民族向内凝聚、团结统一而不断创造丰富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各民族发挥整合、规范和导向等价值功能的体现。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长趋向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相吻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5]，形成这种向心力、趋势化、必然性的重要因素指向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不断扩展与积极推动，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也在直接塑造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样态、格局与走向。中华民族共同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联，意味着必须依循五千多年文明史造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逻辑，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系统化解读。综合结构论的关系分析、维度论的内容表达与时空论的过程叙事，本文认为，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应当采用一种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点的逻辑性视角，看到中华民族共同性结构与过程、实践与表征、历史与未来的内在统一性。“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6]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核心要义，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自成逻辑的形成发展机理。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生息繁衍，结成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的共生性关系形态，经由向内聚合、团结凝聚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既共同创造、巩固、发展中华民族的文明形态、国家形式与民族结构，并对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又进一步夯实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与理念，在中华文明连续演进的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共同选择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走向和未来命运。从各民族之间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逻辑

辑联系来看, 中华各民族密切嵌合的关系结构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根基与条件, 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过程与形态, 情感依恋的现实归属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表征与结果, 命运与共的未来走向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方位与前景。由此可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意涵主要表现为其形成发展的“关系基础—实践过程—现实表征—未来走向”的逻辑链条, 中华民族共同性则存在、增长、发展于这个逻辑链条的各个环节。剖析、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共同”意涵的逻辑链条, 与理解分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性视角相契合。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指导思想与理论话语为统领和指导^[17]。尽管已有学者把民族政策话语中“两个共同”的共享利益、“三个离不开”的共生关系、“四个共同”的共有历史、“五个认同”的共享价值视作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具体表现^[18], 然而只是进行并列式的散点分析, 并未实现体系化的逻辑性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科学总结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建设的历史规律与现实经验, 提出“五个‘相’”“五个共同”“四个共有”等重大原创性概念表述。多个重大概念的丰富内涵与相互联结, 为从逻辑性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以及“关系基础—实践过程—现实表征—未来走向”基本链条的具象理解提供了指导与思路。

二、“五个‘相’”的共生关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系纽带

聚族而居、相伴而生是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普遍特点, “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19]。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突出表现在于多元一体格局的定型, 各民族能够凝聚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模式的基础要件, 缘起于各民族之间高度互容、彼此依存、互化共生、团结统一的内在关联性,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形态。“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 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20]基于这一重要论断, 本文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关系形态理解为“共生性关联”, 可以认为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共同”意涵在关系维度的基础表现。有研究认为: “有‘体’, 非但有‘共同’, 而且因‘体’必然有‘通’, 不通, 共同体便失去了意义。”^[21]“共同”与“共通”赋予共同体以结构性内涵。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共同文明基因导向下, 中华各民族从根本上并非具有独立发展或者相互排斥的硬性边界, 而是始终朝向凝聚一体的兼容并包与相互贯通, 在包容与贯通中共存共在、共生共荣, 奠定中华各民族相互认同的关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 “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 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 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22]2024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则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民族关系基础视角, 进一步将各民族的共生关联归纳为“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五个维度。从“两个源自”的整体判断到“五个‘相’”的系统解释, 全面展现出中华各民族共生关联的具体维度与关系纽带, 充分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内源因素、核心动力与演进基础, 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性在关系维度的结构性表达。

(一) 各民族血脉相融,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3]在中华大地上，伴随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人口迁徙和跨域流动，不同民族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息繁衍发生碰撞、互动、联系，经过通婚、联姻、和亲等多种结对形式，各民族结成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和同胞手足情谊，构成历史上民族融合与现实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血脉根基。无论是以“弟兄祖先”和“英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为主要表现的各民族同宗同源的“根基历史”^[24]，还是分子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运用基因测绘等现代技术实证各民族血脉相连、融为一体^[25]，均反映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骨肉相连、相互融合的共生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族体上相互吸纳的结果，蕴含各民族无法割裂的血脉基因。

（二）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形态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强大统一性，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形成、长久维系且不断巩固的关键因素，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坚守并付诸实践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强大信念，这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相关研究认为：“争夺‘中国’的天下‘大一统’观念事实上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核心动力。”^[26]“大一统”理念的广泛传播与深刻内化，逐渐成为历史上各族群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互动、构建政治关系、凝为政治共同体的内在动力，在同属中华的共有认知基础上，形成对“中华正统”的共同向往、对“一统天下”的共同争取、对“天下大同”的共同追求。心向统一的共有信念和共同意志为各民族在政治领域形成共生关系提供意识条件，推动各民族共同构建并维护有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社会政治秩序。

（三）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与精髓所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源于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多元文化交融性的深层互动，而中华文化要素、中华民族形象和符号价值体系能够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的封闭与隔阂，得到普遍认知、广泛认可、高度认同，各民族文化相通发挥着关键性的中介和联系作用。文化相通的本质是内核相同、精髓一致，前提是和谐共生、并行不悖，动力是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结果是多元汇聚、文明一体。大量考古资料显示，中华文明在起源孕育时期就具有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彼此借鉴吸纳的现象，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共同推崇、学习、丰富中华文化内涵，汉字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符号纽带。“两个结合”引领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各民族文化的共生、相通、融汇、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四）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

中华各民族共生关联拥有深厚的物质支撑和利益基础。马克思主义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7]中华民族共存共生的自然环境为中华文明格局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持续演进提供基础要素。从自然分工的角度看，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集中与地域差别，催生各民族赖以生息繁衍和互动发展的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依靠单一类型的物质生产无法满足多样化的群体发展利益需求，地理上相连的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区域形成宏观上的互补结构，两大经济圈的统一形态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核心范围。各民族通过多种方式，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互通有无、互惠互

利、共赢共荣, 逐渐形成并夯实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进一步促进各民族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互嵌式发展, 各民族的经济相依程度更为紧密、利益共生基础更加坚实。

（五）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概念叙事生动描绘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互信互爱、亲如一家的关系模式, 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则是形塑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心灵纽带, 也是各民族共生关联的心理根基。一方面, 从民族关系层面而言, 历史和现实中各民族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主流实践, 以及共同的道义浸润和价值积淀, 通过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守望相助行动, 使得各民族从内心深处具有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和手足之亲; 另一方面, 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 各民族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共同的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 各族人民面对国家危难和民族危亡选择同仇敌忾、保家卫国, 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共同的民族大义, 爱国主义情感系紧各民族同属一家人的认同纽带。同时, “对同胞的亲密感情, 嵌套在横向的友谊纽带中, 是政治领域的一部分, 并以国家认同的形式表现出来”^[28], 手足情谊与爱国情怀的相互贯通和实践指向, 不断强化各民族政治认同与共生关联的情感基础。

三、“五个共同”的共创实践：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过程

各民族在血脉、信念、文化、经济、情感等维度彼此融通的共生关联, 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关系维度团结统一的“共同”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在各民族共生关联的结构因素和动力机制基础上, 还需要依靠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向内凝聚过程, 才能成其形体、丰其内涵。中西方文明根性比较最突出的差异化表现在于“统”与“分”的不同^[29], 中华文明“统”的过程是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实践表达。各民族的向内凝聚既不是简单结合的机械拼凑, 也不是杂乱无序的被动交叠, 而是始终朝向共创中华的主动实践、团结统一, 这亦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杨建新先生指出: “是谁创造了中华, 推动了中华的形成和发展? 从根本上说, 就是中华各民族。”^[30] 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叙事, 蕴含着向内凝聚和要素聚合的团结统一进程, 既深刻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实践过程, 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实践内涵, 赋予中华各民族的共生关联以共同创制的实践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共同性可以从实践内容、实践主体、实践形态与实践记忆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各民族共创中华全貌

理解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践共同性, 需要全面审视其实践内容。“中华”一词具有疆域、国家、历史、文明、精神等相关性内涵, 各民族共创中华所开创的是“中华”全景全貌。从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来看, 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 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 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5]。“五个共同”的理论凝练, 点明中华民族共同性在实践领域的具体维度, 界定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关系。各民族共同开拓、开发并捍卫祖国疆土, 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幅员辽阔的共有空间。各民族共同缔造国家形态、维护国家统一、创新国家制度、强化国家治理, 为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各民族共同书写、铸就、延续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不绝如线、生生不息的历史根基。各民族共同创造、丰富、传播中华文化要素，形成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使得中华文明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历久弥新。各民族共同培育、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质与禀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现实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综合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疆域、国家、历史、文明、精神等形态都是各民族共创的结果，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实践统一，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存在。其中，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之同向而行。

（二）各民族均为历史主体

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实践价值。根据这一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各族人民群众共在共为的内聚性实践活动。在“五个共同”的凝聚过程中，各民族共创中华反映出各民族均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历史实践主体的客观事实。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域下，中华各民族无论所处方位如何、形成时间早晚、族体规模大小、建立政权与否，均丰富了“中华”的内涵。这些贡献无法被刻意磨灭或有意忽视，因而各民族均具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体地位。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上各族群基本上都选择“中华化”的演进方向，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份子，共同形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民族平等原则下真正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共同当家作主，进一步夯实各族人民共为历史主体地位的法理基础。所以，那些自外于中华民族范围或者拒绝承认别族贡献的狭隘意识并不具有客观性。

（三）各民族普遍主动参与

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23] 254}基于历史合力的观点，“共创中华”的历史过程把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践共同性则是中华各民族历史聚合的结果。从“五个共同”的实践过程来看，各民族普遍以一种主动姿态共同参与创造、形塑、融入中华，具有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并且实现全过程、全环节的实践参与。各民族之所以形成共同的历史主动，一方面是由于面向中华强烈的认同感、向心力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华强大的影响力、吸纳力和凝聚力。二者的对接与契合使得中华民族的自在、自觉、自为体现为始终向内凝聚的主动形态。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和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主心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现代建设更加具有突出的历史主动色彩，共同积极参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共同性并不是自然形成或被动挤压，而是历史主动的探索精神推动下的共创凝结。

（四）各民族同享历史记忆

以一种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实践表征在共同主动参与的过程叙事之外，还会经由连续性的历史积淀成为各民族共同享有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承载并印证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五个共同”的历史事实，同样带有符号意义和实践属性。有研究分析认为：“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31]所以，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源于各民族、各区域和“中华”多维形态的联结关系与互动实践,“五个共同”的各民族共创中华实践意涵则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深刻记忆养料,共时性和历时性、区域性和全域性的集体记忆经过接触、碰撞、融合、转化,逐渐扩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集合。“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实践塑造的思想资源,又会进一步让各民族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集体建构过程,深化“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并转化为继续推动各民族共同参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现实建设环节的经验感受,与历史上的形成发展过程的共创实践记忆形成心理共鸣,这种经由向内凝聚的实践生产并对实践深化延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性在实践维度的重要体现。

四、“四个共有”的共同归属：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情感寄托

各民族“五个‘相’”的共生关联在文明引领、政治整合、民族内聚的综合作用下,经过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五个共同”共创实践转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华意涵的伟大祖国和伟大民族,赋予其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共同体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筑就具有结构内涵的实体形态基础上,还需要各民族共同注入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意义感,使得各民族共同认可并内化“中华”意涵,将“中华”作为各民族积极外显的共同表征和未来走向。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现实表征维度反映在高度认同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各民族的共同归属价值,进一步明确个体与共同体、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层次和认同关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未来走向维度则承载着各民族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共同实现更高层次发展目标的命运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四个共有”的话语表述清晰呈现各族人民强烈认同的现实归属和未来命运,各族人民既有共同的国家归属、民族归属、身份归属,也有共同的发展目标、光荣梦想与光明前景,这种围绕中华意义上国家与民族的深沉情感寄托,进一步凝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现实表征与未来走向维度的共同性意涵。

(一) 共有的家园归属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2]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形态描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政治概念、历史概念,是各民族向内凝聚、共同创造的结果。而从其与各族人民的关系意义来看,以“共有家园”定义中国,体现出其对中华民族生命延续、社会生活与情感依恋的深层价值。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五个共同”的共创中华实践,赋予“中国”以地理空间之外的家园意涵。一方面,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生息繁衍、安居乐业、繁荣进步的实体空间,能够充分满足各民族实现自我发展与共同发展的多样资源需求,提供各民族互不排斥且相互嵌入的共同栖身之地、安家之所、立业之本;另一方面,历史延绵、文明悠久的中国也是各族人民心之所系、难以割舍、不能脱离的精神依托,“家园”与“中国”的相通性成为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具象化表达,各民族只有在中国这个共有家园所提供的条件中才能形成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状态。无论是历史、现实还是未来,中国作为共有家园都在形塑各族人民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所以,

应当把“中国”的共有家园含义理解为中华民族共有生存家园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综合载体，不仅要保证家园的完整性与和谐性，也要提升家园的美好度和幸福度，才能更好发挥其基础保障作用。

（二）共有的身份认同

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存在几种偏差观念：其一，认为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政治界提出的“政治口号”，忽略其数千年自在自觉自为的文明历程；其二，认为中华民族是学术界形成的“空洞概念”，忽视其形成过程与实体内涵；其三，认为中华民族是结构上各民族的“相加之和”，漠视各民族的团结凝聚与要素交融；其四，认为中华民族是称谓上各民族的“指代总称”，割裂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联等。这些言论和理解都是不正确的，不可能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全面理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给出更具中国特色的描述性概念：“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1]2}依据这一定义，中华民族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存在。从身份视角看，各族人民都有一个确定的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拥有中华民族的身份符号，都可以被称作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单纯象征意义的概括总称，而是已经被各族人民高度认同的族属共称。各族人民只有首先凸显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从属于中华民族的各民族身份认同才有意义，这种身份认同深入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层次性和融合性。以共有身份为纽带，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为深刻。

（三）共有的国民称谓

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必然要将来自不同地域、族属、宗教、阶层、职业等范畴的类型化人群有机整合入统一的国家政治框架，需要经历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的“全民一体”过程^[32]。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视角看，“全民一体”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共有家园中结为具有社会政治内涵的国民共同体，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赋予其规范性的法理意义，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各族人民都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政治的中国人”的统称^[33]。“中国人”作为各族人民具有专属性的共同名字，既是体现国民的集体身份表达，也是一种面向国家的个体身份辨别，这种共同称谓包含着归属国家的自我归类意识、荣辱与共理念和权利义务关系，并且超越其他界定身份的话语表意。各族人民只有具备高度的国家认同观念，才会以“中国人”的身份和名称共居于世并进行外部交往，这种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直接表现。“中国人”的共同名字意味着，各族人民都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与国民特征，是无法随意抹除、不能刻意改变的客观事实。同时，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各族人民都要服从并服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传承弘扬发展同是中国人、齐做中国事、共愿中国好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共有的前途命运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观之，历史走向、现实归属与未来愿景构成了从时空演进维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连续视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要面向未来持续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性彰显顺应历史大势而追求进步的积极姿态，具有面向未来的目标指向性和结果导向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有形态及其建设成果并不是文明终结与发展停滞，而是选择明确继续演进的方向、目标

与梦想, 即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面对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宣言, 迅速成为团结凝聚各族人民保家卫国的共有意识, 经过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救国、兴国、强国实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化为中华民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期望, 成为能够实现也必然实现的共享发展目标, 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 既成为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共同团结奋斗的引领动力, 也昭示着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前途命运, 已经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最大公约数^[34]。各民族只有在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者、责任者、参与者, 为中华民族共同性不断增长、强化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能量。

五、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现实要求

在中华文明突出的历史连续性视野中, 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设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存在张力的情况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协同推进逻辑: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保障中华民族大团结, 推动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指出, 中华民族的前景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 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35], 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华民族共同性日益增多的定论相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推进, 必然会带来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要求增进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 通过更好发挥其纽带功能与凝聚作用以促进协同推进实践, 这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线两面”的工作要求^[36]。为此, 应当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逻辑性“共同”意涵, 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需求, 为增进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创造积极条件, 促进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团结奋斗、团结统一,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

(一) 强化共生关联促进团结凝聚

共生关联的关系模式反映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携手共荣的紧密联系,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凝聚提供关系共同性的条件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凝聚, 需要着力提升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和合共生程度。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必然要发挥人口聚合、人心归聚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因此, 要努力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更加完善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现代化社会条件, 积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交往交流交融意味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共同性不断强化的动态走向”^[37], 有利于夯实团结凝聚的内生共同性和多维互嵌性基础。

在空间维度, 积极鼓励、有序推动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融居,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程度、增强结对帮扶效能, 便利各族群众交通往来、增进了解、彼此联系、

相亲相爱，形成更为广泛的血缘亲缘关系。在文化维度，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程中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共同认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媒介，以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为方法，以中华民族形象和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以强化文化相通。在经济维度，优化各民族现代化生产要素和发展资源配置，提升各族群众的互嵌式发展水平，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促进不同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在一起、发展在一起，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意义”，提升各民族经济相依和利益关联程度。在社会维度，着力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改善各族群众进行社会交往、发展社会关系、提升社会信任的综合性环境条件与社会氛围，增强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为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提供更多支持性的社会资源。在心理维度，要以相互亲近的情感纽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各族群众相互欣赏、广交朋友、加深情谊、守望相助，以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兄弟同胞情感拉近各族群众的心理距离，促进互容互嵌、共生共荣。

（二）强化共在实践促进团结奋斗

各民族通过“五个共同”的共创中华历史实践，共同铸就了蕴含疆域、历史、国家、文明、精神等多重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五个共同”的现代表达，集中体现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38]的重要指向。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在实践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各民族首先要“想在一起”，才能“干在一起”。在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是共同团结奋斗最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保证，党的指导思想是共同团结奋斗凝心铸魂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引领，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共同性在实践维度的底色和方向。必须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确保共同团结奋斗始终拥有勠力同心的坚实根基和统一方向。第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有效保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政治条件和平等地位。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框架内，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平等政治权利，推进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最大限度地把各民族有机凝聚起来。第三，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社会实践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在宏观上，要继续促进各民族共同维护领土完整、共同延续中国历史、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发展现代文明、共同弘扬民族精神；在微观上，要精细化打造各族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引导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共同建设幸福家园、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现代化社会实践活动。

（三）强化共有归属促进团结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现实表征与未来发展，落脚在各族人民“四个共有”的自我归属，深刻体现出各族人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依恋，成为推动各民族走向更加团结统一形态的能量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的具体实践，要引导各族人民始终牢固坚守共同家园、共同身份、共同名字、共同梦想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这亦是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最为直接、最有力量、最具影响的路径。

强化共有归属促进团结统一, 需要形成“内外并举”的思路。在对内层面, 应当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润物无声的浸润人心效果, 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明确中国大地是不能割舍、不能分裂的共同家园, 首先体认自身作为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共同身份与名称, 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此外, 需要重视讲好各族人民道路相同、命运一体、前途光明、荣光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未来故事, 以共同梦想牵引各族人民增强民族归属与国家认同。在对外层面, 应当全面防范化解影响各族人民归属感和认同感、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的各类风险隐患, 坚决反对一切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污蔑抹黑、遏制打压的行径^[5], 有效遏制和打击干扰、侵蚀、分裂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境内外活动。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需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由外而内来引导各族人民坚守共有归属。

六、结语

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理路, 需要立足中国历史、中国情境、中国经验,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魂脉中寻找答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建设过程具有丰富的“共同”意涵, 这些“共同”意涵的联结与融合, 凝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特色属性和显性特征。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意涵与建设要求, 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关键意义。

第一,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逻辑与规律,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中华灿烂文明来系统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 拥有独特的规模体量、历史连续和文明逻辑, 无法依据西方语境中源于小团体的“共同体”理论概念来周延描述。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与增长, 并持续发挥聚合效应。这种共同性并非西方自由主义式的要素叠合, 也不是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想象建构, 而是在中华各民族经历长时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自然凝聚和政治形塑中形成的被高度认同、深积淀、深刻内化的共同因子。那些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拆分为“中华民族”与“共同体”的简单加总, 试图从西方话语下的共同体形成理路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是有严重偏差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概念认识应当落脚到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整体性逻辑, 坚持“合”的思路而非“分”的解构。

第二,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客观存在, 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 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要素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具象化表现需要抽象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化表达。中华民族共同性集中反映出中华各民族之间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紧密关联, 从结构格局、内容维度和时空发展相结合的综合视角来理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关系基础—实践过程—现实表征—未来走向”逻辑链条, 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性在联系、实践、归属、命运等不同方面

的综合性表达,可以构成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整体叙事。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五个‘相’”的共生关联、“五个共同”的共创实践、“四个共有”的共同归属等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归纳与阐释,能够充分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共同”意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性越强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越坚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包容性和凝聚力会越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需要不断增进、强化、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性,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征程中,应当坚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推进思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提供各类有利条件,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在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联系,引导各族人民始终牢固坚守共同家园、共同身份、共同名字、共同梦想,推动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凝聚、团结奋斗、团结统一,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3: 4.
- [2] 谷苞. 民族研究文选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1.
- [3]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28.
- [4]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3-06-09 (1).
- [5]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7 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2).
- [6] 周平. 族际关系共同性的社会身份基础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 32-42.
- [7] 郝亚明, 杨文帅.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结构视域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29-35.
- [8] 许倬云. 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06-207.
- [9] 严庆.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命脉与民族工作的方向: 增进共同性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 (4): 12-15.
- [10] 杨须爱. 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价值与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J]. 民族研究, 2021 (1): 30-47+140.
- [11] 陆春梅, 王希恩. 从“共同体”“中华民族”两个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4 (1): 46-53.
- [12] 马伟华, 郭怡敏. 共赢、共情与共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理论结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2): 17-24+181-182.
- [13] 张淑娟.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类型、凝聚机制与形成过程 [J]. 探索, 2022 (1): 51-62.
- [14] 朱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的现代性转化及发展 [J]. 民族研究, 2021 (3): 23-38+139-140.
- [15] 朱永梅, 陈金龙. 以共同性引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 28-36+182.

高永久, 冯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56-69.

- [16]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17] 冯辉, 高永久.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结构内涵、时代需求与实践导向 [J/OL].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11 [2024-10-04]. <https://doi.org/10.19898/j.cnki.42-1704/C.20240703.01>.
- [18] 郝亚明, 秦玉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要素分析 [J]. 民族学刊, 2022 (7): 1-7+137.
- [19] 杜尚泽, 贺勇, 张晓松, 等. “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青海、宁夏考察纪实 [N]. 人民日报, 2024-06-23 (1).
- [20]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370.
- [21] 丹珠昂奔.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构成、内涵特质及铸牢举措 [J]. 民族学刊, 2021 (1): 1-9+83.
- [2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7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7.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
- [24]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25] 王传超. 古 DNA 实证中华源流史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6-17 (6).
- [26] 李大龙. 从“天下”到“中国”: 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69.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19.
- [28] KAPLAN, D. What can the concept of friendship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07 (2): 225-244.
- [29] 潘岳. 中西文明根性比较 [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22.
- [30] 杨建新. 中国少数民族通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20.
- [31] 麻国庆. 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J]. 民族研究, 2017 (6): 47-57+124-125.
- [32] 周平. “全民一体”: 一个述说中华民族的原创概念 [J]. 理论月刊, 2024 (4): 5-12.
- [33] 关凯.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5): 71-77.
- [34] 林华山, 龚静阳, 刘泮菡. 多维团结: 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2-25.
- [35]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46.
- [36] 高永久, 冯辉. 从“一条主线”到“一线两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导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1-12.
- [37] 陈纪, 蒋子越. 增进共同性: 新时代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再思考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4 (3): 128-140.
- [38]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3): 4-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合一共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牛汝极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正确阐明中国历史，必须坚持中华民族历史观总纲和原则。“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总纲，把握处理好“四个关系”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合一共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合一”与“共命”。中华民族共同体“合一共命”的本质特征具体包括实体性、融合性、统一性、共生性，以及在一统多彩结构中的相互依存和有机整体中的共担共享。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出发，“合一共命”指向政治团结统一、经济相依互补、文化兼容并蓄、通语流行普及、精神相亲共振等，其理论渊源主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合一共命”的本质特征，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促进人民团结与社会和谐、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合一共命；“两个结合”；“五个共同”；团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070-12

一、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总纲和原则

历史就是“认识你自己”。回顾历史是重构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国历史不仅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还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石。历史观如何塑造关系到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历史观正确与否关系到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不谋

DOI：10.13946/j.cnki.jcqis.2024.06.007

作者简介：牛汝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引用格式：牛汝极.“合一共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70-81.

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1]。正确阐明中国历史, 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 事关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总目标的实现,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巨轮行稳致远。正确阐明中国历史, 必须坚持中华民族历史观总纲和原则。

“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总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 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2]。这里的“五个共同”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总纲, 是书写、阐述、学习、宣讲中国历史脉络的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历史观突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是从整体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 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3]。这里强调以制度机制作为坚实保障,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迈向法治化、常态化与长效化。具体而言, 就是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 落实到各领域各环节各层面。一方面,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讲好中华民族故事; 另一方面, 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握处理好“四个关系”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原则^[4]。一是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即一和多的关系, 增进共同性是大方向, 也是大趋势。二是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即大和小的关系, 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即主和次的关系,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是主干, 各民族文化是枝叶, 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四是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 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必须体现历史逻辑和思维的整体性、连续性。这也可以称作“同一律”^[5]。虽然古代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叙事可以更新或改写, 但如果不用同一个历史逻辑和思维解释, 就会造成历史表述的“二律背反”。对中国古代历史具体事件的定位定性的表述逻辑, 其实也一一反射映照在近现代话语中。这不仅涉及主体和客体问题, 也涉及主客融合的时间顺序和古今民众的真切感受。历史叙述的逻辑要贯通古今, 连接历史与未来。只有用同一个逻辑打通古今, 历史叙述的观点才能立得住、讲得透、信得过, 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并造成思想混乱。比如, 有关华夷或胡汉关系重大事件和保家卫国民族英雄的认知等话语逻辑, 既要有包容的格局胸怀, 也要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百姓苦难的感同身受和切实理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它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经济生活和政治认同为基础, 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时, “合一共命”这一理念凸显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合一共命”意味着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共同肩负着国家的兴衰荣辱。深入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一

共命”本质特征，有助于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为民族工作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对“合一共命”特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从而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合一共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6]这一重大使命和课题的初步尝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根本支撑，是摆脱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影响的关键举措。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合一共命”凸显其本质特征，有助于把握民族工作主线。“合一”和“共命”是两个价值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新力的精神内核，相互依存促进。

“合一”既是基础条件，也是方向动力。文化上的“合一”意味着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政治上的“合一”是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上的“合一”指通过发展和共享资源实现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精神上的“合一”是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共同追求，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共命”就是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6]：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每个人的发展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共命”体现了个人与国家、民族的紧密联系：共同面对挑战，在面对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社会问题等挑战时，中华民族能够凝聚一心，共克时艰；共同分享成果，在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所有成员都能分享到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共同承担责任，每个成员都有责任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合一”和“共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合一”是“共命”的基础，只有实现了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精神的合一，才能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共命”是“合一”的目标，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合一共命”

“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6]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合一”与“共命”，并以此实现了文化、政治、经济和精神的融合，延续数千年。

（一）古代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合一共命”

在先秦时期，华夏族逐渐形成，各部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加强。《史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诸侯咸来宾从。”^[7]这表明在黄帝时期已经出现了部落联盟，为后来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此时，虽然各部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共同的生存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他们走向联合。例如，在治水过程中，大禹领导各部落共同努力，克服了自然灾害，体现了“合一共命”的精神。

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8],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汉武帝大力开拓疆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使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更加紧密。例如,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8] 309-313},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的开放与包容,以及“合一共命”的理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与汉族相互融合^[9]。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例如,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政策,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9] 303-310},体现了各民族在“合一共命”理念下共同发展的趋势。

隋唐时期形成了“华夷共祖”“胡汉一家”的民族关系理念。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迁徙到中原地区,与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同时,也有不少汉族人口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胡汉通婚现象十分普遍。唐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政策,通过建立羁縻府州等方式,保留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唐朝皇帝对周边民族政权首领进行册封,确立了唐朝在民族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周边民族政权首领由唐朝册封。唐朝经常开展与周边民族政权间的官方互市,民间贸易十分活跃。胡人的服饰、饮食、音乐等文化元素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也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深远影响^[10]。

宋朝与辽、西夏、金并立,各民族间政治联系不断加强,如宋辽澶渊之盟后的和平与贸易往来,体现了各民族在共同历史舞台上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11]。元朝的大一统通过推行行省制度等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各民族在政治舞台上共同发挥作用^[12]。元代西域人不断华化,学习儒学、佛老^[13]。经济上,各民族贸易往来频繁,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北方汉族南迁与南方少数民族共同推动了南方经济发展。宋词与辽金文学相互借鉴,绘画、书法等艺术也相互交流,体现了各民族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合一共命”。

明朝实行开明民族政策。比如,土司制度维护了中央权威和少数民族利益^[14]。清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统治,实行满汉“文化统合”等政策,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15],这促进了国家发展和各民族交流融合。清朝在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政策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经济联系。文化教育进一步发展,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汉族儒家文化得到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也得到传承发展,文学艺术达到新高峰,各民族艺术家相互交流学习,共同创造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

(二) 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与“合一共命”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各成员开始觉醒,共同反抗外国侵略^[16]。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都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危机面前的团结和抗争精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强调民族平等,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提供了理论指导。辛亥革命后,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为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而共同奋斗。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各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族人民

的广泛响应。各族人民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为保卫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新疆同胞献机十架支援“武汉保卫战”，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等，都是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光辉典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合一共命”精神。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发展与“合一共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制度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同发展^[17]。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和发展，体现了“合一共命”理念。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在这一时期，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各民族在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科技创新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时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3]。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可以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于两个词：“合一”与“共命”，坚守并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文化、政治、经济和精神的合一，才成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共命延续。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一共命”本质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合一共命”本质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实体性，是在历史长河中自发形成的客观实在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融合性，以汉族为凝聚核心，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统一性，自秦汉以来各民族不断走向统一，大一统意识体现整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共生性，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缔造国家、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和培育精神，享有共同前途命运。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一统多彩结构，各民族虽各具特色但相互依存，如经济上特色产业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作为有机整体，各民族共担共享，面对困难齐心协力，共享国家发展成果。

（一）实体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客观实在性，并非凭空想象而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发地形成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族实体。它在历史上处于“自在”状态^[18]，历经几千年的沉淀，早已深深扎根中华大地，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并能人的意识所反映。

（二）融合性

中华民族的融合性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汉族身上。历史上众多民族消失了, 去哪了? 大多都融合到被称为“汉人”“汉民”的群体里了, 同时, 也有不少汉人融合到少数民族中^[19-20]。先有了“汉朝”这个国家, 然后才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称呼“汉人”, 包括当时国家中所有的种族部落。强大辉煌的汉朝虽然结束了, 但这个群体一直沿用“汉人”称谓没有中断。这里的“汉人”是各民族统称, 展现出强大的融合性。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中, 汉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21]。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流、兼并与融合, 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同民族虽各自拥有独特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但在民族交往中, 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各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 却又共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今天, 各民族都在“中国人”的称谓里, 根据自身的历史和地理特点, 发展出不同的耕作方式和经济模式, 但又一起为祖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融合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丰富多彩, 充满活力。

(三) 统一性

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根本特征。自秦汉至近代的两千多年间, 各民族通过军事扩张、政治和亲、经济文化交流等方式, 不断走向更高程度的统一。历史上的中国多数时候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存在, 这种“大一统”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22]。进入近代,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特征更加凸显。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 众多有识之士致力于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20] 94-106}。各民族始终视中华民族为整体, 视自己为构成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历史上各民族也曾出现过分裂与对峙的小插曲, 但统一与融合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和方向。“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 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性特征。

(四) 共生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显著的共生性。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 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史, 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各民族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文化, 如热爱祖国、团结奋斗、勤劳勇敢等精神, 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政治理念方面, 古代, 大一统是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近代, 追求民族独立和统一是革命斗争的主线; 现代, 坚持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理念。各民族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共同建设祖国经济, 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祉。此外, 各民族享有共同的前途命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 一统多彩结构中的相互依存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统多彩结构决定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民族构成来看, 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经济模式。然而, 正是这种多样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动力。在经济方面, 不同民族的特色产业相互补充, 形成多元化的经济格局。例如, 蒙古族、哈萨克族的畜牧业, 藏族的高原特色农业, 壮族的稻作文化等, 共同构成了祖国丰富多彩的经济画卷。同时, 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的舞蹈, 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的说唱艺术, 傣族的泼水节等民族文化元素, 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也为其他民族提供了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机会。这种多元结构中的

相互依存，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一共命特征。

（六）有机整体中的共担共享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民族在共同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目标下，实现了共担共享。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同承担责任。例如，在抗击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国家大力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坚持共同富裕理念，让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共享国家发展红利^[23]。此外，国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投入，让各族人民共同受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结构和有机整体的内在特征，充分体现了相互依存、共担共享的合一共命特征。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四、“合一共命”的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面向的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精神等领域。“合一共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紧密相连。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阐释

在政治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无论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纷争，始终保持着对团结统一的坚定追求。在古代，尽管各民族之间偶有冲突，但在面对重大危机时，总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大一统理念，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历朝历代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无不体现着对国家统一的高度追求。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和发展，形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系。

在经济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相依互补。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各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历史上中原农业与边疆畜牧业互补，中原需畜牧产品，边疆需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各地区手工业与商业交流频繁，中原精美产品通过贸易通道运到边疆，边疆特色产品也吸引商人运输到中原销售，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物质文化丰富。现代经济中，各地区产业分工合作，东部与中西部优势互补，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国家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兼容并蓄。在思想领域以儒释道为核心^[24]，融合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在艺术领域，各民族艺术相互交融。汉族的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独特元素。在宗教信仰上，多种宗教在中国和谐共存。古代丝绸之路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艺术和科技，经过消化吸收，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体系，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使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25]。

在通语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流行普及的通用语言文字。国家推行通用的语言或标准语，在历史上分别称为雅言、通语、官话、国语、普通话等。夏商周的标准语是洛阳雅言。春秋时期，孔子就是用洛阳雅言来讲学的。秦始皇“书同文”统一文字，奠定了大一统的文字基础。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语被称为“通语”。隋唐国语为“汉音”“秦音”。北宋人以洛阳方言为标准语，

南宋定吴语为标准音。元代除蒙古语外, 汉语的通行语继承了宋代的南方雅言。明代南京话从吴语转变为江淮官话, 后北京话成了通行语。清代北京话为官话。民国时北京官话被定为国语。“汉语”原指汉朝以来的通语官话, 与民族无关。汉语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母语。普通话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在精神方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相亲共振。中华民族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与价值追求^[26]。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民族文化多样且相互融合。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 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抗争精神。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奋斗目标指引下, 齐心协力,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 “合一共命”的理论渊源

“合一共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有着紧密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大一统”“知行合一”理念对“合一共命”有着深远影响。“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这种整体观念也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27]。“大一统”强调政治上统一, 文化上向更高文明学习和传承。其历史传承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上, 还体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中。“知行合一”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认识过程的动态统一, 通过实践活动对已有的知识进行验证、修正和完善, 从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各民族在共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与自然和谐相处, 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时, “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理念也为“合一共命”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政治共同体到文明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 “天下为公”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28]。“和而不同”则造就了中华民族宽厚包容的性格, 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建立开放包容的社会关系和制度, 鼓励与促进个体的发展。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对构建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将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发展阶段和历史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指出: 人类要扬弃和超越前两种有缺陷的共同体, 而迎来“真正的共同体”^[29]。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 共同主体是由众多主体联合而成的主体。共同主体强调共同主体性。在当代, 我们应以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为指导, 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与协同, 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繁荣与可持续发展。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即要注重各民族之间的协同发展, 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共同进步。同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当代价值。民族文化和心理理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持, 民族关系理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方法原则, 民族融合理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发展方向。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内涵与“合一共命”

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坚实的经济基础、丰富的文化内涵, “合一共命”理念

贯穿其中。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出发，“合一共命”指向政治团结统一、经济相依互补、文化兼容并蓄、通语流行普及、精神相亲共振等。

（一）政治团结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认同方面与“合一共命”紧密相连。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强调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各地区、各民族都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参与国家的治理和建设^[30]。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体现“合一共命”理念。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科举制度的推行，打破了贵族世袭的局面，为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才提供了平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各民族的优秀人才能够进入国家统治阶层，共同参与国家的治理和建设，促进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团结。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强调民族平等团结，为唤醒民族意识、促进思想解放作出有益尝试。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族觉醒。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同样强调民族平等团结，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起到了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为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共同奋斗。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国家的治理和决策，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和团结。各民族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反映本民族的利益诉求，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建言献策，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体现了“合一共命”理念。

（二）经济相依互补

“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2]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合一共命”理念紧密相通。国家为各民族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各民族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不懈奋斗，体现“合一共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促进各民族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体现开放包容与“合一共命”。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地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远销海外，同时也引进了外国的香料、珠宝、药材等物品^[31]。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的开放包容以及“合一共命”理念。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通过茶马古道，中国的茶叶、马匹等商品与周边国家的药材、皮毛等物品进行交换。茶马古道的经济交流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同发展，体现了“合一共命”精神。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各民族企业家共同努力，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经济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展现“合一共命”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环境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企业家共同努力，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例如，张謇、荣氏兄弟等民族资本家，在发展实业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

在经济上紧密合作，共同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物质支持。例如，大后方的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药品、武器等物资。这种经济合作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合一共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发挥优势共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国家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投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各民族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战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各民族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新时代以来，各地区各民族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更好推动国家经济繁荣、更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

（三）文化兼容并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纽带，具有一统多彩的特点。中华文化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提炼组成，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例如，汉族的儒释道文化等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合一共命”理念始终贯穿其中。各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共同为中华文化繁荣作出贡献，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如“和为贵”“协和万邦”等^[32]。这些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和合”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促进各民族团结融合，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历史上，各民族在共同抗击自然灾害、抵御外敌入侵时，充分体现了“和合”思想与“合一共命”精神。

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团结互助精神。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传统。例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村民们在农忙时节会互相帮助收割庄稼；在遇到自然灾害时，会齐心协力共同抗灾。这些民间文化中的团结互助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成员之间的“合一共命”关系。

六、结语与展望

“合一共命”对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合一共命”理念有助于中华民族各成员深刻认识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在历史上，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在现当代社会，各民族继续团结一心，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例如，在反对“三股势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行为。“合一共命”理念有助于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与社会和谐。各民族在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发展目标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创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美好生活。在现当代社会，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合一共命”理念有助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各民族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下，

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各民族将继续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合一共命”对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各个时期不断凝聚、发展和壮大，其背后的理念可以总结为“合一共命”。“合一共命”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人民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合一共命”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中。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呈现融合共生的状态。从古代的部族融合到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同民族在共同的地域上繁衍生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历代王朝通过政治制度的建设和治理理念的推行，促进国家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例如，秦汉时期实行的郡县制，将不同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政治基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密切，形成了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品流通，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共同融合的结晶。在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各民族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字，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也被不同民族所接受和传承。

“合一共命”存在于中华民族的现实发展中。在当今时代，“合一共命”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特征在现实中的生动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在这个目标的引领下，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还是在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方面，各民族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各民族在国家发展中享有共同的利益。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为各民族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各民族的发展也为国家的整体实力提升作出了贡献。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国家致力于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利益，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在环境保护、反恐维稳、国际合作等方面，各民族共同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各民族也在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承担着共同的责任，共同守护国家的领土完整。

“合一共命”存在于中华民族共同的未来展望中。“合一共命”理念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未来的发展中，各民族将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我们要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合作基础。各民族将继续携手共进，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各民族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实现共同繁荣。中华民族共同体将继续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各民族的文化将在交流融合中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合一共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主要特性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和精神的；有了政治经济协同的中华文化，中国人才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才成为中华民族。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本质特征，不断加强团结协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牛汝极. “合一共命”: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70-81.

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 [1]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正编 [G].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8: 577.
- [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年9月27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2).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4]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5] 马丁·海德格尔. 同一与差异 [M]. 孙周兴, 陈小文, 余明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33-47.
- [6]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3): 4-8.
- [7]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5.
- [8] 孟祥才. 中国历史: 秦汉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9-114.
- [9] 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76-285.
- [10]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 (修订本): 第3编第1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70-86, 274-326.
- [11] 施展. 中国史的庙堂和江湖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24: 10.
- [12] 陈高华. 兼收并用莫不崇奉: 陈高华说元朝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41-53.
- [13]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8: 8-45.
- [14] 江应樑. 略论云南土司制度 [M] // 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332.
- [15] 阎崇年. 森林帝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192-194.
- [16] 丁名楠, 等. 帝国主义侵华史: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1-5.
- [1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1: 27-30.
- [18] 费孝通, 等.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1-36.
- [19]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N]. 益世报·边疆周刊, 1939-02-13.
- [20] 顾颉刚. 宝树园文存: 卷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94-106.
- [21] 卢勋, 等.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511-530.
- [22] 杨向奎.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M]. 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 2016: 67-144.
- [23]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J]. 求是, 2021 (20): 4-8.
- [24] 楼宇烈.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83-218.
- [25] 许倬云. 万古江河: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 57-144.
- [26] 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49-56.
- [27] 张岱年. 中国国学传统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3-46.
- [28] 吴稼祥. 公天下: 中国历代治理得失 (增订版)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i-xxi.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1.
- [30] 姜义华. 中华文明的经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52-154.
- [31] 芮乐伟·韩森. 丝绸之路新史 [M]. 张湛,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5: 3-28.
- [32] 张立文. 和合哲学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15.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欧阳彬 魏莹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统一，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日常生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根基，塑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空场域和活动图式。从逻辑理路讲，全国各族人民应遵循“知—情—意—行”的逻辑脉络，以常识经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认知、以符号表征激发中华民族共同情感、以利益驱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意志、以交往互动引导中华民族共同行为。从实践向度看，要从日常生活话语、日常生活情境、日常生活规约、日常榜样典型四重维度探索具体路径，通过把政治话语转变为生活话语、理论灌输转变为氛围感染、外在监督转变为内在修为、示范效能转变为身体力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嵌入各族人民生活全过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日常生活；逻辑理路；实践向度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082-12

DOI：10.13946/j.cnki.jcqis.2024.06.008

作者简介：欧阳彬，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魏莹，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ChatGPT 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与应对研究”（23JDSZ3144）

引用格式：欧阳彬，魏莹.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82-93.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9月2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推动民族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沿课题, 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目前, 学界研究多集中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建构。第一, 在研究结构上, 学者们从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内涵特征、逻辑理路、演进历程、现实困境、实践路径等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2-7]。第二, 在研究范式上, 学者们多采用“XX 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范式, 如引入新质生产力^[8-9]、网络空间^[10]、数字技术^[11]、智能算法^[12]、非物质文化遗产^[13]、传统节日^[14]等角度。第三, 在研究学科范围上, 涵盖了民族学^[15]、民俗学^[16]、历史学^[17]、政治学^[18]、心理学^[19]、社会学^[20]、教育学^[21]、法学^[22]、哲学^[23]等交叉学科。总的来说, 学者们自上而下的深入研究, 把握住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和重要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既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24], 也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25], 始终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统一。2024年9月21至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表示, 要把民族团结落实到基层治理、学校教育、群众日常生活中,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植入孩子们心灵,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因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应以现实世界为基础, 从人民群众的具体日常生活中去寻找, 通过意识形态培育与建设的重心下移, 将“形而下”的具象生活嵌入、贯通“形而上”的理念目标, 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26]。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日常生活领域, 从生活化视角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内涵、价值意蕴、鲜明特征、建构路径等^[27-30]。这些研究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但是仍存在对日常生活特质挖掘不够、日常生活结合度不深、日常生活设计不贴切等不足。

日常生活这一“熟知非真知”的微观领域, 蕴含着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建构的深层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既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 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要有形、有感、有效。”^[31] 那些以增进共同性为导向的日常语言、日常交往、日常消费、日常仪式、日常游戏等, 能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达到“隐而不显”的常态化状态, “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 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32]。鉴于此, 本文以日常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契合为出发点, 将宏大叙事与生活叙事相统一, 从“知一情一意一行”探寻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观照人民群众现实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的生存生活感悟, 探索落细、落小、落实的实践向度,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并成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二、日常生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不是纯粹自我意识的先验存在, 也不是脱离生活

实践的漂浮之物，其生成和发展都是“在几千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并随着共同体的发展外化，升华为一种共同体意识”^[33]，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变迁、日常生活的需要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人们现实生活在观念上的反映，映射着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现实共同体的共性认知和共同意志。如果意识脱离了与生活实践相关的实体性内容，意识就只会沦为一种肤浅抽象的思想形式，意识建构的出发点应是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后一公里在日常生活”^[35]。

（一）日常生活架构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空场域

日常生活的时空特性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36]。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世界的基本维度，为意识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深刻影响着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时间特性，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从宏观层面看，日常生活是历史的产物，具有历史时间的规定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在历时性中得以绵延生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时性中得以积淀传承。从中观层面看，日常生活缔结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社会时间的规定性。人们在社会时间中参与劳动实践，在互帮互助中自发自觉地结成生活共同体，进而演化为民族共同体，生发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断确证着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从微观层面看，日常生活贯穿于个体生命周期历程，具有生命时间的规定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融入个体衣食住行、礼尚往来的生命全周期序列，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血脉在历史时间、社会时间、生命时间中得以代代相传、历久弥新。“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巴依卡·凯力迪别克，一家三代人接力戍守边疆，在代际传承的历史时间中，用70余载的绝对忠诚和担当奉献，将伟大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熔铸于生命时间，并在社会时间中用实际行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边疆，主动承担起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时代重任。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所具有的空间特性，深刻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呈现样态。日常生活空间不仅仅指具有活动边界的物理空间，还包括精神空间和数字空间。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空间是人们实际生活和互动的具体场域，包含地理环境、社会空间和文化场所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我国疆域辽阔，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互嵌特征。物理空间上的相邻互嵌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相亲和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中华大地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遗迹、文化场馆等作为物理空间维度的形象表达，承载了神圣的民族意识，强化了民族集体记忆，激发了民族集体情感。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空间与人们的重复性思维、传统习俗和经验常识息息相关，是抽象性的知识和符号表达，塑造着人们的价值信仰，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日常生活中的数字空间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变革的产物，以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性的时间全面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空范围和时空样态。数字技术创生出全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全面创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表达。比如，数字故宫的建设就是典型。它通过三维建模、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古老的宫殿建筑、珍贵的文物展品以数字形式呈现，既打造了中华文化展示的数字平台，也利用互动体验增强了文化再创作。全

球中华儿女无论身处何地, 都能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中, 不仅有利于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也有利于增进世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明基础。

（二）日常生活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动图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建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图式。个体通过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 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潜移默化地内化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 形成对中华民族自在的根深蒂固的天然情感。

首先, 各族人民在日常消费图式中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以及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马克思指出: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4] 531}人们消费的前提首先是生活资料的获取, 消费“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37], 人们在日常消费中实现人自身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各族人民因日常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 在经济上形成了互补依存的民族关系, 进而延伸至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 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逐步凝聚成利益共存、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其次, 各族人民在日常交往图式中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交往是共同体演进和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跨越族群边界和族群差异, 形成超越血缘纽带的“华夷可变”观念, 以共同体意识构筑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 在共同记忆、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中推动中华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团结奋斗、繁荣发展。日常交往中语言是重要媒介, “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时候, 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38]。当前, 我国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交相辉映, 中华民族语言上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后, 各族人民在日常思维图式中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日常思维图式是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 主要包括经验图式和礼俗图式。具体来说, 经验图式维持着中华民族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形式、节奏和内容。礼俗图式规定着中华民族的伦理规范、社会责任、道德修养。日常思维图式通过世世代代的教育、示范、模仿、类比, 构建起了各民族共同的信仰体系和共有的精神家园, 并指导着各族人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实践。

三、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教化—内化—固化”的过程, 涉及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大心理阶段, 应以常识经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认知、以符号表征激发中华民族共同情感、以利益驱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意志、以交往互动引导中华民族共同行为, 在“知—情—意—行”有机协同下, 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一）认知引领：以常识经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认知

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知识。常识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具有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功能。它改变了激进灌输的教育方式, 润物无声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教育目的。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常识经验入手, 强化中华民族总体性认识, 以此构建更深层次的认同。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常识、政治常识、文化常识涵盖了“五个认同”的核心要旨。我们要以常识还原事实，用客观事实击碎各种虚无主义、地区分裂意识、狭隘民族主义，以此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知，激发人民的情感认同和精神认同。一是通过历史常识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认同。历史常识是指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常识蕴含着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反映着最真实鲜活的历史事实。当前，我国仍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和地区分裂势力的挑战，特别是外部反华势力的干预，更是加剧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度和复杂性。针对民族问题，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予以纠正，通过“五史”教育，认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强化各族人民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认知。二是通过政治常识增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政治常识是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必须让人民群众清楚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三是通过文化常识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内蕴着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命运。“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获得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39]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这是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长远根本之策。文化认同的关键在于以文化常识强化文化自觉，既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华文化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使认同中华文化与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悖，又要传承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扬艰苦奋斗、舍生取义、奋发图强等伟大精神，使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二）情感共鸣：以符号表征激发中华民族共同情感

符号作为意义生发的修辞表征，被赋予了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化符号，是长期实践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外在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1]“无论是民族成员对共同体存在情感感知的生发，还是对民族发展理性认知的达致，符号手段始终是使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的重要凭借。”^[40]符号使抽象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具有共通性的具象化标识，通过联想机制激发人们的情感反应，使个体在面对这些符号时产生情感共鸣和情感认同。

日常语言符号、日常图像符号和日常仪式符号在激发中华民族共同情感中具有互补和协同的作用。日常语言符号是最普遍的符号形式，是人们进行交流互动、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人们通常以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传递信息和沟通情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56个民族共有73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41]。汉语和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扩大和加深了各民族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4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深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也要在民族特色语言文字中挖掘中华民族的共性基因和共通情感，使中华文明的共同性和各民族的差异性在激发民族情感上优势互补。比如，“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这些形象的语言指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归属意识、团结意识、凝聚意识。日常图像符号集视觉、听觉、感觉于

一体, 是人们接收社会信息的主流方式, 具有跨越语言障碍、增强民族共同情感的独特优势。各族人民在日常生产、消费、交往、宗教信仰中形成、筛选、传播、修正了系列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情感诉求、精神品格, 是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视觉媒介, 共同建构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日常仪式符号通过特定的行为和习俗的定期重复, 再现和强化集体记忆和情感联结。“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 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 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43] 中华民族凭借丰富的传统仪式, 如春节团圆、元宵赏灯、中秋赏月、端午龙舟等, 延续着民族独特而强韧的文化记忆, 凝聚着民族情感共识, 架构起民族精神信仰体系。随着新兴媒介技术介入传统仪式, 传统仪式获得创新性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 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体验和全球范围内的情感联结, 切实扩大了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 意志锤炼: 以利益驱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意志

利益是现实的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 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因素。“‘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4] 286} 人们因利益结成共同体。但是“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34] 73}, 那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把资产阶级特殊利益包装成人民普遍利益的共同体并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优先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 始终将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置于最高位置,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包括经济利益、社会福利、文化权益等, 以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为驱动, 有效培育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意志。

意志是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调节支配自身的行动, 克服困难去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的思想共识能否转化为生活实践, 关键在于意志是否坚定。“就个人来说, 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 才能使他行动起来。”^[4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转化为意志, 才可能使全体人民自觉克服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一方面, 在增进利益共同性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意志。利益共同性意在“通过建立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互补的利益链条来增强民族共同体的内部依赖性”^[45], 以各民族间的资源共享互惠和文化交流融通加深民族联结和民族团结, 协调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和中华民族集体利益, 并且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融入各民族发展之中, 在利益共建共享中使各民族成为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 以此强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 在解决现实利益问题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群众利益无小事。毛泽东指出: “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群众的生活问题, 就一点也不能疏忽, 一点也不能看轻。”^[46]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 “就得和群众在一起, 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 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盐的问题, 米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衣的问题, 生小孩子的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46] 138-139}。不解决好人民群众日常利益问题, 就难以汇聚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当前,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进一步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志基础。

(四) 行为助推: 以交往互动引导中华民族共同行为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 包含着知、情、意、行四

大环节的有机统一，从入脑入心到外化于行，日常行为是关键，个人要在各民族日常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加以践行。这样才能使观念的力量转变为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力量。

中华文明孕育着开放包容的历史基因，各民族跨越了地域、血缘、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限制，开展着广泛且深入的交往互动。一方面，各民族在交往互动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统一底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商贸、迁徙、婚姻、宗教等多形式，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联系网络，不断探索出多民族依存共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全方位嵌入各族人民的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这在全域范围内加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等共同理念，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连通、思想共通、经济联通、民心相通，巩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使各民族思想一致、步调统一，“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47]。另一方面，各民族在交往互动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行动。“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48]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作为一种柔性社会联结纽带，以族际互惠的优势维系着民族间性，使多民族的异质个体经过高度整合，形成有机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意志使这一有机体在复杂组织中保持和谐稳定有序，而统一行动则使共同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以意志感召力和实践行动力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42]当前，我国各民族统一行动的目标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向度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在从日常生活话语、日常生活情境、日常生活规约、日常榜样典型四重维度协同探索具体路径，通过把政治话语转变为生活话语、理论灌输转变为氛围感染、外在监督转变为内在修为、示范效能转变为身体力行，架构起国家与各族人民沟通交流的桥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嵌入各族人民生活全过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磅礴精神力量。

（一）巧用日常生活话语，把政治话语转变为生活话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其话语表达需要及时回应时代和人民所需。结合人民群众的日常关切，运用生活化资源和通俗化话语表达，使政治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化，把道理讲得质朴又有温度，让人民能听懂、能接受、能践行。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49]第一，关切日常话语主体需求，设置相应生活话语主题。当前，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突发事件、消费娱乐等主题广受人民关注和热议。应及时对准人民话语需求，利用和设置相关话语主题，话语主题选择应遵循“小切口，大问题”，引导群众关注和参与民族团结建设，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行动自觉。比如，在讨论环境保护时，设置“各民族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主题，强调各民族在环境保护中的共同责任和贡献；在消费娱乐领域，推广反映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影视作品和音乐节目，增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交流互鉴；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宣传

各民族团结互助的感人事迹, 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二, 丰富日常话语表达内容, 建立系统生活话语体系。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生成形象生动、富有生活气的话语表达内容, 根据历史事实和生活事实讲故事、举例子、摆事实, 结合人们常用的口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 积极运用“石榴籽”“胡杨”“吸铁石”“眼睛”“生命”“格桑花”等妙喻,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56个民族是亲兄弟”“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等质朴话语, 拉近理论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构建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话语体系, 深入浅出地讲明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为何重要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第三, 创新日常话语表达形式, 融入现代生活话语叙事。积极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形式, 将理论话语和文本话语转向通俗话语和口头话语。同时,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优势, 融合视觉叙事、媒介叙事等现代话语叙事方式, 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可视化表达将观念具象化, 大力推出相关影视作品、微党课、公益广告、话剧、短视频、表情符号、网络热词等, 将显性灌输转化为隐性嵌入, 以微观感性叙事和现代话语柔性表达的方式完成意义建构。

(二) 创设日常生活情境, 把理论灌输转变为氛围感染

生活本身展现为巨大的景观积聚, 这些景观建构起了自发性的生活情境。针对景观的意识形态支配功能关系, 应积极利用日常生活事件以及特定活动场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景观塑造, 营造一种浓厚且隐而不显的意识形态氛围, 将理论强制灌输转化为氛围渐进感染。

其一, 塑造政治庆典景观, 强化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政治庆典不仅是国家权力的展示, 更是文化传承和精神凝聚的体现。依据重大政治事件、时间节点、政治文化等, 组织策划相关纪念仪式和象征性活动, 向民众传达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传统, 营造强烈的集体氛围。在此过程中, 不仅要展示国家的力量和成就, 还要通过对共同记忆的唤起和对未来愿景的描绘, 使人民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命运和目标, 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从而增强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例如, 国庆典礼、授勋典礼、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仪式、重大政治活动开幕式等, 使民众在庄重威严的仪式感中强化共同情感, 并在国家宏大叙事中找准自身定位和价值意义, 强化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二, 塑造民俗节庆景观, 增强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民俗节庆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 蕴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 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因此, 要注意避免将民俗节庆降格为商业主义和情绪宣泄式的娱乐狂欢。中华民族的民俗节庆应以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为基础, 突出其文化内涵, 借助其仪式化和庆典化功能, 让人民群众在文化体验中增加文化认同。此外, 还要结合民俗节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精心组织民俗节庆活动, 利用大众传媒创新传播形式, 扩大民俗节庆的辐射面, 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以此唤醒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其三, 塑造文化遗产景观, 促进文化认同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遗产景观作为历史的见证,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经验, 反映了人们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应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活化, 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功能, 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社会教育的有效工具。如在文化遗产地开展文化旅游、教育活动和研学项目等, 各族人民通过亲近祖国的大好河山、弘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感受各民族风土人情的方式, 从内心深处坚定文化自信和由衷热爱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 完善日常生活规约, 把外在监督转变为内在修为

日常生活规约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完善日常生活规约就是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乡规民约、家规家训，以法律强制力和道德感召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要健全法律法规。从顶层设计出发，以国家立法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保障民族平等和巩固民族团结。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以地方法为支系”^{[27] 55}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细化相关法规条例，稳慎推进立改废释，依法处理民族事务，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和建设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问题，有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酿成的。”^[50]要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精准滴灌”的法治宣传教育，加大普法宣传，利用普法文创产品、现场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教育引导各族人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增强各族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依法化解民族矛盾和问题，坚决依法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违法犯罪行为。“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50]二要强化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基于乡情和人伦的自治规范，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共同体成员约定俗成的集体意志和价值共识。与法律法规的强制力相互补益，以柔性灵活方式约束着民众的日常行为，助推形成我国社会公序良俗，协调我国基层社会关系和促进我国社会稳定。乡规民约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分配、社会维稳、婚丧嫁娶、育儿养老、道德教化、生态环境、交往交流等，蕴含着家国同构、共同利益至上、公理共议、孝悌睦邻、勤劳自强、诚信友善等精神内核，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一致性。充分挖掘乡规民约的治理智慧，与时俱进地构建展现新时代精神风貌的新型乡规民约，既要体现国家意志又要关照民众愿望，融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治理。三要嵌入家规家训。家规家训是在社会风习影响下，由家庭成员共同遵守并代代相传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既是家庭风尚的体现，也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反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26] 186}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家庭教育，广泛开展家规家训主题活动，通过家庭的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把“五个认同”“四个共同”“四个与共”“马克思主义‘五观’”“三个意识”“四对重大关系”等转化为家庭成员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家规家训的代际传递和代际反哺下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中华美德，形成爱国爱家、团结和睦、明礼知耻、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良好家庭风尚，自下而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树立日常榜样典型，把示范效能转变为身体力行

日常榜样典型作为模仿性实践的范本例证，是可感知、可明见的人格化的价值符号和政治象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51]我们应大力发挥榜样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积聚起榜样典型的强大政治力量，涵养民众的榜样意识，鼓励民众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将榜样示范效能转化为身体力行。

首先，挖掘、褒奖和培育具有真实性和可效仿性的先进模范，发挥榜样的感召力。挖掘先进典型必须严格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确保典型事迹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所选取的典型既要涵盖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牺牲奉献的宏大社会理想，也要囊括日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善心善举，挖掘类型多样的榜样典型，以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要，使每个人在榜样激励下，找到自己在民族团结和国家建设中的个人定位。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及时对先进模范的贡献进行正式认定、表彰和奖励，提升榜样自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激励民众将自身锻造成为国为民的有用之才，在社

欧阳彬, 魏莹.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82-93.

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示范效应。其次, 打造多渠道榜样典型宣传途径, 激发民众对榜样的效仿和追随。单一零散的宣传活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 只有通过系统化、持续性的宣传, 才能不断深化典型事迹的示范效应。要结合重要节日、纪念日和重大活动, 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榜样宣传活动,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在权威平台利用短视频、直播、图文报道等形式, 直观再现榜样在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中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品质, 在系统报道宣传中形成榜样学习的阶段性高潮, 进一步扩大典型人物事迹的社会影响力。最后, 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实践活动, 将瞬时感召力转化为持久行动力。结合日常生活现代化变革, 聚焦民族特色, 根据不同民族地区和人群, 打造具有民族团结意义的多元实践活动, 搭建好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平台, 组织相关志愿服务、联合劳动、文化交流、体育比赛等, 将瞬时情感激发转化为持久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行动, 激励各族人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李强主持 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1).
- [2] 格日勒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途径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4 (2): 16-23.
- [3] 张神根, 王临霞. 从历史生成到时代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蕴涵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2 (3): 1-9.
- [4] 孔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理论特质与实践原则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 46-51+155.
- [5] 高永久, 冯辉. 从“一条主线”到“一线两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导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1-12.
- [6] 起联玉, 张小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生成演进·现实挑战·实践路径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1): 33-38.
- [7] 高旸.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05-121.
- [8] 何雨婷, 刘宗灵. 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关系、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40-50.
- [9] 徐光木. 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26-39.
- [10] 张劲松, 陆豪. 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表征及其逻辑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 34-48.
- [11] 赵聪. 数字技术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4 (4): 18-28.
- [12] 丁忠毅, 程桂龙. 智能算法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优化策略 [J]. 民族学刊, 2023 (10): 1-9+147.
- [13] 李亚, 汪勇. 非物质文化遗产何以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4 (1): 46-52.
- [14] 熊威. 传统节日的创造性转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 11-20.

- [15] 刘仕刚,张继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79-91.
- [16] 王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俗方位与时代路向——基于多民族民俗生活共同体的视角[J].西北民族研究,2024(2):27-36.
- [17] 郝亚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待多学科共创理论话语体系[J].民族学刊,2021(10):10-15+116.
- [18] 石路,董新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建构——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阐释[J].学术探索,2024(6):58-64.
- [19] 苏欣,曾灿博.需要、情感与认知:心理学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23(2):92-98.
- [20] 柏友恒,刘赫,杨昌儒.“秩序”“差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学逻辑[J].民族学论丛,2022(1):5-13.
- [21] 李家新,刘甜甜,刘子云.何种教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3088位大学生的实证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95-109.
- [22] 杨敬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法理意涵与实践路径——基于宪法教育和普法实践的访谈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110-121.
- [23] 徐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与实践路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2-25.
- [2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9.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10.
-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09.
- [27] 熊建生,尚晓丽.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生活向度[J].思想理论教育,2024(5):48-55.
- [28] 藺叶坤,张国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化路径探赜[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26-32.
- [29] 贾立勤,张润君.日常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建构[J].贵州民族研究,2023(6):36-42.
- [30] 孟凡丽,王静,王国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化:内涵、机理及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2022(5):54-62.
- [31]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人民日报,2022-03-06(1).
- [32]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1-12.
- [33] 郑文正,张家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思维向度:叙事图示、理论反思和生成路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2):34-41.
-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 [35] 郑文正,阿依吐松·苏旦.日常生活语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由、内涵和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2023(6):86-92.

欧阳彬, 魏莹.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82-93.

- [36] 列宁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39.
- [37] 王悦.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消费” [EB/OL]. (2023-09-11) [2023-10-11]. https://theory.gmw.cn/2023-09/11/content_36823631.htm.
- [38] 斯大林全集: 第1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
- [39] 詹小美. 民族文化认同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3.
- [40] 詹小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9.
- [41] 张文木. 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 (3): 83-91+160.
- [42]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43]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M]. 渠东, 汲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421.
-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58.
- [45] 马伟华, 郭怡敏. 共赢、共情与共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理论结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2): 17-24+181-182.
- [46]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36.
-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62.
-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55.
- [49] 列宁全集: 第3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468.
-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89.
- [51] 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王沪宁主持 [N]. 人民日报, 2019-09-30 (2).

责任编辑: 卢媛



本刊微信公众号

流动与融居：交往现代化 推进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路径考察

程中兴

（云南大学 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边疆地区的独特性在于交往不便、民族众多。本文从交往现代化出发，探讨如何推进多民族社区互嵌式建设，构建了以族际交往为切入点的现代性分析框架，并从“具身性—离身性”两个维度考察云南入选国家民委命名的 8 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研究发现，交往现代化虽然带来了“大流动”，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大融居”，多民族社区建设中的“有区无社”现象仍然存在。这种族际交往的抽离，是“具身性”因素（交往身份、交往语言、交往意愿）与“离身性”因素（代步交通、数字媒介）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交往现代化，增强边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元人力资本”效用，提升族际通婚意愿以及重建社区步行交往体系，顺应数字时代媒介变革，是当前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直面的关键议题之一。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地区；多民族社区；互嵌式；交往抽离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094-09

DOI：10.13946/j.cnki.jcqis.2024.06.09

作者简介：程中兴，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西南边境固边兴边强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1JJDM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交往变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族际距离消融机制研究”（22AMZ006）

引用格式：程中兴. 流动与融居：交往现代化推进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路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94-102.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围绕“交往交流交融”议题(以下简称“三交”),明确指出“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加强边疆和民族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序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1]。我国各民族正加速迈入一个“大流动、大融居”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呈现为生产的现代化(成为世界工厂),亦展现为交往的现代化(民族史走向世界史)。交往现代化带来的加速^[2]与流动^[3]效应,已极大地重塑了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371万人,其人口流动参与度(26.9%)首次超越了汉族人口流动参与度(26.6%)^[4]。来自全国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更是显示,在20个流动性最强的民族中,除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外,其他民族的跨省流动远超省内流动。因此,“有序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已成为时代的议题。

然而,“大流动”并不必然意味着“大融居”。在“大流动”之后如何促进“大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战略抓手。鉴于边疆地区民族众多,而交往尤其不便,以交往现代化为切入点,探讨多民族社区建设的战略抓手的意义就更为显著。当前,困扰边疆多民族社区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区无社”。所谓“有区无社”,是指在社区内外约一公里范围内(通常呈现为以家为中心的15分钟步行生活圈),族际间交往稀少的现象。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语境下的交往抽离。那么,族际交往又是如何深受现代化影响而抽离于所在社区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立足云南省入选国家民委命名的8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采用综合抽样调查与田野调查两种方法,以社区各民族交往行为为切入点,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多民族社区建设中的交往抽离问题,进而提出化解之道。

“治国必治边”^[5],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探讨边疆地区多民族社区建设中的交往抽离问题,对于一个拥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境线,其中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且有32个跨境民族毗邻而居的大国来说,其突出意义与现实迫切性不言而喻。

二、以族际交往为切入点的现代性分析框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6]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行为”不同于“目的行为”,它不以达成“交易”而是以达成“共识”为目标,而要达成共识,需要立足“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7]。“只有当一种生活世界允许互动——主宰这种互动的不是靠强制所达成的共识,而是直接或间接靠交往达成的沟通——存在的时候,它才是合理的。”^{[7] 426}“社区”作为“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7] 165}的“生活世界”,为何会出现“有区无社”这种现象?族际交往为何会抽离于所在社区?对此,本文聚焦多民族社区建设中局部存在的“有区无社”问题,以族际交往为切入点,从“交往”的两种形式,即“具身性”(Embodiment,强调身体在场)^[8]与“离身性”^[9](Disembodiment,强调身体不在场)两个维度加以考察。

（一）影响社区族际交往的具身性因素

影响社区族际交往的具身性因素众多。本文参照了《新时代中国民族地区发展调查研究》一书中有关“族际交往”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交往身份、交往语言、交往意愿等^[10]。在现代化的加速流动效应激荡下，上述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社区族际交往。

首先是族际交往中的身份感知。族际交往中体现“族际”这一限定词内涵的，是交往过程中对“他者”的认知。在少数民族社区中，“他者”往往展现在“民族身份”意识上^[11]。因此，考察族际交往的“族性”^[12]是否显示，就是看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是否注意到彼此的“民族身份”^[13]。本文将重点考察社区族际交往时对彼此民族身份的感知。其次是族际交往中的语言选择。语言作为最为基础性的交往中介，“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7] 115}，“以民族语言和方言为主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14]。本文重点考察社区中族际交往时语言选择，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情况。最后是族际交往中的意愿分异。“交往意愿根据交往的不同层次、不同亲密程度区分为聊天、成为邻居、一起工作、成为亲密朋友和结为亲家等五种层次，其中结为亲家是最为亲密的一种交往形式。”^{[10] 220}本文重点考察聊天、邻居、工作、朋友及族际通婚等交往意愿的分异情况。

（二）影响社区族际交往的离身性因素

不同于影响社区族际交往的具身性因素，离身性视域下的影响因素没有前期权威调查做参照，只能从实地调查中抽象出来，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从实求知”^[15]。如果说“有区无社”的实质是社区内族群互动抽离于所在社区，那么造成“出则乘车”和“入在隐居”这种抽离状况的离身性因素，绕不开现代化所带来的代步交通与数字媒介。在这个意义上，族际交往的时间与空间被技术性地压缩掉了^[16]。

“出则乘车”，即人们很少在社区外步行，自然其间发生的族际交往机遇也随之减少^[17]，步行交往的减少与现代代步交通的助力紧密相关^[18]。本文重点考察了社区各个民族居民的代步工具使用情况。“入在隐居”，即社区各民族居民喜欢“宅”在家里，不愿出门。族际间的面对面交流机遇，也因人们“宅”在家里而减少。喜欢“宅”^[19]与现代数字媒介的赋能有很大关系^[20]。本文重点考察了社区各民族居民的数字媒介使用情况。

（三）族际交往数据的获取

族际交往数据取自云南省历年（2012—2022年）入选国家民委命名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其中：昆明的金星社区（2012入选）有居民户8357户，关上中心社区（2014入选）有居民户9800户，洛龙社区（2022入选）有居民户1124户；楚雄的栗子园社区（2016入选）有居民户2364户，彝人古镇社区（2018入选）有居民户3781户；大理的万花社区（2016入选）有居民户6887户；临沧的永和社区（2016入选）有居民户3060户；丽江的义尚社区（2019入选），有居民户176户、经营户630户。族际交往数据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问卷获取，二是访谈获取。问卷调查先根据Richard L. Scheaffer提出的样本容量计算公式（如下）^[21]，

$$n = \frac{N}{(N-1)\sigma^2 + 1}$$

确定8个社区应抽取的有效样本容量（ $\sigma = 0.07$ ）：关上中心社区199户，金星社区327户，永和社

区 354 户, 义尚社区 267 户, 万花社区 378 户, 彝人古镇社区 361 户, 栗子园社区 300 户, 洛龙社区 233 户, 共计 2 419 户。实际调查中, 发放问卷 2 419 份, 回收问卷 1 795 份, 有效问卷 1 789 份。在进行问卷调查同时, 研究团队同时开展田野调查, 从“他者”的视角出发, 通过访谈收集社区各民族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22]的相关信息, 生成有效访谈记录 35 份。

三、影响社区族际交往抽离的具身性因素考察

通过考察影响族际交往的三大具身性因素, 发现多民族社区中的交往抽离更多地来自“他者”的参照效应(身份)、“地方性知识”的方言效应(语言)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效应(意愿)。

(一) 交往身份与交往抽离: “他者”的参照效应

调查显示, 族际交往中能清晰地意识到“民族身份”意义的人, 占比为28.2%。当然, 具体到各个民族, 还是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 问卷中列出的10个民族中, 有5个民族在族际交往中身份感知度远高于其他民族, 诸如佤族(58.3%)、傣族(51.2%)、傈僳族(42.1%)、回族(43.3%)、苗族(40%)。上述5个民族身份感知度之所以比较高, 与边疆地区独特的人文区位密切相关。首先, 边疆少数民族众多。边疆多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云南尤甚, 世居少数民族高达25个。少数民族众多, 发生在族际间交往概率就大, 而加速流动更会突显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后的身份意识。例如, 有社区工作人员指出: “我们社区居民从不同村落搬迁到城市以后, 不知道怎样适应陌生环境, 人际关系、经济条件等方面也出现了新问题。交往融入困难实际上也给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①其次, 边疆跨境民族众多。地处边疆, 一族分属两国或多国的现象比较普遍, 云南的跨境民族尤其多, 高达16个, 占中国跨境民族总数的一半(按中国民族识别标准)。“跨境”更易让人们感知到身份差异^[23-25]。例如, 有受访者说: “我们这里以前在边境一线的居民可以经常过去交流, 没有很大的限制, 这虽然方便了我们这边和缅甸那边同族人的交流, 但是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②总之, 地处边疆, 少数民族、跨境民族众多, 这一独特的人文区位特征, 使得来自“他者”的参照效应更为突出, 族际交往中的身份意识更易彰显。

(二) 交往语言与交往抽离: “地方性知识”的方言效应

调查显示, 族际交往特别是社区邻里交往时使用最多的是地方方言(57.9%), 其次是普通话(32.0%), 使用本族语只占10%。地方方言(西南官话)使用的比例普遍较高, 显示出了浓厚的地方性。例如, 有受访者说: “我们讲的语言有三种: 纳西话、云南方言、普通话, 在我们纳西族人面前就讲纳西话, 如果是昆明人来了, 我们会和他们说云南方言, 但是我们也要反应一下才能应答, 听不懂方言的外省人来了, 我们就讲普通话, 虽然我们的普通话发音不是那么标准, 但是外地人也能听懂百分之八九十。”^③具体到各个民族也各有差异。例如, 使用本族语最多的是纳西族(63%)与佤族(62%), 可能与这两个民族聚居区域集中度高有关。例如, 有一位受访者谈到: “我们这边

① 受访者系社区工作人员, 彝族, 女, 40岁。访谈地点: 楚雄市栗子园社区。访谈时间: 2023年8月26日。

②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 白族, 男, 65岁。访谈地点: 临沧市永和社区。访谈时间: 2023年8月2日。

③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 纳西族, 女, 60岁。访谈地点: 丽江市义尚社区。访谈时间: 2023年8月12日。

农村、包括我们社区居住的一些居民，特别是老人，他们不懂汉文、不懂汉语，你们要和他们交流就很困难，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你讲的话。”^①又如，族际交往中普通话运用较高的几个民族（超过平均值32%），如哈尼族（66.7%）、傣族（51.2%）、苗族（50%）、傈僳族（47.4%），与他们的聚居地是“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的典范区域有关^[26]。有受访者说：“这边以前主要是用傣语，过去我们老师讲普通话都很困难，政府组织普通话培训后，我们才开始用普通话讲课，因此普通话的普及对我们的教学帮助很大，也加强了我們与其他民族的联系。”^②可见，“族性”与“地方性”紧密相连，而“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又是通过“方言”来展现的。方言效应也折射出了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必要性。

（三）交往意愿与交往抽离：“宗教信仰”的影响效应

调查显示，族际交往中有高达96.8%的受访者会与其他民族聊天，有88.4%的人赞同混居，有81.2%的人有其他民族朋友，有40.8%的人愿意与其他民族一起工作。但对于族际通婚，各个民族差异很大。这一调查结论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类似，即“受访者族际交往意愿远近有别：聊天、交友、工作和居住不是问题，谈到族际通婚则退避三舍；族际交往行为普遍，大部分受访者都有其他民族朋友”^{[10] 221}。具体来说，“完全认同”族际通婚的民族群体中，苗族比重最高，达90%；其他民族比重由高到低分别是：傣族（79.1%）、傈僳族（78.9%）、白族（78.0%）、佤族（75.5%）、汉族（71.6%）、纳西族（68.5%）、彝族（62.9%）、哈尼族（56.7%）、回族（34.7%）。斯皮尔曼相关系数（Rho）显示，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值为-0.166（ $P < 0.05$ ）。对此，田野调查中，有受访者亦指出：“跨民族婚姻，我们也赞同，关键是嫁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来，生活方面能不能够适应，能不能遵守我们回族的一些礼仪、饮食习惯等。如果说适应不了我们回族的生活习惯，那结婚后会很麻烦。”^③综上所述，通婚作为族际交往意愿的最高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宗教信仰情况的影响。

四、影响社区族际交往抽离的离身性因素考察

离身性因素考察，重在揭示现代化语境下社区各民族居民的代步工具、数字媒介的使用状况。调查发现，“快速交通”之于步行交通的取代效应（交通），“线上沟通”之于线下交流的消隐效应（媒介），是族际交往抽离于所在社区的重要机制。

（一）代步交通与交往抽离：“快速交通”的取代效应

步行交往是多民族社区族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一般而言，社区内外一公里范围内的族际交往，多在步行中进行，因而离不开步行交通的支持。然而，现代化的加速效应呼唤着快速交通，出则乘车成了社区居民外出的主要形式。调查显示，虽然各个民族代步工具使用各有特点，但电动车、摩托车已经成为首要的代步工具（39.9%），其次是公交车（33.3%）与私家车（18.3%），选择步行交

①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佤族，男，56岁。访谈地点：临沧市永和小区。访谈时间：2023年8月1日。

②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傣族，男，63岁。访谈地点：临沧市永和小区。访谈时间：2023年8月5日。

③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回族，男，50岁。访谈地点：大理市万花小区。访谈时间：2023年8月17日。

通的人越来越少。然而, 快速交通的出现并没有都带来“快速”。有受访者说: “社区应该解决一下出行拥堵的问题。淡季的时候, 我们这边车辆比较少, 坐公交车还是很方便的。一到旅游旺季, 我们这边车辆就很多, 堵车问题很严重, 一条街上全是车, 坐公交都不好坐, 要等很长的时间。”^①可见, 虽然快速交通最终没有全部达到快速的预期, 但“出则乘车”已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选择, 族际间的交往机遇也随之减少。

(二) 数字媒介与交往抽离: “线上沟通”的消隐效应

社区建设中之所以出现“有区无社”现象, 线上交流超越线下交流是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指出: “人们花在数字交谈上的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越来越多, 人们对自我组织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越来越重视, 个体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越来越多地体现于自我社会, 且通过自我社会影响大众社会。”^[27]因此, 作为社区居民的个体, 其交往实践越来越抽离于所在的社区, 族际交往也就越来越少。调查显示, 多民族社区居民获取日常信息的渠道, 按占比大小排序, 依次是: 手机 (78.6%)、电视 (11.7%)、面对面聊天 (7.5%)、广播 (1.2%)、报刊 (0.1%)、电脑 (0.7%)。线上交流已成为主导的交往方式, 而以具身性的面对面交往方式来获取信息, 总体占比并不高, 超过10%仅有4个, 如回族 (11.3%)、彝族 (10.8%)、苗族 (10%)、哈尼族 (10%)。这些民族之所以面对面交流相对较多, 可能与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有关系 (根据田野观察, 统计检验并无显著性)。例如, 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 一般会把清真寺作为他们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场所。有受访者就指出: “我搬入这个社区已经13年了, 平时我们都要到这个清真寺进行礼拜, 每个周都要礼拜几次。”^②可见, 数字媒介变革所带来的线上沟通, 主导效应突出, 超越了社区之于交往空间的地理限制, 社区内的族际交往机遇也就随之减少。

五、化解边疆多民族社区建设中交往抽离问题的对策

中国式现代化为边疆多民族社区建设提供了时代契机。基于上述“经验事实”的收集与因素考察, 发现边疆地区多民族社区存在“有区无社”现象。本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分析边疆地区多民族建设中的交往抽离问题, 为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如下决策支持。

(一) 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关注边地两类群体

关于族际交往中身份感知度差异的分析表明, 交往实践中身份意识之所以比较突出, 与边疆独特的人文区位紧密相关。边疆地区不仅少数民族众多, 而且跨境民族众多。这提醒我们, 在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特别关注两类群体, 一类是少数民族 (国内), 另一类是跨境民族 (国际), 并在交往实践中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田野调查中, 有受访者就指出: “以前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些词汇还是很少的, 现在出现得多了, 我们小区里面到处都有这

①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 纳西族, 女, 50岁。访谈地点: 丽江市义尚社区。访谈时间: 2023年8月9日。

②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 回族, 男, 55岁。访谈地点: 楚雄市栗子园社区。访谈时间: 2023年8月29日。

样的字眼。我觉得我不仅仅是白族的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更是一个中国人。”^①因此，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不仅要进社区，还要进机关、进企业、进乡镇、进学校、进宗教活动场所、进军营（即“七进”），进而使多民族社区建设与其他“六进”相得益彰。

（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元人力资本”效用

关于族际交往语言运用的分析表明，方言之所以成为族际交往的首选语言，与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密切相关。因此，要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键是让各民族充分认识到语言是一种“元人力资本”^[28]。有很多受访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只会讲傣族、云南方言，不会讲普通话，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我从事的是服务行业，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为了融入这里，我只好练习普通话，现在我基本上只说普通话。”^②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元人力资本”效用，要自我与社会双向激发。自我层面，要创新学习方式。例如，持续开发并推广“语言扶贫”App，使更多的不会说普通话的各民族居民采取线上自学的方式，轻松学习普通话。田野调查中的访谈也佐证了这一点：“现在媒体发达了，很多信息都来自手机上，我们边看边学，现在很多东西也能看得懂。”^③社会层面，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不可小觑。例如，有受访者说：“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我了解其他民族，比如说经常看到汉族、藏族、彝族来我们这儿旅游。来我们这边租房子做客栈生意的人呢，好多都是从北方过来的，特别是东北那些地方。他们来这边以后，既让他们了解到了我们的文化，也让我们了解到他们那里的风俗、习惯。”^④

（三）提升族际交往意愿，族际通婚是标杆

无论是2023年笔者团队调查，还是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均表明，相对于聊天、交友、工作和居住等交往意愿，族际通婚意愿普遍较低。聊天、交友、居住、工作四种交往方式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近可远，具有伸缩性，族际通婚则意味着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达到一定的深度，然而各民族受访者在这方面仍然有一定顾虑^{[10] 230}。有学者研究赤峰蒙汉通婚时指出：“只有当两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宗教等方面达到相互一致或者高度和谐，存在着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出现大量的通婚现象。”^[2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在影响族际通婚的众多因素中，宗教因素最为外显。因此，提升族际交往意愿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好信教群众工作。

（四）重建步行交往体系，社区微基建先行

步行交往是化解“有区无社”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数据显示，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实践都在15分钟步行生活圈内。例如，有86%居民回答步行到最近公交站的时间在15分钟以内；有76.1%居民回答步行到最近学校的时间在15分钟以内；有73.8%居民回答步行到最近菜市场的时间在15分钟以内；有68.9%居民回答步行到最近医院的时间在15分钟以内；有42.3%居民回答步行到最近大

①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彝族，男，55岁。访谈地点：楚雄市彝人古镇社区。访谈时间：2023年8月24日。

②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傣族，男，30岁。访谈地点：昆明市关上中心社区。访谈时间：2023年7月22日。

③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白族，女，43岁。访谈地点：昆明市金星社区。访谈时间：2023年7月17日。

④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纳西族，女，60岁。访谈地点：丽江市义尚社区。访谈时间：2023年8月9日。

型商场的时间在 15 分钟以内。如何重建步行交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例如, 一些老旧社区的微基建就是一个大问题。在访谈中, 有居民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小区里面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停车位问题。我们门口这条路有些窄, 十年前就存在堵车问题了。之前, 我们小区里每家一个停车位是能够保证的,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家人可能养着二三轮车, 这就使得晚上停车的时候车位不够, 很多车就停在小区外面街道上, 造成小区内外的停车拥堵。停车位的紧缺导致社区居民有时候因为停车问题而闹矛盾, 有两家就因为停车问题发生了争执, 不来往了。”^①可见, 回应“城市更新”的时代议题, 从社区微基建入手, 营造更为友好的社区环境, 是当前多民族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五) 顺应数字媒介变革, 将社区嵌入到“自我社会”

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 数字媒介已经成为居民交往的主要载体, 线上交流成为主流。例如, 在询问获取社区信息的主要媒介时, 比例最高的网络(如微信、公众号), 占 67.2%; 其次是工作人员告知(46.4%)、布告栏(39.2%)、邻里交谈(22.6%)、广播(9.9%)。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下, 唯有顺应数字媒介变革, 将社区嵌入到“自我社会”之中, 多民族社区的治理才可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例如, 有受访者就感慨: “以前住在村子里面去村委会要走上一段路程, 办事不太方便。现在社区办事特别方便, 不用交什么纸质的材料, 直接在手机上扫一下就可以办好我们所需的事, 大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也缩短了老百姓的办事时间。”^②有受访者谈及“老龄化”遭遇“智能化”问题, 极富启示意义。“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 很多事情要办, 我们老年人也要学会用智能手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你别看我一把年纪, 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用智能手机办事情确实方便, 可以刷公交、打视频那些, 这跟我们以前的情况大不一样了。”^③因此, 更多地利用人工智能赋能, 是当前多民族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

六、结论

本文通过实地考察, 把多民族社区视为多民族国家的缩影, 从交往的具身性、离身性两个维度探讨了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化逻辑。调研发现, 以交往现代化推进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其核心议题是如何化解边疆地区多民族社区建设中的交往抽离问题。族际交往抽离于所在社区既有具身性因素的影响, 也有离身性因素的作用。具身性因素中, 诸如族际交往中的身份感知、语言选择、意愿分异影响显著; 离身性因素中, 诸如族际交往中, 步行交往的减少、数字媒介的变革作用突出。由于具身性因素与离身性因素的叠加效应, 边疆地区多民族社区的“有区无社”现象仍然存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化解边疆地区多民族社区建设中的交往抽离问题, 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直面的关键议题之一。

①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 纳西族, 男, 38 岁。访谈地点: 丽江市义尚社区。访谈时间: 2023 年 8 月 8 日。

②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 彝族, 男, 51 岁。访谈地点: 楚雄市栗子园社区。访谈时间: 2023 年 8 月 25 日。

③ 受访者系社区居民, 白族, 男, 65 岁。访谈地点: 大理市万花社区。访谈时间: 2023 年 8 月 19 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李强主持 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2).
- [2] 哈尔特穆特·罗萨.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8-29.
- [3]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化 [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5.
- [4] 黄凡, 段成荣. 人口流动与民族空间互嵌格局的发展演化——基于第三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M]. 西北民族研究, 2022 (6): 128-142.
- [5] 袁沙. “治国必治边”的历史逻辑与时代面向 [J]. 旗帜, 2024 (3): 90-92.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0.
- [7]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1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8] 张文娟. 具身性之思想溯源、概念廓清与学科价值——一种对具身传播研究的元认知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2 (9): 112-125+128.
- [9] 冉聃. 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 [J]. 哲学动态, 2013 (6): 85-89.
- [10] 王延中, 等. 新时代中国民族地区发展调查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19.
- [11] 秦玉莹, 郝亚明.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2 (4): 76-82.
- [12] 斯蒂夫·芬顿. 族性 [M]. 劳焕强, 等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 [13] 张航, 冯晓慧, 张积家. 民族内隐观、身份认同对族际通婚子女的外群接触态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J]. 心理学报, 2023 (7): 1115-1132.
- [14] 郑文正, 阿依吐松·苏旦. 日常生活语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因由、内涵和路径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 (6): 86-92.
- [15] 费孝通.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J]. 学术研究, 2003 (7): 5-9.
- [16]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M].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356.
- [17] 刘星, 盛强, 杨振盛. 步行通达性对街区空间活力与交往的影响 [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1): 56-61.
- [18] 李长莉. 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 [J]. 学术研究, 2008 (11): 90-99.
- [19] 刘沛林. 从新蜗居生活看网络虚拟旅游的前景和方向 [J]. 地理科学, 2020 (9): 1403-1411.
- [20] 江山舞. 数字传播赋能社区治理的机制与变革路径——基于杭州未来社区的实践考察 [J]. 未来传播, 2023 (3): 27-34+129.
- [21] Scheaffer, R. L., Mandenhall, W. and Ott, L. Elementary Survey Sampling 6th edition [M]. Duxbury Press, 2005.
- [22]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23] 周建新. 跨国民族研究: 中国的话语建构与表达 [J]. 世界民族, 2020 (5): 1-12.
- [24] 邓玉函, 秦红增, 陈子华. 跨境民族走廊新视野: 口岸人类学初探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12): 20-27.
- [25] 马戎. 如何认识“跨境民族” [J]. 开放时代, 2016 (6): 199-211+11.
- [26] 周荣. 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云南担当 [J]. 云南教育 (视界时政版), 2019 (5): 8-9.
- [27] 邱泽奇. 重构关系: 数字社交的本质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20.
- [28] 黄少安, 王麓淙. 民族地区语言扶贫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 [J]. 语言文字应用, 2020 (4): 26-36.
- [29] 马戎, 潘乃谷. 赤峰农村牧区蒙汉通婚的研究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3): 78-89.

责任编辑: 卢媛



舌尖上的家国：以饮食象征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路径

李波 宋聪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食物是民族的地理，滋味是国家的记忆。饮食象征文化承载着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节祀俗制，凝缩着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和集体记忆，是规范个体国族认同的关键环节，在助益民族融聚、唤醒集体记忆、确立身份认同、积聚复兴伟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饮食象征文化的本质是精神写照的可视化和易感化，饮食通过采拾、烹煮、命名和复现等途径，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的特色美食符号，为增强各族群众归属意识与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助力。饮食通过符号感知织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网，通过转义生成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意空间，通过象征互动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之场，通过价值认同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土壤。对此，要在深挖象征资源和搭载智媒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有形有意的饮食符号供给、有声有色的饮食叙事体系、有理有据的饮食内容矩阵、有滋有味的饮食周期实践，开辟出一条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舌尖认同之路”，为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能。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6.010

作者简介：李波，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宋聪，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专题”（SDYKC2003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研究”（19CZDJ02）

引用格式：李波，宋聪. 舌尖上的家国：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103-113.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符号；饮食象征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103-11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1] 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历史充分证明，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2]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彰显出中华文化在凝聚情感共识、建构集体记忆、锻造国族意志中的关键性作用，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舌者，官之心也。仅就“饮食”的汉语词源而言，“饮食”一词由“饮”与“食”复合而成，“饮”意为将流体喝进腹中，“食”意为六谷之饭，“饮”与“食”经由食部首联结一体，通过吃、喝、吸、吞的方式，将个体意识与特定食物、饮食器具、饮馔规范耦合互构。正如“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3]所言，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饮食一直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饮食象征文化是主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通过类比、转喻、联想等修辞手段，对外在饮食活动进行非语言编码处理，对内将隐藏的情感、思维、意识附着其上，打造一个“人—物”“物—物”“人—人”相互贯通和转换的文化场域，并借此催生心理归属、回溯身份认同、凝铸国族意志。当前，美食纪录片、逛吃 Vlog 搭乘智媒传播的东风，将饺子、汤圆、粽子等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元符号”内嵌进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饮食象征文化逐渐成为具象记忆图谱、锻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

当前，学者们主要从历史学^[4]、人类学^[5]、民族学^[6]、心理学^[7]、传播学^[8]等视角对饮食象征文化展开研究，显现出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比如，刘春呈从文化视角审视饮食，认为共有的饮食文化认同连接了全体国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文化粘合剂”^[9]；侯琳以柳州螺蛳粉短视频传播为研究对象，探寻了全媒体时代民族饮食类短视频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嵌机制、形象矩阵与崭新路径^[10]；黄彩文、白汉卿基于对滇南石屏豆腐文化所蕴含的多重互动关系进行田野实证研究，通过民族志深描，揭示石屏豆腐及豆腐摊文化集饮食、生活与交往方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涵^[11]。概言之，国内学术界已就饮食象征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彻意蕴和赋能路径进行了多维化的学理阐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现实启示。

然而，上述成果多聚焦于某一地方性饮食，关于饮食象征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论尚付阙如，仍有较大研究空间。既有文献主要从生成脉络^[12]、多重叙事^[13]、互嵌逻辑^[14]、微观例证^[15]等具象视角切入，对饮食象征文化的系统性研究和整体性阐释稍显不足，未能真正从学理上分析饮食象征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和路径。本文从符号视角切入，着重对饮食

李波, 宋聪. 舌尖上的家国: 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03-113.

象征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彰显和运作机理进行梳理, 探寻切实可行的增效进路, 以期为织牢“舌尖上的家国之网”、永葆民族团结之树常青提供有益参考。

二、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彰显

作为人们饮食生活中具有象征意涵的文化现象, 饮食象征文化不仅关涉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产生活实践的意义呈现, 更彰显出对人类精神世界和情感诉求的关照、重构和形塑, 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表达、有感体悟、有效转化”^[16]的重要凭借。通过精准提炼中华饮食文化中荷载民族团结因子的象征资源, 多角度探究以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增效提供学理支撑。

(一) 满足生活需求, 助益民族融聚的基础性符号

作为同人类生存发展直接关联的自觉性活动, 饮食经烹煮饌飧滋养身心, 经高频复现生成记忆, 经积攒沉淀凝成符号, 并通过代际传承对国民的认知和行为产生相对固化的影响。其一, 饮食是族群存衍的“奠基石”。作为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的通用语言, 饮食的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人体从外部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补充能量的主要途径, 是满足个体味蕾体验、支撑族群生息繁衍的核心构件。其二, 饮食是族际交流的“助推器”。譬如, 顶流美食 IP 螺蛳粉在遵循八桂地区“食螺一醉藏一腌制一焖煮”古法制作的基础上, 将侗苗“酸”文化、壮族“稻”文化、瑶族“辣”文化、汉族“卤”文化汇聚一体, 在奇臭和异香造就的微妙临界点上融合不同民族的饮食习俗, 造就共同的民族记忆。其三, 饮食是民族融聚的“粘合剂”。考古发掘证明, 早在距今约 1.4 万年~1.8 万年前, 生活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中的史前先民便已开始有意识地对野生稻进行人工驯化。从春季的秧苗青葱到秋季的籽粒金黄, 从江浙的故园记忆到边城的应季飘香, 水稻这一国人最为熟识的粮食作物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灿然绽放, 于“夷夏互化”的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朝鲜族米糕、维吾尔族手抓饭、壮族面蒿粑粑、傣族竹筒粽等特色美食, 为培养个体共情力量、强化国族价值认同奠定坚实基础。

(二) 构筑情景语境, 唤醒集体记忆的凝合性符号

饮食是生命能量的源头, 集体记忆的载体。其一, 饮食象征文化再造情景生产。“人们对自己、对家乡的认识, 很多时候是通过饮食来实现的。”^[17]其中, 诸如水饺、粽子、月饼等标志性饮食以其更岁交子的谐音、丰富多元的馅料、圆润规整的外形, 联结着地域人群对故园味道的情感追思, 镶嵌着各族民众对固定年节的文化印记。其二, 饮食象征文化编织情感记忆。作为富含鲜明地域属性和族裔象征内涵的非语言符号, 饮食始终与人类种群的繁衍兴衰紧密相系, 经原生态传承和在地化调适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民文化层面的情感共通与身份建构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三, 饮食象征文化熔铸国族意志。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 饮食不仅是烹炙煮烧、宴飧酌酺的日常经验碎片, 也是婚丧嫁娶、节庆祀典等重大民俗活动的呈现媒介, 显示出对中华民族“亲缘相依—互济共生—齐御外侮—筑梦复兴”国族叙事的一体认同。当脱离母文化环境后, 移民者及其后代也多通过保持原生饮食风貌传承民族文化, 于特定节庆祀典的情境化复现中为个体重温集体记忆、呼唤情感共鸣、熔铸国族意志提供核心进路。

（三）凝聚归属意识，确立身份认同的边界性符号

“食物与食物记忆紧密相连，我们所吃的食物以及对于这些食物的记忆，决定着我们是谁。”^[18]其一，饮食象征文化描绘地域现实。回顾中华饮食文化发展史可以发现，各个地域各个民族都有着本地区本民族的饮食习俗，如“满洲菜多烧煮，汉人菜多羹汤”“河南老乡，吃馍喝汤”“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等，这些地方俗语既彰显了地域食材与人文传统的耦合逻辑，也塑造了饮食象征与地域人群的认同关系。其二，饮食象征文化明确认同趋向。例如，美籍华裔将本地居民的甜醋嗜好与中华民族的家乡味道相结合，改造成咕咾肉、麻婆豆腐、左宗棠鸡等独具特色的美式中餐，从而“使个体意识的认同趋向在二者间不断位移，并不断指向经交融而生的新饮食文化”^[9]。其三，饮食象征文化塑造身份认同。尽管高频率的异地迁徙和广向度的全球流动共同稀释了人们对地域民俗文化的传承，使其国族认同逐渐呈现出多元化、错位化、非同构的倾向。但家乡味道仍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政治仪式、年节庆典等多重情境中构建群体性文化、传递共同的价值观念，帮助国民凝聚归属意识、确立身份认同。

（四）升腾家国情怀，积聚复兴伟力的标志性符号

从采集狩猎到农耕时代，从封建王朝到民族国家，饮食象征文化通过内嵌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年节仪式，确立个体的身份归属、构筑共有的家国情怀。其一，饮食象征文化深植仪式互动。饮食蕴含着鲜明的地域烙印和国族属性，“在特定的节日或者时令消费某种特别的食物都是饮食作为族群边界符号的特征”^[19]。流动进入他域后，个体仍未曾停止对故园的追思与构建，身处异乡的人们借助包水饺、煮粽子、滚元宵、吃月饼等习俗表达民族归属、实现情感追思。其二，饮食象征文化荷载家国情感。譬如，纪录片《两岸一味》以两岸共享性美食为切入点，通过对广西酸鱼酸肉和台湾泰雅腌鱼、彰化爌肉和济宁髡肉等同源饮食的系统性梳理和同名路、同名村、同宗人等标志符号的可视化呈现，生动彰显出“海峡炊烟，两岸同源”的内聚交融趋向，巧妙传达出“乡味入魂，家国永续”的主题思想。其三，饮食象征文化积聚复兴势能。无论置身何处，家乡味道始终熟悉而牢固地根植于个体潜意识之中。从“裹粽投江祀屈原”的家国情怀传承到“头碗饺子祭英烈”的红色基因沿袭，从“域食月饼度中秋”的学子思乡情切到“各族欢聚庆元宵”的浓厚烟火氛围，多元饮食象征通过对故园记忆的定期复现和身份认同的依序构建，唤醒民众的家国意识、积聚华夏的复兴势能。

三、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运作机理

饮食象征文化经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的交互影响，为个体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以特定话语叙事参与“家→国”的构筑进程，为催生共有身份认同提供了进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族群众“亲缘相依—荣辱与共”现实生活过程的内在精神写照。新时代新征程，饮食象征文化以符号感知、转义生成、象征互动、价值认同等运作机理，构造了一个多维立体、相互贯通的系统，成为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驱动力。

（一）符号感知：多重饮食资源和特定意义表征织就象征之网

“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正是催

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20]人是符号性动物。早在蒙昧未开的上古时期, 华夏先民便凭依石制(或金属)工具与赭红色颜料凿绘的抽象符号, 形成了对日常生活和节庆祀典的具象化再现, 由此衍生而来的刻画与彩画也渐趋成为各部落成员留存“涵濡一互济”生活场景、标明“我族一他族”群际界限的有效载体。投射至饮食象征维度, 无论是滕州薛国故城遗址中水饺随葬品对中华文明渊脉的可考实证, 还是重阳糕、腊八粥、糖瓜等年节性食物对中华民族内在精神图像的具体化呈现, 均以烟火食味和风俗节律巧妙传递着各种与祈福纳祥相系的象征信息, 彰显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21]的价值属性。

“舌尖上的家国”符号感知的象征之网, 强调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喻体”与“本体”。借由一些在国民中具有普遍认同基础的饮食物象, 如饺子、青团、龙须面等, 可提炼其与共同体概念相关的价值属性, 经逻辑加工和语图互文, 整合生成“源域—目的域”“饮食物象—共同体意识”双向贯通的符号表达结构模型。以月饼为例, 作为一种节令性食品, 月饼形似明月, 寓意阖家团圆、人心相聚, 经代际传承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饮食象征。观诸历史, 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始于唐朝, 北宋时流行于宫廷, 至明代成为一种全民皆喜的美食。在千余年的发展, 月饼逐渐上升为彰显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凝聚各族群众身份归属的直观参照物。概言之, 饮食象征文化通过深植地域文化、联结固定年节等方式, 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看得见、嗅得到、吃得着”的代表性美食, 织就了一张捕捉各族群众集体想象力、再现中华民族一体演进史的象征之网, 继而于现实层面为建构内在精神图谱、凝聚中华民族认同提供重要助力。

(二) 转义生成: 隐喻修辞手法和文化阐释体系建构表意空间

纵观历史, 每当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某个抽象概念的解释陷入困境时, 最常见的应对策略便是利用另一种族群成员普遍认同的文化原型, 根据后者携带的表意系统来感知、接近乃至体认前者的价值内核。这种“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22]的修辞策略, 即是隐喻。

任何饮食象征符号都是根植于特定文化沃土中的文本模态, 故而必然携带着原生文化基因, 其意义承载与表征实践也必定受制于既有的文化法则。将其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度, 则体现为对能够承载共同体价值内核的饮食资源进行挖掘择选、联想匹配及总结凝练。以年节性食物粽子为例, 其符号意义于数千载历史更迭中经历了多次演变。粽子诞生伊始是作为耕牛牛角的替代品用于拜神祭祖。在社会变迁与人群迁徙中, 粽子的象征意义亦随之发生变化, 在祭祀供品这一初始意涵的基础上延伸出三种迥异的意义解释: 其一是将粽子看作华夏先民祭祖拜神, 祈盼五谷丰登的礼仪性符号; 其二是在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民间典故中将粽子视为纪念其爱国热忱的节俗性符号; 其三是将粽子视作团圆健康、光宗耀祖的吉祥性符号。随着近代以降中华民族概念及其内涵的日渐明晰, 粽子曾经被视为供奉神灵先祖、祈愿丰收吉祥的象征意义愈益消退, 并在烽烟四起的革命年代被赋予了共御外侮、精诚团结、顽强不屈等新的象征意涵。当下, 平安康宁、逢考必中、和合共生等现代价值被进一步囊括进粽子文化符号的意义内涵中, 经创造性阐释和世代传承成为各族群众集体共享的饮食记忆。

(三) 象征互动: 既定情景语境和图像储备索引打造记忆之场

集体记忆是一种借实质文物、象征符号、场景建筑、政治仪式等媒介储存、传播与复现, 并为群体成员所建构和共享的心理反映形式, 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基于现实需要对过往事实重新的

建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依靠集体经验、历史记忆和共享的文化符号对其进行形塑和巩固。”^[23]集体记忆虽是一个群体关于“过去”的印象和看法，但和某些只留存于特定历史时段中的“过去”不同，集体记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是与现时现地紧密相系的建构着的“过去”，“在一个集体——特别是民族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24]。我们既可以在仪式节日、影视图像等多样化情景中触探到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也可以在“我族”与“他族”的高频率互动中确立“家乡何在”的地域归属、完成“我们是谁”的国族考量。

在旅吃短视频风靡全球的当下，集体记忆被多元的情景语境和视觉图像所覆盖，使饮食与族群成员间的认同纽带更趋紧密。“具体的食物与饮食偏好成为一个国家（地区）与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口味的巨大差别也会被认为是区分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的标志。”^[25]其中，多元饮食物象建构而成的文化语境，通过除夕守岁、元宵赏灯、端午赛舟等节俗场景，整合形成表征中华民族价值旨趣的记忆文本和共意空间，构建如“共生—互济—御侮—复兴”等蕴含共同体精神要义的情景语境，共同构成“舌尖上的家国”情景生产的象征文本体系。如河南卫视《2024元宵奇妙游》中的《盛宴》节目，以中国传统节日为创作蓝本、以民族传统乐舞为主轴，通过虚实融合和移步换景，实现对吃元宵、喝美酒、品瓜果等民俗风情的代际传承和创新表达，使观众得以透过喜气欢腾的共舞表演解锁千百年来各族群众最美的元宵“闹”景，找回独属于中国人的元宵仪式感和家国一体感。在“一图胜万言”的当下，各类视觉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奇观影像和宏大场面，主宰人们的休闲时间，塑造其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为创造认同性提供了种种材料”^[26]。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一系列以民族美食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面世。如《舌尖上的中国》《边城好味》《圈粉食刻》《三餐四季》等纪录片和文旅节目，立足“饮食文化+人物故事”的双线交叉叙事基调，依托平民美学将特色饮食编码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描绘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27]的生动写照。

（四）价值认同：共享符号创构和多元表征实践培育精神土壤

正如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所言：“人们选择食物是因为他们看中了食物所负载的信息而非它们含有的热量和蛋白质。一切文化都无意识地传递着在食物媒介和制作食物的方式中译成密码的信息。”^[28]投射至饮食叙事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链接各族群众“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精神旨趣的一种认识倾向，被多重饮食象征符号激活、凝练、解码和使用，通过叙事共享和语境置换，使人们得以依循某种共享的表达机制完成认同建构。时下，大量的天然蔬谷符号（花生、枣子、石榴等）、人造美食符号（云吞、汤圆、月饼等）、饮食器具符号（筷子、砂锅、石磨、圆桌等）以及饮食行为符号（尚左尊东、浅茶满酒等），共同形塑了“食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能动意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民族工作重要场合中提及“石榴籽”这一富蕴中华文化价值旨趣的饮食符号，使其“千房同膜，千子如一”^[29]的内部籽实特性被赋予了各民族“互济共生—多元一体”的内聚态势和中华民族“三个离不开”的认同指向，并最终成为诠释“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30]主题思想的典型符码意象。媒介多元化时代催生出“‘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新权力结构”^[31]，为“食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表征实践打开了“机会之窗”。例如，2020年1月底，一幅治愈国人的“全国美食为武汉热

李波, 宋聪. 舌尖上的家国: 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03-113.

干面加油”漫画燃爆全网。90后原创绘画作者“@陈小桃 momo”在深入挖掘山东大葱、哈尔滨红肠、天津煎饼果子、四川火锅等各地特色美食资源的基础上, 借由数智技术赋能, 赋予静态的美食符号以拟人化的肢体动作和民族化的视觉形象, 通过各地美食们守在隔离病房窗外争先恐后为病床上的热干面加油鼓劲的图片隐喻, 彰显新时代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战疫情、舍生忘死守家园的坚韧意志, 成为“中华美食文化+漫画”非官方传播的典型案列。

四、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效进路

饮食象征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一项动态延续、润物无声的长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 精准提炼饮食象征文化的赋能价值, 防范和规避其脱序风险, 有助于增强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合力和践行效力。面向未来, 可从饮食符号供给、饮食叙事体系、饮食内容矩阵、饮食周期实践四个方面打好“组合拳”, 为进一步弥合记忆断层、激发情感共鸣、确立身份认同提供重要助力。

(一) 增加有形有意的饮食符号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32]。增加饮食层面的象征符号供给, 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错误思潮带来的价值解构风险, 也有助于以饮食符号和记忆互动凝聚文化身份归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首先,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夯实共同体聚合的重要基石。实践中, 应深度挖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多重饮食元素, 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和融媒体移动平台, 通过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开发“汉字宝趣味游(美食版)”APP、制作“甲骨文面条”活动等, 赋予汉字和普通话传播活力, “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可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33]。其次, 增加饮食资源的象征供给, 强化共同体记忆的代际传承。应以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bilibili等智媒平台为依托, 推动如月饼、汤圆、石榴籽等各民族共享饮食资源的象征性解码, 进而弥合因代际衰减效应造成的记忆断层、强化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和身份归属。最后, 回归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激发共同体身份的心理认同。紧扣“人, 天地之性最贵者也”^[34]的教育内核, 依托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智媒平台, 大力挖掘家庭、学校、博物馆等多元场域中潜藏的丰富饮食资源, 通过增设中华美食烹饪课程、开展美食夏令营等活动, 打造“线上线下相统合, 饮食教育双赋能”的常态化宣教矩阵, 助推主流内容实现广泛传播。

(二) 构建有声有色的饮食叙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35]当前, 应在整合话语资源的基础上, 积极扩展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维度, 综合使用多元化叙事策略, 为抵御错误思潮侵蚀和提升主流话语认同度助力。

首先, 巧用生活叙事, 打通主流话语传播渠道。列宁强调: “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36]实践中, 有必要在把握各族群众审美旨趣的基础上, 挖掘提炼如“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27]、“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37]、“民族团结要像糌粑和糍粑那样，捏成团、聚成团、抱成团”^[38]等民俗谚语，将其融入智能算法“内容池”，为各族群众打造一个富含理论深度、充盈烟火气息、彰显人本向度的“共同体话语推荐图谱”，弥合“话语悬浮”引发的价值裂解和精神真空。其次，善用视觉叙事，构建图文并茂的话语表达体系。实践中，可依托图像处理技术和视觉识别系统，对民族特色美食、传统饮食器具等象征元素以富含“现代感”和“时尚感”的方式创新转化，将其融入抖音短视频、社区宣传栏、AcFun直播、文创玩偶等大众熟知且易于接触的宣介载体中，激发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强化“我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价值共识。最后，优化议题设置，打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可通过学习强国、抖音、小红书等智媒平台超前谋划和主动设置议题，并综合运用短视频、动漫、影视剧等多元载体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宣传。如在“甘肃麻辣烫你配享太庙”“万水千山‘粽’是情”“华春莹点赞台湾山东饺子馆”等网络议题中，融入“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39]、“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40]、“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33]等一系列重要表述，使民众形成对“我是谁”“我的故乡何在”以及“我将何去何从”等核心问题的正确记忆建构。

（三）打造有理有据的饮食内容矩阵

饮食象征文化在标记地域归属、凝聚集体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久动能。为此，需积极介入饮食象征文化的挖掘与整合，打造有理有据的饮食内容矩阵，为进一步激发情感动能、强化集体记忆、赢得话语认同赋能助力。

首先，寻根中华饮食，强化“同出一源”的根基性情感。应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以多学科合作作为支撑，通过遥感、三维激光扫描、红外线成像等先进技术，对中华民族的炊煮器具、农事惯俗、烹饪古法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探究，为增强各民族情感联结和塑造价值共识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溯源古籍珍馐，强化“食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例如，央视文化类探索节目《一馐千年》，即以《齐民要术》《红楼梦》等古籍为创作蓝本，通过“戏剧+历史+美食”的演绎形式，对饕餮家喻户晓的先贤老饕，以古法复原有载录可考的珍馐佳品，为观众品味古馐背后的文化之美、构筑集体共享的记忆之场提供新方向。最后，善用世界语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时下，应紧扣时代焦点、赋予平民叙事意义，通过TikTok、Kwai、Snapchat等国际短视频软件，将镜头从“台前”一道道的中华美食转向“幕后”一代代的技艺传承和一个个的鲜活个体，从而在化“静”文字于“动”影像、融“大”价值于“小”人物的他者故事化演绎中，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35]开拓新的维度与进路。例如，以“李子柒”“滇西小哥”等为代表的网红博主以美食为切入点，通过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与亲和质朴的解说文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等政治术语融入热气腾腾、平实温馨的四季蔬饭中，使外国观众透过一个个冒着烟火气、染着泥土香、浸着人情味的田园生活视频，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解锁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四）探索有滋有味的饮食周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41]时下，饮食实践的“圈群化”和“异质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共同体成员思想动态难以精准捕捉、情感诉求

李波, 宋聪. 舌尖上的家国: 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03-113.

难以实时反馈、负面舆论难以有效化解, 无形中提高了饮食象征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度。基于此, 积极创新载体呈现, 有效嵌入多元化实践策略, 对于进一步激发民众情感共鸣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 立足校园文化, 搭建浸润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 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 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42]有必要根据学生审美情趣和校园区位优势, 增设中华饮食文化相关课程。比如, 开展“厨王争霸赛”、“以食述史”舞台剧、“家乡年味”摄影展、“美食故事我来讲”主题征文比赛等系列活动, 生动再现“忽必烈发明火锅涮肉”“张仲景创制饺子”等历史场景, 从而将“我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价值共识融入新时代青年的血液之中。其次, 组织文娱活动, 强化互动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体感。“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 其生命历程始终存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状态。”^[43]实践中, 应立足当地特色资源, 抓住传统节日、全国性纪念日和表彰大会等关键时间节点, 动员群众参加如“红石榴”杯民族美食故事演讲比赛、“居民厨艺大比拼”、“舌尖中国”创意剪纸大赛等系列活动, 使其在观之有形、触之有感、品之有味的立体化文娱矩阵中厚植“中华一家亲”的认同基底, 培养“建设共同体”的行为自觉。最后, 强化仪式互动, 打造沉浸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场。应以传统节日为依托, 通过举办民族美食文化节、开放非遗饮食博物馆、推出地域土特产玩偶等, 使民众在抢购萌物、观赏文物、共尝美食的过程中沉浸感受节庆祝典、实现身份层面的认同建构。应当看到, “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屈辱感都是国家认同感的基本维度”^[44]。中华历史上彰显辉煌成就的“暖记忆”与承载民族阵痛的“冷记忆”共同构成了仪式互动的基本元素, 成为以时间为轴心对抗历史遗忘和塑造价值共识的核心构件。例如, 为纪念因在 1944 年除夕夜抗击日伪军而英勇牺牲的八路军老四团“钢八连”24 位年轻战士, 山东临沭县朱村村民自发将春节的第一碗饺子敬献烈士, 使老区人民在 80 载红色年俗的代际传承中持续深植“水乳交融—并肩御侮”的深厚情谊, 强化“家国一体—生死与共”的身份认同。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45]。饮食象征文化作为建构国民“一体感”的关键标识, 无论是在食材采集、烹煮煎炒的诸环节, 还是在日常交际、节庆祝典的各方面, 均呈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 为国民在符号互动中进一步凝聚心理归属和深化对共同体的直观“想象”提供了现实可能。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是借助共享性的中华饮食符号串联起各民族“亲缘相依—文化共创—外侮共御—复兴共筑”的集体记忆碎片, 描摹出各地域“血脉相连—人文相通—情感相融—经济相依”的社会生活图景, 推进“多民族→共同体”的一体化建构进程, 夯实“文化—国家”的自主叙事体系, 进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嵌入心中、融入血液、注入灵魂。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7 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2).
- [3]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451.
- [4] 生彭菲, 朱思媚. 稳定同位素古食谱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J]. 学术月刊, 2022 (9): 201-211.
- [5] 马成明. 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日常饮食实践与群体共生——基于宁夏银川的人类学考察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3): 133-141.
- [6] 瞿明安. 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 [J]. 史学理论研究, 1995(4): 45-52+13.
- [7] 徐洪吕, 陶芳标. 关注多民族青少年饮食行为与心理健康 [J]. 中国学校卫生, 2024 (2): 153-156+167.
- [8] 金强, 郭朝阳. 各民族美食类短视频对民族文化交融的促进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 79-87.
- [9] 刘春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饮食文化认同进路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1 (2): 43-52.
- [10] 侯琳. “舌尖上的美美与共”: 民族美食短视频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柳州螺蛳粉短视频传播为例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 (5): 52-57.
- [11] 黄彩文, 白汉卿. 中华文化符号的地方建构与日常生活呈现: 滇南石屏豆腐文化研究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 104-112.
- [12] 何元凯, 周超, 郝国强. 饮食文化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广西米粉文化溯源 [J]. 民族学刊, 2021 (12): 16-22+125.
- [13] 薛晨浩, 王生鹏, 白永平. 多重饮食叙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临夏州打平伙风俗为例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 (4): 47-54.
- [14] 朝克赛, 苏丹. 饮食文化与民族互嵌——呼伦贝尔市锡尼河地区糕点文化的人类学解读 [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23 (5): 10-15.
- [15] 闻静. 饮食符号建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广西柳州螺蛳粉为例 [J].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6): 46-51.
- [16] 张国启, 蔺叶坤. 生活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价值与路径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 48-56.
- [17] 王素珍. 流动的家乡风味——饮食的记忆和想象 [J]. 民俗研究, 2013 (4): 150-156.
- [18] 刘海铭, 李爱慧. 美国华人餐饮业及其文化认同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8 (1): 12-22.
- [19] 尤金·N·安德森. 中国食物 [M]. 马樱, 刘东,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7.
- [20] 赵超, 青觉. 象征的再生产: 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6): 103-109.
- [21] 孙中山全集: 第 6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28-529.
- [22]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 何文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3.
- [23] 李维军. 视觉说服与意象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像叙事 [J]. 青海社会科学, 2023 (2): 130-139.
- [24]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 身份认同的困境 [M]. 王鲲,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37.

李波, 宋聪. 舌尖上的家国: 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03-113.

- [25] 张沐阳. 人类学视野下的食物与身份认同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1-8.
- [26] W. J. T. 米切尔. 图像理论 [M]. 兰丽英,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1: 1.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99.
- [28] 马文·哈里斯. 文化唯物主义 [M]. 张海洋, 王曼萍,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218.
- [29] 汪灏. 广群芳谱: 第3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5: 1400.
- [30]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4-05-30 (1).
- [31]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M]. 何道宽,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17.
- [3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27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2).
- [33]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34] 许慎. 说文解字 [M]. 汤可敬,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1587.
- [3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N]. 人民日报, 2021-06-02 (1).
- [36] 列宁全集: 第3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467-468.
- [37] 习近平书信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40.
- [38] 李克强在西藏代表团: 民族团结要像糌粑和糍粑那样捏成团、聚成团、抱成团 [EB/OL]. (2017-03-07) [2024-11-05]. http://www.gov.cn/xinwen/2017-03/07/content_5174747.htm.
- [39]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14-09-30 (1).
- [4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38.
- [41]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5月2日) [N]. 人民日报, 2018-05-03 (2).
- [42]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刘云山讲话 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6-12-09 (1).
- [43] 谷家荣. 中华民族“石榴籽”模式论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 33-41+182.
- [44] 吴玉军. 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 (1): 48-53.
- [4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5-46.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本刊微信公众号

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的实践探索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

许丹荔^{1,2} 王炳涵¹

(1.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2. 石河子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 伴随数智技术的革新, 数字游戏的兴起成为推进中华文化创新传播的重要抓手, 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辟了可行路径。首先, 以《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实践为例, 从游戏的本质与特点出发, 揭示其赋能中华文化创新传播所彰显的独特魅力。其次, 从深挖游戏内核、创新文化表达、雕琢话语内容、打破固有思维四个方面, 全面审视游戏作为媒介促进文化创新传播的重要因素。最后, 立足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 深刻把握“游戏+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多样化转出与多元化融合, 为实现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与价值参考。

关键词: 文化强国; 中华文化; 文化叙事; 游戏; 《黑神话: 悟空》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6-0114-10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6.11

作者简介: 许丹荔,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炳涵,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XKS02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兵团高校讲好兵团故事叙事教学体系研究”(BTSZ20221203);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智库项目“‘大思政’视域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研究”(2024ZD490)

引用格式: 许丹荔, 王炳涵. 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的实践探索——以《黑神话: 悟空》为例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14-123.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坚持以数字化为引领, 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 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1]。同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 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 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3]2024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4]。由是观之, 文化数字化已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充分发挥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遗产与发展, 成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生力量。

游戏可以成为中华文化传播和交流创新的网络工具, 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5]。2024年8月, 中国首部3A游戏《黑神话: 悟空》(以下简称《悟空》)正式发布。首发之日, 其销量便已超过450万部, 同时在Steam平台上, 以220万玩家的峰值在线人数刷新了单机游戏在线人数的历史纪录。目前, 《悟空》的销量已突破2100万份, 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创下了国产游戏史无前例的纪录。《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此评论道, “出圈”的是一款游戏, “出海”的是中国文化。2024年7月25日,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发布的《2024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指出, 《悟空》的问世使得自主研发游戏上半年海外市场实销收入达85.54亿美元, 同比增长4.24%^[6]。可见, 数字游戏逐渐成为创新文化传播的又一新兴媒介。

近年来, “游戏+文化”的研究越发受到学术界的青睐。一方面, 部分学者从AIGC、Sora、5G+AI等前沿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传播的视角, 从时代机遇、作用机理、创新方式^[7]、存在问题、资源开发与利用^[8]等方面, 针对传统文化、红色文化^[9]、国风文化、非遗文化、地域文化等多种文化展开研究。新技术的出现, 从思想引领、文化自信、科技赋能、产业现代化四个维度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开辟新的发展路径^[10]。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着眼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视角, 探讨数智技术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策略路径、国际传播的体系建立与机制完善^[11]、文化话语权的建构^[12]等, 为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创新传播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已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游戏赋能文化创新传播奠定了学术基础^[13], 但对于游戏的独特魅力和创新文化叙事的系统研究仍有待深入。据此, 本文以《悟空》为研究范例, 全面审视游戏作为媒介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彰显的独特魅力, 深入探索游戏作为媒介创新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向, 从而不断为“游戏+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注入生机活力, 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出圈：游戏作为媒介赋能文化创新传播的独特魅力

作为国产 3A 游戏的开山之作，《悟空》上线后，迅速成为全球游戏玩家关注的焦点，相关话题迅速引爆社交媒体。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道，《悟空》彻底“出圈”^[14]，打破了欧美国家长期垄断 3A 游戏的局面。这款游戏以《西游记》为情节参照，综合多元技术构建多模态、高互动、沉浸式的游戏场景，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具象化、可视化、可感知的形式呈现出来，还原了大家心中一直存在的东方魔幻世界，谱写出具有东方韵味的英雄史诗。

（一）美学观念与美术呈现流溢展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5]这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传统美学观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审美追求和艺术理念的凝结，内蕴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基因。

进入新时代，传统美学观念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相互融合，通过数字化、游戏化、电影化等形式充分展现。《悟空》在游戏画风、场景设计上既有奇山异水、庙宇古刹、怪物灵兽、雕栏壁画，又有天地变幻、四季交替、神魔交战，无论是画面质感还是情节设计，都透露着独具匠心的东方审美。同时，游戏将众多中式神话元素贯穿其中，将国内诸多建筑和雕塑都转化为游戏内的绝景。《悟空》的美术设计不仅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融入了现代视觉艺术的表现手法，完美地再现了《西游记》中充满神秘与奇幻的世界。它借助游戏化的手段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

（二）人文理念与自然实景具象合一

若欲通过游戏传达浓厚的人文情怀，构筑一个引人入胜的全新世界，绝非是将各种文化元素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借助丰富的文化细节，使其变得立体可感知。《悟空》的第二回，“卧佛寺地窖”下面一个不起眼的窄小通道，布置了数量可观的壁画、石窟、造像以及可读的篆书经文；在第三回“一念壁”的墙壁上，更是布满了上千尊拇指大小的佛像，其色彩的斑驳、石料的缺损都清晰可见。此外，游戏的文本内容也鲜明地展现出我国的传统人文理念。例如，“既见未来，为何不拜？”既表达了古人“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深刻表示为了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不屈精神。

在数字技术与游戏设计的融合下，古人的自然观也以具象化、可感知的形式表达。《悟空》依靠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将现实世界的纹理和细节清晰地映射到游戏场景中，让沉睡多年的文物在游戏中“触手可及”。游戏研发团队通过对古建筑群的实地考察，精心挑选了 36 个地标性景观作为游戏背景，成为游戏中的一大亮点。例如，在“小雷音寺”中，游戏再现了中国古代寺庙的建筑样貌，细致地刻画了寺内壁画和佛像的细节。玩家能够观察到每一尊佛像的表情和手势，能够深切感受到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正是这种人文精神与自然风光的融合，《悟空》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一款数字游戏，更像是一部生动的文化史诗。2024 年国庆节期间，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小西天景区因作为《悟空》的取景地之一被大众熟知，游客蜂拥而至，这个只有 9 万多人的小县城，每日游客量都在 1 万人次以上。一位游客表示：“在小西天，看到了山西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传承，也看到了更多年轻人对《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和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尊重。”

（三）沉浸体验与情感共鸣强烈碰撞

数字游戏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使每一位玩家能够在游戏中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游戏中的一面古镜、一张古琴、一件瓷器、一身盔甲、一座园林、一首诗词、一曲民乐,均展现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悟空》以传统民乐为背景,将戏曲、服饰、诗词、武术等多元文化融于一身,借助4K影视级画质,让每位玩家都能沉醉于传统与现代的动态交互体验之中。

“正如任何信息媒介一样,任何游戏都是个人或群体的延伸。”^[17]《悟空》以《西游记》这一古典神话小说为蓝本,构建了一个延续西游故事的游戏世界。在游戏中,“天命人”的设定,在唤醒国人对于文化经典记忆的同时保留了个人诠释的弹性空间。沉浸于游戏的玩家,仿若获得了一种新的主体性,似“带着自己的使命在游戏中洗去凡心,方能继承悟空的精神”。这也就是游戏升华之处,不仅让玩家在沉浸式体验中获得游戏乐趣,也使其在深度共鸣中感悟人生哲理。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融合彰显

“《黑神话: 悟空》一鸣惊人的背后是长期技术储备的厚积薄发,更关键的是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激活了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18]游戏作为传播媒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

《悟空》凭借超前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使游戏质感得到飞升,做到了“真实世界的虚拟化”和“虚拟世界的真实化”。一方面,游戏和影视的跨界结合,成为突破内在艺术壁垒、拓展类型界限的新型叙事方式。《悟空》将游戏逻辑和影视规律融嵌互通,以现代视觉艺术的表现手法成就了全新的艺术种类。例如,游戏伊始,头戴凤翅紫金冠、身披锁子黄金甲、脚踏藕丝步云履,展现的正是悟空前往四海龙王处的那套行头,这是对1986年版《西游记》中“美猴王”的高度还原。另一方面,游戏借助先进的光影技术,通过对光照、反射和阴影的处理,营造出古代建筑神秘与庄严的场景氛围。当阳光透过庙宇的窗棂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玩家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一个细腻真实的古代世界。

游戏中的文本内容更是将传统观念以当代青年喜爱的方式讲述出来。例如,“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台词,充满了少年的不羁与叛逆;“既见未来,为何不拜”台词,展现出少年的自信与傲气;“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台词,告诫青年要有直面未来的勇气与魄力。《悟空》以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人生哲学”生动而深刻地讲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时期的意气风发和蓬勃朝气,也激励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勇敢地追寻属于自己的方向。

三、出奇：游戏作为媒介赋能文化创新传播的多维路向

《悟空》作为传统文化与数字游戏相结合的成功实践,为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游戏作为新兴传播媒介,尚需全面地审视其推进文化创新传播的可能因素,这有利于深入探索游戏赋能文化创新传播的多维路向。

（一）深挖游戏内核，探索文化传承新模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要充分吸收游戏嵌入文化创新传播的实践经验,深挖游戏作为媒介的本质内核,也要廓清人们对游戏的惯性认知,减少游戏赋能文化创新传播中的阻碍。

一方面，全面认识游戏作为媒介的独有特点。区别于传统传播媒介，游戏具有高互动性、社交性与可复制性等特点，能够增强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其一，随着游戏技术与游戏设计水平不断提高，玩家借助游戏平台能够实现跨时空的互动协作，极大地提升了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其二，游戏中的角色和故事情节配合文字、图形、音效和视频等多种元素，搭建玩家间的情感桥梁，从而增强信息传递的效果。例如，《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细致的考据和传神的人物肖像，将三国时代庞大的政治军事构架融入 SLG 游戏模式中，让玩家在游戏中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江南百景图》将玩家带到明朝江南地区，通过角色扮演、任务挑战和互动剧情，让玩家既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又能沉浸其中感悟文化智慧。

另一方面，厘清游戏作为媒介促进文化传播中的认识与发展误区。其一，“游戏+文化”指向的并非文化泛娱乐化。文化传播强调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文化价值的合理延展。我们要警惕内容浅显空洞的文化产品，避免借助戏剧化、低俗化的滥情表演，调整盲目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的心态，反对满足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19]。其二，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的现象。例如，随着 2024 年《植物大战僵尸杂交版》再度火爆，一时间“融合版”“转基因版”“超进化版”等二创作品频频出现。这种以僵化死板的方式、恶劣低俗的态度对原创作品复制抄袭，绝非创新文化传播的可行之举。其三，不能只搞一种固化模式。“游戏+文化”的发展模式，要杜绝因循守旧，按照“模板”“范例”设计游戏的形式内容，生硬呆板的文化植入不仅会引起大众反感，也将破坏文化本身的价值意蕴。

（二）创新文化表达，扩大文化传播新面向

以传统为媒、以国风为韵、以游戏为介、以实景为参，是突破游戏与文化次元壁、实现内外虚实联动的重要原则。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传播媒介往往会放缓甚至扭曲原本内容的表达。为此，要保障游戏的内容表达与参照对象的旨意精神高度契合，创新多元文化表达形式，才更有利于提升传播的效果。

一方面，注重游戏设计的精度与细节，保持与参照对象的高度还原。在游戏设计中，研发团队要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将游戏内容与多元文化元素相融合，借助精准的文化表达与精细的游戏设计，促进不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增强玩家的兴趣与认同。另外，游戏研发团队要注重对文化底蕴的深度挖掘，通过语言艺术、声乐设计等方式，在角色服饰、建筑风格、饮食习惯、审美态度等方面，做到文化内容原汁原味地呈现。例如，《九阴真经》成功地还原了明朝的生活和文化，为玩家提供了一个真实而细腻的江湖体验。游戏中的石刻、墓碑、管道、庭院各处皆可看到风格浓郁的明石刻，以及通过宝物系统表现玉文化元素，让玩家感受中国古代玉器的文化价值。此外，游戏还通过独特的轻功系统、内功系统和门派系统，让玩家在体验江湖恩怨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武侠文化的魅力。

另一方面，发挥游戏包容文化多样性的功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发展。游戏作为媒介能够实现玩家跨时空、跨文化的互通协作，自然也就承载着多样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人文思想^[20]。这就需要游戏研发团队发扬本土文化特色，吸收有益的文化元素，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协同发展。此外，研发团队应充分了解不同地域玩家对游戏内容的期望和敏感点，调研不同文化背景下玩家的需求和喜好，设计出既风格鲜明又包容性强的游戏体验，促进多元文化的互鉴与融合。例如，

国产游戏《原神》中的蒙德对应中世纪西欧, 蒙德建筑来自荷兰, 教堂则是参考德国科隆大教堂, 琴(人物角色)的服饰来自法国; 璃月对应中国, 绝云间取自张家界, 背景音乐则以传统戏曲和说书的形式表达。《原神》作为创新文化表达的实践范例, 成功搭建起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沟通桥梁。

(三) 雕琢话语内容, 营造文化叙事新生态

游戏作为媒介需要与其他模态结构相互补充完善。我们要利用好游戏多模态叙事方式, 以生动的文本内容、形象的图像渲染提升游戏的话语表述, 从而构建“游戏+文化”的独特话语体系, 营造文化叙事方式的新样态。

一方面, 针对剧情模态进行叙事的重构。游戏能够将传统文化元素贯穿于场景搭建、游戏设定、剧情发展等方面, 实现多元文化表现样态的创新。伴随游戏设计水平的提高, 满足玩家游戏体验的需要也逐渐提高, 单一的剧情模态逐渐被开放式、代入式的游戏体验所取代。因此, 研发团队要坚持推陈出新的原则, 在原有游戏设计的基础上, 融合特色文化、丰富游戏内涵、提升游戏体验。《悟空》植根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肥沃土壤, 历经6年“取经路”, 通过视听模态的交叉转换运用, 使玩家直观感受《西游记》的氛围和情感, 体会中国神话故事的独特魅力。悟空的形象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化的象征, 通过游戏与世界各地的玩家产生了共鸣。他的故事不再是古老的传说, 而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展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并“走进去”的无限潜能。

另一方面, 针对图像模态进行隐喻与互文的融合。游戏图像不仅是对剧情的直观呈现, 更是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和符号系统。色彩的衔接、场景的转换、音乐的穿插、细节的隐喻都能够深化游戏的氛围, 引导玩家更为沉浸地思考和解读。例如, 《悟空》中源于自然的传统色彩被巧妙施用于虚拟世界中, 还原为国人所熟知的自然风光。游戏尊重自然规律的美学, 将废弃的、残破的旧址或残存之物加工利用, 让其成为美的形象, 这种设计理念也体现着东方美学中崇尚的残缺之美。可见, 游戏通过对图像模态的隐喻与互文, 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元素交叉融合, 让玩家拥有沉浸式游戏体验的同时, 也为跨时空叙事模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尝试。

(四) 打破固有思维, 构建文化发展新格局

在传播学中, 当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被置于完全对立的境况时, 其文化也被视为具有独立性甚至对抗性, 此时就会产生文化定势。尤其在跨文化传播中, 定势思维往往会使人们对异域文化产生曲解或偏见。由于我国游戏产业发展起步晚, 虽有个别国产游戏出海, 但仍未能打破外国玩家对中国游戏的刻板印象。《悟空》成功出海的实践经验意味着, 要打破传统游戏设计的固化思维, 从精准定位受众、加强跨媒体合作以及注重国际化传播等方面着手, 开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为全球玩家呈现更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与游戏体验。

一方面, 要从游戏自身出发, 打破传统设计理念, 创新游戏叙事与传播方式。《悟空》人物呈现出的新颖属性, 其背后是颠覆性的技术内核与强大的文化底蕴在支撑。《悟空》依靠空间计算一定位捕捉技术, 实现了游戏中虚拟形象的实时交互; 通过全景光线追踪技术, 使得游戏场景呈现逼真的光影效果, 让玩家的游戏体验更接近于现实世界; 游戏采用虚幻引擎5, 使画质达到了电影级水准, 增强了游戏的视觉冲击感。游戏原创性地将中国风贯穿于角色设计、场景构建、故事情节与叙事文本, 并以新颖的游戏理念搭配细腻的视觉传达效果,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多元

魅力。

另一方面，要创新游戏赋能文化传播形式，构建面向世界的文化发展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相互借鉴发展经验，让不同发展道路交会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21]这要求我们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挖掘文化资源；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成果；坚持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新活力。同时，在文化内容传播方面，我们不能停留在文化内容的简单复制，要以新思路、新视野、新方式，促进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激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22]。中华文化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远走深”。用游戏讲好中华文化故事，既要尊重文化差异、做到深入人心，更要将游戏“产品”做成“作品”，逐步打造“游戏+文化”同船出海新局面，让文化的种子在异国土壤中生根发芽。

四、出彩：游戏作为媒介赋能文化创新的深远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进入新时代，全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意义深远。伴随《悟空》带动的“国潮热”，充分发挥游戏作为媒介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增强全民文化自觉、继续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促进中华文化多样性传承；有利于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创新技术研发应用、促进传统与现代融合并举；有利于深入探索文化叙事形式、增强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力量、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步伐。

（一）有利于赓续历史文脉，促进中华文化多样化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文化创新的宝藏。”^[24]游戏作为媒介赋能文化创新传播，有利于赓续历史文脉，促进中华文化多样化传承。

其一，激活数字叙事赋能中华历史文脉赓续传承的积极效用，有利于盘活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内涵、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虽历时数千年，但其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待深入挖掘。进入新时代，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文化自信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肩负起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文化空间“动”起来，促进中华文化多样化传承。另一方面，依靠互动数字叙事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丰富文化遗产叙事场域、拓展文化故事设计与讲述方案、架接传统与现代跨时空的沟通桥梁^[25]。在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挥游戏作为媒介赋能文化遗产的功能，是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的重要体现、促进文物活化传承与合理利用的有效之法，有利于明确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其二，利用好游戏作为媒介的叙事方式，有利于讲好中国的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26]

《悟空》的“出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它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并“走进去”的成功实践。我们要以多样化的手段激发不同地域文化的共振、实现跨文化共情，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与传播效果。

(二) 有利于开放文化发展空间, 促进中华文化多元化融合

话语反映思想、揭示使命^[27]。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我国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和传播能力的提升, 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倡导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给世界, 讲述充满智慧与情感的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独有的文化声音。在科学技术创新驱动下, 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步伐逐步加快, 世界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及中华文化。

其一, 要坚定文化自信,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 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 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28] 伴随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国内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驿站”“城市书房”逐渐兴起。在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础上, 多种传播媒介的综合利用拓宽了地域文化空间的设计思路, 提升了传统文化空间建设的能力, 促进了中华文化叙事话语的创新表达。我们要保持错位发展的原则,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建设, 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 保障新型文化空间的长效发展,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 要以兼容并包的原则, 创新文化叙事方式的探索实践, 加快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步伐。“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 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29] 《悟空》之所以成功“出海”, 一是中华文化具有对世界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二是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积淀形成厚重的文化底蕴。此外, 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进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 创新了游戏赋能中华文化叙事方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数智技术的赋能作用, 依靠数字平台、数字空间建设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通过文化共享促进人民的精神富裕。

(三) 有利于探索文化叙事形式, 增强文化现代化发展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30] 进入新时代, 我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深度挖掘、充分利用并全面发扬中华文化的优势与魅力, 有利于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一方面, 要积极探索创新文化叙事的多元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31] 这为新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我们要深刻认识到, 讲好中国故事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 也是促进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要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要充分挖掘自身文化优势, 把握讲述中华文化故事规律, 提升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的时效性, 从而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32]。再者, 要把握好文化传播持续性、复杂性与隐蔽性的特点, 推动文化叙事多元、多维、多样化发展, 发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 营造“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华声音”的新局面^[33]。

另一方面, 全面提升对外话语传播效能, 加快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文化兴则国家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 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 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愈发强大, 要积极推动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从“有没有”向“大不大”转变^[34]。《悟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与文化

回响，我们要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巩固和扩大自身独有的文化优势，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效能，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步伐。同时，话语优势决定话语权的归属，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讲好中华文化话语能力，构建起更加完善、更高水平的叙事体系，逐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优势。

五、结语

《悟空》的“出圈”与“出海”，无疑是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传播的一次成功实践。“线上游戏”带动了“线下实践”的火爆，游戏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融合，更是打开了“游戏 IP+文旅”的实践范例。游戏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诠释，以及对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彩呈现，激发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与喜爱。一方面，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契机，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创新传播方式，推动产业交叉融合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自研产品挖掘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趋势渐成主流，我们更应该谨慎联动传统文化，防范游戏等新形式赋能中华文化传播的风险。这些问题包括：过于聚焦头部文化 IP 或者标签化的元素，导致同品类出现太多，让玩家感觉创新力不足；为迎合潮流、步伐太快，忽视文化 IP 本身的适应性，使传统文化成为游戏公司的镀金“工具”；“游戏+文化”的联动缺乏紧密度，高质量联动相对贫乏。总之，创新文化叙事与传播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去”并“走进来”，才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EB/OL]. (2023-02-27) [2024-09-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 [2]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N]. 人民日报, 2024-10-29 (1).
- [5] 夏白桦. 人民财评: 深度挖掘电子游戏产业价值机不可失 [EB/OL]. (2022-11-16) [2024-10-11]. <http://opinion.people.com.cn/nl/2022/11/16/c1003-32567540.html>.
- [6] 2024 上半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国内游戏市场实销收入超 1400 亿元 [EB/OL]. (2024-07-26) [2024-10-01]. <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11/20240726/c96234527323454faf601b654693544d.html>.
- [7] 原光. 数智赋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技术路径、作用机理与优化策略 [J/OL].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 1-13 [2024-10-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4558.G.20240929.1714.010.html>.
- [8] 徐佳, 施燕斌. 数智背景下图书馆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研究 [J]. 图书馆, 2024 (7): 93-99.
- [9] 运迪, 王馨锋. 数智时代红色文化故事化传播的机遇、困境与实践进路——以《人民日报》抖音号为例 [J]. 新闻爱好者, 2024 (8): 42-45.

许丹荔,王炳涵. 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传播的实践探索——以《黑神话: 悟空》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6): 114-123.

- [10] 雷文宣,解学芳. 从封存式到活态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创新[J]. 出版广角, 2023(19): 11-18.
- [11] 姚锋,李恩军.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体系构建与机制完善[J/OL].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2 [2024-10-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285.C.20240926.1055.016.html>.
- [12] 毛倩倩.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与体系建设的实践进路[J]. 人民论坛, 2024(14): 89-91.
- [13] 何威,牛雪莹. 数字游戏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趋势、方式与特点[J]. 对外传播, 2022(9): 21-25.
- [14] 杨俊峰. 《黑神话: 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09-13(8).
-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N]. 人民日报, 2015-10-15(2).
- [16] 彭立勋. 中华美学精神与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J]. 艺术百家, 2015(3): 19-23+170.
- [17]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 274.
- [18] 刘莉莉. “悟空”归来文化输出“路在脚下”[N]. 天津日报, 2024-08-22(9).
- [19] 曾楠. 人民日报新知新觉: 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精神家园[N]. 人民日报, 2017-11-03(7).
- [20] 曾培伦,邓又溪. 从“传播载体”到“创新主体”: 论中国游戏“走出去”的范式创新[J]. 新闻大学, 2022(5): 94-104+122.
- [21] 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为新起点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N]. 人民日报, 2015-09-27(2).
- [22] 辛鸣. 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N]. 人民日报, 2023-11-10(13).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349.
- [24]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 求是, 2022(14): 4-8.
- [25] 余敏. 互动数字叙事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内涵、系统要素和提升对策[J/OL]. 图书情报知识, 1-11 [2024-10-0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085.G2.20240926.1145.004.html>.
- [26] 盛若蓍. 以跨文化共情传播讲好中国政治故事[J]. 人民论坛, 2024(16): 101-103.
- [27] 樊士博,白金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1): 52-64.
- [2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J]. 求是, 2023(11): 4-11.
- [2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3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 人民日报, 2021-06-02(1).
- [3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6.
-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4.
- [33] 邹霞,何攀文. 文化传播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刍议[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27-36.
- [34] 付高生,龚剑飞. 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话语权的丰富内涵、建构境遇与提升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4): 13-21.

责任编辑: 卢媛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对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续建与完善

王英津 于顺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于 2024 年 3 月正式颁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是完成《香港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区宪制责任的需要, 健全和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需要, 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从公开化走向隐蔽化的需要。《条例》内容兼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保障人权、自由的平衡, 完善或吸纳了香港本地既有法律文件的相关条款, 参考普通法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对接国际通例。在《香港国安法》基础上, 《条例》对相关罪行细节作了增补与完善, 对法律程序作了兼容与补充, 对公务人员进一步明确职责与保护权益。面对非传统安全风险增多、美西方涉港干涉制裁增多等新情势、新挑战, 香港特区应与时俱进地修订和优化《条例》, 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关键词: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 宪制责任; “一国两制”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6-0124-14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4.06.012

作者简介: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于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17ZDA109)

引用格式: 王英津, 于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续建与完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24-13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1]199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曾积极推动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的立法任务,但由于复杂原因,该立法进程缓慢,尤其2003年7月1日香港反对派鼓动50万人上街抗议后,该立法进程被中断。随着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以及2021年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香港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立法会的政治生态得到净化与优化。在这一情势下,香港特区具备了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立法任务的基础、条件和环境。2024年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就如何制定《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立法问题开展公众咨询。其后,经历提交立法会审议、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完成条文审议工作及修正案审议工作、立法会三读草案等程序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3月23日刊宪生效。这标志着《香港基本法》第23条赋予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正式完成。

学界对香港特区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香港特区的权力来源维度解释该项立法工作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可以将中央和特区理解为授权关系,《香港基本法》的主要内容是中央授权特区处理授权范围内的事项,其中基本法规定“自行”处理的事项,特区享有最大的自主管理权^[2]。《香港基本法》第23条反映出中央制定《香港基本法》时,将维护国家安全权力这一本应由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授权给香港特区行使^[3]。该项立法是中央相对保留事项,属于中央授予香港特区的特殊防卫权,香港特区行使立法权应当符合授权目的^[4]。这意味着,中央授权香港特区自行立法是“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对香港特区而言,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是法定义务^[5]。二是阐释香港特区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仍需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理由。有学者认为《香港国安法》第3条明确了中央负有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区负有宪制责任,两种责任存在边界、各有侧重,香港特区还需要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有实际行动与具体作为^[6]。还有学者指出《香港国安法》可以解决主要的国家安全隐患和风险,但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国安法网,需要香港特区对标衔接《香港国安法》,更为深入地建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7]。三是对香港特区未来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具体方式提出展望。有学者认为激活、修订及整合香港特区既有法例,是一种完成立法的可行方式^[8]。也有学者建议把内地危害国家安全的刑法部分条款,通过放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实现国家安全立法的统一^[9]。还有学者提出了立法的构建策略,即需要有充分的政治讨论与社会咨询,妥善处理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完善国安立法程序等^[10]。

综合来看,学界对香港特区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既有研究,主要是解释特区自行立法的法理依据,推测特区将如何开展该项工作。多数既有文献如实解释了立法缘由,准确预判了一些立法细节。然而,当前形势与以往有所不同,不仅是因为《条例》已经正式刊宪,更是因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11]。在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形势下，维护好国家安全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才能在长治久安的环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内，香港特区不断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实现既定发展目标，但也不免会遇到新问题。鉴于此，本文将探析《条例》在立法内容上的主要特点，阐释《条例》如何配合《香港国安法》续建与完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以下简称“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研判香港特区实施《条例》的价值功能以及潜在问题，为《条例》发挥应有效能提供参考思路。

二、《条例》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中央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香港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态进入新阶段。在此基础上，及时履行《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宪制责任以进一步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势在必行。

第一，这是完成《香港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区宪制责任的需要。《香港基本法》第23条中有两个事关立法性质的关键词——“自行”和“应”。“自行”表明香港特区拥有对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自主权，可以选择当地常用的立法方式及手段，制定适用于普通法地区的法律文件。“应”在法律语境中的意涵是“必须”，这表明香港特区没有自行决定是否需要立法的权力，而是何时立法、怎样立法的权力。正如有学者强调该项立法的性质：“不是在可立与不可立之间做选择，也不被允许永久拖延，它是一项必须要及时完成的任务。”^[12]从法理学角度看，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权不同于一般事项的立法权，通常由中央行使，将该项权力授予地方行使，表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的高度信任^[13]。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面对香港回归后迟迟未能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立法任务的现实情况，中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决定直接行使立法权来填补香港特区的国家安全漏洞。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其第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的《香港国安法》第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由中央出台的上述两个法律文件，都明确要求香港特区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的立法任务，与中央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在这种情势下，香港特区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任务的条件基本成熟。香港特区制定出台《条例》，既是行使中央授予的权力，也是履行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赋予的宪制责任。

第二，这是健全和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需要。《香港国安法》属于中央层面的立法，中央基于对“一国两制”的尊重，保持立法谦抑，只对四种极端的犯罪行为，也就是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时最迫切需要被制止的四类行为进行规制^[14]，并未完全覆盖《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所有

立法事项。《香港国安法》在案件管辖、执法程序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仅作了概括性规定, 在香港这一普通法地区的适用性有待细化和加强, 香港相关部门在根据《香港国安法》处理案件时会遇到执法困境。例如, 在“黎智英案”中, 被告人要求聘请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担任辩护人, 引发各界争议。该情况表明, 即使《香港国安法》实施, 香港特区在涉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规范方面依然存在需要补充的细节。对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遵循法定程序, 对《香港国安法》的个别条款作出解释, 封堵了香港特区法院认为存在的“漏洞”。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后向公众强调, 香港特区应该把《香港国安法》第 7 条落到实处, 及时修改完善香港本地相关法律, 充分运用本地法律解决《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15]。这表明, 中央希望香港特区尽快制定本地相关法律文件以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薄弱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虽具权威性, 但不是常态性措施。这内在地要求香港特区须尽快全面落实《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的规定,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

第三, 这是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从公开化走向隐蔽化的需要。《香港国安法》的出台, 并不意味着香港特区的安全风险被完全防范。激进反对派人士对《香港国安法》有所忌惮, 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从试图煽动全港规模的公开化暴动转向隐蔽化、“地下化”的个别图谋, 存在着积少成多之后集中爆发的隐患, 威胁着香港特区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虽然反对派在香港立法会等场合不再公开发表反对中央、对抗特区政府的言论, 但仍有少数极端反对派人士将出台《香港国安法》以及完善选举制度的系列举措污名化为所谓“镇压”, 企图在境外煽动香港居民对抗国家制度^[16]。还有一些不良媒体通过书刊、影视剧、网络游戏等途径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以文艺创作之名采取“软对抗”方式, 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或“港独”的理念^[17]。另外, 国家机密保护面临较大风险, 境外间谍及情报活动威胁与日俱增, 境外反华势力通过扶植代理人妄图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团体也在谋划破坏性活动。面对实践中越来越隐秘化、多样化的危害国家安全图谋, 香港特区意识到必须及早封堵风险漏洞, 消除潜在隐患。于是, 2024 年香港特区加快制定出台《条例》就成为必然举措。

三、《条例》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主要特点

《条例》一共有 9 部 190 条, 覆盖了实体法、程序法与组织法等多方面内容, 是一部全面细致的综合性法例。《条例》在内容上体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 兼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保障人权、自由的平衡。《条例》坚持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作为践行“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在香港本地法律文件中同样适用, 明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构建综合性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18]。同时, 《条例》还严格遵循《香港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做到既维护国家安全, 又保障人们的法定权利和自由。

部分西方反华势力指责《条例》所谓“破坏香港新闻及言论自由”“降低国际交往自由”“迫害人权”, 香港个别人士也对人权保障问题提出所谓“关切”。事实上, 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体现

在整个《条例》之中，《条例》通过具体条文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19]⁹⁷。对一些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原则与保障人权、自由原则之间可能存在张力的法律条款，《条例》明确规定了判定有关罪行的标准，严格界定个人正常活动与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同。例如，《条例》第 47 条明确规定了“接受境外情报组织提供利益罪”，将“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罔顾是否危害国家安全而作出某项作为”等作为判罪要素。又如，《条例》第 52 条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干预罪”，同样使用了三种限制性条件来定义“境外干预”，即“意图带来干预效果”“配合境外势力”“使用不正当手段”，每种限制性条件在《条例》中都有专门清晰的释义。可见，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跨境犯罪行为，《条例》在定罪标准上有严格、公开、透明的细则予以界定，使其与正常的跨境学术、商业交往行为区分开来。此外，《条例》第 7 部运用较长篇幅对警权行使作出了多项限制性规定，指出检控方有责任在无合理疑点下证明被告人有相关的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诉讼参与人的辩护权利及诉讼权利也作出了明文法律保障。这些规定体现出“通过严格限制执法权来充分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

在制定《条例》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曾就相关问题开展公众咨询。针对公众提出较多意见的条款，香港特区政府汇集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有益意见，实现了立法过程的民主性，这是保障个人权利的表现。例如，《条例》第 35 条就“披露国家秘密”行为加入“指明披露”的免责辩护，确保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披露一些信息的部分行为不属于犯罪。在香港媒体界提出意见较多的“煽动意图”方面，相较于《公众咨询文件》，《条例》解释得更为明确，其第 23 条明确了 6 项具有煽动意图的罪行，还特意指明 4 项不属于“煽动意图”的善意行为，包括“为了完善宪制秩序”“就该事宜提出改善意见”“劝说任何人用合法途径改变特定事项”“目的在于消除敌意或仇恨”等；第 26 条规定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并不知道有关刊物是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等条件作为免责辩护，解答了公众困惑。这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香港居民享有广泛且实质的言论自由和权利。同时，《条例》充分考虑了广大香港居民对严惩个别罪行的普遍支持态度。例如，对于香港居民勾结境外势力破坏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该条例第 49 条规定“可判终身监禁”。这比普通的破坏国家安全行为“可判处监禁 20 年”处罚更加严厉。

可见，《条例》从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入手，明确了构成犯罪的各种要素，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严谨地规定了相关罪行，还规定了例外情况及适当的免责辩护^[20]。除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当作明确的原则之外，《条例》还规定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正当法律程序、一事不再理等法治原则^[21]。香港特区制定本地法律文件来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在维护香港居民等相关人员的权利和自由，打击借“自由”“人权”之名行危害国家安全之实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参照香港本地既有法例，不断增强适用性。从《条例》文本来看，该法例的部分条款融合了香港本地既有法例规定内容。概括来讲，《条例》第 2 部到第 6 部从实体法维度规定的五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的主要罪行，是以香港本地既有法例为参照。

《条例》规定的一些罪行，是在香港本地既有法例内容的基础上完善而来的。《条例》第 2 部规定了有关“叛国及相关行为的罪行”，第 3 部规定了“有关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的意图及行动的罪行”，这两部就是通过完善《刑事罪行条例》第 1 部、第 2 部的有关内容制成。比如，叛国罪以既有的叛逆罪为蓝本，而煽惑叛变及离叛罪行也是参照既有条款加以完善，并加入了维护国家主

权及领土完整的明确含义。《条例》第4部规定有关“与国家秘密及间谍活动相关的罪行”，是通过完善《官方机密条例》中的两类对应罪行完成的。该条款参照既有法例的“非法获取”“非法管有”“非法披露”意涵，对“国家秘密”及“公职人员”的范围重新作出详细定义，以“境外势力”取代“敌人”这项既有法例中不明确的词汇，明确了“间谍活动”相关罪行所要打击的对象，旨在遏制香港一度泛滥的间谍活动。可见，《条例》是在完善香港本地既有相关法例的基础上，补齐维护国家安全的短板。

《条例》也有直接吸纳香港既有法例条文的内容，并在该部分强调了既有法例内对应条文的有效性。《条例》第58条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组织”罪行，参照了《社团条例》中的规管机制，直接援引了一些重要规定。《条例》第59条说明“本分部不影响《社团条例》的实行”，并在释义里直接借鉴《社团条例》所界定的“社团”来定性《条例》表述的“组织”含义。这是由于《社团条例》在基于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而禁止有害社团运作方面，被证实积极有效。典型实例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曾经在2018年依据《社团条例》取缔了屡次煽动“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条例》保留了《社团条例》对社团性质的界定意义。如此，香港特区政府对社团的规管在《条例》颁布前后几乎没有改变。

可见，香港特区政府是参照本地既有法例来完成《条例》立法，《条例》的具体条文也是按照本地普通法惯常用语编写，详细清晰且易读性高。上述举措可以降低立法过程中因创制全新条款而带来的时间成本，有助于解决在普通法地区实施新条例所衍生出的短期内判例不充分问题。《条例》将本地既有法例作为立法参照和内容来源，契合香港实际，能够增强香港居民及相关人员对《条例》的适应性及熟悉度，强化社会各界对《条例》的理解与支持。

第三，借鉴国外普通法地区现行法律，对接国际通例。为了维护香港一贯坚持的法治精神，给予执法、检控、司法等部门在秉公办案时拥有可参照的普通法依据，同时考虑到香港既有法律文件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不足，香港特区参考借鉴了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使《条例》的相关规定能够与国际接轨。普通法所遵循的国际通例在《条例》中得到充分体现。

《条例》所规定罪行的量刑标准宽严相济，不仅符合法治精神，也符合国际通例。例如，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案》第12条规定了有关破坏资产活动的罪行，对罪行的各类要素作出详细规定，界定“资产”这一概念的指涉范围，明确规定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与此类似，香港特区在《条例》第49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罪，写明罪行包括的各种要素，尤其是对“公共基础设施”作出详细定义，并同样明确规定可判处终身监禁。这表明，香港特区在《条例》中借鉴了其他普通法地区相近的定义标准与惩治措施。但是，《条例》参考普通法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沿用普通法制度下的法律草拟方式、技巧和习惯法规定，绝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审慎、详细地考虑香港实际情况，吸收经验，制定适合香港社会的法律文件。例如，对“隐匿叛国”这一在英国等普通法地区并没有以成文法方式进行定义的犯罪行为，《条例》第12条明确“本条将普通法下的隐匿叛国罪经适当改善而订为成文法条文”，制定成为更加完备的“披露他人犯叛国罪的规定”。这显示出《条例》能够在借鉴普通法立法理念的基础上，廓清普通法存在的模糊地带，明确适用对象、例外情况与罪行元素，使公众更清晰准确地理解该项罪行的确切内涵。

在规定相关罪行的效力范围方面，《条例》具有域外适用性。《条例》坚持普通法通常遵循的

属地管辖，同时加入属人管辖、保护管辖这两种域外效力。这一方面是参考英国、美国、加拿大等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定的域外效力，另一方面是回应《香港国安法》在罪行效力范围上具有的域外效力。而在执法权规定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在《公众咨询文件》中声明，《条例》拟参考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案》的相关执法措施。例如，参考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案》附表6规定，警察向司法机关申请羁押犯罪嫌疑人最长可达到14天，《条例》第75条也规定香港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从原来的最长48小时，可延长达到最长14天，但香港警方必须有裁判官的两次授权才能延长至最长羁押期限。可见，《条例》对警方执法权的限制、对当事人法定权利的保护，与其他普通法地区规定相类似，有机融合了国际通例与香港本地实际，符合立法宗旨及目的。

四、《条例》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主要举措

从适用范围上看，《香港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属于在香港特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而《条例》由香港特区制定出台，适用范围主要在香港特区之内，属于地方性法律^[22]。从法律位阶上看，《香港国安法》拥有高于地方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而《条例》属于香港本地的法律文件，其位阶相对较低，二者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因而《条例》的立法精神与法条内容不能与《香港国安法》相抵触。同时，《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时间早于《条例》，后者需要将前者作为制定依据，并结合前者实施后发现的问题予以完善。从内容上看，《条例》从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三个方面配合、补充和完善了具有上位法效力的《香港国安法》，并与《香港国安法》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

第一，对相关罪行细节规定的增补与完善。在实体法方面，《香港国安法》第3章已经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列明的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详细规定，所以《条例》没有对上述两类行为重复立法，而是对《香港国安法》没有涉及但《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指明应当立法的其他危害行为作出罪行判定及惩治的规定。至此，《条例》与《香港国安法》完全覆盖《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提出的七类罪行。《条例》共计9部，其中有4部分别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应当立法的罪行作出详细规定，在罪行种类设立上与《香港国安法》规定的罪行形成有机衔接。

为体现《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立法要求，《条例》在罪行具体细节方面增补了一些配合《香港国安法》的内容。“煽动叛乱”是《条例》第3部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相对应的立法事项。《条例》第3部将该事项细化为更具体的罪行及对应的刑罚措施，被列入叛乱、煽惑叛变、煽惑离叛、具有煽动意图的作为等4类罪行之中。这样，《条例》第3部所充实的内容，不仅仅完成了对“煽动叛乱”罪行的规定，也能够对《香港国安法》第21条、第23条所规定的煽动分裂国家行为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进行细化和补充。《条例》第52条至第57条规制“危害国家的境外干预”罪行，明确了配合境外势力的含义，列明了勾结境外势力带来干预效果的行动，说明了使用不当手段的含义。这可为《香港国安法》第29条订立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补充罪行规定细节以及检控依据，更全面地从境内与境外共同打击犯罪分子相互勾连的行为。

香港特区的立法工作以《香港基本法》第23条为底线依据，但没有局限于既有法律文件，而是

审视香港遇到的危害国家安全事件, 经过科学公开的论证程序后, 将当前或者未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纳入《条例》加以防范。《香港国安法》在第 2 章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予以说明, 是积极督促香港特区落实《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 完善相关法律, 同样没有限制香港特区对其他罪行实施管制。正如有学者所说, 如果香港特区有关部门能够研判香港目前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遇到的新情况、新需要, 对其他犯罪行为进行重点规制和针对性打击, 中央对此也持欢迎态度^[14]。

《条例》持有前瞻性思维, 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隐患, 将其一并列入立法事项。例如, 《条例》第 49 条对以损坏或削弱公共基础设施为表现的故意破坏活动进行规定, 填补了《香港国安法》第 24 条规定“恐怖活动罪”类型之外的破坏活动行为的管治空缺。《条例》第 50 条规定“就电脑或电子系统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作为”罪名, 为人工智能等网络新技术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设置防线。

第二, 对法律程序的衔接与兼容。《香港国安法》与《条例》需要在程序法上相互衔接、相互兼容。《香港国安法》第 41 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检控、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 适用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所以, 香港特区同时执行中央和香港本地两个层面的法律, 必然要求这两个层面法律之间相互兼容^[23]。《条例》第 7 部列出了事关刑事诉讼程序及保障执法机制的内容, 旨在保证两个层面的法律都得以在香港发挥应有效力。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执法人员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同伙通风报信、潜逃海外等棘手问题, 《条例》以成文法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弥补了这些漏洞。例如, 《条例》第 77 条规定羁押最长期限由原来的 48 小时延长至 14 天; 第 79 条对被拘捕人员咨询法律代表施加适当限制, 不得在被拘捕的首 48 小时内咨询法律代表。这两项举措是为了防止被拘捕人员通过法律代表或者因为羁押期过短被释放传播机密信息。第 81 条至 86 条规定裁判官可指示获释放候查的嫌疑人须遵从较为严格的行动限制令, 限制相关人员的居住地点以及交往方式。这些也是为了防范通风报信。

《条例》第 89 条至 96 条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作了规定, 其中第 89 条规定保安局局长“有权为针对某潜逃者施行措施而指明该潜逃者”, 可在符合特定条件情况下采取禁止提供资金、吊销其工作注册执业资格证书、撤销其香港护照等方式来阻断其潜逃出路。

《条例》第 7 部还从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维度优化原有诉讼程序, 这是将《香港国安法》第 5 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落到实处。《条例》第 104 条“提讯日的指定”、第 105 条“文件的译本”、第 106 条“省免初级侦讯”、第 107 条“被控人被交付审讯后不得申请未经聆讯释放”、第 108 条“解除对报导交付审判程序限制”, 均呈现了较为细化的诉讼规则, 明确指出其取代或者优先于香港《裁判官条例》《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相对应条款。香港原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未能给《香港国安法》的落实提供有利环境, 而《条例》上述条款的出台, 显示出《条例》已经对一些容易延误案件办理进程的既有规定予以完善, 致力于使事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及时的审理, 更好地保障被告人及时接受公正审判。

在法律实施的各个阶段, 《条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以配合《香港国安法》实施。《条例》第 99 条明确说明: “为免生疑问, 任何与本条例所订罪行相关的案件, 均为《香港国安法》第 41 条所述的案件, 《香港国安法》第 4 章所订程序, 适用于该等案件。”也就是说, 《香港国安法》第 4

章所订案件管辖、法律使用和程序，适用于《条例》所订罪行相关的案件。这样《条例》便以确认《香港国安法》上位法律效力的方式，适用后者规定的有关法律程序。《条例》第 100 条规定“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均由指定法官审理”，这是从本地法律层面明确落实并再次强调了《香港国安法》第 44 条有关指定法官的规定。《条例》第 109 条是“初步罪行的罚则”，提出了对串谋犯、煽动他人犯以及企图犯《香港国安法》所订罪行的惩治方案，明确了《香港国安法》对相关罪行的适用性。

第三，对公务人员的职责明确与权益保护。在组织法及相应的行政规管方面，《条例》强化了行政长官以及专责机构依据《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的职位能力与相应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有效实施《香港国安法》，《条例》第 110 条规定行政长官拥有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提议制定涵盖“执行细节”与“行政事宜”的附属法例，应对突发的安全问题^[19]¹¹²。《条例》第 111 条规定行政长官可向香港特区的任何部门或机关或任何公务人员发布行政指令，其中包括为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必需的权力、豁免、便利和配合。这使中央驻港国安公署能够与行政长官领导的特区政府协同合作，发挥中央与香港特区惩治犯罪活动的共同力量。《香港国安法》第 12 条至 15 条详细规定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国安委）的构成及职责等。《条例》进一步细化香港国安委主席及国安事务顾问这两个关键职位的职责，强调香港国安委依据《香港国安法》所作判断及决定必须得到香港特区所有部门的尊重与执行，明确香港国安委在涉及国家安全事务上具有相对香港其他机构的超然性。《条例》为香港国安委优化了职能行使环境。如此，《香港国安法》与《条例》、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与香港国安委形成“双法双机制”，必将有效发挥中央事权和特区责任双保险作用^[24]。

《条例》对香港特区公职人员及法院等相关部门提出了法律保障措施。《条例》第 113 条指出政务司司长可就国家安全教育等事宜提供意见或发出指示。这是对《香港国安法》第 9 条、10 条有关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宣传国家安全事宜职责的进一步确立。《条例》第 114 条规定“公务人员须协助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这明确了香港公务人员依法配合、保障、支持有关部门处理维护国家安全事务的责任，为《香港国安法》以及相关法律的实施提供了全港公务系统的协助范围。《条例》第 115 条、116 条补全了《香港国安法》没有完全明示的一些细节，解答了公众及相关机构的疑惑。其中第 115 条指出，特区行政长官可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就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发出证明书。法院在任何法律程序中收到上述类型的证明书，就相当于已经遵守了《香港国安法》第 47 条有关获取证明书的规定。第 116 条指出：法院与律政司依据《香港国安法》行使本机关所属的审理案件、刑事检控等职权时，不受任何干涉。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3 条以及第 2 章有关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职责的条款，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共同的责任。

《条例》出台上述条款，能够保障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配合、各司其职、高效公正地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

《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前，负责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人员曾遭到不法分子的恐吓、骚扰、威胁，公职人员个人资料也曾被非法披露。这阻碍了相关工作人员正常履职，干扰了相关职能部门发挥效能。对此，《香港国安法》与香港本地的既有法例缺乏具有明确针对性和足够震慑性的法律条款。《条例》保障了工作人员个人权利，为其提供安全的履职环境。《条例》第 118 条“非法披

王英津, 于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续建与完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6): 124-137.

露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或工作的人的个人资料”、第 119 条“对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或工作的人做出非法骚扰作为”、第 120 条“指明法院可应申请采取身分保密措施”、第 121 条“违反身分披露禁令的罪行”等规定, 使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及维护国家安全案件时没有后顾之忧。

五、《条例》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功能与挑战

《条例》在《香港国安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建立健全了香港国安制度体系。《条例》对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由于《条例》本身的特点, 以及制度衔接、体制配套、国际环境等方面原因, 《条例》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一) 《条例》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功能

第一, 进一步优化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制定出台《条例》, 是“爱国者治港”在《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宪制框架内法律化、制度化的一项必要之举^[25]。《条例》的实施, 使香港社会政治生态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已经大为改善的基础上, 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和巩固。《条例》从多方面建立起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理依据, 为“爱国爱港”政党和政团的不断壮大筑牢了合法性基础, 而“逢中必反”的极端反对派则在香港公权力机构、社会团体中基本丧失了合法生存空间。香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2024年11月19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 此案是香港首宗颠覆国家政权案件, 45名反中乱港分子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

第二, 进一步保障香港行政主导型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香港特区政府与立法会的关系回归正轨, 由《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确立的香港政治体制架构基本稳固。随着广大“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的政治机构中占据优势, 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的“拉布”现象消失, 立法与行政掣肘的局面得以解决。众多利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法案得以高效通过, 行政部门能够集中精力高效执行政策, 香港社会走出了民粹化、泛政治化的困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中央对香港特区实行管治的主要途径和抓手, 只有强化行政长官的领导, 才能确保香港特区政府敢于担当、善作善成^[26]。《条例》通过第110条、111条、115条等直接赋予或完善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定职权。这再次明确了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区政治制度中的相对重要地位, 强化了行政长官担负香港特区“当家人”的责任与能力。

第三, 进一步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条例》的出台, 标志着中央与香港特区共同建构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首先, “一国”权威得以继续巩固。中央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等方式, 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创造条件, 同时督促香港特区及时履行法定宪制责任。《条例》将维护“一国两制”作为最高原则, 遵循了《香港基本法》的内涵精神, 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27]。其次, “两制”的制度优势得以继续发挥。香港特区因接受中央授权而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权, 且在中央监督下完成了立法任务, 使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得以落实, 这是“两制”的独特优势。

(二) 《条例》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挑战

第一, 对非传统安全风险关注不足。相较而言, 《条例》更聚焦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传统安全风险, 而淡化了对非传统安全风险防范与惩治的关注。《条例》出台之前, 《香港国安法》《刑

事罪行条例》《公安条例》等，关注点多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较少触及诸如经济、金融、网络等非传统安全领域^[28]。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重申了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之中的上述重要地位。这些有利于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优势领域，恰恰存在着较大的非传统安全风险隐患。这类风险一旦出现，会波及香港特区的经济社会秩序乃至影响国家的总体对外开放格局。对于非传统安全风险，香港特区可以考虑通过特别立法方式，以独立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29]，或对《条例》进行修订。

第二，反干涉反制裁的制度机制不够健全。《条例》在导言部分对“境外势力”作了详细说明，规制了一些境外势力破坏国家安全的罪行，惩治范围也具有域外效力。然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无理制裁、干涉、“长臂管辖”等政府行为，《条例》没有专门的应对性条款。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尚没有制定反干涉反制裁的法律文件，没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中，也没有行使属于高度自治范畴的立法权，即制定禁止香港居民遵守外国有关法律、法规的阻断性条款^[30]。这样香港特区面对西方国家的干涉制裁时，时常显得被动。党中央准确研判新形势作出新部署，要求在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方面，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31]。香港特区在处理关乎国家安全案件以及修订相关法律文件的过程中，需要以战略眼光与底线思维去研判外部势力制造的潜在风险，不断完善《条例》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积极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对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带来的长期挑战。

第三，文本表述的个别概念仍有些模糊。与英文版本相比，《条例》中文版本的个别表述相对抽象拗口，有待进一步明晰。实际上，在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第一次尝试落实《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就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法例草案存在“法律文字须统一、严谨、规范”“错解词语将引起争议”等文本表述问题^[32]。2024年出台的《条例》与2003年刊印的条例草案相比，在文字表述的简洁清晰性、词汇释义的严谨规范性、文本结构的整体统一性等方面，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完善，但仍有个别词汇需要斟酌。例如，第35条“非法披露国家秘密”使用了“披露”一词，是否可以优化为“泄露”来显示犯罪的严重性。再如，第79条与80条是限制相关人员咨询律师，但该条款所限制对象的主语为模糊的“某人”，这样就缺乏明确的专业法律术语，容易引起歧义。

六、《条例》完善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未来路径

《条例》与《香港国安法》在香港共同实施，形成“双法双机制”，这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面对新情势、新挑战，中央会继续支持香港特区在高度自治范围内完善《条例》，香港特区也应与时俱进地修订和优化《条例》。

第一，与时俱进完善条款内容。《条例》的出台并不意味着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努力就此止步，香港特区仍需根据新情况不断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体系^[33]。今后香港特区可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进一步完善《条例》。首先，直接对《条例》的个别条款进行适当优化或补充。按照既定法律程序对法例进行修订是香港特区的惯例。对《条例》进行修改与完善，应立足与《香

港国安法》的衔接与协调^[34]。其次, 依据《条例》第 110 条的规定, 由行政长官依法牵头制定附属法例, 细化《条例》的执行措施。附属法例有自身特点, 只能制定一些行政措施和细则, 不能超过主体法例的权力范围和法律效力, 不能增设主体法例没有规定的主要罪行^[35]。再次, 根据《条例》第 8 条, 制定其他香港本地法例作为补充。立法时应坚持整体性、一致性原则, 确保任何法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规定均与整个国安法律体系保持和谐^[36]。

第二, 建立健全配套法律文件。为推进《条例》的有效实施, 香港特区有必要创制或修订一些辅助其落实的配套性法律文件。香港特区有关部门曾在 2020 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通过订立一些新法例、新附属法例等法律文件来更好地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 涉及电话通讯、电影检查、个人隐私保护、社会工作者守则等领域^[37]。目前, 《条例》第 9 部的内容是对《刑事罪行条例》《社团条例》《官方机密条例》等与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现行法例进行必要修订后所形成。香港特区应根据需要及时修订各项本地法律文件, 使现行法例配合支撑《条例》施行。

第三, 中央引领建构协调机制。《香港国安法》与《条例》相继生效, 我们需要关注两部法律文件、两种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配合。中央与香港特区两个层级的维护国家安全机构如何开展合作办案等事项, 需要更为精细化的法律依据。《香港国安法》创制了两种并行的管辖机制, 即中央刑事管辖机制和香港特区刑事管辖机制^[38]。《条例》第 8 部对香港国安委等机构的执行机制予以较为充分的完善, 但香港特区无权依据地方层面法律来调整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在香港特区行使刑事管辖权力的具体细节。这就是说, 香港特区无法单方面完善两套机构的协调机制。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53 条的表述含义, 两套机构在建立与协调运作的整个过程中,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居于主导地位, 是监督与指导的主体^[39]。中央应主动以细化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的工作方案为抓手, 制定有关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与香港国安委的细节性协同合作机制, 保证两种执行机制有序运行。

第四, 全面夯实民心基础。香港居民在理解、配合、支持《条例》的观念及行动上还存在提升空间, 这需要对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继续加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宣传教育。《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文件, 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40]。香港特区政府还在社团、媒体、网络监管等领域出台或者修订条例, 全面宣传维护国家安全的观念, 纠正少数香港居民的错误认知。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人心工程。香港特区政府要在《条例》出台后, 继续做好对香港居民的解释工作, 强化国家安全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使《条例》获取更多香港居民的理解与支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对香港有深刻影响。香港社会各界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and 部署上来, 这样才能更好地完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中央明确了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香港作为内地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 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整体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应责任。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 中央需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在高度自治范围内完善《条例》, 确保香港特区的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香港特区需要依靠由《香港国安法》与《条例》等法律文件建构起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应对风险挑战、防范潜在隐患, 以香港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12.
- [2] 程洁. 香港新宪制秩序的法理基础: 分权还是授权 [J]. 中国法学, 2017 (4): 88-103.
- [3] 陈明辉. 我国央地分权的模式及类型 [J]. 地方立法研究, 2021 (4): 25-43.
- [4] 刘诚, 许书咏. 中央保留原则下的《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 [J]. 当代港澳研究, 2013 (1): 131-137+141.
- [5] 黄志勇. 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合理性——以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为视角 [J]. 政法学刊, 2012 (6): 34-41.
- [6] 祝捷, 秦玲. 论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责任划分——基于《香港国安法》第 3 条的分析 [J]. 港澳研究, 2022 (1): 3-12+93.
- [7] 田飞龙.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成效、法理正当性与制度前景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5): 56-73.
- [8] 卢雯雯, 邹平学. 香港现行法律和基本法第 23 条的关系: 兼论适应化立法路径的可行性 [J]. 港澳研究, 2019 (3): 24-34+93-94.
- [9] 刘保钰.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实现权宜路径探析 [J]. 社科纵横, 2018 (7): 50-58.
- [10] 祝捷, 章小杉. 主权、国家安全与政制改革: “港独”的《基本法》防控机制 [J].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4): 12-19+125.
- [1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3.
- [12] 周叶中, 张小帅.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J].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4): 5-11+125.
- [13] 叶海波. 香港特区基本法第 23 条的法理分析 [J]. 时代法学, 2012 (4): 104-109.
- [14] 马发腾, 邹平学. 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谋划《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工作的思考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3): 67-77.
-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文件汇编 [G].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3: 79.
- [16] Tetsuro Kobayashi, Jaehyun Song, Polly Chan. Does repression undermine opposition demands? The case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J].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1 (2): 281-283.
- [17] Francis LF Lee, Chi-kit Chan. Legalization of press control under democratic backsliding: The case of post-national security law Hong Kong [J].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23 (5): 927-929.
- [18] 田飞龙.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香港 23 条立法的制度正当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51-165.
- [19]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 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文献汇编 2024 [G/OL]. (2024-06-08) [2024-09-20]. https://www.doj.gov.hk/tc/publications/pdf/NSL_Booklet_Articles_and_Reference_Materials_on_NSL_2024_c.pdf.
- [20] 吴英鹏.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科学完备且刚柔并济, 树立普通法世界高质量立法典范 [G] // 苏健伟. 筑牢安全根基 加快由治及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评论荟萃. 香港: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2024: 188.

王英津, 于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续建与完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24-137.

- [21] 李晓兵. 香港国安立法不会损坏自由权利 [G] // 苏健伟. 筑牢安全根基 加快由治及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评论荟萃.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4: 164.
- [22] 康玉梅. 23 条立法是对《香港国安法》的有效衔接 [G] // 苏健伟. 筑牢安全根基 加快由治及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评论荟萃.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4: 166.
- [23] 刘林波. 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衔接、兼容、互补” [EB/OL]. (2024-04-26) [2024-09-20]. https://zijing.com.cn/article/2024-04/26/content_1233464877642678272.html.
- [24] 郑雁雄. 落实“双法双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EB/OL]. (2024-04-15) [2024-09-20]. https://zijing.com.cn/article/2024-04/15/content_1229454664469270528.html.
- [25] 郭天武, 李峥. “爱国者治港”的理论证成与实践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3): 117-129.
- [26] 卢文端. 23 条立法的香港路向 [G] // 苏健伟. 筑牢安全根基 加快由治及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评论荟萃.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4: 208.
- [27] 张建. “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镜鉴 [J]. 闽台关系研究, 2024 (2): 14-23.
- [28] 周文港. 筑牢国安屏障 体现人心所向 [G] // 苏健伟. 筑牢安全根基 加快由治及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评论荟萃.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4: 115.
- [29] 李浩然, 尹国华, 王静. 国安法 廿三条 安全与自由? ——国家安全法之立法及比较研究 [M].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0: 51.
- [30] 杨俊彦. 论《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之路径 [J]. 国际商务研究, 2023 (6): 72-83.
- [3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42.
- [32] 王友金. 23 条立法论丛 [M]. 香港: 明报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2004: 25-28.
- [33] 冷铁勋. 《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辅相成 [G] // 苏健伟. 筑牢安全根基 加快由治及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评论荟萃.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4: 171.
- [34] 朱国斌, 杨雨辰. 《香港国安法》与香港法律制度: 对比、分析与思考 [G] // 朱国斌, 韩大元, 王江雨, 等. 香港国家安全法: 法理与实践.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1: 27.
- [35] 汤家骅. “附属法例”是普通做法 不会超越主体法例规定 [N]. 大公报, 2024-03-25 (10).
- [36] 叶海波.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制定与实施 [G] // 何建宗. 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的十大议题: 回顾与前瞻.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4: 182.
- [37]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基本法》法律论坛汇编 [G/OL]. (2022-05-27) [2024-09-20]. https://www.doj.gov.hk/sc/publications/pdf/HKSAR_25th_Anniversary_Legal_Conference_on_Basic_Law_Proceedings_sc.pdf.
- [38] 孙潇琳. 香港国安案件刑事管辖机制的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73-83.
- [39] 韩大元, 朱国斌, 黄明涛, 等. 《香港国安法》逐条释义 [M].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3: 347.
- [40] 王振民, 黄风, 毕雁英, 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读本 [M].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4: 124.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 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

韩碧舟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二者都规定了域外刑事管辖内容。无论哪一国的公民在哪一国境内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都要接受《香港国安法》的管辖。《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域外刑事管辖规定不仅普遍适用于各类参与相关犯罪活动的外逃人员，还在特定条件下对来自或位于任何国家的个人或组织发生效力。在比较视野下，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呈现法律因素与政治因素相互交织的鲜明特点，实施管辖的国家需要克服重重阻力，在有限范围内寻求解决之道。我国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推行域外刑事管辖，面临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难以实现、国内不同法律有关域外刑事管辖权规定不够匹配等挑战。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主导性力量推动制度运行。在制度的完善路径方面，我国要采取内紧外松的策略，将罪名中性化推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通过惩治与威慑相结合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还要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多方共赢的域外刑事管辖国际规则。

关键词：“一国两制”；国家安全；香港国安法；域外刑事管辖；引渡；“长臂管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6-0138-14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6.013

作者简介：韩碧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17ZDA109）

引用格式：韩碧舟.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6）：138-151.

一、问题的缘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定位作出系列部署,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寄予的殷切期望。《决定》指出:“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1]在《决定》落实过程中,香港在我国对外开放当中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必将得到加强和升级,但香港所面临的各种国家安全风险和威胁也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并反过来干扰香港由治及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为了保证“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在未来持续发挥更大效能,一套行之有效的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尤为关键。香港连通内外的枢纽地位决定了涉港国家安全案件中包含大量涉外因素,许多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外逃人员和外部势力很难得到惩治。要解决我国涉港国家安全治理面临的这一问题,必须有立法保障和实践智慧,形成一套能够跨国运行的制度体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立法委员们就意识到了遏制境内外势力合流的问题。《香港基本法》第23条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专门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应立法“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在极端反对派的阻挠之下,《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迟迟未能落实。这反过来也给极端反对派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香港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我国国家安全在香港持续遭到各种形式的冲击,其恶劣影响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和生效立竿见影地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依然面临诸多任务和挑战,包括对相关外部势力以及外逃人员的管辖权问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36至38条的规定,该法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任何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规定的犯罪;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实施的该法规定的犯罪;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规定的犯罪。概而言之,无论哪一国的公民在哪一国境内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都要接受《香港国安法》的管辖。

2024年正式落实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中有多个条款规定了域外管辖问题。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完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障碍得以扫清。2024年1月30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短短数周之内迅速完成了立法公众咨询、首读、二读、三读程序,于3月19日在立法会上得到全票通过,于3月23日刊宪公布实施。《条例》关于域外管辖的规定散见于不同部分,内容比《香港国安法》更为细致、具体。《条例》第9条规定:“除非条文另有规定,本条例所订的罪行适用于在特别行政区的所有人。如某罪行具有域外法律效力,该域外法律效力在相关的部内订定。”而在规定具体罪行的《条

例》第2至6部中，不同罪行对于有一定交集但又不尽相同的群体具有域外效力。《条例》中绝大多数罪行的域外效力适用于“属中国公民的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特别行政区居民”“在特别行政区成立、组成或注册的法人团体”以及“不论是法团抑或不是法团的在特别行政区有业务地点的团体”中的一类或若干类。不过，根据《条例》第51条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相关行为的“任何人”都受《条例》管辖。概而言之，《条例》中的域外管辖规定不仅普遍适用于各类参与相关犯罪活动的外逃人员，还在特定条件下对来自或位于任何国家的个人或组织发生效力。

《香港国安法》和《条例》被赋予如此广阔的管辖范围，一方面在制度层面清除了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顽固死角，另一方面也为法理阐释和实践操作提出了重大挑战：当涉嫌犯罪的极端反对派人士逃往他国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从事非法活动，或者外国组织、个人在涉港问题上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我国该如何使以上两部法律规定的管辖权真正发挥作用？又该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尊重他国主权和公民人权？

关于建设与实施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管辖制度，学界既有研究已经完成一定基础性工作，但尚未形成规模且不够深入，有待更多研究工作的跟进。有学者较为详尽地考察了《香港国安法》第38条的立法基础和适用难题，并提出我国应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从国家利益的基点出发，采取刑事司法合作、个案移交、依靠国家实力推进、借鉴外国实践等多样化解决方案^[2]。该项研究内容丰富且思路灵活，但仅聚焦于《香港国安法》第38条展开，从而将“《香港国安法》域外效力”局限于该法对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域外实施犯罪的效力，无法涵盖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实施犯罪后外逃等典型情况。此外，由于依据《香港国安法》或《条例》实施的域外刑事管辖尚未形成普遍实践，因此一些学者从比较视野考察了实施管辖的正当性与可行性。例如，有学者通过美国通缉、引渡本国公民斯诺登（Edward Snowden）以及澳大利亚公民阿桑奇（Julian Assange）等案例证明，在涉港国家安全案件中对域外主体实施刑事管辖权符合国际通行实践^[3]。还有学者比较了《条例》中域外效力条款的合理规定与美西方单方面实施“长臂管辖”之非法性、干预性之间的根本区别^[4]。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法律解释，特别是立法合理性论证层面的工作，未在制度困境与解决方案上过多着墨。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研究有待于从现实困境出发，综合考察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相关规定形成的制度体系，并充分借助比较视野展开。笔者将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多种国家安全案件域外刑事管辖制度进行考察，挖掘其中的问题，分析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实施域外刑事管辖所面临的对象与阻力、所能依赖的主体和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施管辖的若干思路。

二、比较视野下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以国安案件为中心

目前，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丰富经验，我们需要打开比较视野，提炼既往域外刑事管辖实践经验而获得启示。域外刑事管辖是一个涵盖范围广阔、边界不甚明晰的领域，除了国家安全议题之外，还可能涉及金融诈骗、洗钱、毒品走私等多个领域的犯罪，此处仅分析典型议

题和案例。

(一) “域外刑事管辖”的界定与辨析

除刑事领域外, 民商事、人权、环境等领域也广泛存在域外管辖的制度与实践, 所以“域外刑事管辖”是真包含于“域外管辖”的属概念, 具有域外管辖的基本属性。这里的讨论将从一般性的“域外管辖”定义过渡到专门的“域外刑事管辖”。前任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罗萨琳·希金斯(Rosalyn Higgins)认为: “从逻辑上讲, 所有不是根据属地原则而行使的管辖权都是域外管辖权。”^[5] 根据希金斯的定义, 属地原则指“一国可以制定法律并将它们适用于其领土内的人或事”^{[5]56}。这里的“人”包括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和各类组织等实体, “事”指的是可能或已经引起管辖对象权利、义务或责任发生变动的客观事实。根据以上界定, 域外刑事管辖可被界定为“一国对其领土外的人和事适用本国刑事法律的制度”。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定义进行说明。

首先, 笔者所讨论的域外刑事管辖概念中, 实施管辖的主体仅包括主权国家, 因此“域外”也仅限于该主权国家领土之外。诚然, 许多国家都存在拥有刑事立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地方政府, 这些地方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会对本辖区外的人和事实施刑事管辖权, 但在国家安全领域, 即使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管辖, 其管辖行为所体现的也必然是中央政府的主权意志。因此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本文在讨论涉港国家安全问题时使用的“域外”一般指我国领土范围之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视角下, “域外”一般指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特定法域之外, 既包括其他国家领土或公海、外空等区域, 也包括我国内地、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香港国安法》和《条例》的域外效力条款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规定。不过, 限于我国领土范围内不同法域之间发生的刑事管辖属于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合作范畴, 其运行的基本逻辑与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的刑事管辖存在根本区别, 因此本文并不涉及这部分内容。还需作出解释的一个相关问题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权同外国以缔约等方式进行交往活动, 能够作为一个重要主体甚至主导者参与特定的域外刑事管辖案件, 但其所实施的权力源于我国中央政府的授权或许可, 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具体案件中的高度自主性并不代表我国中央政府作为管辖主体地位的丧失。

其次, 笔者讨论的域外刑事管辖既包括一国对领土外个人或组织的管辖, 也包括一国对发生在领土外事实的管辖。在这里需要特别对“域外刑事管辖”与“刑事法律的域外效力”作出区分。由于各国对于犯罪行为或结果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犯罪当然地具有管辖权, 因此刑事法律中对域外效力的规定一般聚焦于发生在一国领土外的犯罪, 而不是位于一国领土外的人。然而在域外刑事管辖的讨论中, 如果不考虑管辖对象所在地而只考虑犯罪地, 将会遗漏一国实施境外追逃的重要情形, 从而使讨论的价值大大降低。《香港国安法》和《条例》都是首先规定了对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犯罪实施的属地管辖, 然后通过若干域外效力条款对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犯罪进行规定。相较而言,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所关注的“域外”是我国领土之外, 所关注的对象既包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相关犯罪后逃往外国的情形, 也包括位于外国的个人或组织实施相关犯罪的情形。在《香港国安法》和《条例》当中, 域外效力条款和域外刑事管辖制度固然存在大面积重叠部分, 但彼此远不能完全涵盖对方, 不能将二者相互混淆。

最后, 在概念层面另一个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域外刑事管辖”与“刑事领域的长臂管辖”的关系问题。“长臂管辖”与“域外管辖”是一对颇有渊源的概念, 在使用过程中非常容易混淆。

狭义及原本意义的“长臂管辖”指美国州级管辖权划分过程中一州法院对另一州主体和事项进行管辖。然而自 20 世纪中叶起，长臂管辖开始越来越多地指美国法院对美国境外主体和事项实施的管辖，并进一步指一国公权力机关对本国境外主体和事项的管辖。在学术讨论中，“长臂管辖”这一词汇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它为了追求形象化的描述而放弃了概念的严谨性，并且因为形象化特点容易被赋予鲜明的贬义和批判立场。加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往往打着“司法管辖”旗号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更加剧了这个概念的负面形象。相比之下，“域外管辖”概念没有这种“负面形象”的包袱，更具包容性。从我国角度来看，我国同时面临反制恶意“长臂管辖”和主动对境外实施公平、正当管辖的双重任务；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各国国家权力的行使跨越边境彼此交织的趋势不可避免，关键在于引导相关制度走向公正化。因此，本文在讨论刑事法律超越国界的现象时采用更中性、更具包容性的“域外刑事管辖”，而非“刑事领域的长臂管辖”。

（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及其限制

引渡指一国受他国请求，将位于本国境内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移交给请求国的一系列制度与措施。尽管域外刑事管辖并不等同于引渡，但关于域外刑事管辖的讨论需要借助引渡作为基点展开。当一国试图对位于本国领土之外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时，最常规、最具合法性的途径就是引渡。然而，引渡制度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正是为一些国家安全案件所设置。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指当一国基于政治见解引发罪名向他国提出引渡特定人员的请求时，被请求国有权拒绝。这项原则的发展经历了从泛化到式微的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政治犯”被赋予追求自由民主的“正义反抗者”身份和受到保护的特权。然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政治见解的表达常常伴随着具有破坏力的恐怖主义活动，且越来越多“政治犯”的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自身。西方国家将恐怖主义犯罪中性化，“政治犯不引渡”也在许多西方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中被取消^[6]。例如，2004 年欧盟在引渡领域推行的“欧洲逮捕令”制度就取消了“政治犯不引渡”的规定。

即使在取消“政治犯不引渡”的国家之间，嫌疑人所在国出于对干涉他国内政的忌讳，也往往不会轻易移交嫌疑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 2017 年 10 月举行“独立公投”并导致该区自行宣布“独立”，积极促成公投的加泰罗尼亚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被西班牙检察机关以“叛乱和煽动叛乱罪”起诉。他开始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逃亡。西班牙司法机关发布国际通缉令，并陆续向相关国家提出引渡请求。实际上，西班牙本就是 2004 年欧盟推出欧洲逮捕令时废除“政治犯不引渡”的坚定支持者^[7]。西班牙在提出引渡过程中为普伊格德蒙特确立的罪名除了叛乱罪之外，还包括更加中性化的挪用公款罪。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及其相关成员国依然给西班牙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引渡始终未能成功。2024 年 3 月，西班牙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投票表决批准了赦免 2017 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公投”发起者的法案。2024 年 8 月初，普伊格德蒙特释放出返回西班牙的信号。虽然他的“叛乱”罪很可能得到赦免，但西班牙司法机关依旧试图以挪用公款罪追究他^[8]。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犯”引渡案例还包括美国对“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的追究。澳大利亚公民阿桑奇自 2006 年创办“维基解密”网站后，陆续在该网站公布大量表明美国政客干涉他国内政、美军在他国实施暴行等事实的资料。美国政府遂提出阿桑奇危害美国

国家安全并试图推动相关国家抓捕阿桑奇。自2012年8月起,阿桑奇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接受庇护。2019年4月,厄瓜多尔撤销庇护,阿桑奇被英国方面拘禁。2024年6月26日,阿桑奇结束了此前在英国的多年监禁后,来到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首府塞班岛,在当地的美国联邦法院庭审中承认自己通过线人窃取美国机密的行为违反美国《间谍法》。根据美国司法部与阿桑奇此前达成的协议,作为阿桑奇认罪的交易,美国承认此前阿桑奇被英国监禁的时长已经作为刑期被折抵,因此放弃对阿桑奇的引渡^[9]。另据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和外交部长黄英妮(Penny Wong)在阿桑奇被英国释放后的发言,阿尔巴尼斯自2022年上任就主动联系美英两国领导人推动阿桑奇案的解决^[10]。

(三) 争议性管辖措施的运用与危害

当引渡不足以满足需求时,有些国家会选择包含非常规手段的管辖措施作为引渡的替代措施,以实现特定个人和行为的惩罚。引渡有两种替代性措施,一是遣返、驱逐出境或使在逃人员在其躲藏国接受刑罚等措施,二是绕过正式法律框架采取跨国绑架或跨国诱捕等措施。后者争议较大,被称为“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11]。跨国绑架和跨国诱捕都是一国采用强制手段在他国领土内的逮捕行为,逮捕对象可以是他国公民,也可以是外逃的本国公民。一般而言,跨国绑架或跨国诱捕成功后,管辖国都会进一步采取特定手段将被捕者转移回本国进行起诉和审判,从而实现与引渡相同的效果。然而,正是此类制度和措施的非常规特点,特别是对相关国家法律和主权的无视乃至践踏,使其充满争议。

跨国绑架指一国以逮捕特定人员回国审判为目的在另一国领土范围内实施绑架行为。主流国际法学界认为应当将跨国绑架行为本身与国家特定罪行和罪犯的管辖权区分开来。例如,布朗利(Ian Brownlie)提出:“作为非法抓捕罪犯的结果,可能产生国家的国际责任,但这种对法律的违反并不会影响国家对他们行使管辖权。”^[12]域外刑事管辖发展史上著名的艾希曼案就是基于上述强行区分的逻辑而得到解决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曾任纳粹德国犹太保安总局犹太处处长,在德国战败后逃往阿根廷。建国后的以色列通过情报机构“萨摩德”了解到艾希曼的行踪后,于1960年5月派出特工前往阿根廷,成功捕获艾希曼并骗过阿根廷哨兵和海关人员的检查,将艾希曼转移至以色列。艾希曼最终被以色列法院判处死刑。阿根廷在得知艾希曼被转移的消息后随即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安理会于1960年6月23日作出的第138号决议认定以色列行为侵犯阿根廷主权,但艾希曼的纳粹罪行应受追究,要求以色列对阿根廷作出适当补偿。此后,阿根廷和以色列两国政府发布联合声明称争议已经解决。

在1992年“美国诉马查因”案判决中,美国法律正式确立了该国法院对跨国绑架前提下的案件具有管辖权。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墨西哥两国政府在墨西哥联合缉毒期间,美国一名禁毒特工被毒贩团伙雇佣的医生阿尔瓦雷斯·马查因(Alvarez-Machain)以注射过量药物的方式谋杀。美国政府并未向墨西哥提出引渡,而是直接派人蒙面劫持马查因,并将其送往美国。在经历几番司法拉锯战之后,案件来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美墨两国的引渡条约并未禁止跨国绑架,国际习惯法当中也没有禁止跨国绑架的规定,即使绑架可能违反一般国际法也无法排除美国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5] 71}。该判决引发墨西哥方面的愤怒和抗议,美墨关系也因此长期陷入低谷。跨国绑架的特点在于绑架发生前保密性较强,逮捕对象及其所处国家均不知情,因此对他国主权的侵犯

更为直接。

跨国诱捕是通过欺诈手段使逮捕对象主动前往本国或第三国的特定地点，管辖国往往与第三国提前达成了引渡方面的合作。这就造成了一种合法的假象，使跨国诱捕具有较强的迷惑性。2007至2010年间，两起我国公民在外国被诱捕的案件发生。一是袁宏伟案。2007年9月，一起中美企业间的商标权纠纷案件在我国两家法院分别审理。中方企业湖南神力公司董事长袁宏伟受美国爱宝公司邀请赴英国谈判，在飞机抵达伦敦、刚刚落地后，袁宏伟就被英国警方依据一纸美国出具的临时逮捕令逮捕。袁宏伟此时才发现自己遭到诱捕，并进一步得知美国司法部门早在2005年就以多项罪名对袁宏伟发出逮捕令。在袁宏伟保释期间，美方向英方提出引渡袁宏伟，而我国驻英使馆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交涉但未获得积极成果。不过，袁宏伟在英国当地法庭就本案进行第三次听证前悄然回国。二是宪宏伟、李礼案。2008年底至2010年间，我国公民宪宏伟和李礼与一家英国公司洽谈芯片销售合作项目，美国特工伪装成供货方长期与二人保持联系。2010年9月，按照与“供货方”商定的时间、地点，宪宏伟、李礼前往匈牙利准备提货，却进入美国特工连同美国司法部和匈牙利政府共同设下的圈套，二人在匈牙利的机场被捕。宪宏伟、李礼被捕后第二天，匈牙利法院在中国大使馆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庭审理美国请求引渡二人的事宜，并最终判决引渡条件成立。

除了跨国绑架和跨国诱捕之外，还存在一些采取更加隐蔽或残酷手段实施的域外刑事管辖措施。例如，美国在反恐领域实施的“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措施建立起一套跨国合作网络，在网络内部秘密逮捕和引渡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并在各关押基地对他们任意实施酷刑^[13]。此类措施的存在向世人展现出域外刑事管辖的底线完全有可能低到惊人的程度。各国有必要通力合作，按照主权平等原则与人权原则对此进行约束。

（四）比较与启示

当国家安全治理需要采用域外刑事管辖时，法律因素与政治因素总是在跨国空间内紧张地交织。具体而言，由于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以及国家安全议题的敏感性，政治因素常或明或暗介入法律程序，而案件的具体走向既与各当事国、当事人的实力对比和在案件中所采取的策略密切相关，也受到来自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的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管辖的国家必然遭遇极大阻力，往往会凭借自身力量兼法律手段与政治手段来推动案件解决，其中一些国家在部分案件中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采取破坏国际法治、无视他国主权以及践踏人权的非常规管辖措施。

在我国刑事管辖权主动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需要在研判阻力和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寻求实现管辖目的的方法。下文将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我国实施域外刑事管辖面临哪些阻力？我国能够凭借哪些方面的力量进行制度建构与运行克服这些阻力？在阻力和动力相互作用形成的有限行动空间中，我国应当选择怎样的方法和策略兼顾各方安全与权利？

三、制度实施面临的内外挑战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域外刑事管辖制度直接指向两大群体——逃亡海外的极端反对派人士及其海外支持者，针对这两部分群体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面临多方面挑战。此外，《香港国安法》关于域外刑事管辖的一些规定与我国其他法律规定尚不总能有效衔接，存在结构性障碍。

(一)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难以实现

涉港国家安全问题从不是单纯的央地关系问题, 始终伴随大量外国因素的深度介入。这使得涉港国家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内政范畴而进入对外关系领域。2021年9月24日, 我国外交部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列举了五类百余种由美方发起或参与的乱港行径。尽管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 极端反对派及其国外支持者的“内外合流”局面得到有效遏制, 但涉港国家安全治理面临的外部阻力并未因此消失, 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 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陆续宣布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止此前签订的引渡条约。为反对这些国家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 我国也宣布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暂停与这些国家的刑事司法互助协定。2023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8名通缉犯, 从他们所逃往的目标国家来看, 全部是与我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暂停刑事司法合作的国家, 而这些国家当局普遍对我国崛起的事实以及我国意识形态抱有抵触甚至敌视态度。

在涉港且涉外的国家安全案件中, 我国不仅难以实现同相关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 还有可能反过来遭遇这些国家的各种施压手段。随着我国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当中推出域外刑事管辖制度并逐步落实, 舆论压力和多种形式的域外制裁不断增加。例如, 美国商务部在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通过当天, 声称将取消对香港的出口许可豁免等方面待遇; 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8月宣布制裁包括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10名香港官员; 2023年5月, 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中国委员会共同发布一份报告, 提议对香港审理国家安全案件的29名法官提出制裁。此外, 相关国家还会借着司法和国家安全的旗号, 在涉港事务上任意骚扰、逮捕和拘留相关人员。例如在2024年5月13日, 英国警方声称3名人员“涉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情报部门提供协助并将宣布对其起诉, 此举遭到我国驻英大使馆的强烈谴责^[14]。

(二) 《香港国安法》与《刑法》保护管辖条款存在差异

《条例》刊宪生效之后,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遵循“一致性”原则展开, 从《香港基本法》到《香港国安法》, 再到《条例》等法律体系具有内在一致性^[15]。然而, 从内部制度建构来看, 《香港国安法》第38条的保护管辖条款存在着与我国现有管辖权制度体系不够匹配的问题。保护管辖原则在我国刑法语境中指“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其在国外的犯罪行为只要侵犯了本国利益或本国公民的法益, 就适用本国刑法”^[16]。我国《刑法》第8条规定: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 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可以适用本法, 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相比《刑法》第8条, 《香港国安法》第38条既没有法定最低刑期的限制, 也不受犯罪地是否有近似规定的限制——实际上外国法也不可能处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有学者分析指出, 《香港国安法》之所以没有像《刑法》那样在保护管辖条款上做出最低刑期和犯罪地的限制, 主要是因为《香港国安法》规定的犯罪危害较大, 而《刑法》中罪名繁多且涵盖许多轻罪^[17]。

单从立法角度来看, 两部法律的规定不一致似乎并不存在问题。根据我国《立法法》第103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 适用特别规定”。在制定机关方面, 《刑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 《香港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授权制定的, 二者的制定机关相同。在规定的性质方面, 《刑法》第8条原则上适用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土外对我国实施的任

何犯罪，在《刑法》第8条所覆盖的属人和属地范围之内，《香港国安法》第38条仅适用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土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因此，前者属于一般规定，后者属于特别规定。在涉港国家安全案件中需要对外国人在我国之外实施的犯罪进行管辖时，我国内地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均应当优先适用《香港国安法》第38条的规定，在定罪时无需考虑罪名最低刑期和犯罪地所在国的规定。

尽管这两条规定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能够实现协调，但如果将视野扩大，依然存在标准不一之处。同样是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为什么仅仅对那些从事涉港国家安全犯罪的外国主体采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中的保护管辖条款应当在国家安全犯罪方面向《香港国安法》看齐，取消最低刑期和双重犯罪原则的限制^[18]。在两部法律对于国家安全犯罪保护管辖规定尚未实现一致之前，《香港国安法》第38条的实施固然不存在法理上的瑕疵，但可能造成我国总体层面国家安全治理上的失衡，反过来影响涉港国家安全治理。

四、制度实施的两方面动力来源

探析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需要首先考察我国特别行政区制度背后的特殊主权体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各自能够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做什么。

（一）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权力分配

此处的制度结构分析有两个层次内容：一是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权力划分；二是涉外案件特别是涉及人员外逃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当中，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

从法理上看，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事务上的权力划分相对清晰。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对于涉港国家安全事务而言，中央政府负有根本责任，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有宪制责任。换言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因此中央政府有权在一定范围内变更甚至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这方面的部分权力和责任。2020年前，在国家安全维护机制长期缺位的情况下，香港政治生态展现出民粹化和无序化的特点，更是爆发了多起对“一国两制”和我国国家安全冲击极大的恶性群体事件。事件背后所反映的是，香港社会内部的一些群体对中央政府乃至整个内地强烈的疏离感和排斥感。2020年6月，中央直接行使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自从修例风波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关键举措，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首次建立起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通道，而这一通道的枢纽正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以下简称“驻港国安公署”）。

《香港国安法》第55条规定了驻港国安公署行使涉港国安案件管辖权的几种情形。其中第1款规定的情形为“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辖确有困难”。而该法第56条和第57条规定，当出现第55条规定的案件时，分别由驻港国安公署、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机关依我国《刑事诉讼法》行使立案侦查、检查和审判的权力。尽管整体看来，《香港国安法》依旧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保留了充

分的空间, 而驻港国安公署实施管辖的范围较为狭窄且具有兜底作用, 但从重要性来看, 其管辖权得以行使的情形恰恰是在重大案件发生的时候, 而涉外案件的发生和域外刑事管辖的启动也在其中。

(二) 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管辖

如果在涉港问题上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我国内地, 那么我国安全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直接援引《刑法》当中的保护管辖权而对其进行逮捕。李亨利案就是其中一例。李亨利出生于上海, 年轻时曾分别因引诱妇女卖淫和诈骗被判刑, 后做生意为避税移民至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伯利兹。李亨利在国外期间结识反华群体, 在非法“占中”及修例风波中和参与乱港活动的极端反对派群体保持密切联系并对后者提供支持。2019年11月26日, 李亨利因涉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被广州市国家安全局逮捕。2021年4月2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判处李亨利有期徒刑11年, 并处没收财产200万元。

如果嫌疑人身处国外且其罪行达到直接由驻港国安公署管辖的标准, 那么需要考量的问题就是我国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与相关国家达成刑事司法合作。制度框架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 《香港国安法》尚不能与我国在国际刑事合作方面的立法实现有效衔接。《香港国安法》第56条规定, 驻港国安公署在其直接管辖的案件中承担立案侦查的职责。然而, 引渡需要外交等方面部门的参与, 我国尚没有关于中央政府管辖的涉港案件如何引渡的规定。根据我国《引渡法》第47条, 我国对外请求引渡时, 应首先由负责办案的省区或直辖市的公检法甚至国家安全等部门向其所属系统的最上级机关提出意见书并交由其审核, 审核通过后交由外交部提出引渡请求。

在涉港事务上, 驻港国安公署由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联合派出人员组成, 而外交部在香港也设有负责处理涉港外交事务的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以下简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据《香港国安法》第52条规定, 驻港国安公署应当加强与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工作联系和工作协同”。其中, “工作联系”指驻港国安公署就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驻港机构互通信息、及时沟通, 相互填补工作盲点; “工作协同”指驻港国安公署就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驻港机构形成步调一致的工作安排和计划^{[17] 345}。因此, 如果驻港国安公署认为需要对特定逃犯实施引渡, 应当可以自行审核案件后直接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提出引渡。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请求中央政府对逃犯实施引渡, 应当可以由香港保安局、律政司以及相对独立的香港各级法院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委员会向驻港国安公署提出请求, 驻港国安公署审核案件通过后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提出引渡请求。这两类程序的推演参照《引渡法》第47条的制度逻辑展开, 但《引渡法》没有直接规定涉及特别行政区案件的引渡情形, 因此相关制度的最终完善除了实践探索外, 也需要立法上的跟进。

(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主导的管辖

如果在犯罪后外逃或在外国实施犯罪的嫌疑人直接出现在香港, 那么案件当然地优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管辖。香港法院已经审判过一起此类案件。2018年9月至2023年初, 留学日本的香港居民袁静婷在社交平台“Facebook”和“Instagram”的个人账号上持续发布宣传“港独”的言论和图片。2023年3月,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袁静婷返回香港更换身份证期间将其逮捕, 最终袁静婷被西九龙裁判法院以“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判处两个月监禁^[19]。在本案中, 袁静婷被起诉和审判的罪名来自香港原有的《刑事罪行条例》, 法院的管辖权也源于《刑事罪行条例》。

尽管如此,本案并不意味着《香港国安法》在此类案件中缺位。正是由于《香港国安法》以进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被导入香港法律体系当中,《刑事罪行条例》的相关条款才得以真正激活。随着《条例》的颁布实施,香港法院得以在此类案件中直接援引《条例》实施管辖。

如果嫌疑人身处国外,那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主导的管辖需要借助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外国签订的移交逃犯条约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而实施,驻港国安公署不介入或仅起到协助作用。出于历史惯性以及“一国两制”的宪制结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其高度自治的事权范围内拥有与外国开展合作、缔结条约或加入国际组织的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当前也更倾向于通过自身力量实现对涉港国家安全案件的管辖。根据《香港基本法》第96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在中央政府的协助或授权下同外国开展司法互助,包括移交逃犯等刑事司法合作。根据香港律政司公布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同19个国家签订了移交逃犯的协定,其中9个国家以《香港国安法》颁布为由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止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同31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其中10个国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止协定^[20]。因此,在涉港且涉外的国家安全案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外国签订的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很难实现预期效果。一旦案件需要实力作保障的政治手段介入时,仅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此时需要中央政府特别是驻港国安公署的出场。

五、制度实施的完善路径

我国推动实施域外刑事管辖制度,既要充分发挥现有制度体系的功能,也要为现有制度体系的完善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具体而言,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域外管辖制度实施的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嫌疑人出现在我国内地、港澳地区或与我国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有意愿与我国开展合作的国家,我国需要保留直接逮捕或引渡相关嫌疑人的可能性;其二,即使落实困难,该条规定本身也能对极端反对派人士及其背后境外支持者造成威慑;其三,基于对未来的展望,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未来将会有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更加丰富的手段来保证《香港国安法》在我国领土外发生效力。

(一) 对内凝心聚力、对外去政治化的管辖策略

对内,我国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强调涉港国家安全治理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和维持国家安全的动力。对外,主动弱化管辖对象的政治性,诉诸双方有限共识之内的部分,争取他国配合。上述内外有别、内紧外松的策略是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灵活性和能动性,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寻求域外刑事管辖的国家常常通过诉诸相对中立的罪名来凝聚各国共识,进而推动问题解决。在《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四类罪名中,仅有“恐怖活动罪”相对中性。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4条,“恐怖活动”包括为实现政治主张而实施的对人严重暴力、爆炸、纵火、破坏交通工具等以危险方法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者安全等行为。在《条例》规定的五类罪名中,仅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相对中性。《条例》第49条中的“破坏活动”主要指“损坏或削弱公共基础设施”。这两条罪名的涵盖范围有很大交集,也是各国刑法中都会规定的常规罪行。如果有人实施或帮助了此类罪行,我国可以考虑诉诸各国通用的罪名,实现对嫌疑人的引渡。引渡请求可能会成为有关嫌疑人或

逃犯庇护国使用的政治工具。即使我国以中性罪名向相关国家提出引渡“港独”逃犯, 相关国家也极有可能将这些人作为外交上的政治工具。因此, 我国需要通过其他政治筹码的加成来成功实施域外刑事管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引渡回国的人员被起诉和审判的罪名和刑罚都有可能无法与他们的犯罪行为和危害后果完全匹配, 惩治力度有可能会因此被削弱。

(二) 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根本目的的多元化手段

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实施域外刑事管辖, 最终服务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目的。根据我国《国家安全法》第 9 条规定, 对我国国家安全的维护本就“应当坚持预防为主, 标本兼治”。相关制度建设只要有助于实现其根本目的, 就有充分发挥积极意义的空间。

其一, 拓展引渡合作方式。有学者提出, 涉港国家安全案件可以“专案专办”的方式进行灵活的单独移交^[2]。这种一事一议的方式能够摆脱国际条约的限制, 直接就具体案件和人员同外国展开谈判, 可结合政治、经济与法律手段, 借助多方面的谈判筹码推进移交问题的解决。

其二, 更好发挥域外刑事管辖的威慑效力和示范效力。2022 年 3 月, 香港国家安全处曾经向设立在英国的反中乱港组织“香港监察”发出警告, 该组织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 29 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21]。2023 年 7 月 3 日, 香港国家安全处公布了 8 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通缉犯, 以《香港国安法》第 37 条规定为依据向他们发出逮捕令, 并做出价值 100 万港元的悬赏^{[3] 71}。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次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此次通缉行动, 表示“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 我们都会终身追捕这些罪犯”^[22]。而在《条例》颁布之后,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惩治通缉犯问题上将获得更多有利条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的相关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宣示和表态作用, 实现了对通缉犯本人及其同伙的威慑。

(三) 推动构建域外刑事管辖国际规则

我国在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更好建设域外刑事管辖制度, 需要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我国要团结更多国家, 构建多方共赢的域外刑事管辖国际规则。

在对外关系和全球治理层面, 我国需要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法规范的进一步完善工作。权威国际组织关于域外管辖国际规则的编纂早已提上议事日程。经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 58 次会议形成主题内容、经第 61 届会议补编而成的《国际法委员会报告》, 其附件六讨论了域外管辖权在国际法中的现状与前景、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原则与限制条件等^[23]。该报告问世已有 10 余年, 但仍未根本改变域外刑事管辖实践中的诸多弊端。中国在未来要积极参与域外刑事管辖国际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推动规则更加公正与民主。只有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合作共赢的国际规则,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的跨国开展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外部支持。

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领域,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会辐射到更加广阔的领域。特别是随着两岸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 我国需要考虑对于外逃“台独”分子的追究问题。《香港国安法》和《条例》既能对外逃“台独”分子造成极大的威慑, 也能在未来两岸实现统一后为我国制定台湾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提供参考。国台办在 2021 至 2022 年先后三次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宣布对清单内的人员实施制裁和终身追责。考虑到未来两岸局势发生转变的情况下, 这些顽固分子可能逃往外国继续从事“台独”行径, 我国对他们的追责形式当然地包括域外刑事管辖。我国在未来需要结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制度设计, 制定出能够有效应对现实情况的

域外刑事管辖规则和实施手段。届时，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相关实践经验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顾敏康，王振华. 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效力研究——从香港国安法第 38 条展开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34-142.
- [3] 王振民，黄风，毕雁英，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读本 [M]. 2 版.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70-72.
- [4] 田飞龙.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香港 23 条立法的制度正当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3）：151-165.
- [5] Rosalyn Higgins. Problems and Process: International law and How We Use I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3.
- [6] Julian Jansson. Terrorism, Criminal Law and Politics: The Decline of the Political Offence Exception to Extrad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233-234.
- [7] Sibel Top. Prosecuting Political Dissent: Discuss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Political Offence Exception in EU Extradition Law in Light of the Catalan Independence Crisis [J]. New Journal of European Criminal Law, 2021（2）：1-21.
- [8] Arresto y declaración ante Llarena siete años después, el horizonte de Puigdemont al pisar España [EB/OL]. (2024-08-03)[2024-08-06]. <https://www.elmundo.es/cataluna/2024/08/03/66ae8946e85ecec538b456d.html>.
- [9]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向美国认罪 [EB/OL]. (2024-06-26) [2024-07-20]. <http://www.news.cn/world/20240626/df1c3179a4114f4ea5fa986920599529/c.html>.
- [10] Australian PM welcomes news of WikiLeaks founder Assange's release [EB/OL]. (2024-06-25) [2024-07-20].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406/25/WS667a8f1ca31095c51c50ac8a.html>.
- [11] 黄风. 论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由“袁宏伟案”说起 [J]. 法商研究，2008（2）：3-7.
- [12] 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78.
- [13] CIA Torture Unredacted [EB/OL]. (2019-07-01) [2024-07-25]. <https://www.therenditionproject.org.uk/documents/RDI/190710-TRP-TBIJ-CIA-Torture-Unredacted-Full.pdf>.
- [14]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无理指责香港特区政府 [EB/OL]. (2024-05-13) [2024-07-23]. http://gb.china-embassy.gov.cn/lcbt/sgryr/202405/t20240513_11303882.htm.
- [15] 何建宗. 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的十大议题：回顾与前瞻 [M].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182.
- [16] 张明楷. 刑法学 [M]. 4 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7.
- [17] 韩大元，朱国斌，黄明涛. 《香港国安法》逐条释义 [M].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3：232.
- [18] 王勇. 论我国刑事保护性管辖权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J]. 政治与法律，2022（1）：110-123.

韩碧舟.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 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6): 138-151.

- [19] 留日港女网煽“港独”判囚两个月 [EB/OL]. (2023-11-04) [2024-07-20]. <https://www.wenweipo.com/a/202311/04/AP65455369e4b0fdf828a56491.html>.
- [20] 对外事务—其他协定 [EB/OL]. (2023-12-04) [2024-07-20]. https://www.doj.gov.hk/sc/external/international_agreements.html.
- [21] 乱港黑手/罗杰斯挑战国安法 法律界促通缉 [EB/OL]. (2022-03-20) [2024-08-10]. <https://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2/0320/700112.html>.
- [22] 港警通缉 8 名窜逃海外反中乱港分子, 李家超: 走到天涯海角都会追捕 [EB/OL]. (2023-07-04) [2024-08-10]. <https://hqtime.huanqiu.com/article/4DZ0yAF615t>.
- [23]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附件 E. 域外管辖权 [EB/OL]. (2006-10-13) [2024-08-18].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6/636/19/pdf/G0663619.pdf?OpenElement>.

责任编辑: 龚静阳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建构、成效与完善

——基于《香港国安法》的分析

徐天骄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之前,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存在漏洞, 激进反对派人士和外部干涉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难以及时得到惩治, 香港的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为了构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 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 制定《香港国安法》。该法补齐了香港长期存在的国家安全漏洞, 打击了激进反对派人士及其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 促进了香港政治生态的根本性好转, 实现了香港社会由乱及治的转折, 并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但是, 《香港国安法》的部分特殊安排在实践中面临一些新问题, 如尚未覆盖所有的安全风险, 法律落实的具体安排有待清晰化, 香港行政和司法机关面临权力限制及目标平衡难题, 抵御外部势力干涉的手段需要及时更新, 香港部分人士对中央管治权威的理解有待深化等。为更好完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 确保《香港国安法》准确实施, 需不断健全《香港国安法》实施机制, 依据实践新情况完善扩充和解释工作, 细化对香港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履职指导, 扩充惩治违法活动的制度工具箱。

关键词: “一国两制”; 国家安全; 《香港国安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D9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6-0152-15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6.014

作者简介: 徐天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17ZDA109)

引用格式: 徐天骄.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建构、成效与完善——基于《香港国安法》的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6): 152-16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1]。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曾面临维护国家安全难题，在中央的支持下构建了阻挡安全风险的制度围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授权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区公布实施。

学界对于《香港国安法》的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探讨立法背景与法理依据，详细解析条款内容，分析法律在司法系统中的具体适用，关注实施效果与社会影响，指出法律执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香港国安法》具有充分的宪法依据和坚实的法理基础^[2]，其实施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香港发展且引发政治争拗的国家安全立法问题，迅速平息了香港政治乱局，实现了对“一国两制”的完善^[3]。也有研究聚焦分析具体的法律条款，如明确第3条中央和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划分^[4]、结合第38条探讨域外效力适用难题^[5]等。但是《香港国安法》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包括驻港国安公署立案侦查的法律适用问题^[6]和只防范规制极端行为、规制的对象较窄^[7]等。有学者结合实践探讨完善路径，提出解决司法认定困境的方向^[8]、促进《香港国安法》同本地法律衔接^[9]等建议。学界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成效和制度完善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总结经验、分析不足，进一步提升《香港国安法》实施的效能，成为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

二、《香港国安法》是特定背景下果断采取的关键举措

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中央在香港特区持续动荡时果断采取的关键举措，是中央政府行使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权力。该法出台以前，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漏洞，被一些境外势力利用以从事破坏香港社会稳定发展的活动，具体表现在激进反对派人士阻挠香港特区政府正常施政以及发动街头暴力活动、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介入四个方面。

第一，激进反对派人士进入管治架构威胁政权安全。在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激进反对派人士通过各类选举进入管治架构，造成立法会时常出现“拉布”现象，使本可以顺利通过的法案或议案被搁置，这严重影响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有效施政和行政主导体制的运行。

由于一段时期香港存在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不完善和选举制度内在矛盾等问题，激进反对派人士乘机进入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区议会等机构。比如，反对派在2004年立法会选举中声称要夺取一半席位从而控制立法会，2006年参加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10]，2019年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优势席位。反对派不断争夺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引发政治争拗使香港特区政府陷入困境。例如，反对派人士利用公职人员身份从事分裂、颠覆活动，通过“拉布”等行为抬高施政成本造成立法会效率低下，通过在立法会倒插国旗等行为挑战中央权威^[11]。同时，在香港选举中，符合条件的中国籍人士和外国籍人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且香港特区没有西方国家

法律中普遍存在的防护条款，如禁止接受外国政治捐款、限制外国代理人从事政治活动等，可能造成香港特区管治权落到外国代理人手中的严重后果^[12]。

香港回归早期，为保持香港社会稳定，中央授权香港特区自行立法填补国家安全漏洞。2003 年香港特区政府曾尝试推动制定《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但因为反对派议员强烈抵制，该项立法止步于“二读”程序。围绕《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国家安全立法任务产生的政治争拗，反对派长期处于“为反对而反对”状态，导致《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所规定的国家安全立法议案无法得到立法会的过半支持。同时，2019 年区议会选举在特殊情况下给予反对派机会，激进反对派人士试图进一步进入政治架构，并以否决所有政府议案、法案为威胁条件迫使香港特区政府让步。如果继续“等待立法条件成熟”时由香港特区自行立法，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舆论氛围只会增加立法难度^[13]。实践表明，在香港政治制度环境没有产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香港特区进行立法上的“自我修复”困难重重，急需中央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兜底性责任，以“决定+立法”的方式完成立法。

第二，反对派搞街头运动破坏社会稳定。2019 年香港街头运动出现扩大化、暴力化趋势，香港行政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时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司法实践中过于依赖外籍法官，并一味强调保护“抗争者”权利，导致香港行政与司法机关难以有效协助治安恢复。反对派将“社会运动”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公然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激进、极端的方式，损害了香港的公共利益。回归以来，反对派长期阻挠和攻击香港特区政府正常施政，试图制造中央和香港特区的矛盾、削弱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14]。为实现其目的，反对派策划了多起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由于非法“占中”“旺角暴乱”“立法会宣誓风波”等事件并没有得到及时严肃处理，导致反对派更为激烈地破坏宪制秩序。这些危害在修例风波中达到顶点，激进反对派人士推动非法游行集会，鼓动市民冲击立法会、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等，此类行为损害了国家主权完整和香港繁荣稳定。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和做法得到部分中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15]，其错误行为影响了部分香港市民，造成部分香港青年产生不端行为^[16]。国家安全立法的缺位、维护国家安全的现行条例未能激活，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设置、力量配备和执法权力等方面的明显缺失^[17]，导致香港特区政府在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时面临无法可依的困难。为应对安全危机采取的本地措施也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如几经波折才确立效力的《禁止蒙面规例》并未减少修例风波中的冲突^[18]。

除缺少预防和制止能力外，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也面临一定困难。香港特区的本地法律资源对维护国家安全有一定作用，但《刑事罪行条例》《公安条例》等法律在实践中的作用稍显乏力^[19]，因暴力示威被捕者数以千计，但被审判和定罪者寥寥无几。此类危害香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活动未能得到有效处理，反对派的街头破坏行动有恃无恐。例如，戴耀廷等人多次策划参与非法活动，保释期间仍然鼓吹“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等论调，误导青年破坏法治秩序。在平息香港暴力街头运动的过程中，香港司法机关依据当时的法律制度并不能及时解决现实难题，且香港部分法官未能认识到其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未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给予足够重视^[20]。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有责任及时介入，确立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秩序并激活香港本地法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条款。

第三，外部干涉势力借机搅乱香港政局。在缺少防范机制的情况下，外部势力在香港扶植代理

人, 不仅借此影响香港管治架构, 还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提供物质、资金和舆论支持。外部势力是“颜色革命”“黑暴”“港独”的滋生土壤, 阻碍了香港政治的良性发展。外部势力以多种方式渗透香港政局并企图影响选举结果、改变香港地区政治, 意在遏制中国发展。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其自由特征十分明显, 而这种社会特征容易为外部势力所利用^[21]。交流交往上的便利和安全上“不设防”被外部势力用来同香港反对派建立联络, 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支持和培育香港反对派力量, 促成反对派势力频繁窜访美国高层领导人, 在社会上宣扬所谓“普世价值”, 影响香港的舆论、青年教育、司法等^[22]。在修例风波中, 外部势力的深度介入加剧了反对派的嚣张气焰。“开放科技基金”“美国国际劳动团结中心”“香港人权观察”等海外组织拨款资助香港暴力街头运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仅帮助反对派在国际扩大宣传, 还多次派员赴港指导暴力活动, 提供技术支持^[23]。

外部势力污名化香港特区政府为恢复秩序所作出的努力, 社会失序等不利舆论引发了国际投资者担忧, 严重威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外部势力不断挑起香港问题“国际化”的话题, 如通过《苹果日报》发表数十篇报道呼吁外国对中国香港特区和内地实施制裁。在媒体片面话语的影响下, 部分香港青年听信利益许诺, 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接连不断的街头运动直接威胁了国家安全, 外部势力无视反对派造成的种种后果, 反而指责、攻击和抹黑中国, 借此放大矛盾冲突以增加中国的政治压力。在修例风波期间, 美国国会表示如果香港特区通过《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 将考虑使用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等制裁方式, 还在贸易谈判中以此为由迫使中国让步^[24], 其他国家亦通过引导国际舆论干涉中国内政。从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工作已筹备良久, 香港的危急情势加速了这一国家行为^[25]。

第四, 反对派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台独”势力一直关注并积极介入香港反对派的活动, 特别是在修例风波中, “台独”势力为香港街头活动提供各类支持, 与反对派共同炒作相关议题, 破坏“一国两制”的国际声誉。“台独”势力注意到香港反对派与建制派的分歧, 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反对派的观点并提供相应“经验”, 使其成为反对“一国两制”的力量。早在 2003 年, 香港特区开展国家安全立法任务时, “台独”势力便邀请反对派参与研讨会, 共同发表否定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言论。虽然 2015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了港澳台同胞的反分裂义务, 但香港方面缺少具体的制度机制和法律设置, 造成“台独”势力与反对派的长期勾结没有得到及时制止。这一漏洞在修例风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台独”势力营造有利于香港暴力活动的国际舆论, 表达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担忧”。民进党声称将对反对派人士提供“人道救援”, 台湾陆委会等机构也宣称将保护“港人来台权益”^[26], 协助参与暴力活动的人员潜逃至台湾, 以提供庇护之名来鼓动其继续从事危害香港安全的各类活动。

“台独”势力为在国际上摆脱困境、营造势力合流的假象, 向反对派影响下的香港暴力活动提供各类支持, 阻碍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台独”势力在制造议题、组织动员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模式, 通过驻港机构渗透至香港社会内部并借此与反对派保持联络, 向反对派发起的许多对抗性活动如“反国民教育”、非法“占中”等输出“经验”^[27]。如“港独”组织成员黄之锋曾多次与民进党接触, 参加由岛内“台独”政党“时代力量”组织的活动。在修例风波中, “台独”势力还为香港暴力街头活动拍摄宣传影片, 反对派在“台独”势力的全程干预下得以扩大声势。这些情况有违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目的，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及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28]；同时，勾连活动误导了香港市民对于中央的看法，使其对“一国两制”产生误解，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三、《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效

中央通过《香港国安法》从国家层面化解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难题，香港由此实现了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该法填补了香港长期存在的国家安全漏洞，有力地遏制了外部势力干涉，制止了反对派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重塑了香港的政治生态。

第一，实现由乱及治的转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国安法》有效应对了扰乱香港社会的暴力活动，使香港开启了良政善治新局面，在政治环境平稳有序的基础上，香港内部经济动能逐步恢复。法律实施后，香港特区得以稳住大局，切实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国民教育、司法裁判和社会舆论等领域得以从动荡复归平静。一方面，《香港国安法》有效打击了反对派的激进主义和违法犯罪活动，避免香港偏离“一国两制”正确轨道，同时巩固了香港在中国整体发展中的独特地位。这一里程碑式的法律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深度完善了香港的宪制秩序。

“决定+立法”的“双轨立法”模式表明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同时保持对香港的信任，使其继续在高度自治范围内维护国家安全^[3]。另一方面，《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若干关键领域也发生适应性变革。法律充实了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上位法律效力和新形势法律依据，香港特区进一步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为完善香港特区治理效能奠定了基础。香港民主新秩序得以建立起来，“爱国者治港”原则和新选举制度切实落实，管治团队能够更为顺畅地依法治港^{[12] 615}。

消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压力后，香港特区政府得以聚焦民生福祉，使香港经济活力持续迸发，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此前，反对派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造成经济发展停滞、市民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使香港走出社会秩序混乱的困境。由于修例风波，2019 年香港的 GDP 出现了十年间的首次负增长。《香港国安法》带来的稳定社会环境促使香港与内地的连接更为紧密，经济、旅游、商务交流等活动有序开展。香港的国际形象也逐渐好转，增强了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带动香港经济逐渐复苏，2023 年出入境人次达 2.12 亿，恢复至疫情前七成。

第二，填补香港长期存在的国家安全漏洞。依据《香港国安法》，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了更强的法律依据和执法工具，解决了以往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方面的难题，反对派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类行为及活动大幅度减少。首先，在香港社会动荡且香港特区管治困难的背景下，以强大公权力为后盾的《香港国安法》为行政机关提供了具体的法理依据。2002 年香港开展《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立法任务受阻时，中央出于审慎考虑没有介入。香港反对派势力却不断扩充规模、招揽人才和扩大影响力^[29]。《香港国安法》体现了中央的坚强意志，为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及活动提供法理依据，避免国家安全漏洞扩大化。在此基础上，香港得以平稳、迅速地完成《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所规定的立法任务，完善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由此，香港特区行政机关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时能够快速反应，减少了法律空白所带来的执法困境，提升了香港特

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如针对修例风波中发现的致命武器、弹药及爆炸品等这类问题,《香港国安法》的规定使行政机关有依据处理香港本地法律资源无法解决的恐怖活动。其次,《香港国安法》改变了国安案件的处理方式,有助于提升国安案件的处理效率和质量。通过设立专门法庭或指定法官,国安案件能够在更专业和集中的环境中审理,避免普通司法程序中可能出现的拖延和程序性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香港国安法》允许适用内地法律,确保有效处理复杂和难度较高的国安案件。此外,香港特区行政机关以《香港国安法》为基础,细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落实机制,综合运用不同法律资源消除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如围绕香港青年维护国家安全意识缺失这一问题,香港特区根据《香港国安法》第10条编订了《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为打击煽动言论及具有危害国家安全风险的机构,引用《刑事罪行条例》《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等本地法律。总体而言,《香港国安法》的相关规定构建了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防范、制止和惩治功能有机统一的体系^[30]。

第三, 封堵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空隙。《香港国安法》通过法律手段识别和排除香港极端本土势力及外部势力,引导香港公职人员和市民同外部势力做切割,阻断了外部势力代理人渗透香港的可能渠道,提高了打击外部势力的有效性。《香港国安法》不仅有助于清除现有外部渗透势力,也有助于防范危害国家安全的潜在行为。《香港国安法》对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定非常清晰,以强大震慑力切断外部势力通过经济资助、情报共享等方式对香港事务施加影响。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与香港暴乱活动有密切联系的组织在香港设立的机构都已被依法处置,极大减少了其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根据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外部势力的代理人 and 牵线人也会依法受到惩处,企图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实施恐怖活动的违法行为骤减。爱国教育和法律宣传活动削弱了外部势力对社会舆论的影响,香港社会对外部势力的危害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抵制外部势力干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为防止外部势力从司法角度干预香港,《香港国安法》通过机构设置、制度安排、法治建设等方面防范外部势力渗透。国安案件往往涉及高度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压力,法官需要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以往外籍法官审理警察与非法“占中”人士之间的冲突时,警察受到严厉处罚,而非法“占中”人士则被判处较轻的刑罚^[31]。《香港国安法》规定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从现有的法官中指定一批专门负责国安案件的法官审理,任命时着重考虑其政治忠诚、专业背景和审理经验。这种安排可以使法官更加熟练地处理复杂的国安案件,强化案件审理标准的一致性和专业性。特殊的审理程序也可以避免香港国安案件受到外界过度干预,如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进行不公开审理。

第四, 打击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使社会重回稳定。《香港国安法》基本覆盖了引起香港社会动荡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暴乱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反对派受到相应审判,削弱了反对派组织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一些支持反对派的政团、媒体自觉约束行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多个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得以成功处理,有效遏制了反对派的嚣张活动,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法律明确四类罪行和惩治机制,罪状描述明确且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构成了典型、有密度及规制质量的国安刑法框架”^[17]。以往审理国安案件时会因法律空缺而分散处理导致缺少震慑力,《香港国安法》为集中打击扰乱香港社会的反对派力量提供支持。从效果上看,多个“民运”组织,反对派

的各种集会、示威和宣传活动需要经过严格审批，不能再肆意进行违法活动；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等反对派核心人物得到严厉制裁，香港的暴力事件显著减少^[32]；截至 2024 年 6 月 21 日，有 299 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和相关案件被拘捕，其中 175 人被检控，有 156 人已经被定罪或在等待判刑^[33]。

《香港国安法》的防范作用也十分明显，打消了不法分子以身试法的念头，制止了大部分潜在违法行为的发生。

《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香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步调不一致现象出现的概率极大降低，反对派难以依靠司法偏袒免受处罚。《香港国安法》的制度安排提升了法院的司法审判效率，同时随着国安案件审理经验的增加，逐步积累了标准化和流程化的司法经验。初期依据《香港国安法》作出的判决和审理流程具有权威性、标识性和启示性意义。唐英杰案作为该法生效后的第一宗被控违法案件，阻挡了反对派从不同角度突破法律限制的企图。此案明显区别于 2019 年黄之锋获得的宽松保释门槛，对于企图犯同类罪案的人员有很大的阻吓性，成为之后案件的参考先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被大幅压缩，其组织能力受到了严重打击，难以再煽动开展大规模的街头暴力活动。

第五，改善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香港特区在落实《香港国安法》的过程中，清除了香港社会政治中的不良风气，使行政机关与立法会形成良性互动，增进民生福祉的施政议案得以顺利通过，这也激发了香港市民的爱国爱港热情。《香港国安法》迫使激进反对派人士退出香港政治舞台，这有助于恢复香港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香港得以建立起一支忠诚且坚实的管治团队。香港的政治氛围逐渐回归理性，出现更多建设性的讨论，香港社会更为关注民生、经济发展等实际问题。法律的实施使香港的公共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重新回到法律框架内，有助于恢复政治理性和法治精神。该法对于选举安全有积极意义，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人员被取消参选资格，从制度上排除了激进反对派人士的恶性对峙活动，复归平静立法会与行政机关理性配合，巩固了香港行政主导体制。过去，反对派长期在立法会普选议席的选举中取得多数票，导致获得立法会内议席的建制派缺乏足够的认受性^[34]。《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立法会的内部矛盾，有助于形成团结和谐的政治氛围。

《香港国安法》亦为许多爱国者提供坚实保护，使香港市民免受因社会动荡带来的消极影响并积极参与到维护国家安全事业中。《香港国安法》缩减了激进反对派人士鼓动市民产生错误认知的舆论空间，被压制的理性民意逐渐上升，爱国爱港的社会政治基础得到修复与巩固。2021 年香港紫荆研究院的调查表明，逾七成受访香港市民满意《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成效^[32]¹⁰⁴。同时，香港市民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截至 2023 年底，香港国安处微信账号收到逾 65 万项举报信息^[35]。社会上不再充斥激进暴力言论，逐渐从“泛政治化”的裹挟中解脱出来，有助于恢复公众对政治和法治的信心。《香港国安法》纠正了香港市民的错误认知，规范了民众行为，为自由与法治划清边界，使香港安全有了更为坚实、广泛的支持力量。

四、《香港国安法》实施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出于对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立法权的尊重，《香港国安法》并未完全囊括《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立法任务，其主要针对的是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一些隐蔽

性强、新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尚未覆盖所有的安全风险。《香港国安法》打击了最紧迫的破坏行为，有选择性地为香港特区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留出一定空间，在制度衔接和补充的过程中，有些安全风险还未纳入法律制度框架内。一方面，《香港国安法》是危机时刻的制度性补救措施，难以面面俱到，且相关制度建设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存在一些缺少惩处依据的情况。法律严厉打击了“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但还有一些相关的演化行为未纳入其中。如现在使用的“勾结外国势力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没有“外国干预香港事务”内涵广泛；“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未覆盖外国间谍在香港的煽动活动。同时，《香港国安法》的配套法律制度有待完善。关于叛国、煽动叛乱及窃取国家机密这些罪名，香港法律资源的内容比较陈旧，一些国际法律资源对香港本地犯罪活动的适用程度有限。此外，普通法并没有分裂国家罪和颠覆政权两项罪名，因而即便有了《香港国安法》，依然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改进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36]。

另一方面，《香港国安法》颁行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安全风险。《香港国安法》的内容更多集中在传统安全上，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内容占很大比例，国民、资源、生态等安全领域的规定有待香港特区完善。对照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广阔领域，该法对文化、金融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保障需要进一步夯实。同时，一些反对派的活动更为隐蔽，采取“软对抗”的方式宣扬反政府信息，如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内有“港独”书籍，网络搜索引擎的检索结果出现“港独”歌曲，社交平台出现恶意帖文等。虽然《香港国安法》制止了外国资金对违法犯罪分子的资助行为，使外国势力难以组织骚乱活动，但也出现了更具欺骗性的集资方式，规避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还未完全纳入现行法律中，也缺少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弥补安全漏洞。

第二，法律落实的具体安排有待清晰化。《香港国安法》是主体法而非程序法，不可能明确列明实践中遇到的所有情况，具体履职依据有待香港特区自行对接补充，但这种策略性的立法技术会增加复杂程度、引发解读分歧。《香港国安法》的文本精炼且极具概括性，面临着与香港本地法律磨合衔接的挑战，法律使用者如何准确、有效地运用法律存在困难。其一，《香港国安法》生效实施一周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同香港特区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国安委）根据本地习惯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也公布实施。“特事特办”的立法节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条款的细化程度，增加了执法和司法的复杂性。其二，《香港国安法》与香港普通法体系还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有效整合，以保障香港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连贯性。香港司法机关有时会面临《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之间的平衡问题，如香港国安委不受司法复核、陪审团制度的例外、保释例外制度与无罪推定的冲突等；《香港国安法》同香港本地法律也存在协调问题，如唐英杰案中的人身保护令判决等^[37]。

目前，《香港国安法》在判断犯罪的资金和工具方面的规定比较简略，可能无法迅速切断不法分子与外部干涉势力的经济联系，而仅针对个人的人身刑罚难以起到预期的惩治效果。激进反对派人士可能在犯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转移参与犯罪活动所获得的报酬，或以更隐蔽的方式获得财产，增加后续判决与财产扣押的难度。同时，《香港国安法》主要依靠香港原有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处理国安案件，但本地行政机关对事态的把控经验不足，需要在制度上作一些弥补。如周庭弃保潜逃至日本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暴露出《实施细则》中限制受调查人离开香港方

面的制度漏洞。此外，部分行为如何定性还未形成明确规定，如挥舞“港独”旗帜、高呼反政府口号、藏有煽动性质标语等行为。

第三，面临权力限制及目标平衡难题。《香港国安法》在制定中力求平衡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17]，但实践中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不过对于空间限度及价值选择的标准有不同观点，而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争议和不满。一方面，香港特区行政机关在落实《香港国安法》中承担多项职责，在实践中引发了关于其履职标准和权力界限的讨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权力及具体行使引发学者们的讨论：如其作出的国家秘密证明书对法庭有约束力，但条文存在含混之处，如判断“涉及国家秘密”的标准何在、是否依据内地的国家秘密相关法律、内地的标准是否适用香港等问题^[38]；以及能否在法院未提出的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法院是否对证明书有审查权等^[39]。还有观点表示，香港国安委的地位超越香港一般行政机构，且缺少司法与立法的有力监督，存在权力过于广泛的问题^[40]。法律框架的刚性特点可能会导致行政机关应对新型威胁及灰色行为时显得不够灵活，因而有必要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以应对突发事件，如香港特区政府利用其赋予的“采取必要措施”权力于 2023 年 6 月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以禁止市民传播“港独”歌曲。

另一方面，法律落实中也需要在不同的价值和标准中做选择，有时难以同时完成多个目标和任务，应当满足哪种需求容易引发争议。比如，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以往习惯的平衡上，法律规定律政司司长可以作出排除陪审团审理等决定，但有观点认为这种限缩有失民主价值^[39]。《香港国安法》的量刑分级依据分为罪行严重性和参与积极性，但未给出具体判断标准^[8]。普通法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判定机制，而如何参考内地法律及判决存在争议，同时量刑标准不明确可能会造成同类型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一致，引发社会质疑。还有学者指出，香港本地法律并未明确区分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普通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司法审判时可能会选择使用香港本地法律如《公安条例》等，没有考虑危害国家安全法益容易作出较轻的判决，影响刑事法律的惩罚和预防效果^[9]。此外，内地和港澳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不同，难以满足司法协助的需求^[41]。

第四，抵御外部势力干涉的手段需要及时更新。外部势力对《香港国安法》的污名化影响了该法的国际接受度、为国际合作制造障碍，《香港国安法》缺少对相关情况的应对条款，导致香港特区在应对外部势力和跨境执法时稍显乏力。一方面，外部势力仍可隐蔽地影响香港政治，并通过攻击该法带动一些国家采取行动来阻碍法律实施，而《香港国安法》缺少相应的应对机制。《香港基本法》的许多条文对外籍人士给予了照顾，但实践中也出于谨慎对待国家安全问题的考量避免外籍人士参与行政会议^[42]，《香港国安法》还缺少对外籍法官参与国安案件审理的法律规制。外籍法官在理解和适用《香港国安法》时，可能会因文化和法律体系差异影响判决的准确性，或习惯于参考外国裁决，而无条件参考外国案例将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外部势力还“批评”法律的实施情况，如认为条文不够清晰、定义不明确，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和滥用的风险^[43]，种种错误批评为部分国家的干预提供“依据”。例如，英国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居民提供了移民途径，加拿大、新西兰、德国等国家暂停或不批准与香港地区的引渡条约，影响香港执法部门拘捕犯罪分子。

另一方面，香港内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受到惩治，但《香港国安法》难以妥善处理在香港外

部实施的犯罪活动。《香港国安法》第 38 条符合国际法下的“保护管辖”原则，可以管辖身处境外的外国人的违法行为。但实践情况表明，对外籍及潜逃人员的惩治难以有效落实，如归化为美国籍逾 25 年的“香港民主会”总监朱牧民（“占中三丑”之一朱耀明之子），是首位被《香港国安法》通缉的外国公民及非中国籍香港居民；被通缉的潜逃人员如许智峰持旅游签证入境澳大利亚，罗冠聪已在英国获得“庇护”。国际上的行为也更难追责，如 2022 年 11 月 6 日世界杯榄球赛精华视频片段、11 月 13 日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中，出现了曾在香港暴力活动中使用的曲目名称或曲目。香港特区面对此类突发性、涉众性的侵犯国家象征行为，缺少以高位阶立法为核心的体系化规制制度，无法为司法机关处理相关违法行为提供良好条件^[44]。《香港国安法》在应对外部势力干涉时，简单提及了国际合作机制，但具体实施方式、合作范围、合作对象等方面缺乏详细规定。此外，《香港国安法》还需进一步考虑跨境执法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障碍和国际法约束。立法会在 2020 年 6 月通过《国歌条例》，但域外国家对于很多情境下侮辱国旗、国徽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并不视其为犯罪，这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第五，香港部分人士对中央管治权威需要深理解。《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特点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尊重，以及中央的管治权威和立法智慧，但在法律实践中出现了香港部分人士对一些特殊安排的深意理解不到位的情况，带来司法理解上的困难。一方面，《香港国安法》的立法技术具有典型特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相关立法、执法、司法原则^[7]，而内地和香港在法律范畴、概念和专门术语方面的规定很不一致^[45]，如《香港国安法》中的“拘役”“管治”“强制措施”等名词不符合香港的法律习惯。法律制定时，有意见指出应当统一草案中的内地和香港本地法律用语，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研究认为，全国人大有关决定要求将本地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不需要通过香港本地立法转化，同时为了便于香港理解适用，有必要保留两种法律用语^[46]。这种考虑既突出了中央的管治权威，也体现了对香港法律习惯的尊重，但香港部分人士对这一点的理解不充分，且由于法律衔接处于磨合期，司法实践中法律的准确适用存在难度。

另一方面，香港法律一般是双语立法，《香港国安法》以中文版本为准突出了中央立法的特点，但也带来一定的不便。《香港国安法》在颁布时并未同步推出英文版本^[37]，律政司强调该法的唯一官方语言是中文，引发部分香港律师不满和质疑。同时，《实施细则》中提到中文文本为真确本，英文译本仅供参考。《香港基本法》也是国家层面的立法，英文版本延迟发布，且中文版本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这充分体现了“一国”的维度，突出了中央权威，不过也带来释法上的困难。香港司法机关主要采取“文义解释”方式解释法律，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条款字面含义进行解释^[47]。唐英杰案中，外籍律师戴启思逐字解读《香港国安法》条文，并声称法律没有具有效力的英文版本^{[18] 63-64}。此外，非官方公布的英文版本中出现中英文条文不相符合情况，这对于香港司法从业人员深入理解法律条文带来挑战。

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香港国安法》的基本思考

中央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三年多以来成效显著，为香港后续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整体框架保证与本地立法示范。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制定法律、

修改法律、解释法律、将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多种方式解决。对于选择性空缺的问题，有待香港特区通过完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等方式解决，制度上内容调整可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依据实践新情况完善扩充和解释工作。完善《香港国安法》应当关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方面，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新型安全威胁提升香港特区行政及司法机关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对于争议性问题结合香港的法治情况及时作出解释说明。一方面，在立法深化上，需要结合国家安全的更高要求和丰富内涵扩充、细化法律条文，并及时补充新挑战的应对措施。目前，《香港国安法》的规定较为简略，可安排一些过渡或应急机制，避免一些势力通过“拖”的方式利用法律漏洞。对于一些更为隐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应纳入法律的管控范围中。在量刑上，各国都将危害国家安全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给予严厉制裁。我国《刑法》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量刑跨度是从管制到死刑，而《香港国安法》则是从管制到无期徒刑，或可根据情况提高量刑幅度，区分普通和严重犯罪行为^[48]。此外，西方的权利话语体系深入到香港社会内部，应该通过相关制度安排避免一些条款被误读，如可解读“港人治港”“爱国者”概念，并通过法律适当明确^[49]。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可能会产生不同解读的概念，还需要使《香港国安法》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必要时刻发挥人大释法的说明和引导作用。法律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可，因此法律解释和释法的透明度至关重要。《香港国安法》“是作为落实中央事权而制定的全国性法律，这种情况下的立法原意更应被重视”^[50]，需要避免一些势力利用法律空白危害国家安全，或对其行为作出另类诠释。在与香港国家安全本地立法配合时，《香港国安法》也可能面对意见分歧，应当充分利用人大释法及详细的《实施细则》，明确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标准。香港有独特的话语体系，同时带有西方和本土文化色彩，《香港国安法》在实践中的解释应当注意话语的使用。不过，人大释法的程序较为复杂且不具有溯及力，可能会影响人大释法在紧急情况中的维护作用，还需要其他制度对其作出一定的调整和预先安排。为及时发现和确定问题所在，也可建立持续的《香港国安法》评估和反馈机制，即通过定期审查法律实施效果，确定有待强化的部分并提前做好补充工作。

第二，细化对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履职指导。维护国家安全的水平直接受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履职情况影响，对于相关机构履行《香港国安法》的要求及行为指导可进一步明确，以切实解决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及司法审判的不当偏差。一方面，香港行政机关面临着提升履职能力与补充执法依据的挑战，可通过细化《实施细则》提升执法效果，特别是中央和香港特区合作机制的完善，为中央在必要时刻的介入作充分准备。香港行政机关在执法中遇到的阻碍应当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解决或规避，需要法律对其作出更为明确的指导，确保执法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有具体的执法标准，同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特别是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由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往往是跨区域性的，香港特区难以从宏观上处理复杂且牵连范围广的案件，而内地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安全部门又不能直接提供援助，驻港国安公署也面临适应香港机构运作的问题。未来可就内地与香港开展合作方面的内容调整和丰富《香港国安法》^[51]，还可进一步实现在“一国”框架内的融合与对接，为驻港国安公署的执法提供基础和支撑。在具体合作中，会出现内地与香港都具有管辖权的情况，要提前做好平衡不同法系和理念的准备，可通过《香港国安法》搭建的平台进

行协商; 还需为难以预见的情况预留处理空间, 如公安部制定的规范并不适用于驻港国安公署, 法律基础、政治体制、机构独立性和人权保障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工作原则和方法的不同。

另一方面, 香港司法机关已积累一定经验, 可将应对挑战的方式及薄弱之处纳入相关法律规定, 通过增强条文的完备性减少司法层面的偏差。针对以往香港存在司法机构固步自封、法官裁决注重学术上的美观价值而非实用价值的问题^{[18] 227}, 《香港国安法》的司法解释情况需要强化重视。在国安案件的审理中, 香港部分法官带有一定的政治立场, 同时缺乏对香港政治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认识^[52], 可考虑配合《香港国安法》完善法官制度安排以避免政治化倾向。对于一些香港本地法律没有的规定, 可参考内地法的定义如“国家秘密”等^[53], 增加内地与香港司法机关的交流机制及具体案件协商机制, 以确保法律的准确落实; 还可增加香港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 以便两者在遇到法律适用问题时可以及时交流和达成共识, 减少因法律解释分歧导致的履职困难。对于《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基本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 有学者指出可通过订立《香港国安法》的解释原则、设立《香港国安法》的修改机制以及提升基本法委员会地位和功能的方式加以解决^[54]。

第三, 扩充惩治违法活动的制度工具箱。针对一些破坏国家安全的灰色行为和域外活动难以得到惩治的问题, 可借鉴国内外相关法律的规定, 增强《香港国安法》的空间效力范围, 借助明确、扩展的域外效力条款应对跨境执法困境。一方面, 可参考国内外相关法律强化对区域内犯罪行为的约束, 扩充法律内容。其一, 在处理过程中, 涉及数据安全和金融经济等方面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往往与多重问题交织在一起, 需要强化各部门协同运作的机制。不同部门之间的分歧可能引发治理危机、削弱法律的权威性, 可强化《香港国安法》在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方面的规定, 如完善香港警务处、入境处、海关等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其二, 全国性法律如《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国家情报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都可以为《香港国安法》的制度完善提供资源和启示, 这类全国性法律可填充《香港国安法》较粗疏的法律网眼, 具有补充和填充作用^[37]。其三, 在行政机关的设置上, 《香港国安法》规定香港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 这意味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并不是独立的, 可考虑增强其独立性, 以提升其执法能力和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 《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条款设置也可借鉴国际经验, 细化落实各项制度安排、扩展国际合作空间。其一, 国际上在订立禁止外国干预的犯罪行为条例方面已积累不少经验, 可适当参考其经验和理念完善《香港国安法》。随着全球化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更多国家颁布了具有域外效力的国内法, 其中属刑事管辖“保护原则”最为典型^[5]。如澳大利亚在 2018 年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 2021 年新加坡颁布《防止外来干涉 (对应措施) 法案》, 主要针对电子通讯领域的外部干预; 英国颁布的《2023 年国家安全法案》, 对外国干预行为作出了广泛定义并引入外国影响力注册制度。其二, 参考国际法的相关规定适应性调整《香港国安法》及配套制度建设。一些具有国际共识的条款能够为完善《香港国安法》提供启示, 如防范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等相关罪行已是国际共识, 可进一步挖掘可利用的国际法资源, 根据国际法规则扩展域外效力条款的适用领域。此外, 还需要充分考虑《香港国安法》与国际法律的协调, 确保法律的适用不会与国际法或国际条约产生冲突, 减少跨境执法中国际合作的障碍。

六、结语

《香港国安法》在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应对内部和外部的冲击、恢复香港社会秩序稳定、巩固“一国两制”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完成阶段性目标后，面对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遇到的新情况，我们需要及时通过释法、补充立法等方式进一步调整相应的内容条款及实施细则。落实《香港国安法》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多阻碍，如外部势力的干涉虽有减弱但仍会持续，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法律衔接不畅等。《香港国安法》的完善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定期跟踪实施成效、修补薄弱之处。当然，维护国家安全不仅依靠完备的《香港国安法》，还需要完善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在宏观上相互配合，保证香港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准确落实。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杜磊，邹平学.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宪法依据[J]. 港澳研究，2020（4）：28-40+94-95.
- [3] 强世功. “想象”与“现实”——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完整世界中理解香港特区国安立法[J]. 港澳研究，2020（4）：17-27+94.
- [4] 祝捷，秦玲. 论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责任划分——基于《香港国安法》第 3 条的分析[J]. 港澳研究，2022（1）：3-12+93.
- [5] 顾敏康，王振华. 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效力研究——从香港国安法第 38 条展开[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34-142.
- [6] 欧锦雄. 驻港国安公署立案侦查的法律适用研究——贯彻落实香港国安法的法律思考[J]. 港澳研究，2021（4）：21-33+94.
- [7] 马发腾，邹平学. 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谋划《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工作的思考[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3）：67-77.
- [8] 陈毅坚，曾宪哲. 《香港国安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J]. 港澳研究，2024（1）：3-14+93.
- [9] 祝捷，周娴. 论《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与香港刑事法律制度之融贯[J]. 港澳研究，2023（3）：3-14+93.
- [10] 陈丽君，唐晓玲. 试论香港政治生态现状、特点及其原因[G] //当代港澳研究：第 1 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183-184.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6-28.
- [12] 乔晓阳论基本法[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430.
- [13] 严椰铭.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路径选择[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5）：106-111.
- [14] 刘兆佳. 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特区管治及新政权建设[M].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220-221.
- [15] 王英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分析[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36.
- [16] 黄来纪，尤俊意，庄金锋，等. 澳门居民国家认同感问题研究[G].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38.

徐天骄.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建构、成效与完善——基于《香港国安法》的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52-166.

- [17] 韩大元, 夏泉, 姚国建, 等. 香港国安法笔谈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1-24.
- [18] 时代研发有限公司. 《港区国安法》首宗判决 唐英杰案启示 [M]. 香港: 时代研发有限公司, 2022: 21-22.
- [19] 刘兆佳.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J]. 港澳研究, 2020 (1): 3-12+93.
- [20] 刘兆佳. 在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中理解和实践“一国两制” [J]. 港澳研究, 2017 (4): 3-11+91.
- [21] 张定淮. 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中的政治与法治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8: 11.
- [22] 张建, 张哲馨.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 [J]. 太平洋学报, 2017 (7): 25-35.
- [23] 周方舟. 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战略的演变 [J]. 港澳研究, 2023 (2): 50-59+95.
- [24] 张建. 美国对香港修例风波的介入: 评估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1): 46-53.
- [25] 饶戈平.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学习与解读 [J]. 港澳研究, 2020 (3): 3-9+93.
- [26] 张建, 唐光俊. 民进党当局借“修例风波”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手段、动机及影响 [J]. 台湾研究, 2023 (3): 51-61.
- [27] 伍俐斌. “港独”与“台独”合流的初步分析及法理应对 [J]. 台湾研究, 2017 (3): 23-30.
- [28] 王禹. “一国两制”: 亚洲立宪主义的一个新发展 [G] // 中国宪法年刊 2012.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134.
- [29] 刘兆佳. 回归后的香港政治 [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2013: 12-14.
- [30] 韩大元. 论《香港国安法》第2条“根本性条款”的规范内涵 [J]. 法学论坛, 2021 (4): 5-10.
- [31] 江国华. 司法文明论坛 (2017年卷) [G].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198-204.
- [32] 大国之声: 人民日报国际评论“钟声”2021 [G].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2: 93.
- [33] 保安局局长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会见传媒谈话全文 [EB/OL]. (2024-06-21) [2024-03-05].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6/21/P2024062100821.htm>.
- [34] 陈弘毅.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 (增订版) [M]. 香港: 中华书局 (香港) 有限公司, 2014: 97.
- [35] 香港警务处. 2023年警察年报 [EB/OL]. (2024-07-09) [2024-08-05]. https://www.police.gov.hk/info/review/2023/html/sc/hkpf_07.html.
- [36] 梁爱诗. 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背景与主要内容评述 [G] // 香港国家安全法解读: 立法与管治, 香港: 中华书局 (香港) 有限公司, 2020: 22.
- [37] 曹旭东. 论《港区国安法》与香港原有法律体系的关系——解析《香港基本法》第11条和《港区国安法》第62条 [J]. 法学论坛, 2021 (4): 28-36.
- [38] 黄明涛. 论《香港国安法》之中行政长官的主要权力 [J]. 法学论坛, 2021 (4): 11-19.
- [39] 朱国斌. 香港国安法与香港法律制度: 对照、分析与思考 (下) [J]. 紫荆论坛 2021 (9-10): 28-37.
- [40] 黄明涛. 香港特区国安委如何行使职权并向本地负责 [G] // 香港国家安全法: 法理与实践. 香港: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2021: 174.
- [41] 郭天武, 朱紫芊. 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探析 [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21 (3): 58-71.
- [42] 肖蔚云. 香港基本法讲座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1996: 159.
- [43]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敦促中国香港采取行动废除《国家安全法》 [EB/OL]. (2022-07-27)

- [2024-03-05] .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07/1106712>.
- [44] 贾健, 董欢. 竞技体育领域侵犯国家象征行为的规制 [J]. 体育学研究, 2022 (2): 93-102.
- [45] 朱国斌, 黄辉, 等. 香港司法制度 [M]. 香港: 中华书局 (香港) 有限公司, 2013: 23.
- [46]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文件汇编 [G].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3: 38.
- [47] 刘志刚. 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与监督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0: 192-193.
- [48] 孙潇琳. 香港国安案件刑事管辖机制的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73-83.
- [49] 强世功. 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与规范意涵——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论述 [J]. 港澳研究, 2020 (2): 3-22+93.
- [50] 韩大元, 杨晓楠. 论《香港国安法》的原意解释 [J]. 港澳研究, 2023 (2): 3-13+94.
- [51] 郭天武, 吕嘉淇.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4): 82-90.
- [52] 李晓兵. 爱国宪法主义 后国安法时代的反思 [M]. 香港: 悦文堂, 2022: 146.
- [53] 韩大元, 朱国斌, 黄明涛, 等. 《香港国安法》逐条释义 [M]. 香港: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2023: 179.
- [54] 林緻茵. 探讨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的实施: 以《香港国安法》为例 [G] // 香港国家安全法: 法理与实践. 香港: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2021: 62.

责任编辑: 王京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 历程、突破与展望

曹宇轩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香港回归以来, 国民教育经历了 1997—2007 年的无形淡化阶段, 2007—2012 年的初步推进阶段, 2012—2020 年的遭受挫折阶段。2020 年后, 《香港国安法》推行、香港选举制度改革, 特区政府得以不受干扰地全力推进国民教育。措施包括整治香港教育界乱象、增设推行机构、调整课程指引、优化教材监管、完善教师培训、改革课程内容、增强教学管理、丰富实践活动。至此, 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取得突破, 香港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且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当下, 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工作还面临制度、师资、课程、监管等方面的挑战, 要进一步完善教材评审制度、设定阶段性清晰目标, 以此探索适合香港的国民教育模式、构建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

关键词: 香港特区; 国民教育; 国家认同; 《香港国安法》; 由治及兴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6-0167-15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6.015

作者简介: 曹宇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国两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17ZDA109)

引用格式: 曹宇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67-181.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认同是现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调整的是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1],大力推行国民教育是各国提升国民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基本乃至最重要的方式^[2]。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特区政府)意识到需要增强香港居民的国家归属感、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3],开始筹划推进国民教育。然而,回归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港英时期殖民教育的惯性,教育领域“去殖民化”并未实质性启动,国民教育实际处于缺位状态。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很难在国民教育缺位的条件下建构。2019 年修例风波凸显香港社会存在巨大分歧,部分香港青少年对国家认同不足。随着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社会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2021 年,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将“反中乱港”势力剔除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香港政治生态得到进一步改善。在此背景下,特区政府得以着手推动香港教育体制改革,以“多重进路、相互配合”的方式推行国民教育,成效显著。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多在国家认同视域下探讨香港特区国民教育^[4]。其一,关于香港特区国民教育概念意涵以及发展历程。吴鹏对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界定较为详尽,即香港国民教育核心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紧密结合^[5]。基于这一界定,学界对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发现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存在阶段性特征:1997 年前国民教育缺失;1997 年至 2020 年国民教育探索与受挫^[6];2020 年国民教育开始实现突破^[7];如今,香港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其二,关于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研究学者普遍认为,2020 年之前,香港特区国民教育推行力度不足,在政治认同方面收效甚微,并从观念、制度^[8]与历史^[6]三个层面剖析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现实困境的原因所在。其三,关于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改革举措及完善思路。2020 年后,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以及选举制度改革,香港政治生态发生转变,“爱国者治港”修复巩固,“人心回归”成为香港治理下一阶段的关键^[9]。在此背景下,学界对香港特区国民教育新变化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更多以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某个侧面为切入点,譬如梳理过去“通识教育科”存在的问题,研究改革后“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预期成效,分析其对国民教育的意义^[10-11];或是以《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抓手,研究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的成效^[12]。综而观之,现有研究缺乏对 2020 年后香港特区国民教育新突破的系统性梳理,没能全面呈现 2020 年后香港特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大突破,且对 2020 年后推进的改革举措缺乏整体性评估。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强调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13]。这为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鉴于此,本文梳理并回顾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不同阶段,归纳并分析各个阶段的特征,重点梳理 2020 年以来特区政府为推进国民教育采取的重大举措,分析这些改革举措对于建构香港特区国民教育体系

的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香港特区国民教育未来走向。

二、1997 年以来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回顾

在香港, 国民教育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一环, 旨在培养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观念、国民身份认同, 增进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责任感。香港特区国民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加强香港青少年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二是构建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和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 三是培育香港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5]。香港回归至今, 特区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推进国民教育。

(一) 1997—2007 年: 无形中被淡化阶段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 正式开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回归初期, 依《香港基本法》规定, 香港特区实行高度自治, 特区政府享有教育行政管理权及教育政策制定权。为保证香港社会平稳过渡, 回归后香港教育行政管理及教育法律体系基本沿用港英时期的, 没有进行大的变动^[14]。中央并未干预香港特区国民教育, 也没有构建起敦促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监督机制。这一时期, 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推行主要遵循过渡时期颁布的“九六指引”, 以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框架的细化及教学内容的发展为主。

其一, 在课程框架的细化方面。2001 年香港教育署发布《学会学习: 课程发展路向》报告书, “公民教育科”被“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取代。报告列明了改革后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课程的七个学习宗旨, 其中与国民教育内容相关的是“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 致力贡献国家和社会”。2002 年香港教育局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指引》, 进一步指明了“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核心价值。“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在其中没有被明确为首要核心价值, 《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将其与道德层面的“坚毅”“尊重他人”“责任感”和“承担精神”一道, 并列为该科目的五个核心价值。在培养路径上, 《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建议从家庭、邻里、地区、国家民族、国际五个基本层面出发, 培育学生的公民意识。这与“九六指引”一脉相承^[6]。同年,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香港教育业机构)编订了《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将“体认中华文化, 培养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作为课程宗旨之一, 旨在通过学习中国文化传统, 增进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15]。

其二, 在教学内容的发展方面。香港回归后, 特区政府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并定为必修课进入课堂教学, 1998 年香港教育署开始推行母语教育, “两文三语”局面出现, 普通话被列入广泛使用的课程语言^[16]。此外, 自 2001 年 9 月起,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在香港特区初中、小学和高中逐步得到推广, 成为必修的独立科目。这一时期特区政府主要通过这一科目推进国民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加强了该科目中国国民教育课程的设计力度。

其三, 在国民教育的宣传方面。这一时期香港特区在政府与社会层面设立了多元、多层次的推进公民教育及促进国民身份认同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在全社会筹办并开展多项活动, 推进国民教育与爱国主义宣传。特区政府于 1998 年成立了“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 主要负责在全社会推进《香港基本法》的宣传工作, 让香港居民能够更好认识《香港基本法》, 增进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该委员会还下设“教师及学生工作小组”, 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及评估面向全港师生的《香

港基本法》推广工作计划。此外，特区政府还于 2004 年成立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主要负责制定在校外推进国民教育的策略及计划。同年 10 月，国民教育专责小组首次推出“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系列短片，其后 4 年分别推出以“志在四方”“承我薪火”“共耀中华”及“国家成就”为主题的短片。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和公民教育委员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情教育，香港民间社团也开展了大量与内地的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17]。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国民教育未单独成科，而是分散到各学科中进行。特区政府主要依托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德育与公民教育科”，以柔性方式推行国民教育，这对于国民教育的完整性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尽管特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培育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但培育国家认同始终不是香港特区公民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香港特区的公民教育强调“普适”的“应然公民”和区域的“香港公民”。学生接受“普世公民价值观教育”，容易陷入狭隘的本土观念，致使国家认同意识不足^[6]。第三，在课程内容设计上，特区政府延续了港英时期的柔性教育路径，主要通过道德和文化层面教育来加强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较少涉及政治层面。

（二）2007—2012 年：初步推进阶段

2003 年反对派“七一大游行”使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问题得到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高度关注。2004 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首次出现“国民”字眼，提出“广大香港居民自觉履行国民责任”。2007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香港并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此后特区政府在教育政策改革中更明确地将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作为目标，并在当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提出推行国民教育的规划。2008 年香港教育局修订了《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取代过渡时期的“九六指引”，明确要求学校进一步加强国民教育^[14]¹⁸⁵。2008 年抗震救灾、奥运会展现了国人的团结，也使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大幅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建构进入关键期。

此阶段，特区政府尝试将国民教育单独成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 2010 年度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增设“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为中小学必修课，更好帮助学生构建国民身份认同。依照此规划，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随后编写了《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这意味着特区政府开始有意将学校教育重心引向国民身份认同建构^[18]。在汲取了社会各界对于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意见后，2012 年 4 月，香港教育局正式发布《德育、国民及公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下文简称《一二指引》）。《一二指引》之前，特区政府主要采取各种柔性模式推进国民教育，通常包括“渗透式”“综合学科”和“混合模式”等策略。在渗透式模式中，国民教育的相关元素被融入各学科的教学内容，学校通过学科内容让学生接触国民教育概念，并不直接教授学生国民教育知识。综合学科模式则是指不将国民教育单独成科，将其分散到各个学科当中。混合模式是指特区政府更多通过课外实践活动推进国民教育，而不是局限于课堂内部，但课外实践活动是自愿性的，内容也多与中华历史文化相关，并不直接接触及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一二指引》出台意味着特区政府正式提出在中小学逐步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课程框架。

为丰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学与教资源，香港国民教育中心于 2012 年 6 月编写并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手册》不同于以往“只讲文化，不讲政治”的做法，在“当代国情”部分宣扬国家几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此增进香港青

少年对国家的认同感。《手册》部分内容被截取并上传网络, 被极端反对派污名化为“政治洗脑”。极端反对派煽动部分群众在7月29日发起游行, 要求特区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迫于压力, 特区政府于2012年9月8日宣布取消三年“国民教育科”开展期的规定, 允许学校自行决定是否设立此科目, 若设立可自行决定教学方式与课时安排。这意味着特区政府在事实上搁置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这一时期, 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培育青少年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在国民教育的推行上注重整体性, 尝试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单独设科。特区政府在推进国民教育的过程中还尝试改变过去柔性教育路径, 更加注重定位准确的国民身份认同建构。然而, 2012年爆发的国教风波使得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面临巨大压力, 最终不得不放弃将国民教育单独成科。

(三) 2012—2020年: 遭受挫折阶段

香港国教风波后, 国民身份及政治参与等在学校成为“敏感”议题, 反对派依旧盘踞思想、媒体、教育等领域。2012年之后, 香港接连爆发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旺角暴乱和2019—2020年的修例风波。这期间, 香港经历了政治斗争和暴力冲突。香港特区立法会内部及其与特区政府之间政治分歧不断, 严重影响香港管治架构的运作和效率。政治分化对立尖锐, 由内外敌对势力挑起、针对中央和内地的政治斗争亦此起彼伏。

在此情势下, 一些原本开展的国情教育因害怕被指责“洗脑”而取消。2014年非法“占中”后, 香港特区的学校与社会回避国民身份认同的学习, 国民教育被看成自愿、可参加也可不参加的活动。一些培养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活动, 如升国旗, 香港教育局只是提倡和鼓励, 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推行, 也没有建立监督机制。这一时期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力度很小, 完全不具备规模效应^{[14] 257}。

大部分学校仍沿用原校本模式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 对国民教育的推行并无统一要求。这一时期更新的课程指引也多沿袭2008年之前的架构, 在内容上着重强调中华文化, 在方式上承袭柔性教育路径。以2017年香港教育局发布的《中学教育课程指引》为例, 该《指引》与国民教育相关的宗旨为“成为有识见、负责任的公民, 认同国民身份, 并具备世界视野, 持守正面价值观和态度, 珍视中华文化和尊重社会上的多元性”。该《指引》提出学校教学重点应当包括“加强价值观教育”“加强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学习”^[19]。这一时期对青少年的教育更多强调世界视野, 在国家认同的培养上仍然着重从文化层面入手, 较少涉及政治层面。

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重点放在文化认同上, 避免涉及政治认同, 推进方式也较为柔和, 推进成效相当有限。这一时期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存在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强化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二是增强学生对于国情的认知; 三是继续推动内地交流计划; 四是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推广《香港基本法》^[20]。

(四) 2020年至今: 重启突破阶段

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引发长时间街头暴乱, 其中更是夹杂“港独”思潮、极端主义思潮的公开传播, 引发中央严重关切^[21]。中央痛定思痛, 下定决心要在香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落实“爱国者治港”, 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

2020年6月30日, 《香港国安法》通过, 次日正式实施。《香港国安法》填补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短板漏洞, 结束了香港持续两年的暴乱, 大幅压缩了国内外敌对势

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以及爱港爱国力量掌握思想、教育和媒体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扫除了障碍。2021年3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性完善。随后，香港特区完成相应本地立法。自此，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把“反中乱港”分子从香港特区的管治架构驱逐出去，他们背后的外部势力也再难产生影响。2023年，特区政府又改革了区议会的职能和产生办法，杜绝了“反中乱港”分子进入区议会。这些重要改革的总体结果是让香港特区管治权完全掌握在爱国者的手上，让“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原则得以全面体现。

在新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中，“反中乱港者出局”，反对势力在思想、媒体和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以及爱港爱国力量得以在少受干扰的环境下推行国民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及《香港基本法》教育。自2020年至今，香港特区国民教育迈向突破阶段，特区政府开始使用《香港国安法》打造的法律框架丰富完善国民教育，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且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这为后续推进国民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加强对教育界乱象的整顿，真正落实“爱国者治教”；二是推进国民教育不再遮遮掩掩，在课程内容中增加促进政治认同方面内容；三是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改革措施、整合多个推进主体，系统性、全方位地推进国民教育；四是特区政府加强对学校推进国民教育的监管与检视力度。

三、2020年以来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举措与成效

《香港国安法》实施前，香港社会泛政治化与政治对立严重，香港极端反对派通过在香港发动激进社会运动来妖魔化国民教育，部分反对派议员还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上对推动国民教育等相关议案进行“拉布”，让国民教育难以顺利推动^[22]。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为改善香港政治生态奠定了重要基础。2021年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危害国家安全、阻碍香港发展的力量难以进入香港管治团队，行政与立法关系进一步得以理顺。香港迈入政治稳定、爱国者治港、行政主导、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与内外敌对势力受压的崭新局面，实现了由乱及治到由治及兴的转变。在此背景下，特区政府采取了诸多举措，以多重进路、互相配合方式推行国民教育，从国家观念、历史文化、国家安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等数个方面，以课堂教学、专题研习、内地交流等多元载体，开展全面而深入的国民教育。短短几年间，特区政府在推进国民教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彻底改变了过去“只讲文化、不讲政治”的柔性教育路径，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

（一）整治香港教育界乱象

《香港国安法》落地后，特区政府连同香港教育局对香港教育界的种种乱象进行全面整治，杜绝“反中乱港”势力骑劫香港青少年思想，防止“港独”思潮在校园蔓延。经过一系列整治工作，香港教育界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第一，失德及违法教师或辞职或被取消教师资格。为全面落实《香港国安法》，特区政府以及香港教育局高度关注教师失德及违法问题，通过发谴责信、书面警告以及取消教师资格等方式作出

曹宇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67-181.

处罚。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于 2022 年 6 月在立法会表示：“局方由 2019 年起至今年 4 月，已因教师失德问题取消了 27 人的注册，并向 69 人发遣责信及 134 人发书面警告。”2021 年 7 月，香港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发布《加强保障学童的措施：学校教学及非教学人员的聘任》通告，严格监督学校教学及非教学人员的聘任情况，确保教学及非教学人员符合教学资格及专业操守。自此，香港的教师队伍得到重新整治，教育团队得到全面净化。

第二，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乱港团体“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成立于 1973 年，由香港各级学校教师共同组成，鼎盛时期拥有超过 10 万会员，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在香港教育界影响力巨大。然而，“教协”长期以来被反对派利用把持，依仗成员人数众多，试图垄断香港教育话语权，甚至大肆操弄政治，宣扬“港独”思想，为极端反对派的反中乱港恶行推波助澜。2021 年 7 月 31 日香港教育局宣布，全面终止与香港“教协”的工作关系，不再视其为教育专业团体；香港教育局日后不会与香港“教协”或其代表举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会议，并会全面检视辖下的咨询组织及相关的教育团体；香港教育局亦将不再承认香港“教协”为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随后，香港“教协”自行解散。这拉开了香港教育领域深入整治的序幕^[9]。

第三，清理香港高校学生会。香港学生会是香港高校最大的学生组织，也是独立于大学之外的注册社会团体。自 2014 年非法“占中”以来，香港各大高校学生会高度关注政治议题。部分高校学生会更是沦为“港独”思潮在校园散播的温床，成为香港乱局的急先锋。《香港国安法》推行实施后，香港高校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学生会问题。香港大学宣布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以及它现有在校内的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宣布解散；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停止代学生会收取会费；香港岭南大学不再承认学生会地位；等等。

（二）增设推行机构

特区政府与不同部门保持紧密合作，携手推进国民教育的发展。2020 年以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新设数个推行机构推进国民教育。

2022 年 2 月，香港特区立法会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如何推行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小组委员会于 2022 年 5 月开始开展工作，职权范围主要是研究及跟进学校（官立及资助幼稚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及大专院校）落实国民教育及国家安全教育的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政策事宜，并在有需要时提出建议^[23]。

2022 年 7 月，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成立香港首个爱国教育支援中心。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名正言顺地举办爱国教育学习活动和教师培训课程，旨在促进教育界推动爱国及国家安全教育，培养香港青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2024 年 4 月，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其职权范围大体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协助制定香港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计划和策略；二是监察、评估及检讨根据商定策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三是促进特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在推广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四是处理与爱国主义教育推广相关的其他事务^[24]。特区政府成立该工作小组，旨在协调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在多个层面增进香港青少年对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认识，对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024 年 4 月，特区政府成立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简称弘扬办），负责策划中华文化和历史相

关活动、交流与合作，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其中，弘扬办与教育局协作推出的“中国历史文化教师培训系列”专为教师而设，内容包括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科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协助他们向不同年级的学生教授中华文化。

（三）调整课程指引

香港教育局颁布的课程指引在规划教学内容、支持课程设计、推动教育改革、引导教材编写及指导教育评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后，特区政府更新并出台了诸多课程指引，将维护国家安全、增进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整合进香港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体系中，为国民教育规划及实施策略提供具体可循的行动指南。

第一，2021年5月，香港教育局发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和15个相关科目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课程框架》包括八大相关范畴，覆盖初小至高中，程度由浅入深，让学生认识国家安全的概念及意义、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法律对国家安全的规定、国家安全与“一国两制”的关系、《香港国安法》列明国家安全的四种罪行，以及国家安全与人权、自由、法治的关系等。这让学校通过将各科目内容与国家安全的不同领域相联系，确保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生日常学习紧密关联。学校还通过全校参与、跨科协作，整体规划相关科目的学与教安排，策划课堂以外的学习活动^[25]。

第二，2021年6月，香港教育局公布了《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修订版，指引涵盖科目的课程架构、课程规划、学与教及评估等，还列出了10个课程理念，要求通过中文教育让学生深入认识中华文化，吸收优秀养分，增强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14] 285}。同月，教育局公布了《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强调要帮助学生加深个人对中国国籍和中国公民身份的了解和认同，通过学习能够认同国民身份，了解香港、国家、国际社会的角色^[26]。

第三，2021年11月，香港教育局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鼓励学校基于现有教学基础，培养学生的正面价值观和态度。该《课程架构》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学生的国家观念，协助学生从小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欣赏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尊重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象征和标志，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建立国民身份认同^[27]。

第四，2024年7月，香港教育局公布了《小学教育课程指引》，供学校于2024—2025学年正式推行，从而进一步优化整体课程规划，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指引》延续了试行版中“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培养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的学习宗旨。因应国家、社会和教育的最新发展，《指引》增加了与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内容，展示如何在课堂内外推动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加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国民身份认同及爱国情怀^[28]。

（四）优化教材监管

2020年后，香港教育局针对此前课程教材存在的管理漏洞作出一系列调整，以此加强对教材的管控力度，培养学生爱国爱港意识。

第一，在教科书的编写方面。香港教科书编写由民间出版社全权推动，香港教育局承担指引、监督和协调工作。为此，香港教育局编订了针对不同学科的《课本编纂指引》，同时发布《优质课本基本原则》以及不同学习领域和学科的课程及评估指引，供出版社参考。出版社在编写教科书时需涵盖课程指引中所订明的宗旨、学习目标等。此外，2020年后香港教育局陆续发布了《香港国家

曹宇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67-181.

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等文件, 出版社必须参照上述文件编写教材^[29]。2020年, 香港教育局修订了《课本编纂指引》, 在初中中国历史、历史、地理、生活与社会的编纂方针中新增部分建议, 强调课本中的学习活动和课业应“避免包含太多涉及评论的问题”。

第二, 在教科书的审定方面。在教材的评审阶段, 香港教育局扮演着关键角色。根据教育局规定, 新编、改版、重印以及订正的课本都需要经过评审, 评审主要依据《优质课本基本原则》, 也会参考各学段的《课程指引》《课本编纂指引》《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以及《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等相关准则。科目评审小组根据这些准则文件, 检视送审查教材是否符合课程宗旨、教学目标及评核要求, 并综合考虑是否将其纳入《适用书目表》^[29]。针对此前出版社存在的无视审定意见出版与销售教材的问题, 香港教育局在申请受理制的基础上增加复审环节。这意味着即使教材审核通过, 出版社仍然需根据评审报告所提出的意见, 修订必须更正的部分。只有在修订获得教育局认可的前提下, 方能对教材进行出版销售。此外, 特区政府扩展审定的科目范围, 将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目教材正式纳入送审机制。这意味着公社科的教科书需要通过教育局的审查与审核, 通过审核后的教科书便列入《适用书目表》, 各校的选书委员会将参考《适用书目表》挑选合适书籍。

第三, 在教科书的选用上。为了方便学校更好选用优质教材, 香港教育局对教材评审作出部分调整, 公开了教材评审中核心项目的概括性评语。学校及其他相关人士可通过《适用书目表》的相关网页查询, 并将此作为教材选用的参考。此前, 香港中小学教材遴选的决策权囿于小范围的专业群体内, 主要由学校和教师基于专业认知作出选择。经此调整, 家长与其他社会人士都能够更好地了解教材的基本情况并参与教材选用过程, 学校、政府、家长以及社会人士等作为“广泛决策”主体的参与度得到明显提升^[30]。

（五）完善教师培训

教师是学生的楷模, 教师的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2019年修例风波反映出一些教师涉及偏颇、失德、违法等行为。对此, 香港教育局加强师资培训以及颁布《教师专业操守指引》, 整顿教师队伍中的乱象。

第一, 从2020—2021学年起, 香港教育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的相关内容, 纳入新入职教师、在职教师及拟晋升教师的核心培训课程。香港教育局也会与专家和相关机构合作, 举办专题式课程, 为校长和教师提供相关培训。另外, 香港教育局规定公帑资助学校新入职教师及公营学校晋升教师必须参加内地学习团, 亲身体验国家发展, 加强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的能力。教育局亦增加在职教师到内地考察的机会。此外, 从2022—2023学年起, 公营学校新聘的常额教师必须在《香港基本法》测试取得合格成绩。从2023—2024学年起, 测试范围扩展至所有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及参加幼儿园教育计划的幼儿园, 以现金津贴聘请的合约教师亦须通过测试。测试内容同时涵盖《香港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

第二, 教育局于2022年12月公布《教师专业操守指引》, 《指引》主要聚焦教师应有的专业及个人道德与操守, 归纳为8项, 其中包括“恪守法治”。《指引》就教师专业操守准则, 列举例子说明教师“应该”和“不应”做的事。教师必须守法守规, 尊重教育局及学校的合法权力, 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 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公众利益, 履行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 积极支持及推广国民教育, 培养学生正确的国家观念。

（六）改革课程内容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学校课程内容加入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国民教育，提高香港青少年守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香港学校初中课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独立单元已加入“国家安全”增润部分。香港教育局适时更新课程框架与学科指引，阐述中小学课程内有关国家安全的课题、教学重点和学习元素。学校参照作整体规划，将国家安全教育“自然联系并有机结合”在各科课程内容，提升学生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归属感的同时也尽力避免所谓“洗脑”疑虑^{[14] 285}。

在具体课程设置上，目前特区政府将中小学的国民教育课程统筹为三个科目。第一是高中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2021年4月，香港教育局宣布将“通识教育科”更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并在未来3年逐步取代高中通识教育科。争议多年的通识教育科在2024年彻底结束。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参考了通识教育科的课程宗旨及目标，同时对其作整合及内容精简。课程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三个主题为核心内容，重视培养学生的正面价值观、积极态度及国民身份认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必修必考，考核成绩由五个等级改为“达标/不达标”两级，不设独立专题研习，为学生提供前往内地考察机会。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和实地考察两部分，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国情，增进国民身份认同。

第二是初中的公民、经济与社会科。2022年10月，香港教育局将初中阶段“生活与社会科”改名为“公民、经济与社会科”，建议该课程于2024年9月在全港学校的中一级全面推行。改革后的课程修订了“课程宗旨”和“学习目标”，突显个人在社会的角色和责任，帮助学生认识国家及培养国家观念，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国情教育学习，加强国家安全学习。

第三是小学的人文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宣布开设小学科学科和人文科，取代小学常识科。根据香港教育局2024年3月发布的《小学人文科课程框架》，开设小学人文科的原则如下：配合爱国主义教育方向、进一步加强人文素养的发展、适时重新整合现行小学常识科课程。小学人文科课程架构涵盖社会与公民、国家与我等六大学习范畴，增加了中华文化、国史及国家地理等元素^[31]。

香港特区也在探索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特区政府沿用港英时期对高校的资助与管理模式，即教育局原则上不能对香港高校采取与中小学同等的强制手段。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就2022至2025年优配学额计划，向8所公办大学发出“启动筹划信件”，列明政府最新的宏观规划指标，包括将国家安全教育列为必修，但具体执行尊重院校自主。当前香港的大专院校通过课程内外的多元化学习机会，促进学生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宪制秩序、不同领域的最新发展等。

（七）增强教学管理

在政府评核上，香港特区教育体系、管理模式与内地显著不同，推行校本管理模式，即将权力下放给学校。学校可根据自身特点、需要、目标制定和实施管理政策。教育局主要提供宏观的政策框架和支持服务，如拨款、指导和评核，不会直接干预学校的日常管理决策。2020年后特区政府也是在此框架下推进国民教育。香港教育局对学校教学的监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全面视学，二是重点视学。全面视学是由教育局派遣外评队伍进驻学校，进行为期五日到一周不等的评估，全面评鉴学校教学、对学生成长的帮助、学校财务及人事管理等所有方面。重点视学，是指教育局人员集中对某一个学科的教学质量或某一个教育活动进行评估^[32]。香港教育局不同分部一直通过校外评核、

曹宇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67-181.

重点视学、学校探访、日常与学校沟通等途径, 了解学校工作 (包括国民教育) 的推行情况, 并因应需要为学校提供支援及改善建议。香港教育局在评核学校国民教育推行情况时, 更侧重于指导和建议, 评核的方式较为柔性, 而非强制性, 最终的执行仍需依赖学校自身的配合与落实。

在学校自查上, 就评估成效而言, 国民教育是学校课程一部分, 属于学校的常规工作。在赋权问责的校本管理精神下, 学校管理层有责任策划和监察学校工作, 包括国民教育的推行、跟进落实和后续完善情况。从 2022—2023 学年起, 香港教育局推出了“优化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 旨在增强公帑资助学校人员对教育质量的问责意识, 并通过全校参与模式, 强化并完善国民教育。为此, 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在 2022—2023 学年内委派专责统筹人员领导整体策划工作。全校层面的规划有助于提升跨科目/组别的交流协作, 提升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的学与教质量, 加强家长教育及家校合作。

(八) 丰富实践活动

特区政府着力以体验活动推进国民教育。2020 年后, 香港的中小学通过举办多元化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对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认知。

2021 年 9 月开始, 香港教育局要求全港中小学须在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和奏唱国歌, 加强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感情、国民身份认同。在实践活动层面, 2022—2023 学年香港教育局继续与香港保安局合作推出“国家安全齐参与”计划, 营造维护国家安全的氛围, 加深全港师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及国家安全的理解。香港教育局整合了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 鼓励学校在各重要日子举办国民教育活动。香港教育局带领公办学校率先在 2022—2023 学年以全校参与和联校协作模式, 结合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 推出一系列以“心系国家”为主题的联校国民教育活动。香港教育局鼓励其他办学团体同样发挥积极带头作用, 组织和支持学校推行联校国民教育活动。

香港教育局结合学校课程, 筹办及资助学校推出不同主题的中小學生内地交流计划。此外, 改革后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设计中包含内地考察一项, 要求所有高中学生通过实地考察活动, 亲身了解国情和国家的最新发展, 增进对国家成就及中华文化的认识和欣赏。随着香港与内地恢复全面通关,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内地考察已于 2023 年 4 月正式开启。约有 5 万名高中学生于 2023 年 4 至 8 月期间到内地考察。香港教育局在 2023—2024 学年重启了中小學生内地交流计划, 约有 109 000 名额。在姊妹学校计划方面, 教育局为每所与内地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的本地公营及直接资助计划学校 (包括特殊学校), 提供经常津贴及专业支援, 促进两地学校双向交流和协作^[33]。

四、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前景展望

2020 年以来, 特区政府利用《香港国安法》打造的法律框架不断完善国民教育, 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 推进国民教育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香港政治生态持续改善, “爱国者治港”原则在香港落地生根, 香港国民教育的发展前景更加明朗。为进一步推进香港特区国民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人心回归”, 有必要直面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工作存在的挑战, 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未来, 在“爱国爱港”管治团队的带领和建设下, 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将在现有框架

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深化和拓展，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建设也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一）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2020 年后特区政府更新了诸多课程纲要及指引，为国民教育规划及实施策略提供具体可循的行动指南。因新举措推行时间尚短，当前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具体实效未完全显现。当下，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工作还面临制度、师资力量、课程推行等领域的不同挑战。

第一，国民教育推行存在制度性障碍。与内地不同，香港学校体系种类繁多、特点各异，主要有公帑资助学校和私立学校。香港学校体系以公帑资助学校为主，包括 800 多所公营学校及 80 所直接资助计划（直资）学校。公营学校中，有 700 多所是由政府全额资助的资助学校，还有 60 多所由政府直接营办的官立学校。除公帑资助学校外，香港有接近 100 所私立学校，一般开办非本地课程。尽管 2020 年后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推进国民教育，但香港教育体制中的校本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这不利于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统一推进。此外，回归后香港教育主权与治权逐层下放，受此影响，特区政府缺乏有效的检查评估手段和明确的考核指标。在教科书编写与使用上，政府只能通过课程框架与指引进行引导，并无权进行强制管控。

第二，推动国民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2020 年后，香港特区国民教育迈向突破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突显。其一，现有师资数量不足。随着国民教育的逐步推进，香港需要更多具备相关知识背景的教师。国民教育课程往往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知识积累，还需要具备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认同感。香港现有的师资队伍难以满足新增的国民教育需求。其二，现有师资质量不够。国民教育中的国安教育涉及很多复杂的法律条文，但目前提供给教师的相关培训较少。部分教师自身都难以正确理解国家安全，遑论教授学生。

第三，国民教育课程仍需完善。一是当前国民教育内容较为分散。当前香港国民教育并未单独成科，分散在中小学的不同科目中。这种分散的安排导致学生在接受国民教育时，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难以很好地形成对国民教育全面深刻的理解。不同学习阶段存在不同的与国民教育相关的内容，需要做好考核与衔接。二是部分课程考核宽松，可能会影响国民教育实施效果。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下文简称“公社科”）为例，改革后的公社科较之从前的通识科，在内容上作了大幅删改，删减了一半课时；提出全新的考评框架，考核方式由计分考核改为等级考试，只设立“达标”与“未达标”两种等级。公社科增设内地考察环节，内地考察不列入考核。过于宽松的考核会使部分学生减少精力投入，课程实效性也会受到影响。三是教学出现形式化问题。例如，香港部分高等院校表面上支持国民及国安教育的推行，但实际并没有系统安排课程。一些院校把诗词歌赋作为国民及国安教育材料，未深入探讨国民及国安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意义。这种做法看似符合政策要求，实则未能真正推行国民教育，也未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国家认同^[23]。

第四，对学校国民教育推行情况监督仍有待提升。当前对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监督主要以学校自评为主，教育局监管为辅。2020 年后，学校设有负责统筹国家安全教育、中国历史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行政管理人员，级别是副校长、主任和科主任不等，各自分管、互不统属。监管标准也不统一，由学校自行确定。因此，绝大多数学校都采取“计时数”的方法，也就是计算各个学科和项目的教学课节和所花时间，统计全年在广义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上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单纯计时难以有效评估国民教育推行效果，在实践中还存在至少两种监督办法：一是观

曹宇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67-181.

课评课, 二是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是对年终学习情况的总体性评估, 而且是学生的自我评估, 成效有待观察。此外, 特区政府对国民教育的监管也存在一定欠缺。香港教育局对学校教学教育质量的监管部门, 称作质素保证部。监管方式主要为两种: 一是全面视学, 二是重点视学。国民教育往往通过重点视学的方式进行监管, 频率较低^[32]。

(二) 香港特区国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第一, 完善教材评审制度。教材是课程教学的基础, 教材中承载着学科知识及思想观念, 具备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由公权力部门对推行教材进行评审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也是世界各地通行做法。未来香港特区要推进国民教育高质量发展, 必须完善现有的教材评审制度。与香港相比, 澳门特区对学校教学的管理更为严格。2014 年澳门颁布《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 明确规定了各阶段教育的课程框架和教学时间, 澳门特区政府积极进行教材改革与管理, 牢牢掌握教材编写主导权。澳门特区通过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 为本地编写专门的历史教材, 并实现了全面覆盖^[34]。香港可效仿澳门, 建立完善的教材审查制度, 加大对教材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教与学资源平台的监管, 防止出现歪曲事实、有损国家和民族形象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35]。

第二, 设定阶段性清晰目标。香港特区应加大力度, 系统性且循序渐进地推进国民教育。香港的学校类型多元化, 国民教育在不同学校的发展有很大区别, 但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考虑设定阶段性的清晰目标。这方面可参考借鉴新加坡的教育方式。新加坡于 1997 年开始逐步在学校分阶段订立国民教育目标, 小学阶段的主题是“爱新加坡”、中学阶段的主题是“认识及相信新加坡”、高等教育阶段是“领导新加坡”^[23]。

第三, 探索适合香港的国民教育模式。香港社会多元化以及信息高度开放使得学生在校外容易接触到各种不同观点, 部分与国民教育内容相左, 这对学校推行国民教育构成了挑战。香港特区推进国民教育高质量发展, 应当在课程教学方面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在课程设置上, 应当兼顾历史文化教育与国情国安教育, 注重国民教育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全方位、多主体、多视角地开展国民教育。其二, 在教学方式上, 应避免过去枯燥的道德说教和单调的事实复述, 鼓励学生积极反思, 深入理解国民教育内容。其三, 积极利用多方主体力量, 通过多样化形式和渠道, 将国民教育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2]。

第四, 构建系统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其一, 改革课程指引。香港特区政府要注重国民教育规划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更好做到不同学习阶段国民教育内容及考评的有效衔接, 为国民教育规划及实施提供具体可循的行动指南。其二, 加强教师培训。香港特区政府要重视教师培训, 注重对未来从事师范行业的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感培育。其三, 完善监督评估。香港特区政府要强化对教育教材编写修订、课堂教学、课程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审查监督和统筹, 定期检查并评估香港各学校国民教育推进成效, 确保国民教育质量。

五、结语

自 1997 年香港回归至今, 特区政府在推进国民教育上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四个阶段。回归初期, 特区政府沿袭港英时期柔性教育路径, 学校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远离政治争议或敏感话题, 关于当代

中国的介绍明显不足。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局限于道德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在培养香港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层面作用有限。随着社会整体环境变化,特区政府开始意识到培育香港青少年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2010年,特区政府试图推动国民教育单独成科,但这一举措遭到极端反对派煽动的激烈抵制,最终被迫放弃,香港特区国民教育发展因此受挫。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再度回归柔性教育路径,不再直接接触及政治认同。直到《香港国安法》推行以及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特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取得突破。至此,香港特区初步构建起较为系统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

国民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单涉及学校教学,更涵盖实践活动、政治生态、社会氛围等方面,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随着香港政治生态的改善以及“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香港国民教育发展将从初期调整建设阶段迈向系统化、制度化建设道路。特区政府在推进国民教育时,要注重结合国家安全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多面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培养香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展望未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将继续深化和完善,香港在构建民众国家认同方面也必将取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 [1] 林尚立.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8): 22-46+204-205.
- [2] 康玉梅. “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民教育与国家认同 [J]. 环球法律评论, 2018(2): 165-177.
- [3] 郭志敏, 施雨丹. 近二十年香港公民教育政策演变探析 [J]. 现代教育论丛, 2014(8): 67-72.
- [4] 权麟春. 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兼论香港国民教育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3): 53-57.
- [5] 吴鹏. 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路径分析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4): 45-49+145.
- [6] 黄葳, 王岩.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政策变迁与改进路径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7(4): 33-39.
- [7] 张沐阳. 意识三态观视野下的香港教育改革 [J]. 港澳研究, 2024(1): 85-92+96.
- [8] 沈本秋. 观念挑战与制度短缺: 港人的国家认同建构之困——以香港国民教育问题为例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6(5): 137-142.
- [9] 田飞龙. 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 [J]. 台港澳青年研究, 2022(4): 101-112.
- [10] 黄元尚, 郭凯杰, 邓颖研. 关于改革香港通识教育的思考 [J]. 港澳研究, 2021(2): 66-74+96.
- [11] 王飞. 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最新发展与未来展望——基于香港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5): 91-100.
- [12] 张建.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 问题、成效与政策思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3): 44-52.
- [1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14] 陈丽君. 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变化研究 [M].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23: 248.
- [15]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R]. 香港: 课程发展议会, 2002: 18.
- [16] 蔡群青, 夏海鹰. 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下的香港国民教育发展策略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0(3): 3-12.
- [17] 陈丽君. 香港人价值观念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85.
- [18] 张曦煜, 余可华. 香港回归以来教育政策变迁与发展趋势——基于1997—2021年施政报告的Nvivo编码分

- 曹宇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67-181.
- 析 [J]. 世界教育信息, 2022 (12): 8-17.
- [19]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中学教育课程指引 [R]. 香港: 课程发展议会, 2017: 14.
- [20] 李秘. “一国两制”下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的探索 [J]. 广东青年研究, 2021 (1): 106-114.
- [21] 陈弘毅, 韩大元, 杨晓楠. 宪法、香港基本法与香港国安法十讲 [M].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22: 218.
- [22] 曹琬茜, 覃辉银. 制定香港国安法与落实“爱国者治港”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的影响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4): 58-63.
- [23]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 研究推动国民及国安教育小组委员会报告 [R]. 香港: 课程发展议会, 2023.
- [24] 李慧琼.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小组: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厚植家国情怀 [J]. 紫荆杂志, 2024 (6): 42-45.
- [25] 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培养学生承担公民责任 [EB/OL]. (2021-06-21) [2024-08-15]. <https://www.edb.gov.hk/sc/about-edb/press/insiderperspective/insiderperspective20210627.html>.
- [26]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R]. 香港: 课程发展议会, 2021: 4.
- [27]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 [R]. 香港: 课程发展议会, 2021: 12.
- [28] 香港教育局. 小学教育课程指引 [R]. 香港: 香港教育局, 2024: 2.
- [29] 蔡静婷, 李志甜, 马早明. 香港基础教育教材管理: 编写·评审·选用·监察 [J]. 基础教育参考, 2024 (5): 25-34.
- [30] 马早明, 夏雪景. 香港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变革探析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8): 152-159.
- [31]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小学人文课程框架 [R]. 香港: 课程发展议会, 2024: 3.
- [32] 邓飞. 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问题和解决建议 [EB/OL]. (2022-12-02) [2024-08-18]. <https://tiandainstitute.org/2022/11/02/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问题和解决建议/>.
- [33] 香港教育局. 多元化推国民教育 培养正确国家观念 [EB/OL]. (2024-04-14) [2024-08-19]. https://www.am730.com.hk/生活/特刊/多元化推國民教育-培養正確國家觀念/371526?utm_source=yahoorss&utm_medium=referral?utm_source=yahoorss&utm_medium=referral.
- [34] 陈卓武. 新时代港澳青年国民教育比较研究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4): 48-53.
- [35] 康淑敏, 黄晶榕, 刘彩祥. 国家认同意识下的香港教育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J]. 港澳研究, 2021 (2): 75+82-96.

责任编辑: 龚静阳



2024 年总统大选与美式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

张春满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从举行第一场美国总统选举以来, 美国的政界精英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构建美国选举政治的例外论。构建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目的, 一开始是为了对抗欧洲的政治传统和建立本土制度自信, 后逐步发展为建立和维护霸权以及巩固和发展软实力。在历史上, 每一个大选周期的隐形政治任务就是努力建构和维持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周期出现了很多新变化, 它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具不确定性的选举、最具暴力威胁性的选举、最受关注的选举、最具科技性的选举。在这样一个过去几十年里最具特殊性的美国总统大选周期, 美国选举政治的独特性、合理性、优越性遭受严重质疑。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基于编织谎言而不是客观事实的大选, 是基于分裂而不是团结的大选, 是基于暴力威胁而不是和平稳定的大选, 是基于破坏规则而不是遵守规则的大选, 是基于党派恶斗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大选, 是基于掏空民主而不是增强民主的大选。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不仅会继续强化特朗普双击效应进而造成美式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 而且会对西方的制度自信产生前所未有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美国总统大选; 选举政治; 美式民主; 例外论的危机; 政治极化

中图分类号: D7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6-0182-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6.016

作者简介: 张春满,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党建’的实践创新与风险防范研究”(24BDJ087)

引用格式: 张春满. 2024 年总统大选与美式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82-193.

一、问题的提出

当地时间 11 月 6 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布在 2024 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选举政治中, 美国备受关注。美国一向自诩“民主灯塔”和“山巅之城”, 把自己装扮成世界民主的“楷模”, 编造了无数有关美国选举与美式民主的“神话”故事。美国政客对内大力宣传美国的民主和选举政治的独特性、合理性、优越性, 让美国民众相信这套话语叙事, 让美国民众感到自己能够成为美国人是多么带有特权性质和无比自豪的一件事。这种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在美国各界都非常有市场。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对外极力推销和输出美式民主, 尤其是美国的选举政治, 甚至不惜为此使用武力逼迫他国就范。这种“救世主”心态的重要支撑就是美国选举政治的例外论。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包括它衍生出的政治“神话”故事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它的产生和演化包含着复杂因素。首先, 构建选举政治例外论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选举政治过程中, 美国的制度设计与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 并不是与众不同就能支撑起选举政治例外论, 每个国家的选举制度都不一样。那么, 美国人是如何成功构建出选举政治的“神话”故事进而支撑美式选举的例外论? 美国人利用各种手段构建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 其次, 选举政治古已有之, 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情。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就有选举,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有选举。为何美国能成功地构建出选举政治例外论而不是其他国家? 最后, 美国的选举制度、过程、结果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很多问题, 而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却没有销声匿迹, 反而被有意强化, 这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也值得探索。

美国的选举政治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尽管学术界意识到了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现象, 但是开展系统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美国的选举政治包含很多内容, 主要由总统大选、国会议员选举、州和地方选举及其他选举构成。总统大选是美国选举中最受关注的部分, 总统大选的研究成果比国会议员选举和其他选举的研究成果多, 是整个美国选举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既有文献中, 学者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关注总统大选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因素和问题。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国内外因素很多, 比较突出的因素包括宗教因素、摇摆州因素、身份政治因素、种族因素、科技因素、经济因素、媒体因素、国际局势因素等。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埃里克·冈特曼 (Eric Guntermann) 等人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论证美国经济状态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1]。张毅认为: “鉴于红州和蓝州政党倾向相当稳定, 美国 7 个摇摆州将继 2016 年和 2020 年之后再次决定 2024 年的大选结果。”^[2]在对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分析时, 有些学者提出多个因素共同影响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孙冰岩认为, 良好的“当选性”、合理的竞选策略、疫情的影响以及种族矛盾激化这四大因素共同决定了 2020 年大选的结果^[3]。王浩认为疫情危机、经济就业和族群矛盾成为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大热点议题, 关键摇摆州的民意走向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4]。第二个方面是美国总统大选周期性的变化和特点。孙兴杰和刘妍汝认为, 随着 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冲击的产生, 美国政治可能进入到了一个长周期与短周期相互叠加共振的新阶段, 尽管拜登在 2020 年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 但是没有改变或者超越美国的政治周期^[5]。张春满将 2016 年以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周期性特点概括为“特朗普双击效应”, 指出美国出现系统性政治衰败的同时往往也会遭遇国家治理困境, 并且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展现出极强的不稳定性

和攻击性^[6]。李奕昕和王浩指出，自 2016 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开启并持续经历着复杂的结构转型。美国共和党已经由“里根共和党”转变成了“特朗普共和党”^[7]。

第三个方面是选举投票和竞选行为。选举投票行为和候选人的竞选行为是美国学界研究美国总统大选政治行为的“一体两面”，这些研究展现了美国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之间复杂的互动形态。近些年，西方学术界非常关注社交网络和新兴科技如何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行为和竞选行为^[8]。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周嘉希重点关注了特朗普在输掉 2020 年大选而再次参与 2024 年大选中的竞选策略变化^[9]。邹虹瑾和谢韬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白人迁徙以及白人价值观的变化视角出发，分析了美国加州选民从投票支持共和党向投票支持民主党转变的内部因素^[10]。近些年，美国选举过程中暴露的风险不断增多，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选举安全的研究。一些国外学者重点关注俄罗斯为何可能干预美国总统大选^[11]，也有学者研究美国民众对美国选举可信度认知的问题^[12]。国内学者也非常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安全问题。例如，杨楠认为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多层矛盾，导致美国选举安全将长期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13]。第四个方面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国内外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不仅对美国内政外交走势会产生影响，也可能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产生影响。谢韬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总统大选的世界影响进行了前瞻性研判，重点聚焦美国民主的倒退与霸权的未来，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与中美关系、欧美关系重塑，美国总统大选背景下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日本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认知与应对，美国总统大选对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环境的影响等问题^[14]。其中，因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很多学者非常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势的影响和冲击。

本文在充分吸收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选举政治例外论的角度研究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本文通过分析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历史建构过程，为探讨本届大选造成的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打下基础。本文重点介绍本届大选周期美国选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并从六个角度系统阐述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遭遇危机的主要内容，最后分析美国总统大选可能在制度层面、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产生的影响。

二、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历史建构

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伴随着美国的国家发展逐步建构。从整体上看，美国选举政治的例外论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点是美国选举场域由完善的法治和制度保驾护航，第二点是美国选举的过程实现了自由和公平，第三点是美国选举的结果能保证权力和平转移，第四点是美国选举以充满效率的方式选出了更优秀的领导人。这四个部分构成相互协作的整体，既覆盖了美国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又覆盖了连接过程和结果的整个场域。

美国政治精英非常注重建立选举与法治的联系，意图打造出一种由法治保驾护航的选举形象。随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兴起，美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形成了由政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在当时完全由党魁控制和操纵，并以秘密会议的形式来落实。毫无疑问，这样的“暗箱政治”不会让美国的总统大选落下好名声。因此，美国逐步通过法律让美国的选举过程走向公开化、法治化、透明化，营造出一种“依法选举”的氛围和场域。以此制造“美国总统大选历史悠久、

定期举行、公平公正”的话语叙事。美国在 1789 年举行了第一场总统选举，之后每隔四年定期举行，持续至今。即使在美国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如期举行，展现了非常强的制度韧性。按照美国人的逻辑，美国总统大选之所以能够持续两百年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公平公正。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不会质疑和推翻选举制度，还可以在四年之后再次挑战之前的赢家。为了让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能够被接受，美国政党在历史上常常做出妥协和交易^[15]。例如，在 1876 年美国第 23 届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获得了 165 张选举人票，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获得了 184 张选举人票，还有来自 4 个州的 20 张选举人票悬而未决。关于这些选举人票的归属，两党僵持不下、互不相让。为了让美国的选举游戏继续下去，最终两党选择进行一场政治交易。民主党承认海斯以 185 票对 184 票多出一票当选，但是海斯不可连任，同时共和党需要从南方各州撤军。这一政治交易也被称为“1877 妥协”。

美国选举政治存在诸多内在制度缺陷^[16]。这些制度缺陷包括投票资格混乱、选举过程各州不同、不实行直接选举、存在大量制度模糊，等等。投票资格混乱是突出的制度缺陷，直到现在美国都没有非常明确而稳定的法律或体制机制来对投票人的身份认定进行细致规定和政策执行^[17]。在本届大选周期，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还在为选民投票资格博弈。事实上，投票资格在众多国家都不是问题，谁有资格投票谁没有资格投票是一个很容易被确定并被严格监督的事情。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但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联邦制国家。在其他联邦制国家，各州或者加盟共和国的选举制度比较清晰和明确，现实操作层面一般没有很大差异。然而，美国的党派政治严重侵扰了各个州在选举过程中的制度设定和实践操作，导致各州之间不仅差异巨大而且异常混乱。美国的选举制度在 19 世纪初期间闹了很多“乌龙”。因为选举规则和制度模糊，在 1800 年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的两名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与阿伦·伯尔（Aaron Burr）各赢得 73 张选举人票，竟然打成平手。美国选举制度被诟病最多或讨论最多的，非选举人团制度莫属^[18]。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由选举人票而非普选票决定，这就意味着美国的选举并不是直接选举，而是间接选举。与选举人团制度相伴随的赢家通吃规则，更是让美国总统大选远离了民主原则。2000 年和 2016 年的两次总统大选，均以共和党输掉普选票但赢得选举人票成功入主白宫而告终。这些制度缺陷导致了选举结果争议问题、政党候选人选拔和替换问题、总统候选人初选资格问题，有时甚至酿成严重的宪法危机^[19]。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由四部分内容构成，但是支撑这些内容的核心要素是选举的定期举行。保持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频率构成了美国建构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基石。为了让美国的总统大选以四年一度的形式不断进行下去，美国政治精英实行了很多政策举措和危机时刻的政治妥协。他们认为，只要美国保持了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就在世界选举历史上留下了特殊的政治记录。美国政治精英以此为根据宣传美国选举政治的种种优越性和极强特殊性。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种种缺陷，则被媒体和政界有意合谋掩盖。

美国政治精英打造选举政治例外论的目的经历了历史性转变。在 19 世纪，构建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是为了建立本土制度自信，是对抗欧洲政治影响的防御性举措。在 19 世纪，欧洲大国是主宰世界的主要力量，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很多方面无法与欧洲列强抗衡。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差别也很大。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议会政治体制，按照单一选区多

数决的方式进行选举。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选举人团制度天差地别。法国的国民议会体制与美国的国会制度也不一样。这一时期的美国面临着来自大西洋彼岸很大的政治压力，19 世纪初期的美国是没有制度自信的。当时的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对美国在外部压力之下走什么路产生了分歧。随着美国在 20 世纪崛起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再担心缺乏制度自信的问题，维持选举政治例外论的目的变为建立和维护霸权。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格局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局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个西方传统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阵营头号强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巨大，因此这一阶段不断强化美国的选举政治例外论有着很强的地缘政治意味。战后的新兴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的独立国家在政治道路上是向苏联学习还是向美国学习，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美国出于维护霸权的需要必须努力维持美国选举政治的例外论，吸引更多国家倒向美国。20 世纪末，美国政治精英高调对外宣传美国总统大选的种种优越性、对外输出民主，则是出于巩固霸权和发展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尤其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时期，苏联不复存在，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时期恰逢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理论^[20]。美国选举政治的光环被人为地照得更加亮眼，选举政治开始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三、2024 年美国大选的新变化

美国的总统大选在时间安排上具有比较强的制度性。从 1792 年开始，每隔 4 年举行美国总统大选。在 1845 年，全民投票日定为选举年 11 月 1 日之后的首个星期二。因此，美国总统大选有清晰的时间周期。在不同的大选周期，我们能看到美国选举的一些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而 2024 年美国大选周期产生的变化前所未有。

其一，美国迎来最具不确定性的选举。以往美国总统大选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到所有选票开出，没有人能够确定谁会当选。这个不确定性是每次美国总统大选最主要的看点。而这一轮美国总统大选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个方面是候选人的不确定。美国总统大选需要共和党 and 民主党各自推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在 2024 年上半年，共和党方面推出的候选人特朗普被地方法院剥夺了参与党内初选资格，但其后，美国最高法院恢复了特朗普的初选资格。2024 年 5 月，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被判有罪，34 项罪名全部成立，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判有罪的前总统。特朗普的“戴罪之身”导致很多人怀疑他是否需要去监狱服刑而无法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也存在不确定性。民主党的原总统候选人拜登年龄偏大，人们怀疑他的认知能力和身体状况能否支撑他参加选举并连任。拜登本人拒绝退选，认为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而在第一场电视辩论之后，因为拜登的表现实在糟糕，美国民主党内部给予拜登前所未有的压力逼迫退选。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意味着直到美国选举投票日前 100 天左右，两位总统候选人才最终确定。

第二个方面是选举安排的不确定。美国总统大选的很多制度性安排在这次选举中都被改变或者调整。比如，特朗普不参加本党的党内初选辩论，这招致了其党内竞选人的强烈不满。此外，第一

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由下半年提前到6月份举行,而第二场辩论由于拜登退选而迟迟没有敲定时间和地点。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9月10日晚,哈里斯和特朗普在费城展开电视辩论。美国民主党在拜登明确表态退出竞选之后,一度出现很大的混乱。谁来接替、怎么接替参选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民主党只能通过临时性的变通举措,以线上方式最终确认了哈里斯的党内候选人提名资格。

第三个方面是选举结果的不确定。因为特朗普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他是否会尊重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因此很多美国民众非常怀疑美国总统大选在11月份的投票日结束之后能否顺利选出新总统。美国总统大选最终会是什么结果,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收场,会不会造成国内政治危机,美国人对此心里也没有底。

其二,美国迎来最具暴力威胁性的选举。世界上部分国家的选举活动往往不能顺利地以和平方式举行,在选举过程中充斥着暴力因素,一些暴力行为甚至演变成了极端的暴力冲突。美国自诩世界民主“楷模”,选举活动自然不应该有暴力威胁。但是美国的选举在这轮大选周期充满了很多的暴力威胁因素。在社交媒体和舆论报道中,很多人都注意到针对总统候选人的暴力威胁、仇恨话语和言语诅咒。特别是在两党政治攻击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两党剑拔弩张的选举气氛助推了一些美国民众对两党候选人的仇视心态。

2024年7月特朗普遇袭案件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这样的政治暴力是美国选举政治中多年未见的。很多人将此归结于两党不断加剧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攻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共和党高层曾经一度呼吁要让两党政治攻击降温,为美国紧张的政治气氛降温。然而事实上美国两党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加剧政治氛围的紧张度。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引发更多的政治暴力和政治威胁。2024年8月,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明确威胁要杀死特朗普。目前该名男子已被拘捕,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美国选举的暴力危险。2024年9月15日,又有一名持枪男子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准备向当时正在打高尔夫球的特朗普开枪。同月的24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竞选团队在亚利桑那州的办公室遭到枪击受伤。这是那段时间在该办公室发生的第二起刑事破坏事件。在美国的很多选举活动现场,安保措施不断升级,防弹玻璃越来越多。

其三,美国迎来最受关注的选举。美国的总统大选关注度一直很高,而2016年特朗普竞选又进一步让美国总统大选受到世界广泛关注^[21]。与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大选相比,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受关注度更高。第一个原因是特朗普再次参加竞选。美国历史上,曾担任过总统的候选人在大选中成功重返白宫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即1892年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在选举中击败哈里森,第二次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受关注度非常高,不仅是因为他口无遮拦,更重要的是他出庭且被定罪,成为一个“戴罪之人”。“特朗普不是在竞选的路上,就是在去法庭的路上。”第二个原因是哈里斯参加竞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女性领导人竞选总统。一旦哈里斯击败特朗普成功当选,那么这将创造美国的历史。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总统大选在今年迎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有太多意外。比如,特朗普遇袭和拜登退选。

移民问题推动美国总统大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历史上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融入美国,推动国家发展。后来美国又不断吸纳来自亚洲和南美洲的移民。近些年从美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人越来越多,形成所谓的边境危机和移民危机。美国对待移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

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反对这些移民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数据统计可能有高达数百万人非法越过边境进入美国。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边境危机。大量移民的涌入冲击了美国地方政府，干扰社会治理，给当地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为此，南方一些州政府调动大量国民警卫力量保卫边境，很多共和党籍的州长甚至因为边境问题聚在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讨伐”拜登政府。难民危机和边境危机愈演愈烈，移民问题成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美国两党在关注和讨论移民问题，美国民众在关注和讨论移民问题，想偷渡进入美国的人也在关注移民问题。总统大选将决定美国移民问题的政策走向，引发媒体和各界的广泛关注。

其四，美国迎来最具科技性的选举。科学技术尤其是颠覆性的科学技术介入西方的选举过程是近些年西方选举政治的新趋势^[22]。选举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提高选举效率，另一方面则会带来很多风险。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就爆发了技术影响大选结果的丑闻。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未经任何授权访问了社交媒体公司 Facebook 的个人资料，通过有针对性地发送信息影响选民，间接协助特朗普赢得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这起事件让外界充分认识到科技介入选举过程给美国政治造成的伤害。2024 年是全球超级选举年，也被很多人称为人工智能选举元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 2022 年底随着 ChatGPT 爆火之后，在 2023 年又获得了飞速发展。这一轮人工智能从聊天机器人很快发展出文生图和文生视频。

美国两党看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积极使用人工智能来助力竞选活动。目前来看，美国共和党比民主党在使用人工智能选举方面更加激进。美国共和党甚至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了一个视频。这个 AI 视频描绘了拜登一旦当选，美国社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难民冲击和社会崩溃的景象。这个视频在 Twitter 和 YouTube 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大量讨论。AI 制作的图片在互联网上抹黑特朗普形象。在纽约曼哈顿法庭就特朗普“封口费”案件开庭前，有关特朗普在街头与警察搏斗、被关入监狱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相关图片、视频在互联网广泛传播，引发民众高度关注和议论。人工智能在后台也在产生影响，那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选民数据，识别潜在的支持者并有针对性地推送广告。AI 还被用来分析社交媒体的网络舆情，以此提高传播效率、辅助决策。在这一轮的美国大选周期，美国一些科技巨头放弃了以往“客观”立场，直接下场支持政党候选人。曾经封禁特朗普 Facebook 账号的马克·扎克伯格看到特朗普重新竞选且气势很盛之后，决定与特朗普“和好”，并解封特朗普账号。特朗普的 Twitter（现在叫 X）账号也被解封。美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还在 Twitter 上采访特朗普，提出愿意为特朗普工作。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公司 CEO 频繁与美国政府接触，体现了美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深度绑定。

四、六大维度审视美式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

美国政治精英认为美国选举场域由完善的法治和制度保驾护航，是一套完整合理的体系，体现了制度设计的精妙和有效，也避免了有人钻制度空子的情况。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还认为美国选举实现了自由和公平，没有歧视、压制、阻碍和干扰。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内核是美国选举的结果能保证权力和平转移，不会让国家因为选举出现局势混乱和政局颠覆。事实上，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不是在“选优”，而是在“比烂”。本文将从六大维度分析美国的选举政治例外论在本届选举周

期遭遇的重大危机。

其一，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基于编织谎言而不是客观事实的大选。准确而客观的信息对于选举政治至关重要。竞选者需要向选民传递准确、客观、中立的信息。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选民才能分析和评价不同的候选人，最终做出真实决策。如果选举过程充斥大量谎言，那么整个选举的目标导向就会出现偏差。选民在这样一场谎言游戏中沦为工具，而无法实现真实意思表达。从表面上看，美国非常重视对谎言的治理。美国严禁在法律过程中说谎。然而，在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太多的谎言和编织谎言的行为。例如，特朗普曾经提出外来非法移民大部分都是罪犯和强奸犯，他们来到美国会吃掉很多当地居民的宠物。这是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共和党 and 民主党还利用人工智能进一步编织谎言和传播谎言。即使在电视辩论等重要场合，外界还是能看到总统候选人撒谎。很多美国媒体甚至会罗列一个事实检测表，把候选人的谎言与现实进行对比。因为选举过程谎言太多，所以选民感到非常困惑。他们不清楚自己面对的政党候选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后来与特朗普分道扬镳。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有上帝才能看透人心，暗示自己看错了人，被特朗普蒙骗。

其二，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基于分裂而不是团结的大选。在 18 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对政党作出定义：政党是人们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团体^[23]。这个定义将政党与过去的派系做出了明确区分。派系追求的是个人私利，是不正当的利益，而政党追求和促进国家利益，是正当的公共利益。政党在追求和促进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增进团结，让国家更有凝聚力。在 19 世纪，林肯及当时的共和党努力团结和维护美国，避免美国走向南北分裂，这让林肯获得了极大的威望，让当时的共和党在全国层面的选举中获得了长期稳定的胜选支持。过去，美国两党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包括大选结果出来后会明确表态，要团结国家、弥合分歧和差异。而在本届大选过程中，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攻击对方的行为是在分裂国家，是在造成国家混乱，让美国走向歧途。两党的支持者也基于各种原因采取部落化的立场和态度。“美国反对美国”的现象越来越多，“美国分裂美国”的言行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共和党人乔治·朗在 2024 年 7 月的一场集会上发表了惊人之语。他说：“如果我们输了这场选举，就需要一场内战来拯救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一定会被拯救。”这种类似言论表明中间选民越来越少，极端选民越来越多。民主党阵营和共和党阵营的对抗已经到了势如水火的地步。

其三，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基于暴力威胁而不是和平稳定的大选。这一轮大选周期的暴力威胁因素非常广泛，包括社会层面、政治活动层面和总统竞选人层面。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输给民主党人拜登。2021 年 1 月 6 日，震惊世界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试图颠覆大选结果。从这起事件开始，人们突然意识到美国总统大选能否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不再是定数。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背后的支持力量是极右翼组织。在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后，“骄傲男孩 (Proud Boys)”“妇女支持美国优先 (Women for America First)”等极右翼组织马上出现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集会，响应特朗普“存在选举欺诈”的说法。因为“国会山骚乱”事件，拜登政府在 2021 年 6 月发布首份《反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着手打击极右翼暴力。然而，美国的政治乱局并未到此为止。随着特朗普卷土重来参加 2024 年总统大选，美国的

极右翼势力再次蠢蠢欲动，力量比之前还要巨大。2024 年 3 月 16 日，特朗普在俄亥俄州的一场集会上表示，如果他不能在 11 月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将发生“屠杀”^[24]。特朗普的这番暴力威胁并非空穴来风。2024 年的多场竞选活动中发生了暴力威胁情况。除了特朗普遭袭事件，民主党 8 月份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受到多次爆炸威胁。美国特勤局和芝加哥警局疲于奔命，采取前所未有的举措进行安全检查。

其四，2024 年美国大选是基于破坏规则而不是遵守规则的大选。在本届大选周期，第一个被破坏的就是关于投票资格的规则。共和党和民主党利用在州政府的执政权力积极修改本辖区范围内选民的投票资格规则。修改的过程并不是为了照顾选民利益，而是为了有利于本党。第二个被破坏的是关于政党候选人的规则。美国两党选拔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有明确规则，即利用党内初选的方式选出候选人。然而，这一规则在民主党换帅的过程中被破坏。拜登在 2024 年 7 月遭到民主党高层的逼迫退选，民主党很快指定了哈里斯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是经过党内初选被确认的总统竞选候选人，哈里斯则完全没有经过党内初选的确认为，由部分党内高层支持通过特别程序成为总统候选人。第三个被破坏的是选举结果愿赌服输的规则。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自始至终没有公开表态会遵守选举结果愿赌服输的规则。他只公开表示能接受自己赢得选举的结果。即使在总统电视辩论面对主持人的提问时，他也不愿意做出遵守选举结果的承诺。在选举政治规则不断被破坏的情况下，大金主、最高法院、偶发事件会对美国总统大选产生更多影响^[25]。

其五，2024 年美国大选是基于党派恶斗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大选。美国两党竞争在近些年逐渐演变为党派恶斗。在历史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也曾发生过“水门事件”等类似的党派恶斗丑闻。但总体来看，政党候选人之间还是保持了基本尊重，政府的行政部门也很少介入政党争斗，维持了美国政治的体面。而在本届大选周期里，美国的党派恶斗已经超越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美国司法体系被武器化，成为两党打击政敌的马前卒。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政治集会，没有多少人在谈论问题、政策和国家发展的改革细节，讨论最多的是把对手投入监狱的话题。在民主党的大选年叙事体系中，他们把哈里斯和特朗普两个候选人定位为检察官与罪犯的对决。而特朗普也多次提到，一旦选举获胜就要调查拜登家族，把拜登等民主党人送进监狱。集会的听众和政党的支持者也非常热衷于把政治对手投进监狱的话题。本届美国总统大选变成了谁把谁送进监狱的一场争斗。美国的选举也被部落化的美国政治所影响，美国两党在大选中的仇恨动员都非常“成功”^[26]。

其六，2024 年美国大选是基于掏空民主而不是增强民主的大选。选举政治要为民主服务，不能本末倒置。在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建构过程中，美国政治精英把美国民主与美国的选举结合在一起。按照美国政治精英的叙事逻辑，美国总统大选在不断增强美国的民主，让美国的民主更加具有生机和活力。从表面来看似乎确实如此，但是透过表面看实质可以发现，美国民主的内核正在不断被掏空。本届大选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掏空民主的趋势。在本届大选的初期，两党都已经明确竞选工作重点是少数的几个摇摆州。这些摇摆州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西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内华达州。掏空美国民主的第一个效应就是摇摆州效应。决定选举结果走向的摇摆州越少，美国民主被掏空的结果越显著。民主是多数人的意志，但是美国的民主在大选过程中却离多数人的意志越来越远。掏空美国民主的第二个效应，即选举人票效应。代表民众意志的普选票赢多赢少无所谓，只要赢了选举人票就行。美国民主在本届大选周期进一步强化了选举人票导向，

而不是普选票导向。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在朝着摇摆州效应和选举人票效应同时不断增强的趋势发展。

五、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潜在影响

从制度层面来看，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严重冲击了美西方的制度自信。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西方国家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经济增长长期陷入停滞和缓速状态，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出现倒退，外界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信心有所降低。现在美国选举政治的现实让以西方理论为支撑的制度自信受到严重削弱。美国总统大选的外溢效果很强，美国政党政治和政党领袖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美国在 2016 年大选周期产生了特朗普这样一个“政治素人”之后，西方世界快速产生很多类似人物。在荷兰等国，这些人物甚至以“本国的特朗普”自居。而在 2024 年美国大选周期，美国选举政治例外论遭遇重大危机，美国选举政治的异化和弊端显露无疑。不少美国民众以美国当今的选举政治为耻，认为两党制下的选举体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27]，更没有人公开谈论向外输出美国民主了。

从国内层面来讲，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不仅会进一步强化特朗普双击效应，而且必将重塑美国的政治秩序。美国的政治秩序面临很大挑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美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是出现了否决机制，两党互相拆台只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28]。否决体制出现是美国政治秩序发生变动的初期表现，而本届美国总统大选状况频出则进一步确认了美国政治秩序正在走向衰败。特朗普对哈里斯的竞选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特朗普在 2024 年被美国地方法院判决有罪，同时特朗普在执政时期的一些失误和错误，也让美国民众非常警惕。哈里斯大选获胜也存在很大难度，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女性总统，哈里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也没有特别瞩目的工作成绩。一些研究认为，特朗普在 2020 年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行为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了很大的损害^[29]，本届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从国际层面来讲，很多国家不希望特朗普再次竞选获胜，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国家。鉴于特朗普上台期间美国与盟友关系的下滑，欧洲很多国家非常不希望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但是不希望特朗普上台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就不会上台，因此一些国家也在两面下注，为特朗普再次上台做预案。按照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他将继续加大使用关税武器促进更多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大幅抑制美国的通货膨胀现象。这将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美国与盟友国家在制造业方面会产生较大分歧。同时中美关系也会迎来新的挑战，如特朗普当选，不排除其政府会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在供应链关键领域和产品的“卡脖子”。与此同时，特朗普如上台也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坛的向右转化，刺激更多的极右翼政党向本国政治的高层发展。特朗普政府可能也会调整之前拜登政府的俄乌政策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因而对俄乌冲突的走势和中东地区的局势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多次声称他能在很短时间结束俄乌冲突。如果特朗普上台，俄乌冲突能否在短时间结束值得关注。如果最终的选举结果是哈里斯获胜并顺利上台执政，那么哈里斯在坚持拜登政策的基础之上很可能对国内外政策进行比较明显的调整。哈里斯在国内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政府与企业关系上明显与拜登有所差异，在对外政策方面可能也会进行一些调整。不管谁担任美国总统，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我们都要以我为主，保持战略定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以负责任的态度发展中美关系，不断增强和发展自身实力，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既定任务实现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 [1] Eric Guntermann, Lenz G S, Jeffrey Myers.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y o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roughout US History [J]. Political Behavior, 2021 (43) : 837-857.
- [2] 张毅. 红州、蓝州、摇摆州和 2024 年美国大选 [J]. 美国研究, 2024 (3) : 9-31.
- [3] 孙冰岩. 2020 年美国大选: 决胜因素、选举特点与政治困局 [J]. 国际关系研究, 2021 (1) : 82-109.
- [4] 王浩. 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的美国政治: 认同分裂、政党重组与治理困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5) : 78-85.
- [5] 孙兴杰, 刘妍汝. 特朗普冲击: 政治周期视角下美国治理困局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2) : 89-100.
- [6] 张春满. 特朗普双击效应: 从恶性党争到政治衰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2) : 101-108.
- [7]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 171-183.
- [8] Loris Belcastro. et al. Analyzing Voter Behavior o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J].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 2022 (12) : 1-16.
- [9]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 165-180.
- [10] 邹虹瑾, 谢韬.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价值观之争: 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嬗变为例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0 (3) : 2-30.
- [11] Andrew Ross, Cristian Vaccari, Andrew Chadwick. Russian Meddling in US Elections: How News of Disinformation's Impact can Affect Trust in Electoral Outcom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J].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22 (6) : 786-811.
- [12] Pippa Norris, Holly Ann Garnett, and Max Grömping. The Paranoid Style of American Elections: Explaining Perceptions of Electoral Integrity in An Age of Populism [J].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020 (1) : 105-125.
- [13] 杨楠.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 以 2016 年和 2020 年总统大选为例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1 (2) : 132-156.
- [14] 谢韬, 刁大明, 冯仲平, 等. 2024 年美国大选及其世界影响 [J]. 国际论坛, 2024 (5) : 3-41.
- [15] Alan Hirsch. A Short History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Crises: and how to Prevent the Next One [M]. San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2020: 15.
- [16] Richard Hasen. Election Meltdown: Dirty Tricks, Distrust,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7] Lonna Rae Atkeson. et al. Balancing Fraud Prevention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ttitudes toward Voter Identification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14 (5) : 1381-1398.
- [18] Alexander S Belenky. Who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Guide to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ystem [M]. Cambridge: Springer Nature, 2016: 127.
- [19] Pippa Norris. Why American elections are flawed (and how to fix them)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35.

张春满. 2024 年总统大选与美式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82-193.

- [20]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J]. Foreign Policy, 1990 (80): 153-171.
- [21] Rachel Bitecofer. The Unprecedented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M].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17.
- [22] Anna-Verena Nosthoff, Felix Maschewski. The Platform Economy's Infra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Facebook and Cambridge Analytica Revisited[J].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2024 (1): 178-199.
- [23] Edmund Burke.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889: 525-534.
- [24] 赵明昊. 特朗普何以发出“屠杀”威胁? [EB/OL]. (2024-05-07) [2024-09-20]. <https://ciss.tsinghua.edu.cn/info/zmgx/7145>.
- [25] Richard L Hasen. Plutocrats United: Campaign Money,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Distortion of American Election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6] 李智. 论美国民主选举中的仇恨动员 [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 115-120.
- [27] Mike Lofgren. The Party Is Over: How Republicans Went Crazy, Democrats Became Useless, and the Middle Class Got Shafted [M]. London: Penguin Press, 2013.
- [28]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J]. Foreign Affairs, 2014 (5): 5-8.
- [29] Mansoureh Sadeghi and Mostafa Entezari. The Impact of the 2020 US Election on Changing the Position of US Soft Power in the Worl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2 (3): 175-192.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图谱： 维度、特征与展望

——基于 2020 年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分析

龚静阳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重庆 400064）

摘要：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对内是指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经验、提炼出的理论规律及其相互联系所构成的整体；对外是指在充满多样性的时代为构建国际社会秩序、探索更好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引导人类走向团结提供新方案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智慧。本文以 2020 年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为主要样本，分析我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图谱。研究发现，学界主要从国家建构和治理维度、制度安排维度、文化文明维度、技术前景维度、思维方式维度绘制了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轮廓图。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形成了以“两个大局”为背景，注重现实问题导向；基于“多学科交叉”，观照中国实践；坚持“两个结合”，深化理论视野；使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范式等典型特征。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立场和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基于狭义理解的统战研究多，基于广义理解的统战研究少；统战研究对单一学科依赖多，交叉学科运用少；对具体问题研究多，对整体性问题研究少；国内传播路径多，国外发声平台少。克服这些问题，需要从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视野、学科范式、融通整合、对话交流等方面协同发力。

关键词：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两个大局”；“两个结合”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6.017

作者简介：龚静阳，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

引用格式：龚静阳. 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图谱：维度、特征与展望——基于 2020 年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94-210.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6-0194-17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是解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时代之题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 “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2] 与此同时, 我们在国际上面临着美西方的学术霸权。美西方将其人文社科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相绑定, 以学术霸权宣扬“西方中心主义”和所谓“制度、文明优越性”。这使得部分国家和地区在输入美西方知识体系时, 夹带接受了美西方对制度、文明的强势解释权。美西方也利用学术霸权和话语霸权, 对我国统一战线领域开展长期污名。国外学者对中国统一战线的研究存在两种极端: 一种是扭曲统一战线价值, 将多党合作制度诬称为“党国体制”“威权体制”, 声称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控制”; 另一种是轻视统一战线, “认为不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流”^[3]。随着美西方经济呈现衰落趋势、政治上各类极化和民粹现象层出不穷、社会撕裂愈演愈烈, 长期占据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的美西方知识体系日益出现解释力问题。应对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误读和曲解, 祛魅美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霸权, 亟需建构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内外两方面意涵。对内, 它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经验、提炼出的理论规律及其相互联系所构成的整体; 对外, 它是在充满多样性的时代为构建国际社会秩序、探索更好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引导人类走向团结提供新方案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智慧。1945 年, 毛泽东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讲话, 强调: “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 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 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 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4] 2015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 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同年, 山东大学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合作共建的统一战线学学科迎来首届研究生入学, 这是统一战线学首次作为独立学科被纳入我国国民教育招生系列^[5]。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将统战作为学科方向, 自主培养统战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6]。2017 年, 全国首本统一战线专业学术期刊《统一战线学研究》创刊, 由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管、重庆社会主义学院主办。2023 年, 《统一战线学研究》成为全国首本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的统战专业期刊。2024 年 6 月,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调整组建统一战线教研部。统一战线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越来越多学者加入统一战线学研究领域。

然而, 关于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存在不均衡现象。截至 2024 年 10 月 10 日, 笔者在知网尚未检索到直接专门研究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文献。既有成果主要是对统一战线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展开研究。其一, 在学科体系方面, 有关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可

追溯到 1999 年，学者明确提出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概念^[7]。到 2010 年左右，学者们开始探索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含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基本框架等^[8]，认为统一战线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9]，统一战线学是政治学的分支。此后 10 年间，学者们研究了统一战线学学科建构过程，较多使用“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的框架，从外在建制^[10]、学科力量、知识形态强化等角度探讨学科发展，认为统一战线学与政治学有交集但不等同^[11]。其二，在话语体系方面，有学者将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范式从“利益分析”“组织分析”传统视角拓展至“话语分析”新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问题开展整体性研究^[12]。有学者研究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战话语体系^[13]，阐述抗日战争时期^[14]、解放战争时期^[15]统一战线话语构建的实践经验。也有学者对统一战线不同领域话语体系展开研究，如提出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16]，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体系建构情况^[17]，等等。还有学者将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放在不同背景下研究，例如运用全过程人民民主^[18]、新媒体^[19]、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20]等视域。在学术体系方面，目前鲜见相关研究。

既有成果对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架构、特征、重点与不足、在上位学科中的角色定位等缺乏深入的研究阐释，对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系未有明确界定。这与当下学界对统一战线日益深入的研究进展不相匹配。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业已形成阐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理论、方法、范式，初步建构了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学术论文是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是前沿理论的最新展示，能够提供观察窗口。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是我国权威的学术文摘之一，所选文献广泛覆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25 个一级学科、107 个二级学科，清晰反映有关学科研究的主题、重点与趋势。本文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为研究基础，为跟踪最新研究情况，以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9 日期间的转载论文为重点研究对象，运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梳理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维度、特征与前景。

二、转载文章数据

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笔者以“统战”“统一战线”等关键词搜索 2020 年以来研究统战的全部转载论文，汇总后进行数据整理、筛除无关文章，最后得到论文 173 篇。本文借助 Excel、FineBI 等分析软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重点对原文出处、转载期刊、作者等情况进行统计；使用文本分析方法，重点对文章内容结构、所涉领域进行分析。

（一）定量分析

分析原文出处发现，173 篇论文呈漏斗状分布，68.21% 的论文集中出自 3 本期刊，其余论文分布于 45 种期刊。30.06% 的转载论文出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它定位为具有统战特色的政治理论刊物，以“国际视野、中国立场、理性思辨、服务决策”为办刊宗旨^[21]。27.75% 的转载论文出自《统一战线学研究》，它的办刊理念为“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着力推动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10.40% 的转载论文出自《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三本期刊的共同点是主办单位均为社会主义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

的政治学院^[22], 成为建构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

剩余 31.79%的转载论文出自《科学社会主义》《苏区研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新闻春秋》《文学评论》《黑龙江民族丛刊》《世界宗教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它们或是政治学、新闻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等学科的专业期刊, 或是各高校综合性社科期刊。这凸显了统一战线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从具体转载论文与期刊的契合度来看, 论文选题突出统一战线与刊物定位的结合。例如, 《苏区研究》关注革命历史中的统一战线, 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联合”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统一战线, 如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最大政治”功能;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关注涉台前沿动向, 如一个中国原则对国际社会涉台用语的规制; 《黑龙江民族丛刊》关注民族工作与民族理论, 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创新发展; 《史学集刊》关注特定历史人物的统战故事, 如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 等等。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将这 173 篇转载论文分别纳入 23 种复印期刊(见表 1)。排名前五的转载期刊是《中国政治》《台、港、澳研究》《民族问题研究》《政治学》《中国现代史》, 分别占 39.88%、11.56%、9.83%、6.94%、6.36%。在同一统计口径内,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宗教》《中国外交》《文化研究》《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也转载了 3 篇及以上统战相关文章。可见, 统一战线研究成果归入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转载期刊较多, 但同时也与文化、历史、外交、经济、思想政治教育、新闻、社会学等学科有着广泛联系。

表 1 复印期刊分布

复印期刊	篇数
中国政治	69
台、港、澳研究	20
民族问题研究	17
政治学	12
中国现代史	11
中国共产党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5
宗教	4
中国外交	3
文化研究	3
毛泽东思想	3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3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
公共行政	2
国际政治	2
体制改革	1
国民经济管理	1

复印期刊	篇数
工会工作	1
思想政治教育	1
新闻春秋	1
社会学	1
青少年导刊	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1

在统计范围内，转载文章的作者（统计第一作者）共有 134 位，张建、张献生、何虎生、戴洁、王彩玲、杨爱珍、肖存良等 7 名专家学者均有超过 3 篇统战相关文章被转载。陈明明、汪仕凯、余源培、黄天柱、商红日、林华山、徐理响等 21 名学者均有超过 2 篇统战相关文章被转载（见表 2）。作者单位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两地，其余作者分布在武汉、兰州、南京、杭州等地。作者大多兼任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或为社会主义学院教研人员。

表 2 转载作者信息

作者	篇数	作者单位
张 建	7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何虎生	3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献生	3	中央统战部
戴 洁	3	华东政法大学
杨爱珍	3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王彩玲	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肖存良	3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明明	2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丁俊萍	2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源培	2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商红日	2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张牧云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理响	2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李 捷	2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李春玲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束 赟	2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林华山	2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殷啸虎	2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汪仕凯	2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汪效驷	2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汪曙申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范丽珠	2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作者	篇数	作者单位
谢 静	2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郝 丽	2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
钱再见	2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承新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黄天柱	2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龚少情	2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二）文本分析

173 篇转载文章中, 35.84% 的文章主题为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 认为党百余年的统战历史实践形成了宝贵经验, 具有完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在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 统一战线呈现策略、战略与治道三重面相^[23], 中国基于统一战线形成的政治整合是典型的合作型政治^[24]。15.61% 的文章主题为党的统战工作研究, 认为统战工作面临新环境、新挑战, 需要处理好统战领域的各种关系。新时代统战工作要遵循规律^[25], 把握好“固守圆心与扩大共识”“潜绩和显绩”“原则性和灵活性”“团结和斗争”等四对关系。13.29% 的文章重点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围绕党中央最新决策部署, 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研究。在新征程上, 统一战线具有了全新的历史方位与多维团结的发展形态^[26]。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观点, 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篇章^[27]。13.29% 的文章关注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应对, 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统一战线领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集中表现为美西方的污名化和干涉。例如, 有文章揭示外部反华势力的“香港牌”与对华干涉、梳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与政策动态。还有文章揭示外部反华势力的“台湾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动向以及双方的合流趋势等。12.14% 的文章从历史视角研究统一战线, 或以某段历史为研究区间, 或以某位历史人物为研究对象, 考察其中的统一战线实践与经验、特征与启示。6.36% 的文章以统一战线视角观察国际社会热点事件, 研究美西方的政党政治、身份政治议题, 研究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与教训, 等等。

表 3 转载文章类别

类别	篇数
基础理论	62
统战工作	27
党的创新理论	23
统战风险	23
历史	21
国际观察	11
新技术	5
学科	1

除学术论文外，专著、理论研究基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也是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载体。其一，统战研究专著。2024年10月2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网站、孔夫子旧书网分别以“统一战线”为检索字段，经过人工识别并删除重复项，得到有关专著共计60种。其中，统战基础理论类有41种，统战历史类有13种，统战工作类有6种。其二，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这些基地有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及其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研究基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基地等，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市建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基地等。其三，统战研究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截至本文数据统计时，有37个统战研究相关项目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获得立项，主要涉及党史党建学、政治学、中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历史、马列·科社等学科。

上述数据勾勒出了我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图景。下文将聚焦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梳理我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情况。

三、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维度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学界围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三个更加重要”的历史方位，不断建构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明晰统一战线学的内涵与外延，主要从国家建构和治理维度、制度安排维度、文化文明维度、技术前景维度、思维方式维度绘制了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轮廓图。

（一）国家建构和治理维度的统一战线

将统一战线放在国家建构和治理维度中加以观察和阐释，是我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主要做法，也是其显著特征。该维度指涉国家建构和政治运行中的统一战线。

其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实践中蕴含着统一战线智慧。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组织、动员群众，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这个“塑造人民”的进程中，统一战线至关重要，人民形成的过程也是发展统一战线的过程^[28]。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奋斗的宝贵经验^[29]。百余年来，统一战线形成从“联盟之术”上升为“强国之道”的发展逻辑，即以服务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增进人民团结的社会逻辑、致力民族复兴的目标逻辑、追求命运与共的价值逻辑，不断融入国家建设、人民团结、民族复兴、人类大同实践进程^[30]。

其二，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与理论迎来新发展，学界对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做了集中研究。学界阐述了统一战线所处的历史方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析了统一战线所处的政治场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界不断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进行学理化阐释。一方面，有关知识生产关注中国的民主实践与理论，尤其是对嵌入统一战线基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展开实践提炼与理论发展^[31]。另一方面, 在统筹“两个大局”背景下,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统一战线服务国家安全建设, 是国家政治共同体安全的存在形态^[32]。

（二）制度安排维度的统一战线

制度安排维度是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观研究层次。该维度指涉国家制度中的统一战线。

其一, 围绕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政治逻辑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 与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一起成为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领域。一方面, 人民政协是科学、有效、管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指出, 人民政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33]。另一方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了合作的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为世界政党政治理论注入新活力, 引导世界政党政治研究更加关注制度效能与治理绩效。

其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重要的理论创新领域, 学界以此为视角阐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谋划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在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 知识生产从一开始对其提法的梳理、重要性和定位阐述, 逐渐演变为系统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逻辑、发展动态与实践路径, 再发展到如今重点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具体走深走实。此外, 面对国外反华势力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污名化, 知识生产从团结和斗争两个面向, 一方面对反华势力的谬论和谎言展开旗帜鲜明的批驳; 另一方面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五个认同”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来展现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

其三, 在其他统战领域的制度安排方面, 学界也展开了充分研究。在宗教工作方面, 学者认为“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34]。围绕新的社会阶层的知识生产包括阶级阶层的百年演进、新阶层的产生发展及特点。新技术如何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影响新的社会阶层, 成为新近研究热点。对港澳台侨有关制度的理论研究呈现强烈的时效性, 形成显著的中心议题。其知识生产围绕外部势力的操弄手段及内外联动的特征展开, 同时阐释了我国中央政府反干涉、反制裁等应对举措。

（三）文化文明维度的统一战线

文化文明维度的统一战线知识生产, 主要指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等层面的统一战线。

其一, 学界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研究重点, 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团结基因和大一统传统, 这对中华民族“向内凝聚”产生了深刻影响。“两个结合”为统一战线学研究拓展了视野, 形成近年统一战线理论建构的显著增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奠定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最坚实最稳定的精神基础。

其二,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视域, 学界关注中国现代文明中的统一战线元素及统一战线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层价值嵌入。在 2023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

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35]中华文明中的大一统传统，经由统一战线这门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学^[36]发展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成果^[37]，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对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政治文明本体进步具有重大作用^[38]。

其三，统一战线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固守狭隘的“中心主义”，试图将西方制度和文明塑造造成所谓“普世性”的模式。西方有关国家和人士还鼓吹所谓“文明冲突论”，在世界各地兜售西方现代化的“配方”，引发许多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制度选择的水土不服。事实证明，西方知识体系难以解答当前诸多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当今世界呼唤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以团结为核心，包含物质、制度、思想、行为等层面的文化形态，是人类的文化成果、文明结晶^[39]。这有利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解题思路，助力走出世界变局、塑造未来世界文明。

（四）技术前景维度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面向未来的，同样观照新技术对人的影响以及给统一战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Sora、chatGPT、元宇宙等新的数字应用或数字生态包含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新变革，使统一战线面临新场景。Sora、chatGPT作为视频和文字领域的人工智能生成模型，成为数字“意识形态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用户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改变，以“镜像认知”“幻象认知”不断强化用户的固有认知与认同。这可能会因认知极化造成社会撕裂，消解现有的社会团结和共识^[40]。另一方面，数字时代带来的人的认知和交往的变化，引发个体的量子化和群体的离散化趋势^[41]。从个体来看，个体在多种身份、多个平台、多种圈层横跳，呈现类似量子的叠加态，导致传统的统战方式难以捕捉和识别具体的个体。个体通过数字平台表达自己，数字平台则以数据绘制用户画像，并以露出与否、露出频次控制用户的数字存在状态，个体的存在状态越来越与数字平台密切相关。从群体来看，离散化体现为非整体性和非独立性，个体与个体联结的边界变得模糊和跳跃。

对于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做好网络统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学界重点围绕网络统战工作的开展进行知识生产。网络统战工作是“不断建立连接的过程”，需要创新数字化治理联盟机制^[42]，进而更好地发展政治联盟。

（五）思维方式维度的统一战线

在知识生产中，统一战线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背景下，非西方世界迎来“群体性崛起”^[43]，这些国家都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路径而发展起来的。世界亟需原创、自主的非西方话语，用以客观、科学地解读各国发展实践。统一战线相关知识生产以团结学、力量论的角度看待国内外的政治实践。团结、共识、协商、底线、共赢等思维构成了统战思维的基本内涵，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团结与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固守圆心与凝聚共识的关系，则是统战思维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运用^[44]。

国外虽不直接使用“统一战线”这个词汇来表述有关政策和实践，但统一战线的思维和实践方

式在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政党政治走势是评价一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绩效的重要窗口。中西之间合作型与竞争型的政党政治分野, 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为导向, 能够有效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将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人民, 实现国家治理的有序与有效。相比之下, 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带来了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绩效不足等问题。有关知识生产坚持问题导向、跟踪最新动向, 以统一战线视野和思维来分析西方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走向和政治生态演变, 深刻总结国外政党政治的教训。

百年变局之下, 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统战思维, 在统筹把握“一致性与多样性”有机统一中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正是在多样化社会制度中追求一致的和平与发展, 在各国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关切^[4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 是中国为化解国际社会价值冲突、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延续, 为解答世界难题、破解时代之困提供了新范式”^[46]。

四、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特征

在对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 学者们通过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的知识生产, 积累了丰硕的理论资源。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形成了以“两个大局”为背景, 注重现实问题导向; 基于“多学科交叉”, 观照中国实践; 坚持“两个结合”, 深化理论视野; 使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 拓宽研究范式等鲜明特征。

(一) 统筹“两个大局”明确研究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 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是基于对“两个大局”的深刻认知, 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导向。统一战线学的中国情景和本土特征, 决定了围绕统一战线的新问题也亟需学界发现、筛选、研究和解决^[47]。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着眼“两个大局”, 不断探索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出的统战新课题。

一方面,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国际形势深刻变革, 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具复杂性、艰巨性、挑战性。统一战线有关知识生产关注外部环境发展变化对中国产生何种作用力, 给统一战线带来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并提出应对路径。其中, 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是研究重点: 在人民安全方面, 共同体中人民联合的稳固性面临风险因素; 在政治安全方面, 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政治同心圆面临外部干扰; 在经济安全方面, 基本经济制度安全运行面临新风险; 在文化安全方面,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巩固面临新风险; 在社会安全方面, 社会结构平衡和社会团结面临新风险; 在外部安全方面, 外部干涉成为最大的增量风险^[33]。在外部形势叠加技术手段后, 外界对我国尤其是统一战线领域的认知攻击也有加剧趋势。美西方国家在人权民主议题对我国实施污名, 打造攻击中国的枢纽话语; 在涉疆议题实施污名, 干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稳定; 在涉台议题实施污名, 妄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在涉港议题实施污名, 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 在国际关系议题实施污名, 丑化中国整体形象^[20]。

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下，统一战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关知识生产契合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新征程上，统一战线不断发挥向内凝聚的作用，成为党的强大法宝。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统一战线实践凝聚着党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一战线蕴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密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基于“多学科交叉”观照中国实践

统一战线学研究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是一门以统一战线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围绕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生产体现大统战视野，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以《统一战线学研究》为例，所刊载文章鲜明地体现了统一战线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该刊已经形成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统一战线历史、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比较研究等架构，并以专题栏目引导多学科力量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研究统战议题。

“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的有关研究，从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角度来阐释党的百余年统战实践，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有关研究，将统一战线的研究范式从价值研究、组织研究拓宽到话语研究，从美西方的对华话语攻击、如何理解和应用新技术、如何构建统战话语叙事体系等角度展开研究，涉及新闻传播学、人工智能等专业。“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的有关研究，聚焦“两个大局”背景下统一战线领域风险及应对，主要涉及台港疆藏、反分裂反干预反制裁等议题，涵盖国际政治、区域国别和国际法等研究。“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等有关研究，运用统一战线视角关注其他国家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语言规划等治理情况，涉及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

（三）坚持“两个结合”深化理论视野

统一战线知识生产以“两个结合”拓展视野，关注中国实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寻找统战基因、统战实践、统战经验，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这使得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显著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深刻阐释其中的内在机理、历史渊源、发展趋势、内外作用等。

有关知识生产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统一战线。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体现出文化的认同功能，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统战基因，尤其是大一统传统和突出的团结理念及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3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

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内容, 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通^[48]。

其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 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新篇章。统一战线学是一门研究事物间关系与联系的学科, 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征。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党建国家的重大使命, 不断团结同胞、整合社会、塑造人民, 成功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战思维贯穿党建国家的全过程。统一战线以化敌为友的方式发挥着改变政治力量结构的作用^[49]。新中国成立后, 大量统战成员进入国家政权, 为我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主张“国事是国家的公事, 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50],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要团结各党派和社会各界力量来共同进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国建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广泛团结各社会阶层的多元一体现代国家结构^[53]。改革开放后, 统一战线的团结范围进一步扩大,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起到引资引智等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融入统战基因。统战成员资政建言的渠道不断拓宽, 助推国家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四) 使用“两种方法”拓宽研究范式

在对统战实践的观察与分析中, 学者们提炼出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概念、研究方法、探索方向, 把实践规律提炼升华为理论知识。统一战线的知识生产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具有共同点, 同样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

其一, 统一战线知识生产注重运用规范研究方法, 以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来构建内容框架、展开论证、得出结论。例如, 在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时, 学者对照“十二个必须”来分析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 使用“两个结合”的框架来阐释这一重要思想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刻学理; 从“六个必须坚持”阐释这一重要思想中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7]。又如, 在研究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时, 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为分析框架, 认为“五个共同”具有辩证统一的内在关系。再如, 学者从政治学视角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 用历史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政治传播、比较政治、政治发展作为基本分析框架^[51]。

其二, 统一战线知识生产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研究具体统战工作实践。例如,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方面, 学者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3 088 位大学生为调研样本, 发现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与相关教育的参与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52]。又如, 针对美西方发起认知战、大力诋毁污蔑我国统战领域, 有学者基于 2018—2022 年 13 家海外媒体报道, 剖析美西方涉疆“强迫劳动”谬论演变过程, 揭露美西方炮制的“强迫劳动”谬论进入工具化和政治化时期^[53]。再如, 学者以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54]。

五、不足和展望

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立场和学术研究的主体性, 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同时具有开放性，与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实践应有互动和对话。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治理实践，主体框架包括统一战线-治理、统一战线-制度、统一战线-文化、统一战线-技术、统一战线-思维等。主体框架中的每个板块都是基于中国实践、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而来的，并形成围绕不同议题的具体理论知识。

然而，当前我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基于狭义理解的统战研究多，基于广义理解的统战研究少。**狭义视野中的统一战线特指党的统一战线。该指向的统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重要性。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也呼唤我们从大历史观、大统战观来研究统战，即跳出统战论统战。**其二，对单一学科依赖多，交叉学科运用少。**统一战线学科性质、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学界对统一战线交叉学科性质、上位学科理论还未形成普遍共识，存在抽象探讨统一战线学科建设的现象。**其三，对具体问题研究多，对整体议题研究少。**有关知识生产存在碎片化、块状化的情况，缺乏系统性框架。学界对统战的研究多是基于不同议题展开垂直的深入研究，但对不同议题之间、统一战线与各议题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清晰明确的图谱式梳理，还未形成学理化、系统化、体系化的框架。有关知识生产对党的政策部署的研究阐释集中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等层面，缺乏理论范畴概括。**其四，国内传播路径多，国外发声平台少。**当前，美西方利用其国际话语霸权对中国统一战线进行妖魔化、污名化，并利用其国际社交平台的传播优势选择性截断我们的声音。这也导致国内学者虽对统一战线有良好阐释，但国际社会难以广泛接收和全面了解这些信息。

克服上述问题，要从统战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视野、学科范式、融通整合、对话交流等方面协同发力。**其一，以“大统战”思维厘清本质内涵。**坚持大统战研究视野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必然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的重要举措。”^[55]坚持大统战研究视野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统一战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厘清统一战线研究“事物之间联系”的“团结学”“力量论”内涵。这要求我们不断完善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平台载体，建设高水平统战专业学术期刊，不断增加期刊和理论研究基地的协同作用，形成良好的统战研究生态，共同推动大统战研究。

其二，以“大交叉”思维看待发展趋势。这要求我们从内外环境、政策条件、现实需要来思考统一战线学科发展。要加强学术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智库、期刊、高校同向发力、协同合作的学术共同体。鼓励学术共同体组成多学科背景团队向外交流，以接地气的方式对外发声。学术期刊尤其要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在知识创新、社会动员、弘扬中国话语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平台驱动学术共同体的良性循环，以问题导向贯穿编辑出版全过程，带动交叉学科研究。要注重学科人才培养的供需关系，以大历史观、大统战观、系统观及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思路，促进高校统战专业方向的毕业生具有更宽阔的就业渠道。

其三，以“大整合”思维链接知识成果。统一战线知识整合的重点是定位，定位的重点是厘清三方面内容：一是统一战线的本体为何；二是统一战线的上位概念、下涉议题及彼此深层联系为何；三是统一战线有何相邻议题、内在联系为何。下一步，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治理实践

的顶层逻辑来看统一战线的本体、关联与前景, 从生动的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学理范畴, 完整、清晰建构起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的纵横网络。

其四, 以“大融通”思维提升传播效力。要充分融通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社会话语, 融通使用国内外多元传播平台。一方面, 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媒介、市场主体要对政策话语和理论话语进行改编后再传播, 尤其是对外传播中需要对内容进行解构和重构。另一方面, 要善于运用国际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应用, 将经过解构-重构的信息传播出去, 争取更多知华友华人士。具体方法包括丰富话语载体, 使用短视频、长视频、漫画、游戏等; 拓宽发布渠道, 针对 Instagram、YouTube、Facebook、抖音、小红书、微信等不同平台特点, 发布不同形式的内容; 精准信息传送,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成果, 对不同群体甚至个体发布不同内容, 破解美西方对统战污名化、部分人“谈统战色变”的现状。面对这种情况, 要将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置于中国国家话语权的总体大格局中来建构”^[56]。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57]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呼唤建构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 呼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学。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化形态——统一战线学, 将在这一过程中深入发展, 并为人类社会更好处理一致性 with 多样性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增量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04-26 (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J]. 求是, 2022 (21): 4-35.
- [3] 龚少情. 试论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及其实践形态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20 (5): 109-116.
- [4] 毛泽东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415.
- [5] 为何设立这一学科? 如何培养专业人才? 探秘统一战线学 [EB/OL]. (2016-10-13) [2024-08-23]. <https://www.rmzxb.com.cn/c/2016-10-13/1079764.shtml>.
- [6] “冷门”统战学: 从科学到学科之后 [EB/OL]. (2024-07-31) [2024-08-23]. https://new.qq.com/rain/a/20240731A00JYZ00?suid=&media_id=.
- [7] 李景源. 关于搞好邓小平统战理论教学的两点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999 (4): 43.
- [8] 罗振建. 统一战线学科体系研究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1): 9-14.
- [9] 罗振建. 把统一战线学纳入国家学科的可行性研究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3): 5-11.
- [10] 张有明, 张凤玲. 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现状、问题 and 对策创新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4): 30-34.
- [11] 李小宁. 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情况的整体思考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6): 4-10.

- [12]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 [13] 张超, 曹文宏. 中共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J].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15-24.
- [14] 曾荣, 王毅昂. 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考察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6): 5-12.
- [15] 许彬.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权构建研究 [D].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2023.
- [16] 林华山. 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J]. 团结, 2024 (2): 51-56.
- [17] 潘越. 话语体系构建与顶层设计角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3): 11-17.
- [18] 李白, 肖光荣.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J]. 甘肃政协, 2023 (3): 24-29+74.
- [19] 颜苗苗. 新媒体视域下基层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J].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1): 19-29.
- [20]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9-146.
- [2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选题方向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1): 205.
- [22]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EB/OL]. (2018-12-25) [2024-08-23].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12/25/content_5352099.htm.
- [23] 陈明明.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 策略、战略与治道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6): 5-14.
- [24] 徐理响. 合作型政治: 统一战线与政治整合的中国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4): 7-14.
- [25] 王彩玲. 新时代统战工作要遵循规律把握好“四方面关系”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87-100.
- [26] 林华山, 龚静阳, 刘泮菡. 多维团结: 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2-25.
- [27]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 [28] 汪仕凯. 将人民带回中国政治研究 [J]. 政治学研究, 2023 (2): 129-139+172.
- [29] 陈家刚, 赵佳豪. 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1-13.
- [30] 林华山, 龚静阳. 建党百年统一战线发展逻辑: 从“联盟之术”到“强国之道”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1): 5-13.
- [31] 景跃进.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民主: 反思、批判与想象力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6): 40-53.
- [32]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3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0 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龚静阳. 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图谱: 维度、特征与展望——基于 2020 年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94-210.

- [34] 吕其俊.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的重要举措[J]. 中国宗教, 2024 (8): 9-11.
- [3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J]. 求是, 2023 (17): 4-11.
- [36] 俞佳奇.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及生成进路: 以大一统为中心的讨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22-35.
- [37] 王新影, 温林森. 新型政党制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成果[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40-52.
- [38] 刘志礼, 魏梓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26-37.
- [39] 俞佳奇, 秦宣.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38-52.
- [40] 曹克亮. Sora 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66-178.
- [41] 谢静. 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17-23.
- [42] 谢静.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 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17.
- [43] 刘德斌. 大国兴衰、世界之变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OL]. 思想理论战线, 2024(1): 123-127[2024-10-07]. <http://gflagzcadd5f6184ce4461ho66qx5w6vwcv60o6.fzfy.oca.swupl.edu.cn/kcms/detail/31.2184.D.20240325.1749.015.html>.
- [44] 张献生. 统战思维: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3-21.
- [45] 李爱敏.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 (2): 96-102.
- [46] 杨威, 李春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路、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OL].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8 [2024-10-12].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2406.0148>.
- [47] 韩云波, 陈思思. 社科学术期刊引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理论创新之问题议程的研究[J]. 科技与出版, 2024 (4): 5-13.
- [48] 中共中央统战部.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 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J]. 求是, 2024 (2): 23-28.
- [49] 肖存良.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 地位与作用[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2): 1-10.
- [50]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9.
- [51] 黄天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25.
- [52] 李家新, 刘甜甜, 刘子云. 何种教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3088 位大学生的实证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95-109.
- [53] 吐尔孙·艾拜. 西方涉疆“强迫劳动”谬论演变与中国应对策略——基于 2018—2022 年 13 家海外媒体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78-90.
- [54] 徐光木.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 141-153.

[55] 石泰峰.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N]. 人民日报, 2024-08-05 (6).

[56] 韩云波. 新征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分析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6) : 96-113.

[57]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5 月 17 日) [N]. 人民日报, 2016-05-19 (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年总目次

(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在当期开始页码)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源”与“道”

——一个基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黄天柱(1·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刘志礼 魏梓桐(1·26)

统一战线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团结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合形态与实践路径·····戴洁(1·38)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樊士博 白金艳(1·52)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发与政治建构·····魏崇辉 王悦(1·65)

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侯勇 柯增金(2·1)

协同监督的内涵属性、实践形式和运作逻辑

——兼论党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完善·····程同顺 王利平(2·16)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哈战荣 郑佳(2·30)

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论释与启示·····步蓬勃(2·43)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重大论断研究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内在逻辑、历史演变与当代意蕴·····刘宗灵 严静(2·58)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魏崇辉 王悦(2·69)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谭敏 吴阳松(2·8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何种教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3088位大学生的实证分析

·····李家新 刘甜甜 刘子云(2·9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法理意涵与实践路径

——基于宪法教育和普法实践的访谈研究·····杨敬之(2·110)

统一战线与新质生产力研究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效能提升与图景拓展……徐敏 汪语桐 刘靖北 (3·1)
新质生产力视野下统一战线团结力的内涵结构、逻辑机理与价值图景……曹楚楚 (3·13)
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与路径……徐光木 (3·26)
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关系、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何雨婷 刘宗灵 (3·40)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语境下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魏崇辉 李垠辰 (3·51)
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应然契合、实然逻辑与具体路径

——以生产力三要素与共同富裕三维内涵为视角……陈芳 杨二美 (3·62)
面向共同富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演绎与培育路向……刘庆莹 张莹 (3·77)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系、支撑与实践……侯亚 张雯婕 (3·88)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陈明明 杨东光 (4·1)
统战思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张献生 (4·13)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及生成进路：以大一统为中心的讨论……俞佳奇 (4·22)

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研究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缘由、定性和功能……陈喜庆 (6·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优势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要求……杨志平 刘金华 (6·10)
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样态构成、作用机制与行动路向……李昱丰 (6·23)
团结与改革的交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机制与动力保障……王艺腾 (6·34)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历史、经验与路径……杨玉文 (6·44)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高永久 冯辉 (6·56)
“合一共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牛汝极 (6·70)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欧阳彬 魏莹 (6·82)
流动与融居：交往现代化推进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路径考察……程中兴 (6·94)
舌尖上的家国：以饮食象征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路径

……李波 宋聪 (6·103)
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传播的实践探索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许丹荔 王炳涵 (6·114)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制度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汪仕凯 (5·1)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统一战线：治理功能、制度结构与实践路径……陈家刚 赵佳豪 (5·15)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钟德涛 付瑀 (5·28)

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陈 欣 (5 • 43)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及制度建设主线

——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张艳娥 (5 • 52)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 ……………柯增金 侯 勇 (5 • 64)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脉络、辩证联系与实践进路……………刘宗灵 张雨桐 (5 • 78)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樊士博 (5 • 90)

六维驱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与作用机理 ……………邓海龙 牛宝琨 (5 • 104)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张 建 (1 • 79)

“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

——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王明亮 付潇仪 (1 • 90)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高 旻 (1 • 105)

作为知识的宣传：大革命时期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与现实启示 ……王晓荣 张君尧 (3 • 13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钟厚涛 (3 • 10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叙事结构及价值意蕴

……………张润峰 (3 • 11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叙事逻辑与内涵意蕴

……………郝小刚 任志锋 (3 • 12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研究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朱松岭 (4 • 3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的内在关系和实践指向……………赵南宁 康秀云 (4 • 47)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许丹荔 蒲 瑶 (4 • 58)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钟厚涛 (2 • 122)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现状、新态势及制约因素解析

——基于 2016 年“大选”以来的选举分析……………杨昆福 (2 • 135)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香港 23 条立法的制度正当性……………田飞龙 (3 • 151)

Sora 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曹克亮 (3 • 166)

反分裂反干涉反制裁研究

司法对“台独”行为的认定与制裁……………张 龔 邵丞玉 (4 • 70)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动态、制度与前景……………田飞龙 (4 • 82)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张 建 常帅兵 (4 • 98)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内容、认知与影响

——以 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为背景……………李 恒 周生龙 (4 • 117)

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特点与动向……………杜哲元 (4 • 136)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态、危害与治理……………邓观鹏 顾友仁 (4 • 149)

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历程、表现与本质……………伍俐斌 张 骏 (5 • 115)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档案进场及其实现：以“迁台记忆”档案为例

……………郑容坤 (5 • 128)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周文星 (5 • 141)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基本样态、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郑志康 (5 • 158)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国家建构视角下乌克兰的语言冲突：影响及镜鉴……………何俊芳 朱国义 (1 • 122)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唐 健 (1 • 135)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美国干涉新疆事务 80 年（1943—2023 年）……………李 捷 杨喻博 (2 • 154)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

——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陈 静 周文星 (2 • 175)

全球超级选举年与世界政党政治新动向研究

“特朗普归来”：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周嘉希 (4 • 165)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李奕昕 王 浩 (5 • 171)

“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戴永红 刘知乐 韩瑞萌 (5 • 184)

2024 年总统大选与美式选举政治例外论的危机……………张春满 (6 • 182)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专题

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研究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国安制度体系的续建与完善……………王英津 于 顺 (6 • 124)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韩碧舟 (6 • 138)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建构、成效与完善

——基于《香港国安法》的分析……………徐天骄 (6 • 15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国民教育的历程、突破与展望……………曹宇轩 (6 • 167)

研究现状与动态

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图谱：维度、特征与展望

——基于 2020 年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分析……………龚静阳 (6 • 194)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z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6期 总第48期 第8卷

双月刊 2024年11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微信公众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20.00 元